

导 言

江苏省南通地区跨北纬 $31^{\circ}41'06''$ — $32^{\circ}42'44''$ 、东经 $120^{\circ}11'47''$ — $121^{\circ}54'33''$ ，全地区总面积约8001平方公里，南北最大距离为114.2公里，东西最长处为158.8公里。南通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北连盐城，西接泰州，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地史年龄最年轻的土地之一。南通市区及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六县^[1]范围内，除狼五山为境内唯一的浅丘群外，其余都是低平的冲积平原。

这个地区原是浅海海域，在长江泥沙与海浪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堆积而露出水面，而形成广大的平原，则是近5000~6000年内的事。它从西北部的扬泰古沙嘴起逐渐向东南延伸，向沧海争得沃土。本地区的成陆过程也就是长江北岸沙嘴东南部的发育过程。这里有一部沧海桑田的变迁史：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这里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沙洲连陆现象。

[1] 即今南通市（大市）。20世纪60年代，六县为南通专区管辖，统称“地区”。本书仍用20世纪60年代的建制名称。



位于本地区西北部的海安、如皋成陆较早，距今5000~6000年。这里地势高亢，是扬泰古沙嘴的东端。如皋的东部，远古时为大海，汉代时有一片沙洲，史称扶海洲。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间有一条夹江，汉代以来，沙洲逐渐发育扩大，而夹江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渐渐淹没，沙洲与其西边的岸陆连接了起来。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的并接是南通成陆史中的第一次沙洲大连陆。这次沙洲接陆使长江北岸沙嘴向东延伸了50多公里，廖角嘴——古代对长江北岸沙嘴顶端的称谓——到达今如东县长沙乡以东。

中部的南通市区、南通县一带形成的时间距今1500~2000年。南通市县一带于公元6世纪中期是名为壶豆洲的沙洲，后又称胡逗洲。唐代的胡逗洲已发展成一个东西约40公里、南北约17.5公里的大沙洲了。此沙洲与其北边的如皋陆岸之间有一条被称为“横江”的长江支汊。胡逗洲的东边还有南布洲、东社、长沙等沙洲，胡逗洲先后与这些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公元10世纪初，横江逐渐淤塞，最终使胡逗洲与如皋涨连，致使黄海海岸线内凹，在胡逗洲与如皋大陆间形成一马蹄形海湾。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如皋陆岸的并接是南通成陆史中沙洲连陆的第二次大并接，长江北岸的廖角嘴延伸到今余西一带。

公元11世纪中叶，在胡逗洲并接大陆以后约一个世纪，终于发生了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东布洲的连陆。

唐初，长江口出现了东沙、西沙等沙洲。此后，在它们的北方又出现了东洲、布洲等沙洲。这一带沙洲涨坍不定，变化很大。东洲与布洲是长江口的两个较大的沙洲，也是这一带的渔盐业生产基地，一度成为五代吴国长江口北侧的重要经济中心。东洲和布洲两个沙洲的位置比较接近，由于长江对泥沙的搬运作用，两沙洲约在10世纪中期并接，并洲

后的大沙洲称东布洲。东布洲的位置在今启东市北部、吕四以东以南一带。北宋初，它与通州（今南通市）相隔约100公里。东布洲与其南边不远的顾俊沙于北宋初合称海门岛。公元11世纪中期，东布洲与通州大陆并接。于是，海门岛由于其主岛的连陆，成为历史名词。这次大并接，长江北岸扩展到现在的启东市东部一带，这时的长江北岸沙嘴东部顶端称为宋廖角嘴。

此后，这一带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五代后周与宋代的海门县在元末清初之间大部陆沉，现代海门县的形成在清乾隆年间。启东县更年轻，清代中叶以前还是江口的多块沙洲，20世纪初才和大陆连接。长江江流带来的大量泥沙培育了这块肥沃的土地，但有时长江主泓向北摆动，也给这里带来灾难。

元末至清初，后周一宋代的海门土地大量坍没，这是南通历史上领土的一次大规模坍塌。

宋初海门县是长江口北岸的一个大县。宋元以来，海门沿江地带多次发生水灾，县城屡遭江潮巨涛冲击而被迫迁移。史书中江海巨涛冲毁堤岸、漂没田庐的记载屡见不鲜。由于江海冲蚀，海门县境的土地大片坍入江中。从元至正（1341—1368）到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海门县境除吕四一角外，几乎全被江海吞没。长江在吞噬海门领土时，通州东部的利和镇、余中场也被大江侵蚀殆尽，金沙（今通州区金沙镇）以东到吕四，呈一东西长、南北狭的半岛凸入海中，廖角嘴后退到吕四以东。

上文提及的马蹄形海湾，亦即地理学上称之石港湾的海域，因元末黄河夺淮改道入海，大量泥沙从江苏北部注入黄海，而黄海由北向南的近岸流又把泥沙带入这个海湾。到清末，海湾全部淤积，三余一带成为陆地，其形成是350年内的事。



东南部的海门、启东形成有100~300年，海门厅诸沙洲及崇明外沙与大陆涨连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四次沙洲大并接。18世纪初，通州东部的江口中，沙洲纷纷出水。清雍正六年（1728），原余中场南的扁担沙率先靠上其北陆岸。通州、崇明两地农民因围垦沙田而争斗不休。为解决沙案争端，雍正十三年（1735）划定通州、崇明各自管辖沙洲的范围。此后三十多年中，这一带又涨出许多沙洲，因围垦而发生的争斗加剧。为解决争沙纠纷，乾隆三十三年（1768），通州、崇明两地划出30个沙洲，连同新涨出的10个沙洲建立海门直隶厅。海门厅东南方的沙洲于清末统称崇明外沙。海门各沙间有较宽的水道相隔。光绪年间，这些沙洲终于和通州陆地连成一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崇明外沙中的惠安沙、连升沙、杨家沙等沙洲逐渐同大陆相连。至此，南通的境域大体形成。

本地区于夏、商、周时在扬州范围内。东周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后属越、楚。秦代属九江郡。西汉为海陵县东境，属临淮郡；东汉改属广陵郡。三国时属魏，后归吴。西晋属广陵郡，东晋属广陵郡，隶徐州；义熙七年起，先后属山阳、海陵两郡。随着陆域的拓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本地区的行政建置逐渐建立。东晋义熙年间，晋安帝分广陵郡地设置海陵郡。海陵郡属县中的临江、如皋、蒲涛、宁海、海安五县分布在本地。这些县于唐代以前裁撤。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本地区在海陵郡的管辖范围内。隋初，废海陵郡，本地属江都郡。唐时为盐亭场，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唐末，为浙江西道节度使控制。

五代后期，海陵以东逐渐建立州、县级行政机构。952年，南唐建立如皋县，属泰州。958年，后周设立通州，同时增设静海、海门两县，属通州管辖。此后多年，南通境内没有增加县级行政机构。1768年，建立海门直隶厅。这个海门

直隶厅即海门县的前身。1912年,通州、海门直隶厅分别改为南通县、海门县。1928年,增设启东县。1933年崇明县来属。1941年,分如皋县为如西、如皋两县。1945年,如西、如皋县分别更名为如皋、如东县。1943年,分泰县、东台、如皋三县境增设紫石县,1948年改为海安县。1949年,南通县改设南通市。与此同时,另在金沙镇设立南通县。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1950年,海安、如皋两县划属本地区。1958年,崇明县划归上海市。到1958年底,南通境内一市六县的格局基本形成。1983年始行市管县体制,六县属南通市管辖。1989年11月、1990年3月、1993年1月、1994年5月,启东、如皋、南通、海门先后撤县建市(县级)。其中,南通县改称通州市,2009年改为通州区。

本书以现代地理学对南通地貌的分区研究为基础,从历史自然地理的角度,借助地理学河口沙洲发育研究的成果,综合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参考历年来南通地区考古发掘实物,探索本地区的成陆过程和长江北岸沙嘴的发展规律,比较系统地阐述南通地区的成陆及行政机构建立的过程,为进一步研究本地区的开发,提供历史地理方面的依据。邻近的上海市崇明县、泰州市靖江县、苏州市沙洲县(今张家港市)与本地区有较密切的关系。靖江、沙洲二县一带沙洲群的出现,曾引起本地区西部江岸的大量坍塌,而崇明岛则有逐渐与北岸涨接的趋势,因此一并加以探讨。

本书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对长江北岸沙嘴的发育,用历史文献的记载作印证,概略地提出南通地区成陆的大致过程。归纳起来可以得到下列几个结论:

- 1.南通地区最初是长江口一带海域中的若干沙洲和浅丘,其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历史时期内以这些沙洲和浅丘为依托逐渐成陆的,是长江冲积的结果。海安县一带成陆最早,当是武木冰期海平面上升的产物,距今5 000~6 000



年。如皋西北部在汉初已经成陆。如东县于汉代原是沙洲，六朝时与大陆涨接。南通市和南通县一带于六朝时也是沙洲，唐末与大陆相连。南通东部地区曾经历过涨坍的剧烈变化。宋代海门县已不存在，现在的启东、海门是近300年来江中沙洲重涨的产物，启海平原是本地区最年轻的土地之一。江口地壳缓慢上升也对本地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成陆有先后，海拔高度也略有差异，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微倾斜地势。

2.南通地区的成陆存在一定的规律。海安、如皋西北部成陆较早，其余部分是在汉代以来自西北逐渐向东南，由沙洲涨接大陆、长江泓道淤积而形成的。如东、南通、海门与启东都是这样成陆的。海门、启东以及南通三余一带由于泥沙淤积，人类从事围垦，促成其成陆。长江口北岸沙洲的形成与涨接，受地球自转与来自东北方向的合成风的影响，也与长江主流逐渐偏向东南有很大关系。

3.公元7世纪和15世纪地球两度气温转暖，海面上升，对本地区有巨大影响。7世纪的一次，曾使长江江口北岸江海岸线后退，这一带于六朝时期增设的县被裁废。15世纪的一次，导致建立于五代后周的海门县大片土地陆沉。历史的教训可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以降低自然灾害对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

4.靖江、沙洲（今张家港市）两县的涨起对本地区西部有很大影响。长江江流在这一带南北摆动剧烈，靖江县与沙洲县的涨出又把江流逼向北岸，冲蚀南通西部江岸，引起如皋南境的大坍塌，一座原在北岸的段山移往南岸。护堤防坍成为如皋沿江一带多年来的重要任务。

5.由于江海泥沙继续沉积，本地区仍在继续向东发展。如果任凭泥沙沉积，则崇明岛有向北涨连的趋势；如果不作有效的治理，今后几十年内可能连接长江口北陆岸，长江口

崇明以北泓道亦将成陆，第二个马蹄形海湾又将出现。三余海积平原和启海平原的成陆都与人工围垦有关，近年来沿海围垦的发展及长江北泓的淤积，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规划提出新的课题。

总之，史料显示，汉代以前，以长江江流为主的载体所输送的泥沙，在扬泰古沙嘴之东、江南古陆之北的江口外长江江流与海水综合消能的条件下，逐步发育成沙洲。自汉唐以来，出现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洲、布洲、顾俊沙等沙洲，清初长江口北侧出现了扁担沙、大年沙、小年沙、藤盘沙、惠安沙等沙洲。自西北向东南，在沙嘴与沙洲间先后出现夹江（六朝前）、横江、布洲夹等长江江流入海北泓（支流）；因地球自转与东北合成风的共同作用，入海江流主泓渐渐偏向江南古陆，北泓之内的江水流速缓慢，有利于北泓内泥沙沉积而封闭。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间的夹江，其封闭时间约在公元5世纪初；在向东延伸了的扬泰古沙嘴与胡逗洲、南布洲间的横江，其封闭时间在公元10世纪初，而形成马蹄形海湾，这一马蹄形海湾南缘形成通吕水脊西段；通吕水脊西段与东布洲之间的布洲夹在11世纪中期封闭，通吕水脊西段向东延伸。18世纪以来，通吕水脊以南的长江泓道中涨出了数十个沙洲，且与水脊陆土并接，今海门、启东境土涨出。这便是长江江口北泓在地球自转与东北合成风共同作用下的封闭规律，以及南通地区由沙洲自西北向东南不断延伸的规律。



南通的自然地貌及其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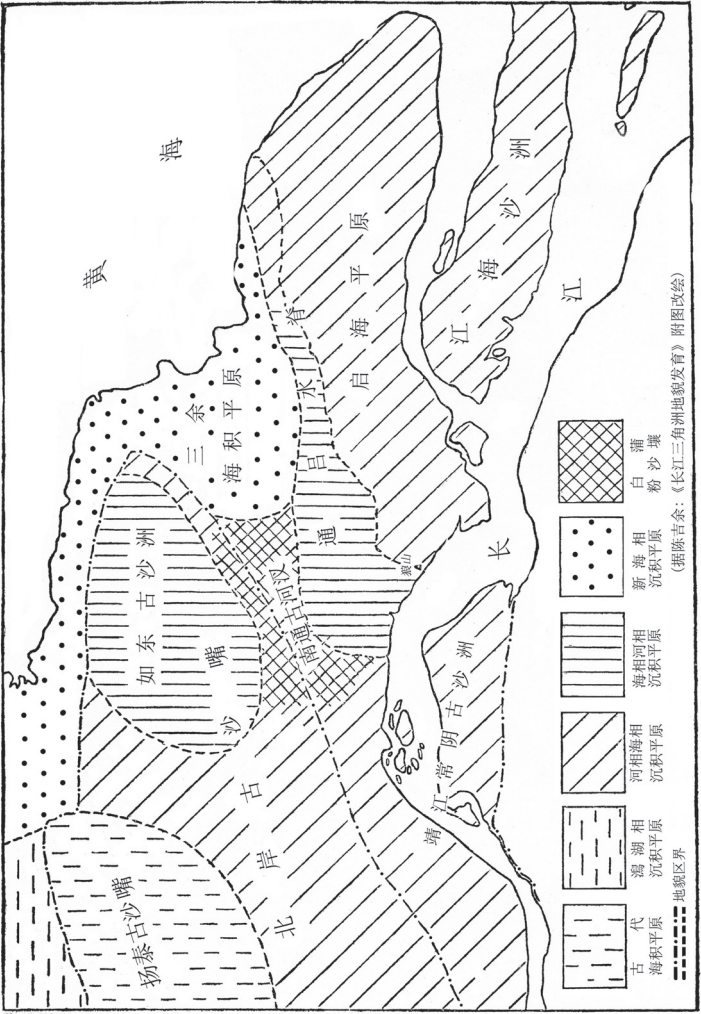
地貌分区

南通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北侧，绝大部分地势低平，除南通市区南部狼山一带外，均为长江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由于成陆时间和形成原因不同，有1~2米的低微起伏。地貌分区并不十分明显。从地理学的角度，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图1）：

1. 狼山浅丘群

狼山浅丘群位于南通市市区南9公里的长江岸边，经历代营造，已成为南通市郊主要风景区。这一浅丘群自东向西有军山、剑山、狼山、马鞍山、黄泥山，合称狼五山，呈弧形排列，延长方向约4公里，宽约1公里。山体主要为单斜构造。它们和苏州、无锡一带的浅丘群一样，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江南古陆下沉后残留于地面的高顶。

据文献分析，这一浅丘群在唐代及其以前为长江口海域的小岛，宋初仍在江中，宋中叶以后才渐与大陆相连。元、明时军山又曾坍入江中，直到清康熙末年才再度与大陆并接。狼山，高104.8米，因山岩多紫色，又称紫琅山。剑山，高





80.5米，因形似宝剑而得名，旧有剑迹山、刀刃山等名称。军山，高108.5米，相传因秦始皇曾驻军于此而得名。马鞍山，濒临江边，高49.4米，宋代称仙女山，明代也称塔山、黄



狼峰雄踞



剑军对峙



江滨黄马

图2 五山浅丘

泥山,今名马鞍山。黄泥山,濒临江边,位于马鞍山西侧,高29.3米,宋、明两代曾称马鞍山,今名黄泥山。(图2)

2. 长江北岸古沙嘴

北岸古沙嘴由扬泰古沙嘴和如东古沙洲两部分组成,位于本地区的北部,其投影略呈三角形。它是自西向东逐渐发展形成的。北岸古沙嘴区西缘大致在扬州东南到泰兴西部江岸一线上;北缘沿泰州、海安间的通扬运河北侧,东循原范公堤(捍海堰),经海安县李堡、如东县丰利到掘港;南缘沿泰兴、靖江两县间的界河,东经如皋城与石庄之间,再东经如皋县白蒲、南通县石港以北而达如东掘港。本地区的海安、如皋和如东三县大部分地方就在这一沙嘴上。

扬泰古沙嘴西连扬泰,东达李堡,东西长约100公里,宽约25公里,是距今五六千年间海面最高时期的产物。其平均高度为海拔7~8米,地势较高,通称扬泰岗地。岗地北边为里下河洼地,南边为泰兴、长江河漫滩平原。里下河洼地为低洼平原,其西北部海拔约2米,东南部约3米。这里曾为古潟湖。长江河漫滩平原海拔4~5米。因此,这条岗地成为一条分水脊。岗地上分布着一些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条状沙脊,沙脊之间存在着一些洼地。这是当年在成陆之前因波浪作用而致泥沙沉积的结果。海安李堡、如皋到卢庄的岗地应是最后的一列,为扬泰岗地的东南极限。20世纪70年代,海安县西北部沙冈公社青墩发现了新石器遗址,80年代又在隆政公社吉家墩发现了新石器遗址及动物化石。这说明5500年前人类已在这一带从事生产活动。^[1]

北岸古沙嘴的东西部成因并不一致。从地貌成因类型分类,西北部的海安一带在本地区成陆最早,其形成约有5000~6000年,属于海相沉积,是扬泰岗地的东部边缘。

[1] 参见南通博物苑:《南通历史文物参考资料》,1979年。



1969年，海安县西场公社新农9队出土古树木一株，长4米，其中段直径28厘米，部分炭化。经南通博物苑取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碳元素测定，这段树干距今时间为4630年 $\pm$ 100年。古树木的出土地点在扬泰岗地东端，与推定沙嘴生成时间基本相近。扬泰岗地东南方的如东地区属于海相河相沉积，从成因类型上看与岗地不同而与通吕水脊区的古沙洲相似。可以设想，如东在古代也是沙洲，后来与岗地连接，成为长江北岸古沙嘴的延伸部分。

3. 通吕水脊

通吕水脊区为通吕运河所经，故名。该区西起南通市天生港、南通县平潮镇附近，东到启东县吕四镇、通吕运河两侧。水脊区东西长约82公里，其西部南北宽约32.5公里，东部南北宽3~7公里，平均海拔4~5米，它比其南侧的启海平原及其北侧的三余垦区高1米左右，形成一条脊地。它与三余垦区的界限并不明显，呈微缓的倾斜；与南面的启海平原间则有比较显著的高差。因此，通吕运河和启海平原的水道之间曾筑有堤坝控制水位。水脊西北与如皋之间还存在一条低洼地带。显然，水脊并非北岸古沙嘴的直接延伸部分。

这块水脊最初是几块分散的沙洲，后由沙洲涨连合并而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该区最大的沙洲位于水脊西部，南北朝时称壶豆洲，唐代为胡逗洲。公元10世纪初，它与长江北岸古沙嘴并接，成为北岸古沙嘴的东端。公元11世纪中叶，其东边的东布洲又与之相连。胡逗洲大致就在今南通市及南通县（今通州区）西部一带。水脊区面积原来较现在的为大，五代后周设立的通州及其辖县静海、海门就在这一范围内。公元14~17世纪，古海门县坍没，仅剩下吕四一地，形成现在的狭长地带。

4. 启海平原

启海平原位于南通地区东南部，在通吕水脊以南，军山

以东,包括南通、海门、启东三县的南部地区,是本地区内成陆最晚的地带。东部于宋元之际属古海门县,公元15世纪海面上升,长江主泓道向北偏移,导致长江江口段北岸土地大量坍没;自元末至清初,古海门县境土不断受到坍蚀,致使一个江口大县消失。清雍正、乾隆年间,这里重新涨出许多沙洲,乾隆中设置海门直隶厅。海门厅的大部分沙洲逐渐与大陆涨接,其东部的沙洲延至20世纪初才与大陆连接,1928年建立启东县。由于本区多为新涨圩田,地势低于通吕水脊区1米左右,平均高程2~3米。启海平原多以沙洲并接的形式形成,沙洲形成先后不一致,先涨出先围垦,地面仍略有起伏。

5.南通古河汉

南通古河汉位于长江北岸古沙嘴和通吕水脊之间,西起如皋石庄附近,东经白蒲、石港抵达三余海积平原。沿南通、如皋两县分界线两侧,西端南北最宽处35~40公里,其间为一低洼地带。当通吕水脊尚处在沙洲阶段的时候,这里是长江的一条支泓道。自通吕水脊和北岸古沙嘴涨接连陆之后,它才逐渐干涸成陆。因此,古河汉地势低洼,水网稠密,有许多荡地。车马湖、六祥符湖等湖泊就在古河汉内。20世纪初古河汉内仍有大小不等的草荡,每年大水期间大部积水,生长芦苇、红蒿。这里的土质呈粘性,颗粒细小,含多种有机质。这里为本地区建筑材料的重要产地,居民多以烧制砖瓦为业。我国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曾于20世纪30年代到南通作调查,从他绘制的土壤地图上可看出,这一狭长地带的土壤与其南北两侧截然不同,被称为“白蒲粉砂壤”。这正是因为这里是长江古河汉的遗址。

为保持通扬运河的水位而又便于排除古河汉地带的积水,历代在古河汉区西口附近的白蒲、平潮到唐闸以西一带,筑有许多水坝。水坝以西地势更为低下,它的成陆应较



晚于古河汉地区。古河汉的东口，即三余海积平原。

6. 三余海积平原

三余海积平原西与南通古河汉相连，西北起于原范公堤，南抵原沈公堤，北到鲁家汀子，为如东、南通、海门三县的接壤地带，为海相沉积。海堤外侧，以南通县三余、十总和如东县华丰为中心，呈马蹄状。这里原本是长江支泓道——古河汉的东端入海口，通吕水脊区涨连大陆后成为残存的海湾。黄河改道从苏北入海后，苏北近海含沙量增加，大量泥沙为近岸海流搬运，在海湾沉积，这里逐渐成陆。遥望港（洋岸港）自西向东贯穿本区中部。全区平均海拔3.5米左右，地势自北海堤向遥望港微微倾斜。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人们在这里围堤垦殖，使之全部成陆，为南通地区成陆较迟的地块之一。

7. 靖江常阴古沙洲

靖江常阴古沙洲为长江下游新三角洲的起点。靖江、常阴原来都是江心沙洲，由于长江沙嘴不断向东伸展，长江口外移，这些沙洲与江岸之间的河汉逐渐淤塞，沙洲和大陆连接。江北岸的沙洲上建靖江县，江南岸的沙洲上建沙洲县（现为张家港市），行政上不属南通市。这里的地势一般为海拔4~5米。历史上这一带江流摆动剧烈，对南通地区的如皋及南通市区的江岸影响很大。

8. 江海沙洲

江海沙洲位于南通地区的东南。这里是长江口，江面开阔，为长江的消能地带。由于泥沙大量沉积，这里形成许多沙洲，以崇明岛为最大。在合成风、潮汐作用及地球自转的影响下，江流主泓道逐渐偏向东南。这一带江岸呈现出南坍北涨的现象。长江北泓道日渐淤浅，崇明岛西北端有与长江北岸连接的趋势。沙洲上的崇明县，行政上属上海市。

南通地区形成的主要原因

南通地区位于江海之交，地当长江入海口的北岸。它是由长江北岸沙嘴不断发育合并若干沙洲而形成的。长江年入海流量达 1.06×10^{12} 立方米，平均年输沙量在4.5亿吨左右，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起主导作用。长江口一带的大地构造古老，属于江南古陆的一部分。中生代时期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对本地区断块造山起了很大的作用，狼山等断块山逐渐形成。2 5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江南古陆下沉，接受大量的沉积物。南通狼山浅丘群是江南古陆下沉后残留于地面的高顶。

早在人类历史时期以前，这里处于长江入海口，江口以外是较深的海域。当时长江所搬运的泥沙还不十分丰富，大部分泥沙在距江口较远处沉积下来，形成水下三角洲。最先形成的为古代水下三角洲，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略呈扇形。其外缘和50米等深线相符。扇形的中心线与外缘的交叉点在北纬 $32^{\circ} 18'$ ，距江口约200公里处。中心线呈东偏北方向，这就是古代长江主泓的方向（图3）。

在古代水下三角洲之上，覆盖着一个现代水下三角洲，其边缘为水深10米的等深线。这个扇形三角洲的中心线呈北到东南的方向，显然和古代水下三角洲的中心线不相符合。据此可以说明，长江河口段主泓的流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东南偏移。这种现象是由地球自转而形成的科里奥里斯力与来自东北方向的合成风作用的结果。由于长江主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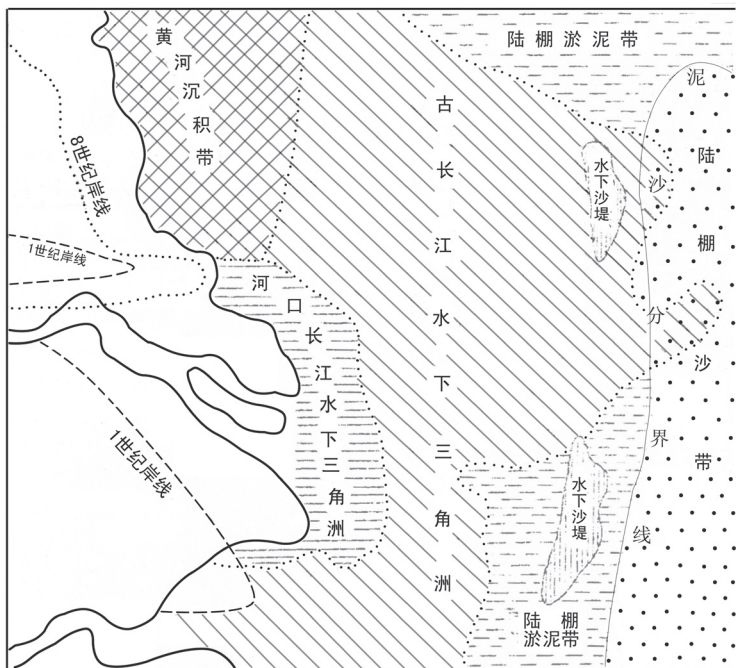


图3 长江口外水下沉积分布

(借用《地理学报》卷23第3期,陈吉余:《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一文附图)

逐渐偏南,接近长江北岸的江水流速较缓慢,因此有利于泥沙沉积,江口沙洲大部接近北岸,并逐渐向北涨接,从而加速了长江北岸沙嘴的延伸。

当古代长江水下三角洲形成时,波浪作用促使部分泥沙在江口两侧堆积而形成沙嘴。在长江北岸,最先形成沙嘴的是扬州到李堡附近的扬泰岗地。这块岗地上存在一列列呈东北—西南方向的沙岗。现代地理学者根据对组成沙岗土壤成分的分析,判明岗地中心的土壤颗粒比较粗大(直径为0.04毫米),从中心到岗地南北两侧及东部的颗粒逐渐减小,岗地

物质比河漫滩直径为0.01~0.02毫米的组成物质要粗得多。并且,岗地有海生贝壳存在。由于岗地平均高度为海拔7~8米,为现今最高水位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可以断定这条沙嘴不属于河漫滩相沉积。从太平洋沉积物质的放射性碳的研究,推断武木冰期以后距今6000年左右,地球上曾经有过最高的气温。这时,海面上升,海岸后退,波浪作用和长江口的涌潮为这块岗地带来较高的沉积。

南通市区及南通、海门、启东三县于古代均处于长江泓道之中。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为因素破坏了长江上游的森林资源,使那一带土壤流失严重,长江含沙量增加,为江口地段泥沙的沉积提供了物质来源。汉代以前长江口为一喇叭形的海湾,与现代钱塘江口外的杭州湾相似。由于江口骤然开放,江流流速降低,泥沙易于堆积而形成沙洲。与江水相比较,海水所含电解质极为丰富。电解质与江流中的杂质交混形成大量胶态悬浮物质,即所谓“江花”,从而促使泥沙凝集沉淀,加速沙洲的发育。钻探证明,南通、崇明一带地层中,第四纪沉积物厚度在300米以上,距地面70米左右深处有介壳、骨质海绵化石存在,说明南通地区远古时期确是大陆附近的浅海海域。

长江主泓逐渐折向东南,近北岸水流缓慢,有利于泥沙的沉积,沙洲在这里不断形成。近北岸沙洲间的夹江、支汊也因此容易淤积,沙洲与沙洲易于连接成片。当近北岸的最后一条夹江淤塞后,长江北岸古沙嘴与沙洲合并,造成沙嘴的延伸。南通地区的所有古代沙洲,如东古沙洲、胡逗洲、东布洲等,均循此规律合并、接涨,北岸大陆不断向东南延伸。唐末以来,通吕水脊区西部的胡逗洲等沙洲涨接大陆。随后,宋代又有东布洲的涨接。近三百年来,海门、启东成陆,而崇明又有和北岸涨连的趋势。种种现象都说明,长江北岸沙嘴在发展过程中,是逐步由一个个沙洲涨接北岸延伸而形成的,这种发展



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如前所述,距今6000年前地球上曾有过较高的海面,平均高程7~8米的扬泰古沙嘴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据现代地理学者的研究,由于来自东北方向的合成风的影响,北岸古沙嘴起初延伸的速度小于南岸沙嘴延伸的速度。因此,早些时候南通地区扩展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自从江流主泓偏向东南以后,北岸附近沙洲沉积的速度加快,促成了本地区境域的发展。长江江流主泓不时摆动,对本地区的影响很大。当主泓摆向北岸时,便造成本地区大片江岸土地的崩坍。千余年来,这一直是这里的重要威胁。元代,黄河下游河道南徙,黄河从苏北入海,黄海海水含沙量大大增加,黄海海水泥沙在黄海近岸海流的作用下,向南黄海海边输送,助长了南通沿海沙洲的沉积,加速了海岸的延伸。

此外,从本地区整个地势来看,成陆较早的海安西部接近泰县一带的岗地,平均高程可达7~8米,中部成陆较晚的通吕水脊区为5~6米,最后成陆的启海平原和三余马蹄形海积平原则在3~4米,形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倾斜。成陆时期先后不同,而高程递降,反映了这一带地壳存在缓慢上升的现象。因此,地壳上升是本地区成陆的又一因素。

汉唐期间如皋以东地域的扩展

汉代以来，历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南通地区西北部地域不断扩展。由于这段历史时期内关于本地区的历史记载十分罕见，因此这个时期内南通地域的扩展情况并不十分清晰。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在本地区成陆最早，长江北岸古沙嘴扬泰岗地的东端沿海一带，因海潮的作用形成一道道沙岗，这些沙岗成为当年江海岸线的标志。在古代，海安县李堡镇和如皋之间存在着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沙岗，即赤岸。这是汉代江口一带的北岸岸线。

如东县地是长江北岸古沙嘴的尖端部分。这里曾是汉代古沙洲分布地。这块古沙洲即扶海洲。约在公元5世纪初，扶海洲与其西边扬泰岗地连陆，如皋以东地域向东扩展。



汉代江岸线及古扶海洲

如前所述，南通地区西北部的扬泰岗地是距今5 000~6 000年间海面最高时期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海安县西北部的沙岗青墩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说明几千年前这里已有古人类活动。1973年8月，海安县沙岗公社青墩大队农民在开凿河道时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据南通博物苑的调查，其中有斧、锄、镞、凿等石器和陶器、玉器、骨器。这是南通地区第一次发现新石器遗址。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苑等单位联合在青墩进行考古挖掘。到1979年9月，在35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墓葬90多处。在青墩新河与三扬河之间的第一探方第六层淡灰土中发现一古树根。经C₁₄测定，此树根距今 $5\,405\pm110$ 年。青墩新河与东塘河之间第二探方的第四五层内发现两个灰坑中有木炭。经C₁₄测定，这些木炭距今分别约 $5\,970\pm190$ 年和 $5\,235\pm125$ 年。经考古工作者鉴定，这批墓葬属于原始社会末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进化的阶段。青墩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扬泰岗地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遗址的年限与扬泰岗地形成时间的推断结论相近，可以据此断定，长江北岸古沙嘴的扬泰岗地东端成陆确有5 000~6 000年，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是南通地区成陆最早的地方。

扬泰岗地形成以后，其东部最早的行政机构为汉代的海陵县，此后直到晋末，约500年间没有新的发展，由此反映出这里经济开发较为缓慢，同时也说明了这一带陆地的扩展速

度并不快。唐以前的历史典籍很少有关于本地境域扩展的记载,古遗址和古文物更少有发现。嘉庆《如皋县志》及《读史方輿纪要》存有如皋县境的发繇口、会盟原等吴主会诸侯所在的记载。^[1]这种记载,宋代著名的《太平寰宇记》《輿地纪胜》都未著录。当年吴王选择这个不在交通要道的海角作为会盟之地,实难置信。也许他有强大的水军作后盾,企图不战而屈其他沿海诸侯之兵。这一点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证实。就经济开发而言,海陵置县始于汉。就自然地理而言,这里有关于汉代河道及岗地的记载。由于汉代江岸线的所在有史料可征,可以藉以推定本地域汉时的大体范围。

现代学者关于南通地区古代江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根据丁嘯推算,纪元前的海面较今高3米,推定周代长江江口海岸线在南通市天生港附近。^[2]第二,根据汉代运河的走向推测,认为汉代“吴王濞为运海盐而开凿通扬运河,西起茱萸湾,东仅止于白蒲”^[3],今南通一带当时尚为“盐泉海贼之所聚,无历史可传”的地方,而指长江口在天生港附近。第三,根据本地的地貌特征及历史文献,认为汉魏及南北朝时的江口岸线在泰兴北部经如皋、石庄间,再经白蒲至石港的一线上。^[4]

以上第一、二两种说法都认为汉以前的江口在天生港

[1] 清嘉庆《如皋县志》卷22古迹。又《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州如皋县。

[2] 刘象天:《南通专区的棉垦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集刊》第1辑。

[3] 程潞:《南通地区经济地理》自然条件注3,《华东师范大学地理集刊》第1辑。

[4] 陈吉余、恽才兴执笔:《南京吴淞间长江河槽的演变过程》,1959年《地理学报》卷25第3期。



附近。其时代，前者估计为周代，后者估计为汉代，时间上相差达10个世纪。这两种说法都值得研究。

第一种说法并不恰当。首先，如果天生港附近是古代江口所在，其附近就应有海潮堆积的沙岗存在，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次，如果古代江口在天生港附近，那么天生港以西的地面高程便应高于天生港以东的通吕水脊区，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天生港以西为长江古河汉分支处，后来涨接之地多圩地，反而低于被认为是海域的通吕水脊区。因此，从海面的高度来推断海岸所在，其结论并不可靠。

第二种说法存在引用文献方面的错误。《天下郡国利病书·扬州》引《扬州府志》：“汉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说明邗沟的东端是在如皋蟠溪而不是白蒲。蟠溪在如皋县北，与南通天生港相距较远，因而不能据此断定当时海岸线就在天生港附近。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观察地貌、结合历史文献来推断的，比较接近事实。不过，由于本地区开发较晚，唐朝以前的历史文献对这里的记载远欠丰富，要作肯定的判断尚有困难。如果说汉代以前的江岸已如第三种说法，为什么汉魏以来，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几个县治并无任何遗迹可寻？因此，第三种说法同样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书就汉代长江北岸岸线与古沙嘴的延伸，分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 汉代江口岸线—如皋岗地—赤岸

汉代长江口北岸岸线于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可以从汉代以后有关长江口形状的文字描述推定这条岸线的位置。汉代到南北朝时，长江口呈喇叭形，自扬州向东，江面逐渐开阔。海潮从江口上溯，奔腾澎湃，形成涌潮（图4）。江潮在镇江、扬州以东附近一段产生的涌潮现象，类似于现代钱塘江潮的广陵潮。汉魏南北朝文献中有不少描述著名



图4 江涛奔腾（模拟）

广陵潮的记载。

汉代辞赋大家枚乘的《七发》中提到汉代吴国大潮。他以“客曰”的形式建议吴王“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曲江”^[1]。在形容潮势的壮观景象时他写道：

……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弭节伍子之山，通利骨母之场。
凌赤岸，躐扶桑，横奔似雷行。

晋代山谦之《南徐州记》中也记下了每年秋季大潮时江涛汹涌的盛况。东晋文学家郭璞在《江赋》中描绘了广陵潮的盛大场面：

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于柴桑……《七发》曰：
凌赤岸，或曰“赤岸在广陵兴县”。^[2]

[1] [南朝梁] 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570-1571页。

[2] [南朝梁] 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558页。



南北朝时，广陵潮仍然十分壮观。《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记“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当年，南朝南兖州驻广陵，即今扬州，海陵为今泰州，京口为今镇江，可见观潮地在扬州东面不远处。这些作品对广陵潮的描绘，说明从汉代至南北朝，广陵潮为一大名胜景观，也反映了当年的长江口自江口向西渐趋狭窄的状况。

对于汉魏南北朝文献中的赤岸，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郭璞、山谦之文中的赤岸是指六合县境内的赤岸山，并且说明发生涌潮壮观的地方在赤岸山下。东汉广陵郡下有舆国，晋广陵郡下有舆县，说“赤岸在广陵兴县”，“兴县”实为“舆县”之误。赤岸山在今六合县东南，山临长江，江岸色赤红。《读史方輿纪要》六合县条下记有赤岸山：

赤岸山 在瓜埠东五里，下临江中。《南兖州记》云：潮水自海门入，冲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势始衰。郭璞《江赋》所称“鼓洪涛于赤岸”也。《寰宇记》：山高十二丈，周四里，临大江，土色皆赤，因名。

南朝刘宋永初（420—422）年间，广陵潮气势依然磅礴，并且在长江北岸的赤岸山以东至扬州一段最为壮观。江涛过赤岸山西上后，潮势开始减弱。李善对于《江赋》“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于柴桑”句中的“赤岸”采用两说并存的手法，说明赤岸有两处，一为“凌赤岸”中的赤岸，一为“或曰”所称的广陵舆县的赤岸。对于枚乘《七发》里的赤岸，李善专门做了解释，认为从文势来说，“凌赤岸，簪扶桑”的赤岸应另有所指，而不是赤岸山。李善引用曹子建及山谦之的文章并作注，说：

赤岸，盖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谦

之《南徐州记》：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按在镇江以西句容以北），北激赤岸，尤更猛烈。然并以赤岸在广陵，而此文势，似在远方，非广陵也。

李善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凌赤岸”应解释成海潮漫越“赤岸”，这个赤岸就是汉代江口一带的江北岸线。自汉代到南齐，“广陵潮”的壮观盛况无异于现在杭州湾的海宁潮。从自然地理的条件判断，只有在喇叭形的条件下，江口愈向上游愈趋狭束，才有可能产生盛大的涌潮现象。这也反映了当年的长江口呈喇叭形，江口北岸向东北方向展开。这个方向基本上和如皋、海安李堡间岗地的方向吻合。这些岗地位于北岸古沙嘴区扬泰岗地的东南部，岗地的东南方是如东古沙洲。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岗地是北岸古沙嘴和如东古沙洲接涨前的最后江岸线。（图5）

通州及如皋地方志中记有“赤岸”。这条“赤岸”实际上位于江海之交，应当是早期的古代江岸。明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山川》对如皋境内的这条沙岗做了如下的描述：

赤岸 在县东北跨南，延亘计六七十里。脉接蜀冈，土高色赤，故名。

从赤岸“东北跨南”的走向来看，这条沙岗应位于当年的江口。显然，这是在古代江海波浪作用下，泥沙堆积形成的。《读史方輿纪要》扬州府条下记，蜀冈在“府城西北四里，绵亘四十余里，西接仪真、六合县界，东北抵茱萸湾，隔江与金陵相对”。赤岸“脉接蜀冈”说明这条沙岗成为扬泰古沙嘴的东南延伸部分。清嘉庆《如皋县志·疆域·山阜》对赤岸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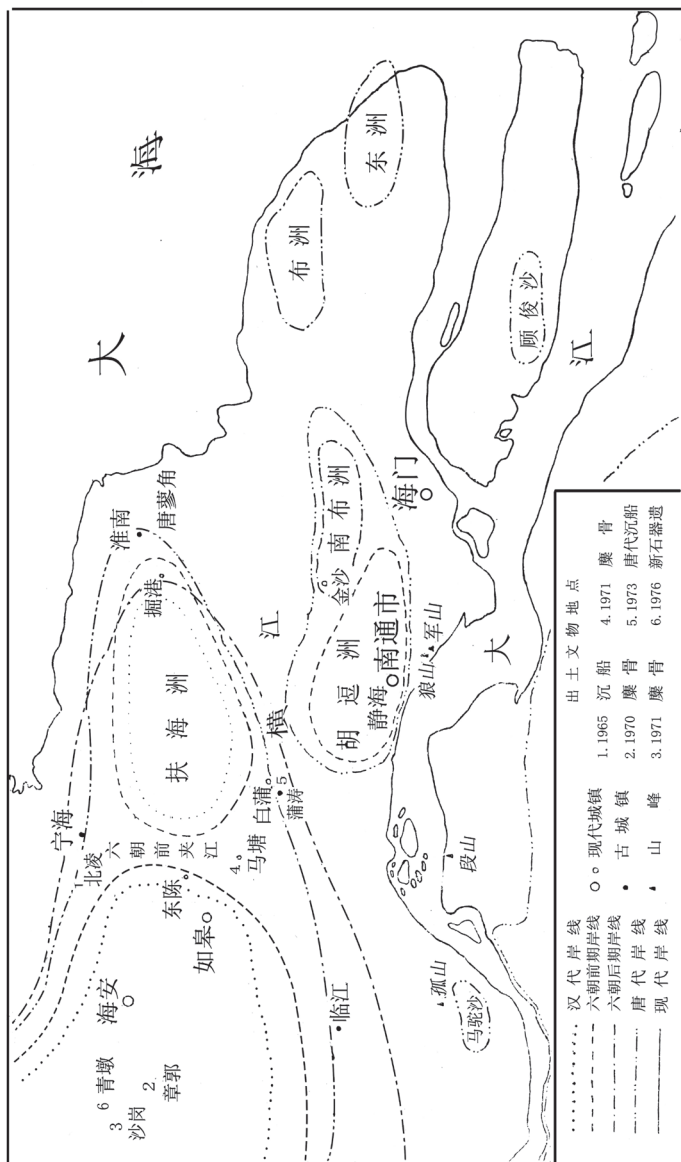


图5 唐代以前江岸变迁(示意)

赤岸 县东北迤南，延亘六七十里。脉接蜀冈，土高色赤。枚乘《七发》云：凌赤岸。郭璞《江赋》：鼓洪涛于赤岸。《文选》注：在广陵舆县。如皋即汉舆县地也。

清嘉庆《如皋县志》的作者对枚乘《七发》“凌赤岸”所做的注释是正确的，但把这个赤岸与郭璞《江赋》中的赤岸列在一起，这就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赤岸。《文选》注所说的“在广陵舆县”的赤岸是郭璞《江赋》中的赤岸。县志作者为了自圆其说，加上了“如皋即汉舆县地也”的注释，其实这是错误的。舆县，在广陵西，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并入江都县^[1]，与如皋无涉。嘉庆《如皋县志》作者所注只对了一半。民国《如皋县志》的作者对此做了改正。明嘉靖《如皋县志·山川》中另有县南70里的“平阜”：

平阜 在江宁乡，去县南七十里，东西延亘六十里，土高阜，相传为江岸。

这条“平阜”距如皋县的里程“七十里”之数可能有误，但可以说明如皋县南也存在一条“高阜”。这应当是宋以后的江岸。

汉吴王濞为通海运盐，开运河自扬州茱萸湾到蟠溪^[2]，这条运河应当是南通地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对于蟠溪，明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山川》解释说：

蟠溪 古邗沟，在赤岸乡。溪滩宽广，中多洲渚，湾曲如龙蟠，故名。西接运河，东入海。

[1]《读史方輿纪要》卷23扬州府江都县。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2册，引《扬州府志》。



赤岸乡在如皋县北，现属海安县的李堡镇，清代属如皋。这条古水道可能就是西场、李堡间的古河。清嘉庆《如皋县志·疆域·河渠》转引知县郑见龙碑记：

治北李家堡镇之西偏，名老鹤嘴，其为水所汇者有三河焉，曰古河、洋河、新河。新河为鹺运之河，上接淮水，频年疏浚，较古河、洋河深八尺余。古河为民地内河，洋河为灶地内河，虽流与新河接而浚串场河道者不及之，以故日浅且淤。农民无以为灌溉，灶户无以为樵煎，于是筑坝之议兴焉。

从这段碑文的内容来看，古河为“民地内河”，洋河为“灶地内河”，两河道与新河水道有别，其间必须以土坝相隔，以保持“民地”、“灶地内河”的水位。古河在赤岸的内侧，且近海，刘淠的运河止于蟠溪，县志所说的古邗沟应该就在这里。县志中另有邗沟铺（一称十里铺）的地名，这应当是蟠溪沿线的一个小集镇，为古蟠溪所经之地。

海安县李堡镇和如皋之间东北—西南走向的沙岗，大致东北起李堡附近，经如皋城北，西南接卢庄。其西北侧为小溪河，东南为龙游河和小芹河。岗地地势高亢，成为一条分水脊。小芹河以东的如东县地为古代江口沙洲所在。自从如东古沙洲和扬泰岗地涨连以后，海潮作用不再对沙岗发生影响。所以，北岸古沙嘴的海相沉积只到这里，成为扬泰岗地最东端的沙岗，古代称之为赤岸，说它“土高色赤”，“西连蜀岗”。汉代的江口北岸岸线，应即在如皋境内的赤岸一线。

2. 古扶海洲和如东县地的形成

如东县地是长江北岸古沙嘴的尖端部分。如东县北部濒海古代海堤由西北向东南的走向，与阜宁、盐城间海堤的由北向南的走向并不一致，且两海堤的建筑年代也不相同。而如东县与其西边的扬泰岗地之间小芹河沿线一带存在着

比较低洼的荡地，这一带的土质属海相河相沉积，与通吕水脊古沙洲的沉积相似。可以推断，如东县境曾是古老的沙洲所在地。我们认为这块古沙洲即扶海洲。

扶海洲的实际位置在何地，史料中并无具体说明。然而，在通州地方志中，有把扶海洲与东阳县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后人一般以为东阳县就是泰州，扶海洲就是通州。南通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不乏以“扶海”描绘通州的例子，而通州地方志中表述得更为明确。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疆域志》认为，通州“后汉为东阳县地，属广陵郡，隶徐州刺史部”。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名迹》记载：“扶海洲，在州境，后周广陵郡东阳县地，多蒹草。”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下《名迹》中“后周广陵郡东阳县”的问题。“后周”当是“后汉”之误。东阳县，则应是海陵县。《后汉书·郡国志》将“东阳”列在广陵郡下。建立于汉代的海陵县于《后汉书·郡国志》中却没有记载。一般方志都认为东汉时海陵县被裁撤且并入东阳。东阳县西汉时属临淮郡，故城在天长县东南约70里处^[1]，位于今扬州市西北。海陵县即今泰州市，在扬州市之东。东阳、海陵之间隔有广陵、江都、舆县等县，两县并不接境，且距离较远，似无合并的可能。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州条下记：

建陵废县 在州东北……晋义熙中侨置于此，
属山阳郡，寻属海陵郡……大业初复省入海陵县。
或曰秦汉时东阳废县，在州东百里，其东有长洲泽。
又东有扶海洲，今湮。

《读史方輿纪要》的作者把东阳废县附在建陵废县条下，明显有误，称“或曰”是有保留的引用。东汉海陵有没有

[1]《读史方輿纪要》卷21天长县。



并入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没有说明,但是《后汉书·郡国志》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东阳县条的原文及其注文,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东阳 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

(注)县多麋。《博物记》曰:“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畷。民人随此畷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又:“扶海洲上有草焉名蒹,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

《后汉书·郡国志》中的这条注文在其他的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博物记》又称《博物志》,晋张华撰,书中有山川地理知识,还载有奇异的草木虫鱼等。不过这本书的字句有脱误,所以我们看到的本子与古本就不尽相同。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关于麋的记述是作为“佚文”处理的。对于“县多麋”现象,在北宋《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条下也有记录:

麋畷,《博物记》云:海陵县多麋,千万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畷。民随而种,不耕而获,其利所收百倍。

除《太平寰宇记》所引以外,《政和本草图经》卷48与嘉庆《如皋县志·物产》关于麋的记事,都采用陶弘景的说法:“今海陵间最多,千百为群。”《太平寰宇记》的这条引文和《后汉书·郡国志》东阳县的注文基本相同,出处都是《博物记》,所不同的是《太平寰宇记》明确指称海陵县多麋,而《后汉书·郡国志》的注则列于东阳县条下。显然,《后汉书·郡国志》所谓“县多麋”的县应是海陵而不是东阳。

《后汉书·郡国志》为刘昭据司马彪《续汉书》编成,其内容应早于沈约的《宋书》。《后汉书·郡国志》不载海陵

县应有遗漏。海陵县于东汉时仍然存在且属广陵郡，这在《宋书》与《三国志》中均有所反映。《宋书·州郡志》广陵郡中明显列有海陵县：“海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说，吕岱是“广陵海陵人”。这两条资料可以说明东汉广陵郡的下属县中有海陵，该县于三国之际兵乱时才荒废。

《后汉书·郡国志》把海陵县的记事列于东阳县条下，显然有错乱的地方。既然《后汉书·郡国志》东阳县条下的注文为海陵县的记事，那么扶海洲在海陵县境内可以肯定无疑。

扶海洲的准确位置由于文献无征，不易确定，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洲多蒹草这一物产特征来推断其位置。蒹草是一种生长在海滨沙地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政和本草图经》卷26中说：“蒹草……出东海洲岛，似大麦，秋稔，一名禹余粮。”《博物记》：“海上有草焉，名蒹。其实食之如大麦，七月稔熟，俗名自然谷或曰禹余粮。”《博物记》所记与《后汉书·郡国志》的引文相吻合。《博物志校证》对“海上有草焉，名蒹”做了注，范宁根据《齐民要术》、《后汉书》、《太平御览》等著作中的相关记述认为，应补上两字，成为“扶海洲上有草焉”。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五谷》：

《博物志》曰：“扶海洲上有草名曰‘蒹’，其实如大麦。从七月熟，人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转引了《博物志》的记录，其837卷百谷部记：

《博物志》曰：“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蒹，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



余粮。”

然而,《太平御览》的药部与百卉部对茈的产地则说:“《博物志》曰:‘海上有草焉,名曰茈草。’”对茈草的记述则又比《博物志校证》略为详细。其药部记:

《博物志》曰:海上有草焉,名茈草,其实如粉,食之如大麦。七月稔熟,民敛至冬乃讫。名自然谷,或曰禹余粮。

百卉部记:

(《博物志》)又曰:海上有草焉,名茈草,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名曰自然谷,或曰禹余粮。

《太平御览》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要迟于《齐民要术》450多年。可以设想,贾思勰引用的《博物志》可能较为完整,其关于茈草产地的记录可信度较高。《太平御览》中出现了产地不同的两种记录,可能是作者们所引版本不同的缘故。范宁对此做的校订是正确的。南通地方志中也有关于茈草的记载,这至少说明通州也是茈草的产地之一。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物产·草之属》:“茈,有实如大麦,七月熟。俗名自然谷,或名禹余粮。”

汉代海陵东境是长江入海处,扶海洲应当是位于江口北部的一块沙洲。那么,扶海洲是否如《通州直隶州志·名迹》中所说的那样,“扶海洲,在州境”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清光绪年间,如皋县早已隶属通州管辖多年了,如皋的东部当然也在通州的范围内。不过,人们把“扶海洲,在州境”理解成“扶海洲地就是通州”,这就难以认同了。扶海洲的位置可以根据时属如皋东部的今如东县地来认定,而通州

地却另有沙洲。

如东县地位于长江北岸古沙嘴的东部，成陆较早。从海堤的遗迹来看，早年它的东北、东南两面均为大海。一般说来，它是扬泰岗地的延伸部分。但是，从地貌和江口地区发育的过程中发现，这地区有几处和扬泰岗地并不完全吻合，它并不是直接延伸而形成的。这说明它在成陆之前另有一个发育阶段。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前面提到，如皋及海安李堡一带东北—西南走向的沙岗，为扬泰岗地海相沉积最东南的界限。在这条沙岗的东南，自海安角斜到如皋丁堰之间的小芹河沿线，地势比较低洼，有草荡头、管爬圩子、薛家窑、红草荡等洼地。其东北端有地名沿江口，即今海安县沿口，再东连接沿海滩地而通川子洋口，洼地东侧即如东县地。这里的沉积属海相河相沉积，基本上与通吕水脊区古沙洲沉积相似，且这一带与扬泰岗地西北海相沉积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洼地应当是汉魏时代北岸沙嘴与扶海洲之间的一条夹江。

这些洼地西南的如皋县东陈镇现在离海很远，然而唐宋时期，这里曾是盐场。《宋会要辑稿·食货载》盐法条绍兴年间就有掘港东陈场的名称。从这个场名可以推定，东陈曾是煎盐的场所。清末，东陈镇东南留有“盐场子”^[1]的地名，这应是唐宋盐场留下的名称。南宋盐场名为“掘港东陈”，这与20世纪初南通一些盐场合并后的称谓相类似，如丰利、掘港场合并后称“丰掘”场，拼茶、角斜场合并后称“拼角”场。东陈场与掘港场的合并，说明南宋时东陈的盐业生产已经萎缩。宋代以前，东陈既然能煎盐，必定近海。南朝刘宋刘敬叔《异苑》一则关于如皋古墓的传说称：海陵如皋县东陈村为一滨海渔村。从东陈所处的位置看，其南，

[1] 南通博物苑藏：清末《如皋县全境舆图》。



图6 沙洲并陆（模拟）

临近长江北泓道，亦即扶海洲与胡逗洲之间的古“横江”（详见下文）；其东，即地势低洼的小芹河沿线，这一带至迟在两晋时还是长江北泓道的一条北通大海的支汊。其时，如东还是一块沙洲，尚未和北岸扬泰岗地连接。

从苏北海堤的走向来看，阜宁、盐城以南的古捍海堤（俗称范公堤）在宋代就是淮南的海岸，堤外即为海岸潮间带所在。阜宁到海安李堡以北的海岸线呈西北西—东南东的走向，与东北合成风的方向正相交。可是，宋代李堡以东的海岸、海堤折而向东，与李堡以北的海岸走向明显不吻合。可以说，这两段海岸线是在不同条件下形成的。海堤的不同走向，可以反证如东一带不是扬泰岗地的直接延伸部分，它最初是以沙洲的形式出现的。这块沙洲和其西边的扬泰岗地涨接后，其东北面的海岸才成为长江北岸古沙嘴海岸线的延伸部分（图6）。

《太平寰宇记》转引《博物志》称：海陵县多麋。现代考古挖掘的实物可以证明其历史真实性。20世纪70年代，海安县西北部的章郭、沙岗、烈士公社以及如皋县南马塘等地，先后发掘出大量麋鹿角、骨，并有一具完整的头骨。这为晋张华《博物志》海陵多麋的说法提供了实物依据。如皋县南马塘地处扬泰岗地的东南缘。这反映了汉晋之际，这一带正是海陵县江口段的濒海地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如东县境在东汉时原是沙洲，

小芹河沿线应为长江北泓道的一条古支汊。这块沙洲最靠近扬泰古沙嘴，是本地区长江口较早出现的沙洲，汉代为海陵东境，扶海洲就在这里（图5）。从南北朝时期本地区增加的县级建制的情况推测，扶海洲与其西边扬泰岗地的连陆，约在公元4世纪末至公元5世纪初。扶海洲连陆后，如皋以东境域向东推进到今如东县掘港以东，长江江口北岸岸线由白蒲东延至掘港以东。



唐以前江岸的扩展及胡逗洲

自汉初以后的500多年间，有关史籍对南通一带的记载不多，对本区域长江岸线的记录更为少见。因此，对两晋及南北朝到唐代的长江江口北岸岸线，只能从本地境域的有关情况作分析并加以推测。自东晋到北周时的岸线当在今泰兴以北、如皋以南，至如皋白蒲以东的一线上。唐代，这条岸线东延至今如东掘港以东。

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白蒲东南有一沙洲称壶豆洲。这块沙洲形成的最初时间不详。到唐代，沙洲“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已有相当大的面积。唐代末年，这块沙洲的西北部与如皋东南境连接，长江北岸岸线再一次向东南延伸。

1.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岸线

东晋以前南通地区是海陵县东部县境。海陵县即今泰州市，始置于汉代。汉时的海陵大致以扬泰古沙嘴为范围，东北濒海。汉代吴王刘濞在太仓经营海盐生产，获利颇丰。吴王濞的太仓在海陵，《汉书》卷51《枚乘传》说：

……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
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原注）臣瓚曰：海
陵，县名也，有吴太仓。

据此可以说明，汉景帝时已有了海陵的名称。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海陵县划属临淮郡。东汉时仍为海陵县，三国时兵

乱县废，晋初复置，《晋书》记为海阳县。南宋王象之根据晋成帝杜皇后讳陵，于咸康四年（338）更宣城之陵阳县为广阳县的史实，推断海陵县改作海阳也是因为避杜皇后名讳的缘故。^[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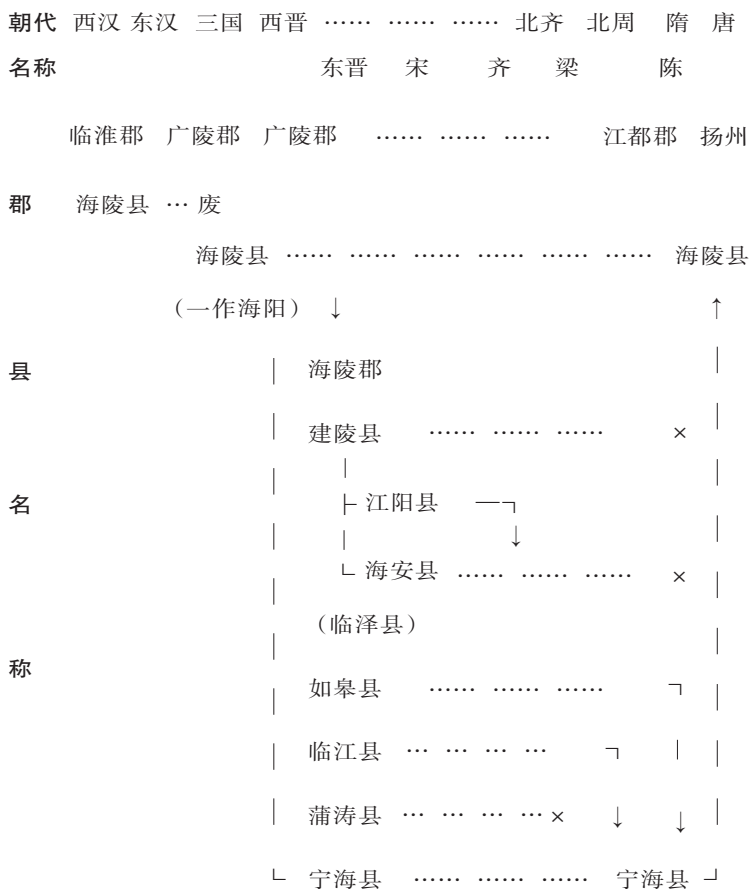
东晋时，北方战乱连年，人民大批南迁。长江两岸及广陵一带为北方移民集中地。苻坚南进失败后，东晋境内稍得安定，生齿渐繁。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分广陵境置山阳、海陵二郡，如皋、宁海、临江、蒲涛等县划属。^[2]南朝刘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又析置江阳、海安二县。这些县与当时侨寄流寓的县治不同。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户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海陵东南境的土地有了延伸和扩展，经济也得到了开发。

现有历史文献对以上六县的记载很简略。六县的位置除如皋、海安大致为今县所在地之外，其余已无遗址可寻。《舆地纪胜》卷40泰州古迹条下记有宁海城，似乎南朝刘宋时宁海遗址尚在。《读史方輿纪要》卷33泰州如皋县条下，记宁海城在如皋县东北，与《舆地纪胜》不同。《读史方輿纪要》卷23中又说，如皋县东南有临江县，通州西有蒲涛县，不知所据，可能是因为如皋县东南有江宁乡、通州西北有白蒲镇的缘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志》名迹中确以白蒲为晋蒲涛县所在，并有居民掘得城砖的记载。但是，现有文献不足为证，还有待考古发掘相关发现才能证实。六县的建立与裁撤较为复杂，各县的置废分合情况见图7。

除宁海外，东晋与刘宋新置六县，都在隋以前省并。其原因史书上无记载。这是值得注意的。从空间上说，这六个县西汉时在临淮郡范围内，东汉至西晋在广陵郡范围内，历两晋南北朝，只剩下宁海县，而宁海县又于唐代并入海陵。

[1]《舆地纪胜》卷40泰州。

[2]《晋书》卷15。又，《晋书》卷14：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属南兖州。



说明:

↓为并入, ×为裁撤。

图7 西汉—唐临淮郡名称及其辖地内属县变化

从两晋时期本地区行政建制情况分析, 晋以前只有海陵县, 东晋以后本地建制县逐渐增多。北周、隋、唐之际, 这些县大多裁并, 建陵县于隋开皇初并入海陵, 临江、如皋两县先后并入宁海; 唐初废宁海县, 将其地并入海陵县。这里有

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临江、蒲涛两县自置到废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却无故迹可寻。第二，隋代宁海县在《旧唐书》中没有载录，《读史方輿纪要·如皋县》中说，该县于唐代已废。另外，海安县于唐代景龙二年（708）到开元十年（722）之间曾重新设置，不久又废。如皋设场也迟至唐太和五年（831）。^[1]一般说来，隋唐之际生滋日繁，行政建制应有所增加，而这一带的县级建制反而省并，不能不说是一特殊现象。什尼特尼科夫指出，公元7世纪和15~16世纪时地球上气候变化，海平面曾经上升。^[2]15世纪的一次引起古海门县的坍没，那么7世纪的一次海面上升正值隋唐之际，也有可能引起江岸的大规模坍塌，几个县的废省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否则这个地区何以开发缓慢而废县遗迹多数无存？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自东晋到北周时的岸线当在今泰兴以北、如皋以南，至白蒲以东的一线上。隋唐之际则可能退到如皋附近不远处（图5）。

2. 胡逗洲和唐代江岸

通吕水脊区是由几块沙洲并接形成的，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胡逗洲、南布洲、东社长沙、东布洲。水脊区的西部为胡逗洲，其位置大体在今南通市及其附近一带。胡逗洲何时涨起没有文献可以为据；作为实体，它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就已存在。《文献通考·輿地考》说，通州在“唐时为盐亭场”，可见唐代这里已得到开发。唐末沙洲和大陆涨接时，其范围已相当广大，足见这块沙洲的涨起还在南北朝以前。唐末胡逗洲与大陆涨连以前，沙洲的北边是长江北支泓道，这条泓道的北缘，大体在如皋县磨头、石庄间，经白蒲到如东掘港的一线上。这条泓道的北缘，就是唐代长江江口段的

[1]《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如皋县。

[2] 陈吉余等：《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地理学报》第25卷第3期。



北岸岸线。

(1) 胡逗洲

胡逗洲也称壶豆洲，《南史》写作“胡豆洲”。这个沙洲公元6世纪南朝梁时已经形成，位于长江口一带。壶豆洲，最早见于《梁书》关于“侯景之乱”的记载。南北朝时，东魏大将侯景投降了梁朝。后来梁与东魏通好，欲以侯景换回被俘的将领。侯景闻讯在太清二年（548）起兵叛梁。承圣元年（552），侯景被陈霸先、王僧辩军击败，向东逃窜。《梁书·侯景传》有这么一段记载：

王僧辩遣侯瑱率军追景。景至晋陵，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进次嘉兴，赵伯超据钱塘拒之。景退还吴郡，达松江，而侯瑱军掩至，景众未阵，皆举幡乞降。景不能制，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尸于王僧辩，传首西台，曝尸于建康市。

这段故事在《南史·羊侃传》中记述得更为详细：

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会景昼寝，鸱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鸱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鸱与王元礼、谢答仁弟葳蕤，并景之昵也，三人谓景曰：“我等为王百战百胜，自谓无敌，卒至于此，岂非天乎？今就王乞头以取富贵。”景欲透水，鸱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挟船。鸱以稍入刺杀之。景仆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斩于京口。

从《梁书》与《南史》的记述看，梁时壶豆洲的经济社

会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问岸上，云‘郭元建犹在广陵’。”这一问一答，显示应答者还知道广陵的情况，这充分说明当年的壶豆洲上不但有居民，而且还与外界音信相通。可以据此推测，壶豆洲在梁以前多年就已经形成了。那么，胡逗洲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从它位于沪渎附近，且处于京口—广陵与沪渎之间，可以推定胡逗洲应当是后来的通州地。但是，历来的古代地理资料，都把胡逗洲记入泰州，而通州中却没有。《太平寰宇记》卷130 泰州海陵县条下有一段记述：

胡逗洲 在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海〔南〕北三十五里。土〔上〕多流人，煮盐为业。
梁太清六年侯景败，将北赴此洲，为王僧辩军人所获。^[1]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地理著作，就本条所记胡逗洲的方位看，洲在泰州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应当超出了泰州的范围。而根据北宋长江口一带的自然地理情况看，泰州东南二三百里的范围内，不再有大片沙洲存在。所以，这应是依据唐代史籍的说法。如前所论，唐时江岸在白蒲。白蒲距如皋70里，如皋距泰州140里，则白蒲在泰州东南约210里。从距离上推断，胡逗洲当在白蒲东南的江中。从沙洲的范围看，其东西有80里，约相当于南通县（今通州区）平潮镇到西亭镇之间的距离；南北35里，约当南通市到刘桥之间的距离。南通市西北方的刘桥、平潮一带，原是通吕水脊区的西北边缘，隔夹江到泰州的距离基本上符合《太平寰宇记》的说法。

从《太平寰宇记》中通、泰两州有关位置距离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可以推断出胡逗洲的大体位置。通州及泰州的

[1] 梁武帝太清年号仅3年，太清六年实际为梁元帝承圣元年，即公元552年。



“四至八到”分别记有：通州“西北至蒲堰南清水港如皋县界六十里”；泰州“东南至如皋赤岸乡界一百三十里”。泰州东南130里为如皋赤岸乡界，说明胡逗洲还在此界址东南108里。从北宋《元丰九域志》卷5所记通、泰两州间的距离看，通州北边界首到泰州州治海陵县为225里。西北界首到海陵县为215里。这是胡逗洲涨接北岸沙嘴以后通州建州划定的界址距离，这两个数字均小于238里。尽管古代的测量数据不十分准确，但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太平寰宇记》所记的胡逗洲已超出宋代泰州的范围。由此可以印证处于沙洲阶段的胡逗洲，正位于南通市区及南通县（今通州区）西部一带。

20世纪20年代，南通在整治新老河道及修建涵闸时，对旧运盐河等河道做了测量，发现南通西部上游河道的旧运盐河河底要比东部下游河道河底高。运盐河“自八里庙至西亭一段，高出寻常河底二尺至三尺……金沙夹河，有仅宽及三丈三尺者。此等河道，能浚深则须浚深，能放宽则须放宽。如曰不能，则须辟线改道，此时急须（需）施工者：一为遥望港……占地既广，来水自多，而港道之深度，不求与之相称，虽有九孔大闸，其流量何能充分？则该港上下之开深，实不容少缓”。^[1]八里庙在南通市老城区东北。这段至西亭的运盐河以及金沙夹河是南通西部的旧河。遥望港是南通、如东两县的分界河，它们的河底较高，说明其流经地区原来的地势要比东部高，所以河道要开深，以利东西河道贯通，积水东泄。也就是说，这些河道流经的地区曾是古沙洲。

胡逗洲是一个近海能产盐的沙洲。《太平寰宇记》说，

[1]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页。

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这说明唐代胡逗洲上已经有了盐场。可以推想，南通还处于沙洲阶段的时候，盐场即已分布在沙洲潮间带及其周边港岸。这可从宋代通州利丰监管辖下的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余庆八个盐场的分布状况得到证明。其中，永兴场在通州之西，石港场在通州北，金沙、西亭两场均在通州东，利和场则在通州东南。从沙洲的位置、范围以及煮盐的条件等方面来看，泰州东南只有通吕水脊区的西部符合胡逗洲的特征，因此，南通市区及其附近一带应该是当年的胡逗洲。

此外，有一个语言例证可以说明南通一带曾为沙洲。南通六市县居民语言可分三大区域。除部分乡镇因移民、语言区边缘交汇等原因语言有变化外，一般来说，海门、启东的启海方言属吴语系，如皋、如东、海安三县居民用语属江淮语系，南通市县一带居民使用“南通方言”。通吕水脊区西部，东起余西，西到平潮，北起石港，南至狼山、观音山一带，为南通方言分布区。这种方言有特殊的音调和俚语。它与北面属于江淮语系的如皋方言，与东南面属于吴语系的启海方言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海安、如皋、如东早期与扬泰岗地连接，语言交融较早；启海平原为新涨沙地，居民多来自崇明及江南，其方言属吴语系，这些都可以理解。而南通、如皋两地毗连，语言差别却很大，其间大致以古河汉为分界线。可以推断，很早以前，两地间必然有天然的间隔存在，否则语言上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太平寰宇记》说胡逗洲“上多流人”。所谓流人，即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可以设想，来自不同地方的居民，在一个与外界交通不很便利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汇集在一起，其语言互相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方言。南通市一带的独特方言与南通市县一带曾经长期是沙洲的稳定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图8）

胡逗洲的东边为南布洲及长沙东社洲。“南布洲”即宋



图8 近岸沙洲（模拟）

代的金沙场。《舆地纪胜》卷41记：

南布洲 旧是森然大海，其中沙涨，复为布洲场，今为金沙场。

对于胡逗洲来说，南布洲位于其东方，为什么反而称作“南布洲”？可以设想，这个“南”的方位是相对于如皋而言的。南布洲形成的时间不详，如上述方位的推断成立，则此沙洲于唐代已形成。“长沙东社洲”在南通县余西一带，“渔者在此结社”。^[1]胡逗洲与南布洲、长沙东社洲涨连的时间不详，至迟在五代时应当并接，成为通吕水脊的一部分。沙洲并接以后，原先的洲与洲之间存在一些河汊，有的地方仍然保持了一些较为宽阔的水面。南通县四安附近的横港、南通市城北的横河，也可能是古横江的支汊。如皋境内的六祥符湖、车马湖是古横江的残留部分。还有一些河道则保留了神话式的传说和名称，如龙游河、天生港等。

（2）唐代江岸线

唐代长江口北的江岸，大致是沿南通古河汊区的北缘，即西起如皋县石庄，东经白蒲到掘港的一线。古河汊区原为通吕水脊区与北岸古沙嘴之间的一条古代夹江。这条夹江大致西起如皋磨头、石庄之间，向东经白蒲、刘桥石港间流入大海。夹江的南缘，在南通县平潮、新坝以西，经刘桥以北，

[1] 明万历《通州志》卷5古迹。

向东到金沙（今通州区）、余西的一线上；夹江北缘，在如皋县石庄北，经白蒲到如东掘港的一线上。可以断定，这条夹江的北缘，就是唐代长江江口段的北岸岸线。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遣唐使团的船只在扬州海陵县掘港以东江口附近遇险，使团大使藤原常嗣及求法僧圆仁等，分别在掘港庭东北海边的淮南镇与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附近登陆。这在日本求法僧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圆仁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的徒弟，日本仁明朝承和五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他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西渡黄海入唐。在中国九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佛教经典，多有著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圆仁的著作之一。该书第一卷中记述了圆仁等渡海入唐，在如皋以东的行程。掘港的名称在我国史籍中以《宋会要》为较早，而日本史籍则在我国唐朝时已有载录，证实唐时长江北岸江口在海陵县的掘港以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下了当年大江入海口的情况：

（六月）廿八日……巳时至白水，其色如黄泥。
人众咸云：“若是扬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见，
申云：“从戌亥会，直流南方，其宽廿余里。”望见前路水还浅绿……大使深怪海色还为浅绿，新罗译语金正南申云：“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坎？”未时，海水亦白，人咸惊怪。令人上桅见陆岛，犹称不见……

在七月二日的日记中，圆仁写道：

（七月）二日早朝潮生。进去数百町许，西方见岛，其貌如两舶双居……舶沉居泥，不前不却……舶卒倾覆，殆将埋沉。



以上引文中，所谓“巳时至白水，其色如黄泥”，是指长江北泓富含泥沙的支汊入海之水，其势浩大。这为沙洲发育，海岸推进提供必需的物料。唐代，长江入海北泓道在胡逗洲以北，江水含沙量较多，这有利于掘港以东沙洲的发育及陆地的伸展，也有利于胡逗洲等沙洲的发育。掘港以东近海水域明、暗沙洲的存在，使这里成为海船的禁区，不熟悉航道误闯进来，会造成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这正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讲“扬州掘港难过”的主要原因。如皋以东伸入大海的半岛端部存在着一个个小沙岛，这与河口三角洲的地貌特征相吻合，也表明掘港以东海岸正在逐渐向东推进。进入大江口后，如“两舶双居”的小岛正是长江北汉道中已经形成的沙洲。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的“白水”，客观上反映了唐代古横江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白水，一般有两种解释：一为水色发白的湍急水流，这里的“白”实际上是“黄”，因为其含沙量大；一为特指日本与新罗人认识中的长江北泓——“扬州大江流水”的分支，后来北宋《太平寰宇记》称之为“古横江”。

至于掘港，作为唐代日本航海来华的一个地理坐标，位于古横江北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六月廿八日记载，大使坐船越过一条“绿色”大海中的黄色水道时，新罗翻译金正南误认为船已过了掘港水道。可是其船继续南行又发现前面航路“水还浅绿”，“海水亦白”，于是“人咸惊怪”。这与他们所掌握的航海经验迥异。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驶过掘港。这里的“白水”，不是“古横江”，而是古横江之北海岸因陆上暴雨产生的巨大浑浊地表径流入海，形成“从戌亥会，直流南方，其宽二十余里”的海上景观。正因为他们误认为这一“白水”是“扬州大江流水”，所以后来他们到达事实上的“白水”（古横江）后，人人都十分惊异。圆仁对白水

的记述说明古横江于唐代确实存在于胡逗洲的北侧。1973年6月，如皋蒲西公社十九大队第三生产队出土一艘唐代木制沉船，船距地面2.5米，长17.27米，宽2.9米，深1.6米。船内留有瓷器、开元通宝等遗物。这为唐时夹江的存在及其位置提供了实物证据。1984年8月16日《新华日报》报道：1984年春，如东县汤园乡长田村村民在南荡河边掘得一长约9.6米的杉木小舟，该小舟距地表3.5米。这则报道为支持“古横江确实存在于胡逗洲的北侧”提供了又一力证。

长江北泓道的淤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其起始时间无从考据，但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看，应在9世纪中期以后。其最后涨接大陆的时间在唐代末年，三余马蹄形海湾是这条夹江泓道淤积后的产物。《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静海县条记载：

古横江在州北，元〔原〕是海。天祐年中沙涨，
今有小江东出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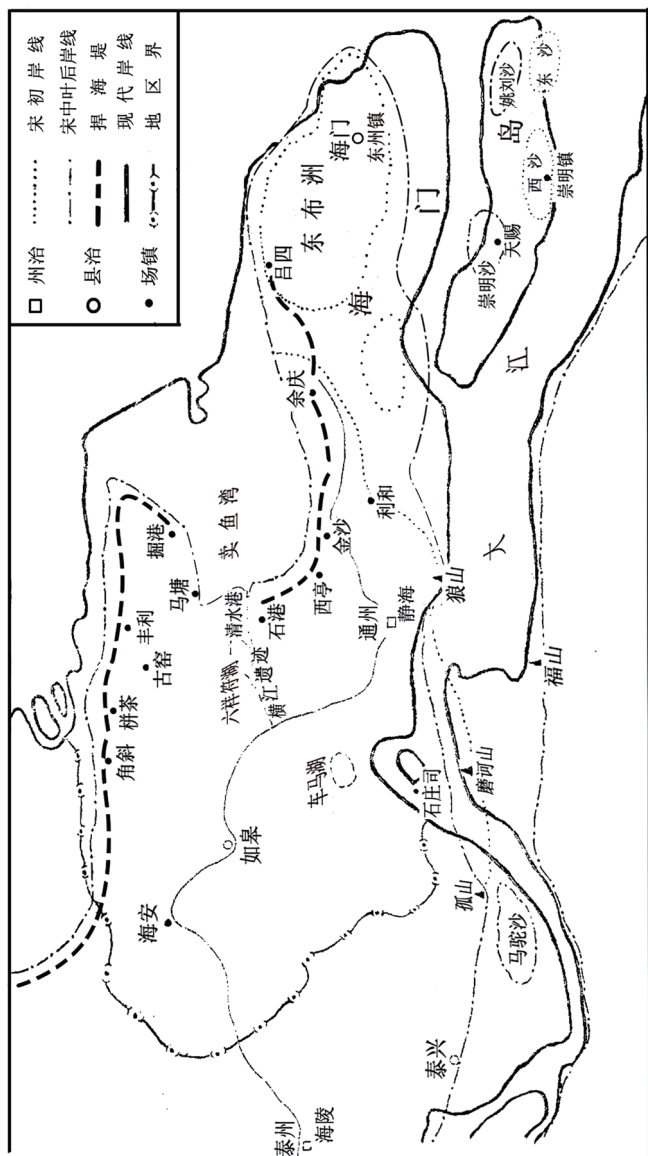
天祐是唐哀帝年号，期间为904—907年，这是古横江淤积的时间。《太平寰宇记》所记的古横江应是上述北岸古沙嘴与胡逗洲之间的夹江。宋初，这条夹江又名清水港，为通州静海、泰州如皋两县间的界河。当年这条长江支泓的封闭，使支泓东部口外不能继续得到由长江来水输送的中上游泥沙，形成一个马蹄形的海湾。现在的遥望港（洋岸港）就是这条夹江的最后遗迹。胡逗洲的连陆使长江口北侧东端岸线由白蒲、掘港一线南移到狼山、余西一线。这时江口段长江北侧的岸线大体在泰兴南、孤山、段山、狼山到余西（今属通州区）的一线上。



宋代以来江阴、如皋江岸的变迁

唐代以前，南通地区的江岸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坍塌，全区境域的扩展缓慢。唐太和五年（831）析海陵东境五乡置如皋场；隔百余年，到南唐昇元三年（939）又析海陵南境置泰兴县；保大十年（952），如皋场也升为县。如皋县的设置，意味着公元10世纪，南通地域有了新的拓展。

宋明以来，由于长江主泓道变向及海面升降等原因，一千年间，通州、泰州一带的江岸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靖江县境域的扩大，如皋县南境县土的大量坍没；南通、江阴间的江岸发生着北坍南涨的巨大变迁（图9）。





泰兴靖江的涨接和江岸南移

长江自扬州东下，过泰州折向南流，到江阴受阻于南岸的古陆块及残留的浅丘群，产生较大的折射作用力，冲击北岸。泰兴以南的江岸呈凸形继续涨出。与此同时，江阴以北的长江中出现多块沙洲，且不断扩大，最终与北岸相连，使长江北岸岸线大幅度南移。

唐代以来，泰州以南长江北岸的河漫滩在继续伸涨。南唐昇元三年（939），析海陵县南界五乡置泰兴县。北宋初，长江北岸岸线在泰州南75里，约在今泰兴城南到孤山，再向东连接原在如皋境内的段山（又称磨河山）的一线上。

1. 泰兴县城位置的迁移

宋代泰兴县隶属泰州，县城到泰州的距离，与现在两地间的距离大致相符。北宋《元丰九域志·泰州》记泰兴在泰州东南73里，下辖四乡，柴墟、永丰二镇，有大江过境。《元丰九域志》没有载明泰兴到长江的距离，但我们可以从其他资料来推算。《太平寰宇记·泰州》说，泰州“南至大江七十五里”。《元丰九域志》的泰兴应当在长江边，距江约2里。可以断定，宋代这一段江岸在今泰兴县城南不远的东西一线。

泰兴县最初设治于泰州以南的济川镇^[1]，约在今泰兴西北40里处。^[2]宋乾德三年（965）县迁于柴墟镇，即今口

[1]《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泰兴县条作济南镇。

[2]《读史方輿纪要》卷23扬州府泰兴县。

岸。^[1]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引旧志说,“绍兴初移治延令村,即今城,其故城仍为柴墟镇”,《太平寰宇记·泰州》所记泰兴在“州南四十五里”即此。《元丰九域志》记泰兴县距泰州73里而另有柴墟镇,可见宋代元丰年间(1078—1085),县治已不在柴墟。这也和《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兴县条所引“绍兴初移治延令村,即今城”的说法不合。《元丰九域志》为当时记实,应当可信。建炎三年(1129),岳飞为通泰镇抚使时曾因泰州无险可守,退保柴墟,渡百姓于泰兴沙上。《读史方輿纪要》所引旧志,泰兴移治延令村,当是南宋初兵乱后的另一次迁徙。不过,元丰以前何时迁到距州73里处,史无明文,显然有脱节的地方,是否如此,还待进一步研究。

2. 孤山的变迁

宋代的泰兴、如皋境,有孤山与段山。由于长江主泓流江流方向的变化和靖江、沙洲二县的先后涨出,两山附近曾几经沧桑,从山体与长江江流位置的相对变化,可以探讨泰兴、如皋南部江岸变迁的过程。

孤山原是泰兴县的“镇山”,在今靖江县东北12里处,宋以来的文献中有几则关于它的记载。北宋初,孤山在泰州境位于海陵县东南210里,且在泰兴县边界。南宋《輿地纪胜》卷37扬州记,“孤山在泰兴县东南七十里,南枕大江,岿然一峰,约高百仞”。“南枕大江”说明了南宋初年,孤山虽依然在长江北岸,却已在江边了。孤山沦入江中的具体时间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明《读史方輿纪要·泰兴县》只说孤山“旧在江北岸,其后岸圯山入江中”。该书靖江县条中记孤山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旧在大

[1]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3建置志解署。朱一鸣《口岸察院碑记》:(口岸)县治西北四十里,为柴墟镇。



江中，去岸五六里。距山百步有石碇，亦在水中，与江阴浮山相对”。孤山重新登上陆地的时间是明确的。《读史方輿纪要》卷25靖江县条称：“成化八年，潮沙壅积转而成田，今山在平陆矣。”《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710常州府条中却有不同的记录：“孤山……屹峙江中，欲登山者必方舟而渡。厥后，江势徙北，山趾徙南，至明弘治元年登岸。”两条记录的时间，一在成化八年（1472），一在弘治元年（1488），而这正好说明了孤山的重新上陆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472年山体四周开始有泥沙淤积，并逐渐扩大范围。到1488年，孤山周围的沙田与陆地连成一片。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志》把孤山列入泰兴县的范围：

孤山在泰兴县东南七十里。岿然一峰枕峙江浒。上产巨竹，县之镇山也。明成化时，潮沙壅积，山南成平陆，与靖江连界矣。

不过，从《古今图书集成》所说“江势徙北，山趾徙南，至明弘治元年登岸”的情况来看，孤山所登的“岸”是指“南岸”，亦即马驼沙。马驼沙与北岸涨连后，孤山成为泰兴、靖江两县的界山，而孤山从泰兴县“进入”了靖江县，却是长江江流作用的结果。

以上史料大体把长江泰兴段江流和孤山由江中登陆的变化过程勾画了出来。北宋初，孤山在长江北岸，由于泰兴南部江岸被江水冲坍。南宋初，孤山山体已濒临长江。元明之际，孤山沦入江中。明代成化八年（1472）到弘治元年（1488）期间，孤山之南泥沙大量淤积，山体登陆马驼沙岸，入靖江县界，后来成为泰兴与靖江两县的界山。

3. 马驮沙连陆

马驮沙本来是江阴县北的江中小沙洲，一名驥沙，又名

阴沙。相传这里有三国吴赤乌元年(238)建的紫微宫^[1],可见这个沙洲在赤乌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传说五代杨吴时曾经在此练兵。^[2]宋建炎三年(1129),岳飞曾经迁泰州民众避兵于此。元末张士诚部将朱定等曾据此筑土城镇守。马驼沙原有东西二沙,附近还有开沙、面条、西官、新沙等小沙洲多块。明代中叶,这些小沙已涨连成大岛。明成化七年(1471),岛上置靖江县。

此时的靖江县所在的马驼沙东西长70~80里,南北宽约20里,并以一宽约10里的长江泓道和泰兴县相隔。江北岸为泰兴县的黄家港、印庄等汛。印庄在泰兴县东南30里,明成化十八年(1482)于此筑江堰,经泰兴城南到口岸附近的庙港。印庄以东的江岸直抵如皋石庄以南。《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兴县条:

大江 旧在县南三十余里,自江都县流入界,
又东入如皋县界。天启以后,沙渚涨塞,泰兴与靖
江接壤处悉为平陆……

明代的长江在泰兴南30多里,自江都流入,又东入如皋县境,马驼沙北的长江北泓实际上成为泰兴、靖江两县的界江。明中叶以后,这条北泓被泥沙淤积,导致靖江西北部迅速向北淤涨。“天启以后,潮沙壅积,县北大江竟为平陆。”^[3]由于泰兴与靖江接壤处悉为平陆,于是在泰兴县“南三十里处开为界河,东通老沙港,西通大江,长亘五十里”^[4],最终使

[1] 原见《广陵志》。《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721常州府古迹考:有紫微宫,“三国赤乌元年建”,并传有三国古碑。

[2]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卷721常州府古迹考,靖江县剑池条。

[3] 《读史方輿纪要》卷25常州府靖江县。

[4] 《读史方輿纪要》卷23扬州府泰兴县。



靖江以北的长江北汊全部淤塞。靖江成为江北一县，原来的马驮沙南缘成为长江北岸岸线的一部分。江阴附近的长江江流顿然束狭，并形成一弧形弯曲。

如皋南境的坍涨

古代长江江口开阔，宋初通州、如皋一带江岸线大致在西起孤山（靖江境），东经段山直到狼山一线上。长江江南岸线，自江阴东下，经杨舍（今张家港市）、福山到浏河口一线。两岸岸线平直，长江主流对江岸的侵蚀作用并不明显。自靖江沙洲扩大并向北岸接涨以后，镇江以东江阴段江面日趋狭窄，江流速度增加。长江江流从镇江东下，受阻于江阴浅丘群，产生较大的冲击力，折向东北，江流的侵蚀力量也不断增强，致使如皋南境的大片土地崩坍入江。自明代永乐初到嘉靖末（1403—1566）的160多年间，如皋县南部的江宁乡荡析过半，江流继续向北摆动，如皋南境涨坍不定。清初，这里的江岸已内蚀为一大弯曲。这股江流成为数百年来南通、如皋江岸的主要威胁。现将这段江岸的演变过程略述于下。

1. 如皋江岸变迁概况

从长江河漫滩发育的情况判断，泰兴的涨出及胡逗洲连陆约在唐代末年。如皋南境位于通、泰之间，应该同时成陆。唐末以来，如皋南境长江泓道淤积加速，导致古横江的淤塞。北宋初，段山濒临江边，如皋南境的江岸应在孤山到段山（磨河山）一线上。南宋时，段山在江中，江岸在石庄之南。清嘉庆《如皋县志》卷2记，如皋城南70里有一条东西绵亘60里的“平岸”，就是这个时期的江岸线。

明初长江北岸岸线在如皋南70里到天生港南30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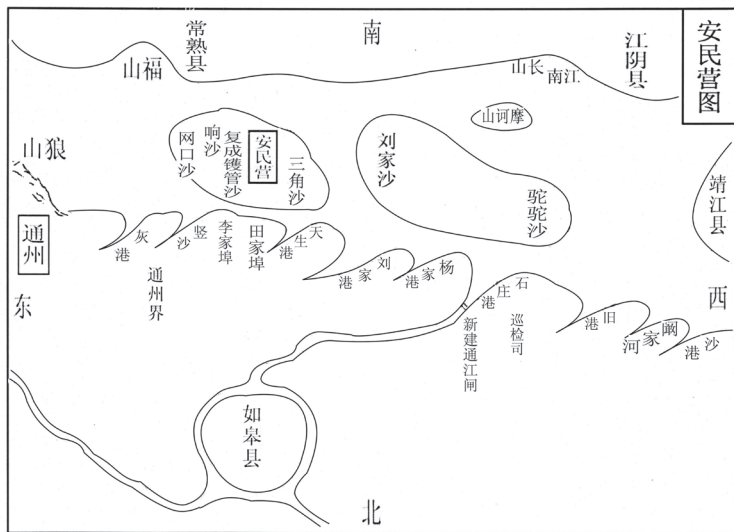


图10 安民营及其附近沙洲

线。明嘉靖时，江岸线在由距如皋60里的石庄到距如皋60里的天生港一线上，江岸内蚀达10里到30里不等。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如皋以南的江中有不少沙洲涨起。嘉庆《如皋县志》转引明万历《扬州府志》，记如皋有北沙、南沙、骆驼沙等芦洲凡14处，共3.5万多亩。江流摆动，沙洲涨坍不定。《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有一幅明代的“安民营图”（图10）。此营设立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这幅图具体标明了明末此段江岸及江面的形势。石庄以南大江中，自西向东有骆驼沙、刘家沙、三角沙、响沙、网口沙等沙洲。

石庄附近有条东西长约40里的老岸。清嘉庆《如皋县志》卷5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划分沙田，以一东西长40余里的老岸为界。老岸为江岸线所在。石庄东北有地名柳家闸。明天启二年（1622），知县李衷纯于其地建石砦，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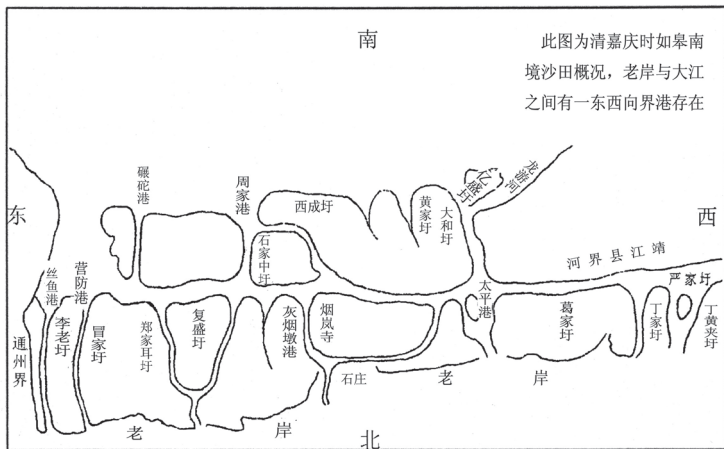


图11 清嘉庆《如皋县志》沙田分布

龙游河水位。当时此闸距长江5里^[1]，大致和老岸一线相符。清中叶以来，这段江岸仍然涨坍不定。康熙二十三年时还有田滩17.5万亩，乾隆十三年（1748）又有坍没。嘉庆《如皋县志·赋役·沙田》所载知县郑见龙详稿中记有坍地的数据：

康熙二十三年，奉部定额免丈原额田一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二亩三分七厘零……迄今六十余载沧桑变易坍涨靡常。前此通潮之港，缘江潮灌入，日渐冲击，南北宽逾数里，东西环绕三十余里，俨成内江，以致腹地芦田坍削日甚……计坍没田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亩零……

嘉庆《如皋县志》载有当时老岸以南的圩田地图（图11）。石庄以南西起靖江界，东抵营防港，有滨江界港一道。界港以南尽是圩田，是乾隆以后的新涨地，其范围大致和老岸至靖江

[1] 清嘉庆《如皋县志》卷3建置堤堰石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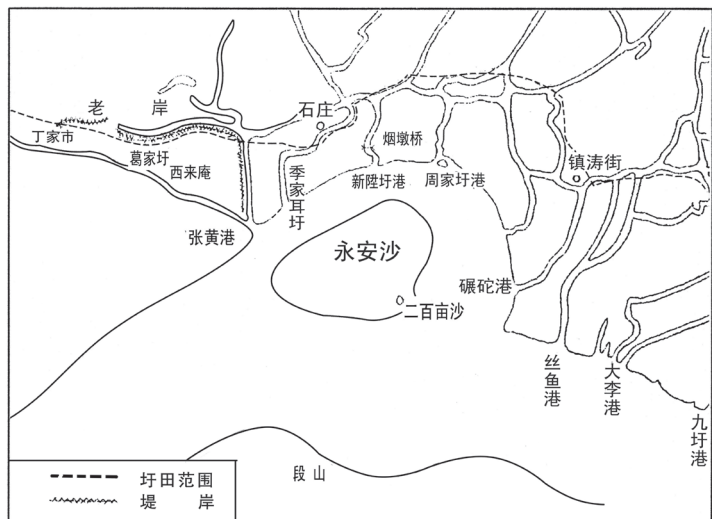


图12 如皋县南境圩港分布

界河间的沙田范围相符。同光年间，如皋滨江一带田地又有坍没，同治十年（1871）、光绪十年（1884）和三十年三次申报坍没滨江田地约632顷。^[1]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实地测量时，除季家耳圩尚保有一部分外，其余圩田尽赴江流（图12）。这时，如皋西部江岸成一弓形弯曲，西起张黄港，向东北经季家耳圩、新升圩港（新生港）、周家圩港，折向东南到碾砣港。

此外，石庄以南江中永安沙六案东南端有一块二百亩沙，这块沙是明末安民营所在的三角、网口沙坍没后的残余部分，清末为江心一弹丸小岛，以后几十年间，沙洲涨起成一大沙洲——永安沙。四五百年间，此沙两度涨坍，表明这一带江流摆动极不稳定。

[1] 民国《如皋县志》卷4沙田。

20世纪20年代初,荷兰水利工程师亨利克·特来克在分析如皋江岸被冲坍的原因时说:“退潮自上流来,江阴之黄萧两山迎头击之,反射于对岸,此即如皋江岸近五十年来被坍之主因也。”“惟水浪侵蚀于江岸下之力之大,竟足使岸坡不能成立。高水岸线与低水岸线几如悬崖绝壁之同在一平面线上,吾人已见数处,如周家圩港以下一带是也。”^[1]可见,20世纪初,如皋南部江岸依然呈坍势。二百亩沙以北在40年间曾数度涨坍,到50年代末坍势渐趋稳定。原来沙北的支泓于20世纪初是沪扬班轮航道,20世纪中叶为一宽阔的内港。

20世纪50年代,如皋县对县南部江滩有计划围垦,逐步封闭永安沙北的长江夹泓。50~70年代,永安沙、长青沙一带的江滩共围垦4万多亩,永安沙与江北岸连接。

2. 段山沧桑史

段山在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北约30里处,东距十一圩港约25里,西距江阴长山约40里,隔江北距石庄约40里,距如皋约100里。一般地方志上称段山为磨河山,《太平寰宇记》和《舆地纪胜》都称之为磨河山。段山与狼五山一样,是古陆下沉后残存的浅丘,最初为喇叭形江口中的一座孤屿,江北河漫滩向南扩展并与孤屿滩地相连后才成为长江北岸的一部分。估计此山上陆最早不会超过唐代中叶。宋初“磨河山在如皋南一百二十里,半在江中”^[2]。当时如皋南境的江岸由此西达泰兴南的孤山。南宋时磨河山已在江中。

《舆地纪胜》卷40泰州景物条:

磨河山在如皋县南一百二十里扬子江中流,去石庄二十里,水势甚湍。

[1]《特来克与南通保坍史料》第43-44页。

[2]《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如皋县条。



这是当年的写实。《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都记磨河山距如皋120里，比实际距离多30里。后人据此推测如皋南界位置会产生误解。通州、如皋地方志都有明永乐初磨河山体入江之说，然而，此山何时重返北岸，现有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明茅元仪《武备志》所附海图，经考证即《郑和航海图》，图中长江江阴段近北岸处有东鞋山、西鞋山。这一带并无其他浅丘存在，可能东鞋山即段山，西鞋山即孤山。倘若如此，则此图可作段山于明初入江的佐证。

关于段山永乐初入江的说法，通州、如皋地方志的载录大体相同。清康熙《如皋县志》附有明嘉靖至清顺治间如皋南境变迁的一组地图4幅（图13），大致标明了这一带的变迁过程。组图第一幅反映嘉靖以前孤山和段山同在江北。这里所谓“嘉靖以前”应为“永乐以前”，这样才能与地方志所载相同。嘉庆《如皋县志·疆域·山阜》：

磨河山 一名段山……旧志云：初连北岸，距石庄二十里，自永乐以来田没入江，民输坍租甚苦。嘉靖间，知县黎尧勋奏准均派。今江又日加湫隘，去岸六十里。山下沙洲为江阴、靖江二县百姓占垦，山已连苏州之常熟，反与如皋隔绝，实则县之南界也。

竹排岭 在磨河山南二十里。石氏先世皆葬岭下。顾氏分谱载，竹排岭为皋境，今山为波涛湫隘，青畦化为白浪，浮螺一屿已距厓六十里矣。

根据这些记载，段山原与江北岸相连，永乐以来随坍田没入江中。嘉靖年间，山体距北岸已有60里之遥，且成为江南的一部分。如明嘉靖以前图（图13-1）所示，江岸可达磨河山南的竹排岭，竹排岭的位置在磨河山南20里。如此，则明初如皋江岸在“段山以南二十里的竹排岭”之南。这里有几点值得提出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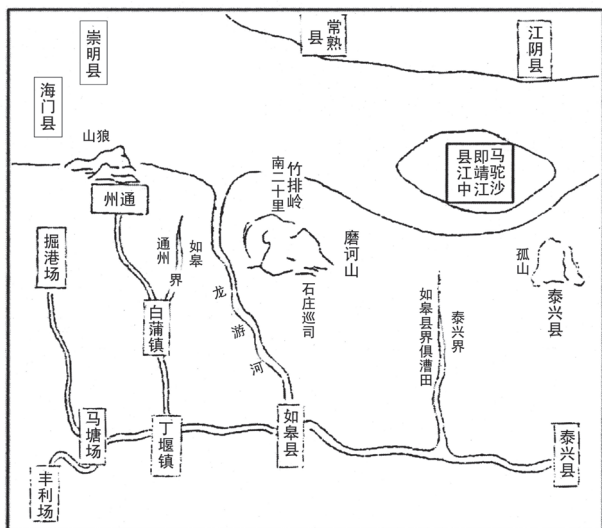


图13-1 明嘉靖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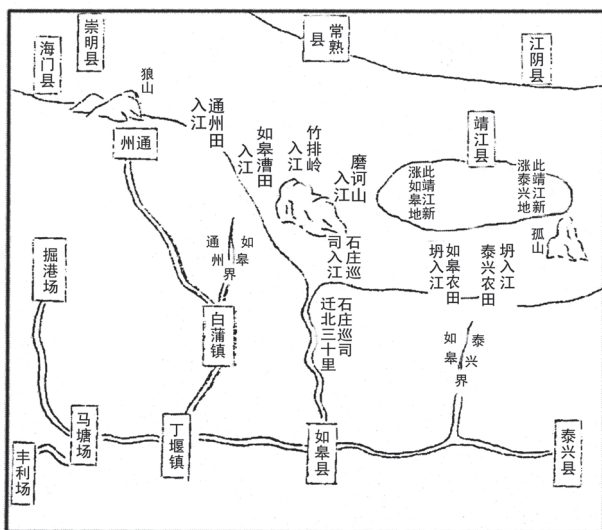


图13-2 明万历年

图13 清康熙《如皋县志》载明代江岸变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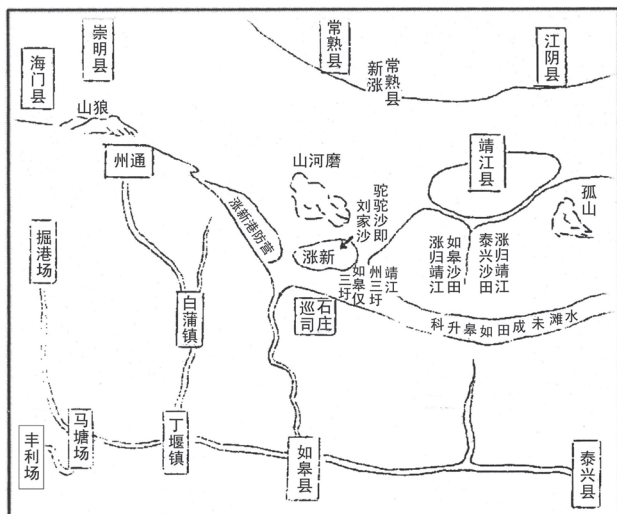


图13-3 明天启崇祯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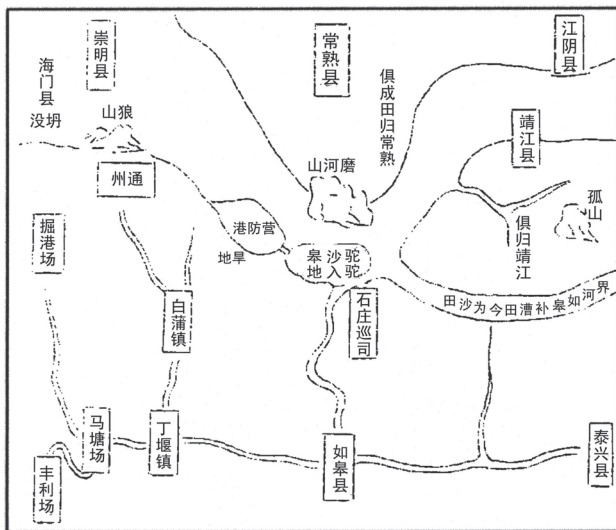


图13-4 明崇祯至清顺治十一年涨连

图13 清康熙《如皋县志》载明代江岸变迁图

说明：此图按原图缩绘，时限上略有不同。

第一，前面所引“永乐以来田没入江”主要是指如皋县南江宁乡的大部分坍塌地而言，当时江宁乡是否包括段山并不明确。

第二，竹排岭“在磨诃山南二十里”。据此数据推测，竹排岭应在沙洲县（今张家港市）以北的周庄、汇丰镇一带，已逼近当时的长江南岸。南宋时杨舍已成为沿江要镇，是一个“江流浩瀚直接大海”^[1]的去处。如江北岸在段山南麓，与杨舍隔江30里尚有可能，而说江北岸在段山更南20里且接近南岸的话，则与当时江面开阔的情况不相符合。至于石氏祖塋与顾氏分谱，两者都没有提出确实的年代，在时限上仍有疑问。

第三，据如皋县志说，竹排岭在“磨诃山”南20里，现时地图不载。按以上所引两条原文，磨诃山、竹排岭距岸60里。这个“岸”系指如皋南境的江岸。当时的江岸在如皋石庄附近，段山“距石庄二十里”，所谓“去岸六十里”，固然是夸张了的说法。但是，磨诃山和竹排岭都称“去岸六十里”，似乎山、岭应在同一位置上，而原文山、岭却有南北20里的差距。段山以西有长山，如果说县志所记方位上有错误而距离不错的话，那么，明初长江应从长山经过。这与事实不符。段山以东有一片新涨沙地，并无山岭存在。因此，如皋志所载竹排岭的位置实有可疑之处。

这里还不能武断地否定明初段山在长江北岸的可能性。但是，从明初至今江流摆荡、南涨北坍的趋势来看，段山于宋代入江重连长江北岸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段山为如皋县南境的说法，其时间应上溯到宋初，《太平寰宇记》所记证明如此。如皋县志强调明永乐初段山在北岸的说法应从经济上的原因去考虑，不排斥从地史角度的追述。

[1]《读史方輿纪要》卷25常州府江阴县。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2册载：

旧（如皋县）志江距县七十里，今止六十里，湫啍日广，江宁一乡荡析过半。自嘉靖季年黎侯尧勋具奏均派，始苏浮粮之困。隆万以来，沙涨渐出。近摩诃者则江阴、靖江扼其咽，近天生者则通州掣其肘，往往为豪力所争占。而溯江之民无可愬告，于是沙田始为讼府矣……

又说：

皋土鹵瘠不宜稻任，皋则唯沙田，岁皆仰给其入。以故争讼日纾，非独利藪……今者讼牒日繁，纷纭伊始。在坍民欲求补额，在业户欲据扒头……总出贪心，都无定据。

这里，顾炎武确切地指出，由于江宁乡坍地复涨，发生了原土著居民与江阴、靖江、通州三邑人争垦之事，往往以旧时江宁乡所及都是如皋县地为藉口，因而地方志强调磨河山、竹排岭为如皋南界的天然标志是可以理解的。江宁乡大坍在明永乐初年，可能也就统而言之认为段山于此时入江，并以此作为争讼的依据。从历史地理科学的角度来看，对这种说法就应当慎重考虑了。

宋代长江南岸自江阴东十里的白沙港起，沿雷沟港（县东35里）、陈港（县东37里）、蔡港（县东48里）到范港（杨舍以北）以及鹿苑口一带，自宋淳熙（1174—1189）以来一直为滨江戍守要地，宋明间长江南岸大致在这一线上。

明中叶以来，江流主泓在马驼沙南折向东北，如皋南部江岸受蚀，渐成凹岸。段山东南，大江南岸以北的江中沙洲逐渐涨出。据《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载安民营图，段山在江中，山北为驼驼沙、刘家沙以及安民营所在的三角沙、网

口沙，山南和江南的长山之间隔有宽阔的江面。最初，近南岸一带有福兴、青屏等沙洲。万历时稍北出现青草沙（即刘海沙的前身），到清道光初年（1821—1830）大概有13块小沙。^[1]雍正十三年（1735），自通州划归江南昭文县管辖的万寿沙即其中之一。^[2]一百年来，这些小沙逐渐涨接成为三个沙洲，即南沙、东兴沙和常阴沙。南沙涨接较早，亦称老沙，位置偏南，接近原来的南岸，即沙洲县南沙人民公社（今属张家港市）一带，段山就在沙的西北端；东兴沙居中，西北狭东南宽，成一羹匙形；最北为常阴沙（原有青草、刘海等沙），东西狭长。1917年以前，三块沙洲之间还有夹江分隔，清代末年杨舍以北的范港、常熟以北的鹿苑口仍然为滨江港口（图14）。1917年，当地人在夹江西端建造海坝，封闭了夹江，加速了夹江水道的淤积。于是，原来的三条夹江分别成为北中兴河、南中兴河和南横套河，三块沙洲连成一片。

新中国建立前，这一带分属南通、常熟、江阴三县。建国后，原属南通县的常阴沙划归常熟县。1962年1月，这里连同江阴东部、常熟西北部分地区建新县，以原为沙洲突涨之地名为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县人民委员会驻杨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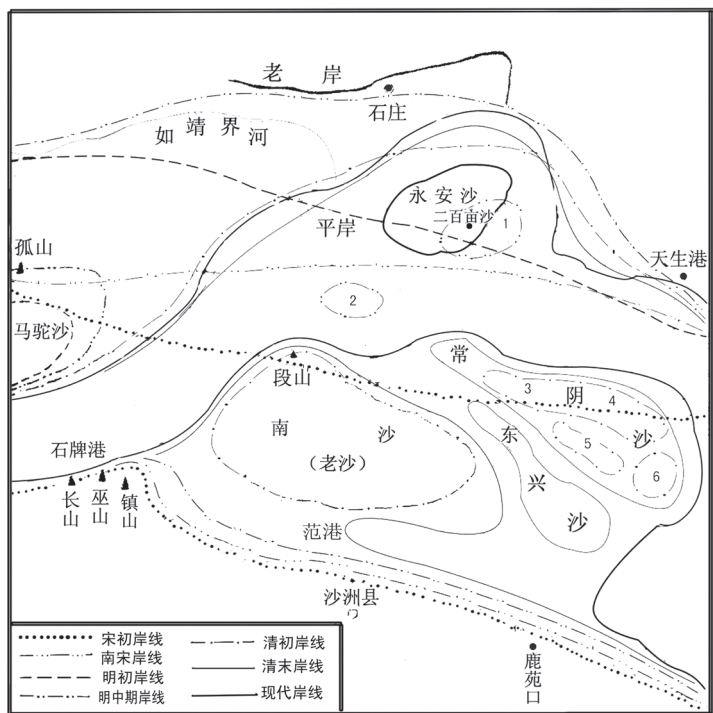
三块沙洲连接南岸后，位于沙洲北部的段山成为大江南岸的一座小丘。一千年来，这座山从北岸移向南岸。这一带江面变化极大，其间也包含了民众流离失所的痛苦历史。这一沙洲地区并接江南古陆以后，全境凸入江中，沙洲东端形成一个水弯，江流主泓不能流经，水流缓慢，泥沙淤积极为迅速，福山一带的江面即将成陆。也由于沙洲凸出，长江水流在沙洲以北形成一弓形弯曲，其主泓道自西到此受沙洲县西部江岸的

[1] 南通市图书馆藏：1921年常熟乡土教科书。

[2]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4民赋志芦政。



阻隔,折向东北,因而成为侵蚀江北南通一带江岸的主要因素,保坍工作遂成为南通的一项重要课题。



1 明代北沙 2 明代南沙 3 寿星沙 4 刘海沙 5 带子沙 6 盘篮沙

图14 段山附近江岸变迁(示意)图

宋代以来南通海门的巨变

南通市区及南通县（今为通州区）一带的通吕水脊区原来是沙洲，唐末才和如皋南境连接起来。江北沙嘴向东南扩展100里以上。北宋初，长江口还有一些沙洲，主要有东布洲和顾俊沙等。宋庆历（1041—1048）中，东布洲与大陆涨接，北岸沙嘴再次向东延伸。元明之际，当如皋南部境土大坍没的时候，通州西部江岸也受到剧烈的侵蚀，江岸北退最多的地方约达20里。特别是长江近南岸的沙洲扩大后，江流直逼北岸，通州以西江岸成一弓形大弯曲。明清两代，这一带随江流摆动，涨坍交替频繁。元明之际，由于长江主泓冲击北岸，同时也由于海面一度上升，引起古代海门县境土大面积崩坍，几乎全部陆沉，迫使古海门县数迁其治。到清乾隆中叶以后，江流重新偏向东南，北岸沙嘴附近沙洲叠涨，不仅出现了一个新海门，而且清代末年以来的崇明外沙也陆续涨接大陆。于是，整个南通的陆地全部形成。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启东成陆，而崇明岛又有与北岸涨连的趋势。这种种现象都说明，长江主泓逐渐折向东南，靠近北岸的水流流速缓慢，有利于泥沙在北岸河滩沉积，长江北岸沙嘴因之逐步由沙洲涨接延伸而向东扩展。这也说明，长江北岸三角洲的发育有一定的规律。



通州狼山以西江岸的变化

宋代通州西部江岸西起通州、泰州如皋县交界处，东南到通州南的狼山附近。宋《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都载有通州的境域范围“四至八到”，其中自州城（今南通市区）到江和海有八个方位的里程。两书成书先后约距50年，《太平寰宇记》多记唐末宋初之事，两书所记有所不同，见表1。

表1中所列两书所记的道里路程不尽相同，但所处环境颇多一致，除西、北方连接大陆以外，东临大海，南、西南两面都临长江。

表1 宋代典籍中通州境域四至

方位	《太平寰宇记》卷130	《元丰九域志》卷5
东	至大海八十里	至海八十里
西	至泰州三百五十里	至本州界四十五里 自界首至泰州二百三十里
南	至狼山及大江一十五里	至江二十四里
北	至泰州如皋县界清水港五十里	至本州界五十里 自界首至泰州二百二十五里
东南	至海，州下口海门县界六十里	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里 自界首至苏州二百五十里
西南	至海，陈墮港南，海中流六十里	至江六十里
东北	至石港场东大海一百五十里	至海六十里
西北	至蒲堰南清水港如皋界六十里	至本州界六十里 自界首至泰州二百一十五里

说明：上表《太平寰宇记》中，西南方位“至海”、“海中流”中的“海”实为江。南通地方习惯称江为海。陈墮港原误为陵墮港；“至石港场东大海”的方位《太平寰宇记》误作“西北”。

宋朝通州静海县的江岸西起与如皋交界的陈堕港，此港现已不存在。《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利丰监条说，监“西至泰州界陈堕港四十五里”。利丰监在通州南3里，从通州到陈堕港约45里，根据这个距离估计，陈堕港约在今碾砣、丝鱼港以南，段山以东不远处。通州江岸在这里与孤山到段山的如皋南境江岸相连接。由陈堕港江岸向东延伸直抵任港，这段江岸约长40里。当明代如皋江岸受到侵蚀时，这一带也发生了剧烈的崩坍，江岸向后北退。明代中叶，天生港原距如皋县90里，嘉靖时只有60里，江岸后退约30里。可见这段江岸曾大片坍塌。

1. 狼五山一带的江岸

狼五山，地理科学上称为狼山浅丘群，五山中的狼山现距江仅约3里，其西边黄泥、马鞍山两山的南麓已临长江。《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静海县条说：

狼山、军山、塔山、隔山、马鞍山、刀刃山，以上并在江海之际。〔按：原文中有“隔山”，现无此山。〕

《舆地纪胜》卷41通州景物：

狼山 《寰宇记》云，在江海之际。今在静海南，五山相连属。或云山形如狼，又云或有白狼居其上，故名。凡五山元〔原〕在海中，今居平陆……

晋时已有狼山之名，陶弘景有“狼五山在海中对勾章岸”的说法。唐代中期，狼五山在江中。天宝七载（748）六月，鉴真第五次东渡，船过狼山，在这里因风急浪高而旋转三山。这里的所谓三山，系指三组山。西边的黄泥山与马鞍山相连为一组，中间的狼山与剑山相隔不足百米为一组，东边的军山与中组相隔约500米，自成一组。自然，亦不排斥三山所记为



视角所限，而非实地踏勘所得。

狼五山也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一带江面宽阔，五代时称狼山海。宋初，从州城至大江约15里。此时狼山应在江中，山体何时连接大陆，方志无具体时间记载，惟可从宋人诗文中略见大概。宋人王辟之的史料笔记《澠水燕谈录》卷8中有关于狼山的记事：

通州狼山广教寺，在唐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

昔人有诗云：“飞来灵鹫岭，化作宝陀山。”前后乃江海相接处。舟出二山间，水湍碍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护之，舟无触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后皆陆田。后人又有诗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马蹄痕。”皆纪实也。

王辟之，治平四年（1067）进士，绍圣四年（1097）致仕还乡，后写《澠水燕谈录》。所记为北宋开国后到宋哲宗绍圣年间140余年的杂事。因系追记所闻，文章中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如“近年”、“昔年”、“今日”等，但至少可以说明，唐时狼山是在江中。1976年3月，南通狼山出土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驻防军队题名石刻一方，记载当时属沿江两岸海内都巡检司第一番的驻防禁、厢两军兵员数、番号和人员名单。从这一驻军的资料推断，狼山在公元11世纪初可能已开始与大陆涨接。

目前，史料中尚无较为准确的狼山登陆的具体时间，我们只能从文字资料中做些分析、推断。北宋夏竦（984—1050）17岁时跟随父亲到通州，《舆地纪胜》卷41通州条保留了他的《登通州狼山》诗：

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常怯夕阳天。

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

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
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

夏竦诗文反映了当年欲登狼山还要经过渡口，说明公元1000年时狼山还在大江中。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志》收录了北宋姚辟的《登狼山》诗：

清浅溪流送断槎，暮云深处见僧家。
龙居碧海云无迹，凤老苍崖竹有花。
潮卷乱峰横几席，沙填重险变桑麻。
人间陵谷犹如此，身外穷通空自嗟。

姚辟，宋庆历年间（1041—1048）任通州通判，他登狼山时已是“沙填重险变桑麻”，可见狼山于11世纪40年代已经连陆。明邵潜撰写的《州乘资》卷2《碑记》中保留了宋元丰四年（1081）刘弇《狼山记》的全文，其中有一段山僧对刘弇的告白：

元丰四年冬……僧有语余曰：“今之山跗虽皆平陆，然前五十载海也。”

元丰四年，上推50年，应在天圣（1023—1032）年间。据此推断，狼山附近最初连陆当在宋仁宗明道（1032—1033）以后至庆历（1041）以前的七八年间。也就是说，约在11世纪中期。

军山在五山中位置偏东南，宋元丰年间也在陆上，濒临大江。自明至清康熙中叶以前，此山已在江中，为一周长约9里的孤岛，以一条水势湍急的军山洪与剑山相隔。康熙朝后期，军山才重新与大陆涨连。军山与大陆涨连的具体时间于史无征，然而在古代文人的作品里却可以找到军山连陆的大体情况。

刘弇在《狼山记》里也谈到军山，然而却没有山在水中的说法。刘弇说：



图15 军山螺浮（模拟）

……而自军山左转，皆闽艘吴舰与渡，而渔且漕者之所出入……

显然，宋元丰年间军山在陆地上。至于军山重新下水的时间，尚无资料证明。明代末年，军山仍然在江中。通州范凤翼《登军山》诗云：“一山冷浸江泠泠，昼雾晴岚相杳冥。”包壮行于崇祯四年（1631）十月的《游军山记》中称：“古静海城南十五里五山峙焉，军山如一螺浮江面……白狼山昔亦居水，而今踞江浒。至军浮沉波中，尺水千里……”^[1]这些都是军山于明末在大江中的真实写照（图15）。

军山于清初仍在江中。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志》引清顺治时人胡公孙《游军山记》说：

……始问渡军山，山僧曰：从白狼间渡不若从朝阳洞（剑山东南麓）间渡，遂道经剑山，下视大江翻在脚底，涛光拘人，令行人足不若定……再上复下，始折入朝阳洞……再呼即得舟，登舟时犹有微浪，及至中流而两山夹峙一水，空明白昼似青，骄阳疑月……

[1]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2山川。

据胡公孙所记，说明当年狼山与剑山都有前往军山的渡口，其时剑山东南麓也濒临长江。

南通学者管劲丞也认为“军山登陆在康熙末年”^[1]。他研究了清初通州两诗人的诗句，得出了军山登陆较为准确的时间，即在1712年以后的十年中。清初通州范国禄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作诗：

一晌军山在水中，有心无力结茅蓬。
而今快得江滩涨，不待褰裳便拄筇。

康熙五十一年（1712）诗人徐轂有诗：

城北老人八十三，不携藜杖踏山南。
却怜暮色经春好，又得游僧赏酒谈。
怪石坐来云欲坠，横岩断处翠空探。
一泓拟来微风渡，恨少当时十二庵。（原注：谓军山）

这两首诗，前后间隔20年，却反映了这样的自然现象：1693年时军山山麓江滩淤涨的速度已经比较迅速了，以至诗人产生了“不待褰裳便拄筇”，急于渡过浅滩的迫切心情；时隔20年，军山与陆地间却仅剩一泓之隔。光绪通州志又引李堂《军山歌》：

军山昔在大江中，夔隔不与四山通……我常带
月乘清风，扁舟来渡东山东。四面江声清肺腑，万籁
俱寂天地空。今日周回涨沙磧，潮来不听吼蛟龙。
军山宛然居陆地，青青联属亘五峰。高沙旋欲没，
浅水尚留洪。倏忽二十载，沧桑几度逢……

李堂为清康熙间人，雍正年间两江总督尹继善曾聘他参修

[1]《南通历史札记》第51页。



《江南通志》。他写《军山歌》约在康熙末年。李堂作《军山歌》时，军、剑两山间尚有浅泓一道，没有完全淤塞。清雍正二年（1724），通州诗人丁腹松（康熙四十二年进士）于中秋节后有《游军山麓记》。当年军山山麓周9里多，可乘山轿。

从以上通州文人对军山景象描绘的诗文中，可以推断：17世纪，军山还在江中。约在18世纪第一个十年，军山开始涨接大陆，山陆间的水面日益缩小。到18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军山已与陆地完全涨接。

清初以来，沿江任、姚各港和狼山附近，陆续有田滩涨出。乾隆十六年（1751），滨江一带升科沙田达1500多顷。清代康熙《内府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图（十三排图）》都绘有通州当时江岸的概况，康熙、乾隆《通州志》也有新旧通州境略图（图16）。图虽很粗略，但新州境图所标州西南江岸与旧图比较已向外扩展不少。

《康熙皇舆全览图》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编绘，历10年初步完成，康熙五十八年印行。这幅地图上的通州东部江岸线画得较为平直，通州以东吕四、余东、余中、余西场已在长江边，永安镇依然存在；通州南边的五山均在江边，而军山作为一个点，画在江中。《乾隆内府地图》俗称乾隆《十三排皇舆全图》，于乾隆二十七年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编就，图中所示通州附近的江岸情况比康熙图简单。乾隆《通州志》所载通州四境新图中，五山以南有大片新沙涨出。

从乾隆十六年（1751）到道光十六年（1836）的80多年间，通州江岸附近继续增涨两千余顷沙田。其中，狼山一带增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增下田958.32顷，草地364.642顷（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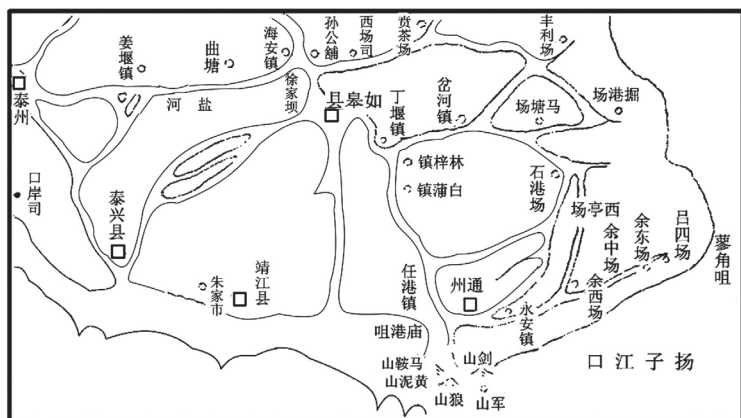


图16-1 清康熙《内府图》通州附近概况



图16-2 清乾隆十三排图通州部分

图16 清康熙乾隆朝文献中有关通州附近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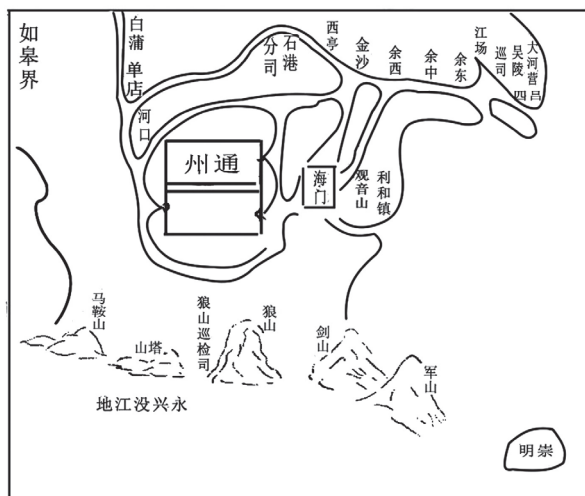


图16-3 通州四境(旧) (原载清乾隆《通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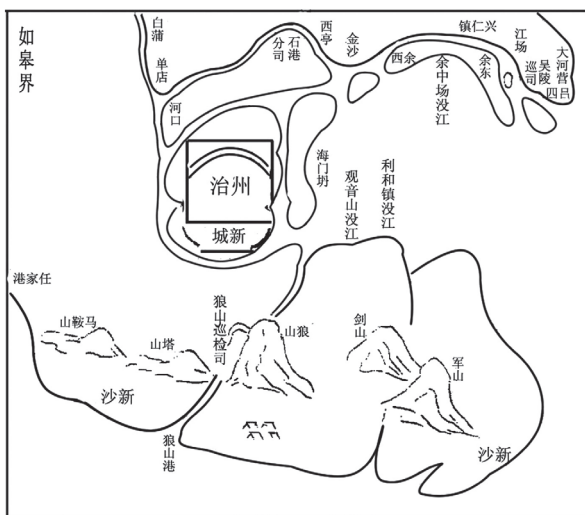


图16-4 通州四境(新) (原载清乾隆《通州志》)

图16 清康熙乾隆朝文献中有关通州附近岸线

表2 清乾隆道光朝狼山附近沙田状况

单位: 顷

沙 名	乾隆十六年	道光十六年
狼山东沙	下田230.225 草滩222.856	下田298.288 草地73.077
狼山沙	下田59.715 草滩65	下田284.168 草地166.019
狼山西沙	下田208.804 草滩11.275	下田588.131 草地317.722
狼山西外洋沙	下田17.857	下田20.898 草地3.21
狼山附西沙	下田11.801 草滩0.952	下田11.801 草地0.952
狼山西洲并 东小西洲	下田460.836 草滩259.907	下田744.272 草地363.652
狼山附西洲	下田70.903 草滩0.962	下田70.903 草地0.962
合 计	下田1 060.141 草滩560.952	下田2 018.461 草地925.594

说明: 本表资料取自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4, 民赋志, 芦政。

2. 通州西部江岸的涨坍

11世纪中期, 通州江岸曾修筑江堤以防潮灾。宋宝元年间(1038—1039), 通州州判任建中在州城西筑了一条长20里的江堤, 后称为任公堤。嘉靖《通州志·宦迹》对任建中修筑江堤有较为简单的记载:

任建中, 宝元元年以大理评事出判通州。筑海堤二十里, 高丈余, 自是潮不为患, 民赖之。仕至兵部员外郎。

任公堤起迄点不明确, 年代久远, 江岸变化, 故址亦失考。万历志称“筑海堤二十里”, “海”是通州沿江一带居民对大江的一般称呼。由任公堤的建造可以推想, 早在北宋中叶, 通州西境已面临江流冲击的威胁。《舆地纪胜》通州条



中有“士公堤”：

士公堤 朱文长撰《士公堤记》。士公宝元中
以大理评事通判是州，筑堤二十丈，故曰士公堤。

这条“士公堤”是否就是任公堤，尚待考证。《万历通州志》秩官表中，宋仁宗宝元年间通判只记有任建中，而无其他人的名字。以“大理评事通判”通州的还有丁度，不过，那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事。“士公”也许就是指的任公。但是，士公只筑堤“二十丈”，可能数字有误。二十丈的大堤是没有抵御江潮的能力的。

任公堤与通州城之间的距离于明代地方志中没有记载，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清代地方志中则对此有所反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2册扬州之通州条中记：

任公堤 在州城西五里。宋宝元间通判任建中
筑，长二十里。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录基本相同。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志》记载：

宋仁宗宝元中，通判任建中筑堤州城西五里，
以障江潮。袤二十里，高丈许，称任公堤。

然而，光绪通州志在记述了通州城西南芦泾港以西的江边诸港后却又说：“……又东为任家港（北有任公堤），州治至此二十里，与南岸昭文县福山港相对。”由此，在同一部地方志中，记任港到州城的距离出现两个数据，一为5里，一为20里。

对于“州治至此二十里与南岸昭文县福山港相对”句，因断句不同，可有两种解释。第一，州治到任港20里，在这里与“昭文县福山港”隔江相对。第二，在任港，与南岸的福

山港相隔20里。从现在的情况看，任港距南通市区中心已超过5里，却没有20里之遥。而从江南福山至南通任港的直线距离有45里之多。南通城与江南福山是两个定点，则可以把任港看做动点。如果说，任港至州城为5里的话，则任港至福山就不可能为20里，而应超过20里；如果任港距福山为20里的话，则任港的位置会在现在的长江中流，且到州城也会超过20里之数。按当年的实际情况，这两种可能性均不会存在，所以，这个20里的数字应当是明代中期及以前任港到州城的距离。果真如光绪州志所说，宋时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则宋代通州的江岸线在任港一带会内凹15里，这不符合宋代当年通州西部江岸较为平直的情况。任港距州城5里，当是清代的实际情况。

明代中期以前的任家港距州治应有20里。明代通州城南有地名灰港，位于天生港与芦泾港之间。万历年间，此港距州城17里，狼山距州城18里，且灰港与狼山“皆逼于江”。灰港，也见于明安民营图（参见图10）。任港在灰港和狼山之间，明万历年间的任港距离通州城20里是极有可能的。光绪州志中，已不再记载灰港。可以推想，任家港距离通州城20里应为明代中后期以前之事，其下限至迟应在16世纪后期。光绪通州志中的“二十里”之数极可能是前朝某时期的数据，而《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州城西五里”之数，则是明末至清代通州与任港间的距离。宋代任公主持修筑的堤岸也许早就为江水冲坍，然而港口不能无堤防，后来建筑在任港一线的江堤被指认为宋代的“任公堤”，也是极有可能的（图17）。

明代通州西南江岸坍塌的程度并不亚于与通州毗连的如皋南境。万历年间，通州境内的“狼山、文安、永兴三乡虽滨江，本沃壤，今乃蚀已过半”^[1]。明末邵潜《州乘资》卷1

[1] 明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



图17 江堤新貌

说：“通土皆浮沙，易于崩圯。故西南一带田地坍没于江者八百九十三顷三十一亩有奇。”这是明末通州西南江岸坍塌情况的佐证。

清末，通州西部江岸又曾出现坍塌现象。由于江南常阴沙的不断扩大，西来之水破坏了江南通州西部江岸线的稳定。芦泾港、任家港等处“从前江岸距城十五六里”，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近者仅五六里”。^[1]西起天生港、东到姚港约20多里的沿江田地大量被大量坍蚀。这一情势，在清光绪三十四年通州西部沿江姚港、任港、芦泾港、天生港四港民众的一篇呈文中陈述了概况：

自光绪初年常阴沙涨而益东，江流渐移为子午线，直冲北岸。潮汐荡刷，南风尤烈。遂至沿江地亩日坍一日。东起姚港，经任家港、芦泾港、庙港，西至天生港，计地二十四里余。三十年来，坍削地亩面积已有十万余亩。昔时江岸距城之西南远者二十余里，近亦十余里。今则姚港距城人行道仅八里，鸟道

[1]《南通县保坍会文牍辑要》，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关州牧通禀查勘沿江坍势集议筑堤情形文》。

仅五里。最远如天生港亦不过十四五里……^[1]

把宣统三年（1911）实测通州地图和海关税务司旧图作比较，平均每年坍地约10平方里。对此，《南通县图志稿·工程志》提出了中肯的警告：

前此江岸距城西南远者二十里矣，近亦十余里。
今则姚港距城仅八里，鸟道仅五里，最远如天生港
亦不过十四五里。失时不治，愈坍愈北。

《南通县图志稿·工程志》中还有一段关于芦泾港江岸的说法，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父老相传，四十年前有礁石当芦泾港江圩之内
龚姓宅旁。勘测之，则礁石已过江，当刘海沙东角准
鸟道十二里许矣。

清末《通州水陆道里详图》载有此礁，在芦泾港南边十多里的江中，称青天礁。这段文字记于1911年，“四十年前”应在清同治末。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水利治绩》中所载通州江岸沿线港口与明代大体相同，对照这段江道近百年来的变化，可以判断：在19世纪中期，岸土并没有发生相对于青天礁的巨大坍塌，但青天礁离岸入江亦即江岸略有北移，却是事实。这可能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年月里。

清同治以后，江南近岸沙洲不断扩大，民国初年人工堵塞沙洲间的水道，导致江流向北冲蚀，破坏了江北通州江岸的稳定。光绪十六年（1890）到宣统三年（1911）的21年间，登瀛沙、

[1]《南通县保坍会文牍辑要》，光绪三十四年六月《芦泾港、任家港、姚港、天生港人民代表陈琛、袁煦等二十人公呈关州牧江坍日甚农田日削吁乞详请奏闻筹款筑岸文》。



济生沙、刘海沙、文心沙、保婴沙、鼎兴沙等近江南岸的沙洲纷纷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报官认购的沙田面积达4.4万亩左右。^[1]这样,通州对面的长江南岸岸线发生了变化。原来常熟、江阴一带本以鹿苑口以西至段山以东为江岸,常阴、盘篮各沙为该两县所属江中新沙。其后,盘篮沙及紫气沙南岸日渐涨出新沙,原沙两岸之间成一落潮时不通流之断港。其江岸遂移于登瀛、常阴、紫气等沙的北侧,这一带岸线北移。

20世纪初,通州西部一带坍塌十分剧烈,直到20年代末,狼山附近仍然在不断坍塌。宣统三年,实测五万分之一的《通州水陆道里详图》载录有“东芦泾港”及离长江约3里的坐狮子,其间有地名“三圩店”;任港有二濠庙,距城约10里;姚港镇西2里有义学镇;马鞍山西南8里有王港;狼山以南到山港镇约7里。20世纪初这一带都是沙田所在(图18)。1912年6月30日,南通张謇在致大总统及财政、农林两部的电文中称“四十年来江岸崩坍,纵宽自十余里至二十余里,横长二十六七里,损失民田二十余万亩,值近千万”^[2]。20世纪前20年,这一带江岸继续遭到江水侵蚀。江南段山一带筑坝,封闭南沙等与长江南岸间的水道,对南通、如皋两县的保坍工程造成极大的损害,修建护岸石榵成为南通保坍的重大工程。

在长江水下紊流的冲击下,1918年,如皋境内的周圩港、碾砣港、丝鱼港等处已坍三四千亩土地,而南通境内“任、姚港垂成之榵五六两座顿受重伤,七至十榵已离岸根。坍地亦日必十余丈至二三十丈不等”^[3],沿江坍户,迁徙流离,顿失生计。张謇在一则通告中称,“然江堤即筑,若不赶修七八两榵,

[1] 民国《南通县志》卷2《工程志》。

[2] 《南通县保坍会文牍辑要》,张謇致大总统及财政、农林两部电。

[3] 《特来克与南通保坍史料》:《南通保坍会会长张謇、如皋水利会会长沙元炳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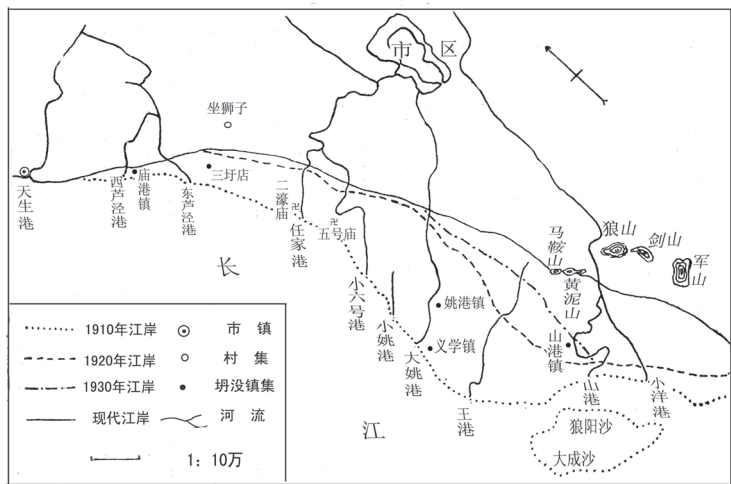


图18 清末以来南通市区西南江岸变迁(示意)

赶补九十两榵，加筑十一十二两榵，则江流逼冲，岸塌而堤终不保”。^[1]当年南通保坍工程并未能阻挡江流对北岸的侵蚀，南通天生港到狼山一线的江岸坍塌仍然十分剧烈。把1928年出版的《通如海三县交通图》与前图做对比，可以发现，近20年内江岸已北退不少。芦泾港、坐狮子到黄泥山一线以南的河港、村集都已坍没入江，三圩店、二濠庙、义学镇、老姚港镇均不复存在，马鞍山西端也濒临长江，江水直逼马鞍、黄泥山麓。旧时山南的梅垞、西林已坍没，江堤距狼山最近处已不足2里。西来江流对这一带构成巨大威胁。因此，狼山以西江岸防汛保坍工作成为当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在清末开始的通州自治运动中，对江岸的保坍成为要务之一。

[1]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通州东部涨坍史

宋代文献关于通州东境的记载很少，江岸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古代海门县由沙洲涨连大陆，长江北岸沙嘴向东南又一次延伸。这说明宋代这一带在迅速伸涨之中，通州东南境土有很大的扩展。元代末年以来，由于海潮和江流的侵蚀，海门旧县曾多次迁移。到清初，海门旧县全境除吕四场外全部坍没，于是，该县被废为乡，并入通州。清康熙、雍正年间，通州东部江岸在狼山东北形成一个弯曲，江流逼近金沙、余西、余东、吕四等场，这一带的北海岸与南江岸之间最大距离不过10里。自宋到清初的700多年间，古海门县的形成与坍塌过程也就展示了通州东部江岸的进退过程。

古代海门县^[1]在宋初还是沙洲群。这些沙洲涨接大陆后遭到海潮侵蚀，从元末到清初的320多年间，数度迁移县治，终于几乎全部陆沉；清中叶以后通州东南江沙涨起，并重新成陆；崇明岛由散布江口的许多沙洲连成大岛。沧桑几度，变化巨大。

1. 东布洲和古代海门县的形成

古代海门县最初由长江口的沙洲群组成，它们涨出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其形成最早应当在唐初，至迟也不会晚于唐代中叶。海门的名称较早见于《南兖州记》和《旧唐书》。

[1] 为区别1912年由海门厅改称的海门县，称五代后周建立的海门县为古代海门县。

《南兖州记》的“海门”实指长江入海口，本书前面已有所提及。《旧唐书》中的“海门”另有所指。

唐德宗时关中多乱，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镇海军节度使韩滉在江南加强战备。《旧唐书·韩滉传》：

自关中多难，滉即于所部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马牛出境；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还……明年正月……陈少游时镇扬州，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滉亦以兵三千人临金山，与少游相应楼船于江中，以金银缯彩互相聘贄。

对这段历史，《资治通鉴》所记略有不同：

（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岷，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滉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旧唐书》记“明年正月”陈少游阅兵、韩滉于金山相应，此事在德宗兴元元年（784）。那么，韩滉由海门大阅舟师，应当在德宗建中四年（783）。《旧唐书》中的“海门”是否泛指海口，并不明确。从《资治通鉴》所记内容看，这个海门应指京江，即今镇江一带。对于韩滉阅兵的终点申浦，明万历《通州志·遗事》中定在黄浦：

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奉天之难，时修石头城，以备巡幸。造楼船数千艘，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还。按：申浦乃春申浦，今上海县之黄浦是



也。故楚春申君黄歇所凿。

清康熙《通州志》转抄明万历州志的说法，其实对申浦的说明是错误的，申浦不是黄浦。申浦在江阴西30里。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江阴县下有申浦：

申浦 县西三十里，一名申港。相传春申君所开……唐兴元初韩滉镇润州，造楼船繇海门大阅至申浦而还。

宋隆兴二年（1164），“议开申、利二港”。宋设申港寨，又设巡司于此。^[1]可见，申浦在今江阴。按唐代的航行条件，韩滉大阅舟师，从镇江到江阴申港的可能性，要大于从镇江到黄浦。

唐代，长江江口一带开始形成一些沙洲。到唐末，长江江口段东部外口有东洲、布洲、顾俊沙等，其西有胡逗洲。这些沙洲因控扼江口，成为浙西、淮南藩镇争夺的军事要地。

《輿地纪胜》通州条转引宋《通川志》史料：

通川志云：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制卒，子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始筑城，钱镠遣水军破之，虏廷珪。

《通川志》即孙昭先所撰《淮南通川志》。万历《通州志·艺文》存书名，已失传。“存”、“制”即姚存、姚制，为唐末占领静海、东洲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首领。“海陵之东有二洲”，即胡逗洲与东洲。《通川志》这么记，显然是指唐代末年胡逗洲尚未与大陆涨接之前的事。东洲位于长江口，是一个战略要地，于五代为吴、吴越军阀争夺之地。公元10世纪初，吴越与吴国军队多次在长江口一带

[1]《读史方輿纪要》卷25江南七。

发生战事。《资治通鉴·后梁纪》说：

（开平二年八月）……淮南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击吴越，九月围苏州。吴越将张仁保攻常州之东洲，拔之。宋白曰：通州海门县，东南隔水二百余里，本东洲镇。

又说：

（贞明五年三月）诏吴越王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四月……乙巳战于狼山江……秋七月，吴越王镠遣钱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出其后……

开平二年即公元908年，贞明五年即公元919年。这里，陈璋的水军“下海门”，抄吴越军的后路，显然，这个“海门”指当年的江口一带。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军政志》记载，937年，南唐主“徐诰遣沿江巡检卢绛募亡命习水战，屡破吴越兵于海门”。这个“海门”也是在长江入海口，亦即东洲、布洲、顾俊沙一带。当年的东洲能驻泊五百艘兵船，其面积应当较大。

东洲附近有一名为布洲的沙洲，因生产海盐而富甲一方。《舆地纪胜·通州》中还有“吴改东洲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的说法。可见，五代吴政权统治期间，东洲和布洲还是独立存在的两个沙洲。

东洲和布洲，一为长江口的军事要地，一为长江口的海盐生产基地。从上引《舆地纪胜》丰乐、大安二镇的记载来看，东洲和布洲显然是两块沙洲；后称东布洲，则两沙洲应已合二为一。清乾隆《通州志》海门乡条的“旧云古大安镇即东



洲”、“原为海屿沙岛”的说法，与《舆地纪胜》改东洲为丰乐镇的说法不同。造成记录相左的原因有两种可能：其一，因为东洲与布洲并洲后，大安镇与丰乐镇同在一个沙洲上，后人对此记载发生了错乱；其二，宋初海门县原在东州镇，可能后来迁治大安镇。乾隆《通州志》的说法当有所本。

东布洲，见于《旧五代史》与《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周）世宗纪第五：

显德五年……三月……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彦钊奏，大破贼军于东 沛洲。

在《资治通鉴》中，对周显德五年（958）的战事有更明确的记述。其后周显德五年三月条载：

辛卯，上如迎銮镇，屡至江口，遣水军击唐兵，破之。上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 沛洲，将趣海口，扼苏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将步骑、右神武统军宋廷渥将水军循江而下。甲午，延钊奏大破唐兵于东 沛洲。

这里的“东 沛洲”就是东布洲，慕容彦钊与慕容延钊当为一人。这说明，五代后期就有了东布洲这个地名。清代学者是把东 沛洲和东布洲视作同一自然实体的，这在清光绪通州志对静海乡的叙述中有所反映。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1疆域志静海乡：

杨吴为东洲镇 扬州府旧志，海门县本汉海陵县东境，其地为东布洲，杨吴时为东洲镇。海门县旧志，古大安镇即东洲也，原为海屿沙岛，曾有布机流挂其上，沙涨为陆，人民渐繁，又曰东布洲。《通鉴》注，东沛洲在泰州东南大江中，元是海屿沙岛之地。宋白曰，

东 沛洲在泰州东南，通州海门县界。沛音布，州当作洲。《輿地记》通州有东、南二布洲。

光绪州志的作者视静海乡为宋海门县历史载体，有其一定的道理。而这段历史与上引《輿地纪胜》的记述内容并不矛盾。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是宋元史学家，曾任扬州江都丞。他的注应当与宋代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宋白，北宋人，他对东布洲的位置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对其位置作了注释。可见，东 沛洲是东布洲早先的写法。

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纪胜》通州卷中，列有“东布洲”条。在对东布洲作说明时，他则引入了“布洲”、“东洲”的概念：

东布洲 元〔原〕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布机流至沙上，因名布洲，既成平陆，民户亦繁。

王象之把东洲和布洲同时列在东布洲条下，说明了东布洲是由东洲和布洲并接而形成的，只是他没有正确地表述这两个沙洲的并洲现象而已。综合上述资料，可以推断：东洲与布洲的并洲现象发生在公元10世纪30至50年代。

宋初海门县，其西界为海。《太平寰宇记》指认县在通州“东南隔海二百余里”。所谓西界，即东布洲的西部边缘。既然宋初的海门县还未与通州陆岸连接，说明当年的海门县是以沙洲形式存在的。明嘉靖《海门县志》集之一说：“县治初与崇明比境。”这表明东布洲应和崇明岛相去不远。崇明在宋初为海门县的一个属镇，因此，宋初海门县的范围包括了崇明镇各沙。

宋朝初年，通州海门县境内有“海门岛”，且和登州沙门岛同为流配犯人的地方。宋太祖时，兵部郎中、左谏议大夫、梓州知州冯瓚与监军、绫锦副使李美获罪，“瓚流登州



沙门岛，美配隶通州海门岛”。^[1]对于海门岛的范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作了明确的记述：

（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注：通州海门岛。“海”原作“沙”，据宋本、宋撮要本及《纪胜》卷41海门岛条改。）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洲。两处悉官煮盐。是岁，始令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之。（注：“始令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之”，分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史》卷201《刑法志》补。）

由此看来，海门岛中至少有两个沙洲，一为崇明镇所在之顾俊沙，另一为“东北洲”。东北洲，于通州地方志中无记载，仅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应当是东布洲。对于这个“东北洲”，在《文献通考》与《宋史》中则有不同的记载。《文献通考·刑考》所载文字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记述对比，除较简略外，有两处不同。其一，“通州海门岛”改成了“通州海岛”；其二，配隶懦弱者的“东布洲”改成了“东北洲”。《宋史·刑法志》的相关记载则另有变化。其中，“通州海岛”与《文献通考》所记一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东北洲”与《文献通考》之“东布洲”在这里被改为“东州市”。“通州海门岛”写成“通州海岛”不排除掉字的可能，另一种可能性，即《文献通考》与《宋史》的作者们依据其所处时代的情况，对这个史事做了记载，在我们看起来，则是对前条记录的相应修改。可以说，“东北洲”即东布洲，而东布洲、东州市则是对宋初海门岛中两个沙洲因时期变化而产生的不同称呼。（有关论证参见下文“‘通州海门岛’的史料研究”。）

[1]《宋史》列传29。

吕四场在宋朝为海门县的一个盐场，也就是《文献通考》中所谓东布洲煮盐的地方，应在东布洲的北境，明《筹海图编·沿海图》（图19）和嘉靖《海门县志》都有载录。这里原有一条东洲河，南流入江。明嘉靖年间，吕四场境内还保留了这条河的古道。嘉靖《海门县志》集之五古迹说：

东洲河 在县东吕四场境。按县在唐宋时属吴，为东洲镇。河已淤浅，故道尚存。

根据这些资料判断，宋初东布洲大致位于启东县北部。《读史方輿纪要》卷23通州海门县条说，宋时大海距海门县有80里之遥，但按照明嘉靖《海门县志》海门县的四至来看，县“东至料角嘴八十里”。明嘉靖时的海门县侨置于通州余中场南，《读史方輿纪要》作者顾祖禹可能误引。按顾祖禹的说法，似乎东布洲的东部边缘还在现启东东海岸以东。不过，东布洲的地理条件和崇明基本相似，当时崇明还是一块不大的沙洲，东布洲东境能不能有80里的长度是个疑问。

东布洲从沙洲到涨接大陆的发展过程，文献没有记载。太平兴国年间，海门县与通州之间隔海200余里，州县之间可能有一些沙洲，以后逐渐涨接而成陆。在东布洲还没有连接大陆之前，通州东境的江岸线，宋、明文献中有三条线索。

第一，明嘉靖《海门县志》所附《新旧县总图》（图20）中，在吕四场以西有一条曹严洼，为明初通州和海门分界处。吕四于宋代属海门县，这里应该是原有的界线。洼的南端，即《筹海图编·沿海图》中的竖河口。这条洼及竖河口在东布洲涨接大陆前，应是一条夹江。

第二，明代通州东南50里有一个利和镇，又叫里和镇，清初坍入江中。利和镇于唐宋之际是一个盐场，属利丰监。可见，宋时此镇应该近海。《宋会要辑稿·盐法》中所列绍兴时通州已无此盐场。《太平寰宇记》中，利丰监统辖八个盐场，而《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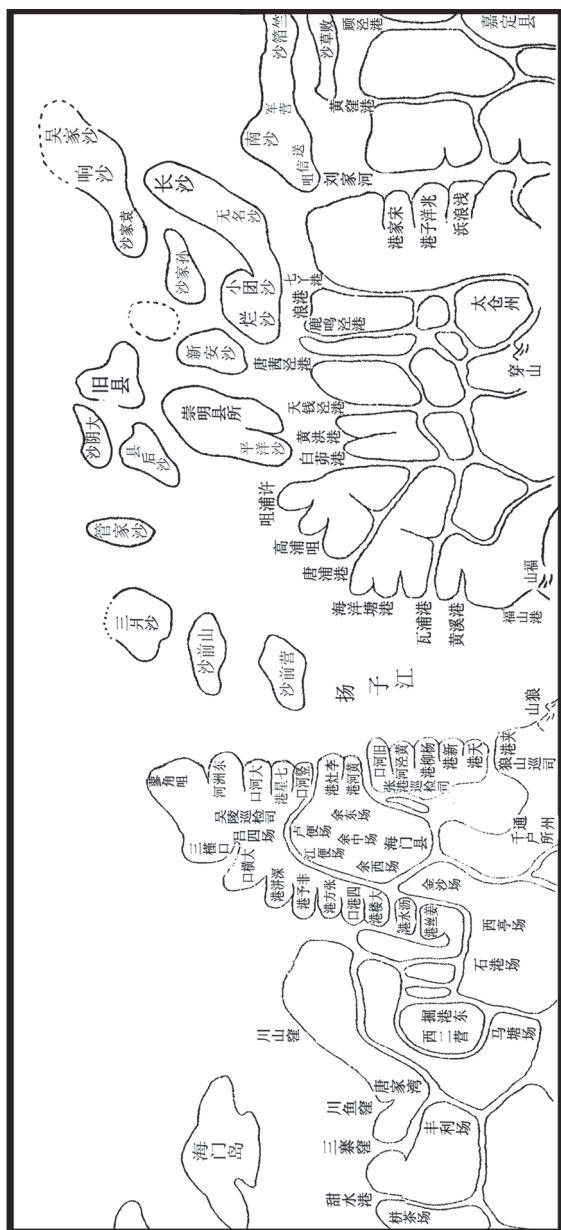


图19 《筹海图编·沿海图》长江口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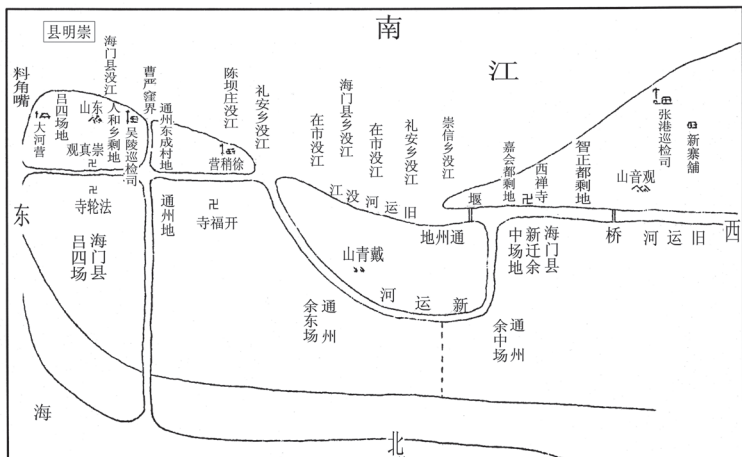


图20 明嘉靖《海门县志》海门新旧县总图

史·食货志》盐法中所记天圣中通州盐场仅有七个，少了一个，可能即利和场。这显然是因为沙涨并陆、江岸延伸之后，此场与海隔绝的缘故。

第三，《舆地纪胜》卷40通州条载，静海县南40里有一条布洲夹，当是东布洲与通州之间的一条夹江。但是，这里“南”的方位有误，应为“东”。《太平寰宇记》对此没有记载，但说东州镇与通州隔海200里。《舆地纪胜》记静海县距布洲夹只40里，这反映东布洲及通州东部海岸在宋初以来分别向西、向东有很大扩展，以至使海成为夹江。这与后来清乾隆中现代海门涨起的情况相似。

东布洲涨接大陆的时间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太平寰宇记》通州海门县条明确指出，宋初通州与海门县之间隔海200余里；《文献通考》卷17称，太平兴国五年（980），东布洲还是沙洲海岛；而《元丰九域志》卷5通州海门县条所记，却不再有州、县间隔海的说法了。这可以说明，自太平兴国到元丰的近百年间，东布洲已与大陆连接，然具体时间却



不明确。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海门知县沈起修筑吕四到余西的捍海堤。这段堤的修筑时间在范仲淹修捍海堤之后约20年,也晚于庆历年(1041—1048)通州狄遵礼修堤约10年。《宋史·张纶传》说,泰州原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读史方輿纪要》说堤从北海寨到景庄长180里。可见,范堤在泰州境内。通州境内的海堤为狄遵礼所续修,但也只到余西,不到吕四。沈起继续完成了这条捍海堤,使之延伸到吕四。

海门县是通州的属县,吕四和余西相隔才70里。当年,通州东部和海门北部毗连,面临海潮冲击是相同的。狄遵礼主持一州修堤大事,为什么缺70里不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海门还没有完全与通州涨连的缘故,其间存在滩涂、夹江而无法修筑。此外,通州利和场于宋天圣(1023—1032)中废。可以说明,其时通州东南因沙洲涨连,海潮难以到达利和一带;也可说明,东布洲与大陆间的泓道于此期间开始淤积。据此推断,东布洲与大陆涨接的时间应在沈起筑堤之前不久,即在宋庆历、皇祐年间。这和前面推断狼山接涨大陆的时间相近。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这一时期内通州东部江岸扩展的客观反映。

根据以上的线索可以推断:宋代通州东部岸线随东布洲的扩展而发生变化。大致东布洲最初为沙洲时,州东江岸自狼山东北经利和、余庆等场以南到曹严洼西,隔洼与东布洲相望。宋中叶以后,东布洲向西涨接,利和、余庆等场的江岸线也向东南扩展。据明嘉靖《海门县志·建置》记载,“县治初与崇明比境,元至正中以江患,北徙礼安乡”,说明海门旧县于元末开始坍塌。因此,元末以前的海门县境应是比较完整的。可惜《大元一统志》已失传,无法了解元代海门县的实际情况。明《筹海图编·沿海图》绘有海门沿岸各港,自狼山起由西向东为夹港、天港、新港、杨树

港、黄泾河、旧河口、黄河港、李灶港、竖河口、七星港、大河口、东洲河而抵廖角嘴。吕四、余中等场以南还有大片土地。把《筹海图编·沿海图》与《嘉靖海门县志》附图对比，其差别甚大。显然，以上各港均为嘉靖坍岸之前的江岸港口。元代，这一带的江岸应该近似这些港口所在的江岸一线上。宋代岸线也应在这条岸线以南不远处。

2. 古海门县的坍没和通州东部江岸

前文提到公元14至15世纪之间，即元末到明中叶，世界气候发生变化，海面上升，长江主流也曾移向北泓。古海门旧县首当其冲，发生了县境土地大片坍塌、人民流离失所的灾难。自元至正中（1350左右）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320多年间，县治曾经迁移多次，最后除吕四一角之地外，全部坍没入江，终于废县为乡，并入通州。

宋元以来的海门旧县是一个“置里百有二十”的“壮县”，县治原来在距崇明不远的大安镇。元至正中（约在1350年左右，张士诚部占城之前），由于海潮侵袭，县城崩坍，向北迁移到礼安乡。《读史方舆纪要》卷23通州海门县条说，这里“距通州百里”，这里的江岸已退到距吕四不远的地方，估计在今蒿枝港向西的一线上。

礼安乡残存部分——约相当于今海门东北江家、三和等镇附近——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圯于风潮”，成为一个“仅可避居”的地方，户口只剩下“三十七里”。成化二十年（1484），通州州判萧盛主持修筑通州江堤120里。弘治十一年（1498），海门知县萧绪主持修筑沿江堤岸，^[1]然而这些工程的护岸作用仍然没有能抵御江涛的冲击力量。到正德七年（1512），又一次“飓涛骤作，溺民漂庐”，县治再次成为“荡然一墟”，因而于正德九年县治迁徙，西移30

[1]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2山川志通江治绩。



里到通州境内的余中场。这时的海门已“无饶土”了。旧县东境，江岸坍得特别厉害。据明嘉靖《海门县志》附图看，当时，吕四场南尚有大河营、吴陵巡检司等地，而礼安、崇信两乡已全部坍入江中。余东场以东的江岸向北凹入，形成一弧形弯曲，嘉会、智正两都地所剩无几。县西南15里的张港巡司以南就是海门旧县西部江岸所在。

海门县于明代中叶为江水冲蚀，其田地已坍没过半。嘉靖《通州志》卷3田赋记载：

海门县旧额田地草场一千四百六十二顷一十八亩二分……弘治年间奏，准勘过坍没田地草场一千五顷六十二亩九分……见存田地草场五百五十顷五十四亩五分。正德、嘉靖等年又坍没六千九顷八十六亩八分，见存田地草场四百八十顷六十七亩七分。

万历《通州志·则壤》记载：

海门县旧额官民田地草场一千五百五十六顷一十七亩四分。弘治间奏，允勘报坍没一千五顷六十二亩九分，续二百五十六顷九十四亩六分。今在二百九十三顷五十九亩九分。

嘉靖、万历两《通州志》所载海门县田地“旧额”数并不相同。万历《通州志·则壤》所载嘉靖六年海门知县陈海的《除坍粮以苏民困疏》中称：

据本县坍民彭锐等告称，本县原额官民田地草场一千五百五十六顷一十七亩四分，后于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等年，江水坍没。弘治年间本府知

府邓文质奏准，勘实被坍田地草场一千五顷六十二亩九分……继以正德七年、嘉靖元年屡患风潮，田土续坍几尽……到职查得，本县临江枕海，三面风涛，额有田地十坍八九，较之他方事体委有不同……

陈海疏文中海门田地原额数，万历志所记旧额数与清光绪通州志所记明洪武九年（1436）数相同。可见，明嘉靖志所记“旧额”数应在洪武九年之后。事实上，从1436年到1505年的70年间，海门县的田地“三分已坍过其二”^[1]。嘉靖十七年（1538），风潮再次侵袭江岸，以致境土“日蹙”，户口只剩下十四里。县治不得不于二十四年（1545）西移到金沙场南，瞿灶、进鲜两港之间，约当今袁灶港、海坝桥以西之地，并向通州割借户口六里、田地142顷来维持残局。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民赋志·则壤》中保留了明至清初海门县坍没田地的数据（见表3）。表3表明，从明洪武九

表3 海门县明清坍地统计

单位：亩

时 间	增加田地	除豁坍田	剩余田地
洪武九年（1376）			155 617.4
弘治十六年（1503）		126 257.8	29 359.6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借14 264.6		43 624.2
万历二十年（1592）		20 506.8	23 117.4
万历四十三年（1615）		6 607.5	16 509.9
崇祯六年（1633）		1 718	14 791.9
崇祯十六年（1643）		1 624.4	13 167.5
顺治三年（1646）		4 882.5	8 285
顺治八年（1651）		1 639	6 646
康熙十一年（1672）		2 691	3 955

[1] 明万历《通州志》卷4则壤，巡抚都御史高友机《题蠲坍粮以苏民困疏》。



年到弘治十六年的近130年间，坍地126 257.8亩，年平均坍地994.16亩；嘉靖二十四年到万历二十年的近半个世纪期间，坍地20 506.8亩，年平均坍地436.31亩；崇祯十六年到顺治三年的三年中，坍地4 882.5亩，年平均坍地1 627.5亩。可见明代以来，通州东部因江潮冲蚀而导致田地大量坍没，明代初期达到高峰，明末清初又进入高峰期。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民赋志》中收录了明崇祯十六年海门成友谦的《除坍赋疏》，疏文称：

臣原籍南直扬州府通州清干乡，今割属海门县。溯考洪永初志，海门县编户一百八十三里，缘海潮冲击，城郭崩坍。一迁于吕四场界地，再迁于余东场界地，三迁于余中场界地，只剩民户一十四里。于嘉靖二十四年，割借臣通州清干乡六里、金沙一里，合成二十一里，是以四迁县址。回视畴昔，十亡其九……未及百年而坍没更甚于前。斗城遗子，聊与波臣争此片席地。然循其名，仍是一县治也……今大海去县不过里许……

成友谦的疏文简述了海门县治的迁移过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明末海门县治为江涛所逼的惨状。这时的海门只是一个寄治通州领土的侨县而已。吕四以南的吴陵、余中以南的张港两巡检司已经坍没，不复存在，江岸再次北退。东部吕四、余东之间的江岸在原通吕公路所经的倒岸沿线，西部江岸距城里许，新寨铺、利和镇重新濒临江岸（图21）。《读史方輿纪要》引《江防考》说：“江岸东起蓼角咀大河口及吕四、芦家等场，治於杨树港海门县里河（利和）镇以达通州。此海门县之南路也。”^[1]当时的江岸就在这一线上。

[1]《读史方輿纪要》卷23通州海门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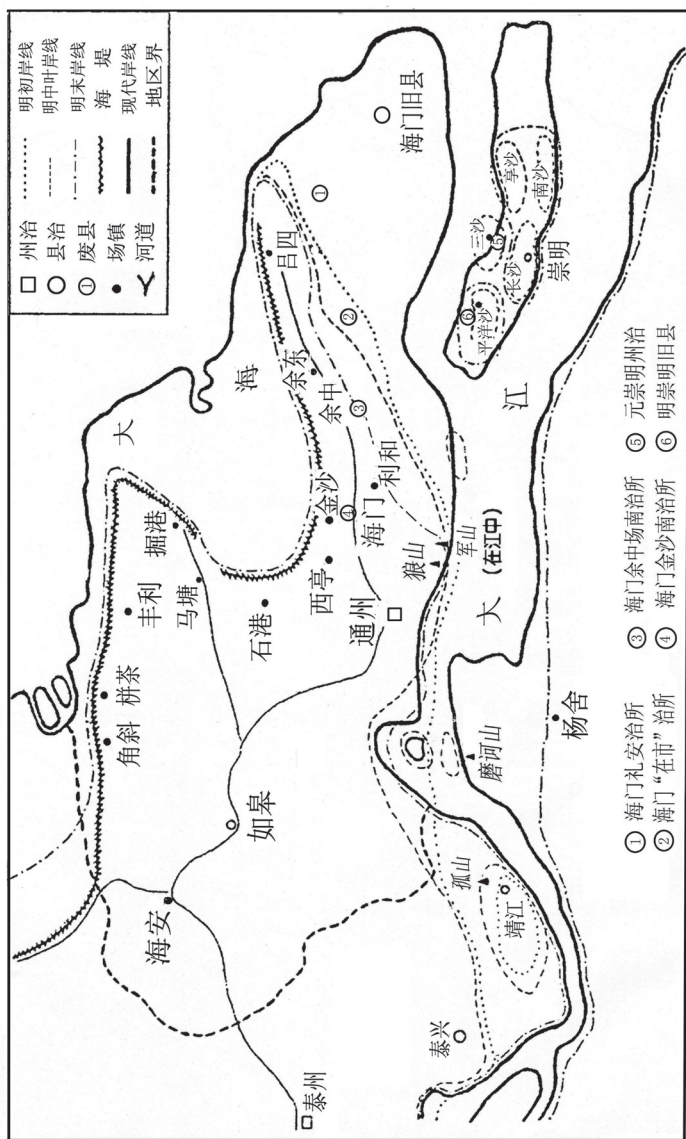


图21 明代江口以北岸线变迁(示意)



明末以来，通州东部的江岸仍在江流海涛侵袭之下继续坍没。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城又遭风潮侵蚀，利和镇、新寨铺全部坍入江中，海门县治再度西移，迁到城西永安镇，民户所剩寥寥无几，不能成县，于是裁县为海门乡，并入通州。康熙末，永安镇为江水所逼，继而坍没，海门乡人最后迁到兴仁镇。自此以后，为江水侵扰的人们始得安定。因此，兴仁镇有“新地”之称。海门旧县自后周显德五年（958）建治以来，县土一坍再坍。至此，除吕四场以外，已无余土。雍正以后，江沙新涨，乾隆年间增设海门厅。为避免海门乡与海门厅相混淆，道光十二年（1832），改海门乡为静海乡。

在海门旧县最后坍没的过程中，通州城东南一带也大片坍蚀。州治东南一带迭遭大江侵削，自海门归州止，剩文安、清干两乡，以东十六里墩迤逦而去，半属洪涛所没。这时的通州江岸，自吕四廖角嘴沿倒岸，经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等场以南，大致为原通吕公路沿线所经，如八索子、四甲坝、四扬坝、二甲镇、六甲镇、曹家镇到达进鲜港的海坝桥，再西南经陆洪闸抵达剑山东麓，江岸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弯曲。此外，这段江岸沿线有一系列的坝头，坝南、坝北的地势存在显著的高差。坝南之地称为“沙地”或“圩地”，坝北之地称为“老岸”。今陆洪闸、啬园东南不远处还曾留有一段江堤的遗迹。观音山以东三圩头一带至今还叫“东沙”。这是坍后复涨的后起名称，与原来的“东沙”无关。以上所述，也可以从清康熙、乾隆两通州志所附通州境域图中所绘江岸形势得到印证（图16）。康熙朝的通州州境旧图中，通州以东的观音山、利和镇，通州余中场都还存在，海门县城已经迁移到通州境内的金沙场南的进鲜港了。乾隆朝的通州州境新图中，通州东部的观音山、利和镇都已经沦为泽国，而金沙场南的海门城、通州余中场也为江潮冲坍。

为了便于了解古海门县治的设置及其故地的大致位

置，根据文献资料推断予以复原，列表于下：

表4 海门县治时限、依据与位置推测

朝代	记 载 摘 要	位 置 推 测 说 明
宋 代	《太平寰宇记》：（州）东南隔海水二百余里，六乡，本东洲镇。 《元丰九域志》：通州东二百十五里。	约当今启东、吕四以南，汇龙镇东北一带。
元代 至正年	嘉靖《海门县志》：至正中以江逼北徙礼安乡。 《读史方輿纪要》：通州东百里。 万历《通州志》：旧县铺在县（金沙治所）东九十里。	按嘉靖志海门新旧县总图，礼安乡约当今余东镇南及东南一带，即今三和镇附近。
明代 正德年	嘉靖《海门县志》：正德九年，复卜迁于西三十里余中场，之北实通州境，海门已无饶土矣。	旧余中场已坍没，其位置在今四甲镇以南，约当今合兴、长兴两镇之间。
明代 嘉靖年	崔桐《海门迁县记》：通州之东四十里，海门（余中）之西三十里有土曰金沙，南襟曹河，北负阜野。东有港焉曰进鲜……西有港焉曰瞿灶，左之南则利和雄镇……右之西则狼军五峰……金沙一里可以永奠，益清干六里可以裨虚出……	按清末实测图，今金沙镇东南进鲜、瞿灶两港之间有一五角形地带，和嘉靖新县图比较可以吻合，进鲜港海坝桥以北港面宽阔，桥南港面较狭，地貌情形完全不同，可反映出当年县治坍没及江岸以海坝桥为限。
附： 清代 永安镇 海门乡	《静海乡志》：康熙十一年，县城为潮所坏，迁治永安镇，省县为乡。越数十年，永安复圯，迁于兴仁镇，距州城十五里。	永安镇见于清内府地图，在州治东南。乾隆十三排地图不载。其处已形成一江湾。此镇原在金沙故海门之西及兴仁之间，即今东沙、三圩头一带。



表5 明代海门县乡都位置推测

明代地名	记载摘要	位置推测说明
人和乡	嘉靖《海门县志》：四里，在吕四场南，没江大半。（按县图，在吕四以南东山附近。吴陵巡司、料角寨在境内。） 万历《通州志》：人和乡有新河港、黄沙港、东明港、生港、大河口港。	在吕四以南，约当海门旧东五区以东，即原满洋、小安等沙及启东北部之地。
礼安乡	嘉靖《海门县志》：五里，在旧县南，没于江。（按县图，当戴青山以南地，戴青山在今余东镇西南。） 万历《通州志》：礼安乡有西河港、徐稍港、西七星港。徐稍寨在境内。	在吕四西南，余东东南，新倒岸以南之地。戴青山，清末实测地图作对青山，在余东镇西南二里。约当海旧东四、东三区北部地。
崇信乡	嘉靖《海门县志》：四里，在旧县西，没于江。（按县图，崇信乡在礼安乡西，约当余东西南，余中东南。） 万历《通州志》：崇信乡有陆港、孙潭港、陈铁港、道堂港，通大江。	在余东西南，约当新河镇、富安镇及海门旧东一、东二区北部地。
陈坝庄	嘉靖《海门县志》：二里，在旧县东，没于江。（按县图，陈坝庄在礼安乡东，徐稍营东南。）大河口寨在境内。	约当吕四西南，吕寿沙一带。
嘉会都	嘉靖《海门县志》：四里，在县南，没江已半。（按县图，嘉会都在余中场南，西禅寺东南。） 万历《通州志》：嘉会都有杨树港、薛家港、西黄泾港、东黄泾港。	在余中场以南，海门旧东一区北部长乐镇一带。
智正都	嘉靖《海门县志》：十一里，在县西，没江大半。（按县图，智正都在西禅寺西南，观音山东南。） 万历《通州志》：有张港、湖港、曹港、天港、套口港、腰夹港、头条港、新港等。	在今海门原县治区北部。张港应在余中故地西南十里，其北十里有新寨铺，当在二甲镇以南，此为州县新界。再西四十里为利和镇，约在今袁灶南。

启海平原的形成

启海平原以海门与启东两县为范围，是南通地区最为年轻的土地之一。清康熙初年，海门县境土大部分沦为江域。康熙中期以后，通州东南江海之中新沙洲逐渐涨出。其后约二百年间，通州东南、崇明岛以北的长江北支之中出现了数十个沙洲。至19世纪末，这些沙洲先后与江北岸通州大陆并接，长江口北岸廖角嘴从吕四向东南延伸到下三和镇东南，启海平原形成。

1. 海门的重涨

从元朝末年到清初的320多年间，通州东境的旧海门县境几乎全部坍没。清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永安镇坍没以后，这一带的坍削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康熙中后期，江流逐渐回向南泓，通州东南江中又开始新的涨积。州城东南观音山一带的东沙，以及狼山以东的川港等地也有伸涨。这时，军山如前面所述，已重登陆岸。

清康熙年间，通州东部余西到余东以南一带江中陆续涨出一些沙洲，其较大者有扁担沙、大年沙、小年沙、万盛沙、龙珠沙、三角沙、丁家沙、藤盘沙、杨椿沙、汤家沙等10块沙洲。其中，余中场南的扁担沙于雍正六年（1728）首先与大陆涨接。雍正八年（1730），余东场以南的满洋等沙也露出水面。

通州、崇明两地民众移往新涨沙洲围垦，往往发生争沙纠纷。雍正十三年（1735），划定以大安、戏台（已坍没，在今海门江岸以南）等沙为界，沙北归通州管，沙南为崇明地。当



时，余东、余中、余西以南涨出的扁担、杨家、张家、三角、万盛、藤盘、丁家、大年、小年等沙共约2600余顷，以后30年间又陆续涨出许多新沙，争沙纠纷更多。江苏巡抚企图解决通、崇争沙纠纷，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划新涨沙洲地区设置海门直隶厅，归省直辖，割通州的川港西、大兴、安庆、南安、小浅、裙带、玉心、玉带、通兴、东天补、西天补、柴宝东洪、万盛、大小年、三角、丁角、藤盘、吕寿、日照等19沙，以及崇明的大洪、复兴、日盛、五桂、太平、富民、半洋、永阜、大安、小安、戏台等11沙归海门直隶厅。此外，又有新涨出的天南、天余、满洋、吕复、民灶、小安戏台接涨、永兴外、裙带余、新小、利民等10沙也划厅管辖。

早在设厅以前，各沙出水的时间不一，最初各沙洲并不连接，如西天补沙与通州川港、姜灶港之间，西天补沙与裙带沙之间，裙带沙与复兴沙之间，东天补沙、通兴沙与富民沙之间都有较阔的夹江存在。天南、满洋等沙大部原是水域，在建厅前不久才形成涨出。小安、日照等沙在建厅时还是独立的沙洲。清光绪《海门厅图志》卷9王恒《徐公堤碑》说：

设官以前事第，念境内沙名不下数十，其始必星罗棋布于大海之中，若堆阜然，虽渐次连络，而终以海环其外。

这是当年的写实，其时通州东南地区已渐涨出。

乾隆初年，军山东北的江岸在大撇港、芦潭港、（东）天生港、姜灶港、进鲜港、袁灶港的一线上，江岸与海门各沙洲间还有较宽阔的泓道。直到海门建厅以后的乾隆四十年，这条支泓最宽处约有20里，狭处约有2里，但已淤浅，退潮时可以涉越。因为潮汐冲刷，沙洲难以与大陆连接，于是，海门厅同知徐文燦倡议在西天补沙西南部建筑拦洪坝，促使沙洲连陆。《徐公堤碑》记载：

乾隆四十年，公长兹土。时西北一方虽近州境，尚隔流洪。阔处一二十里，狭亦数里，潮汐上下冲激，沙土随涨随坍，势难连接。贫民徒涉淤泥中，爬沙不前，猝遇潮至，如万马奔腾，漂流灭没以致陨命者不少。先一年，公相度形势，议筑长堤，横截中流，通通海之途，使回澜停蓄，易成高阜……堤成，堤长二千一百八十丈，广一丈四五尺至三四丈。按水势之缓急而宽狭因之。

拦洪坝筑成以后，支泓断流，南北水滩沙渚没有多少年便都成了沃壤。厅境的裙玉、北安、龙腹等沙都是筑堤坝后成陆的。

海门厅设立以后，南部江岸则因江流摆动仍不稳定，如大兴、大安戏台、小安戏台接涨、天余、永兴外、裙带余等沙又复坍没。厅境各沙间及东部迅速涨出沙洲，北安、龙腹、裙玉、永盛、东小、小荫、小塘、鲈鱼、馒头、新沙等纷纷出水。日照沙西北和小安沙，以及通州、吕四间的水下沙洲逐渐成陆。此时的江岸大致西起汤家沙的老洪港，东经大安、牛洪、浒通、竖积、青龙等港到半洋沙的大有港，自大有港以东折向东北到石涂港以西，再转向东南经三丫枝等港到塘芦港，再向东到达廖角嘴。

老洪、大有两港间岸南为大江北泓。大有、塘芦两港间东南方的大江中为崇明县所属惠安、连升等所谓“崇明外沙”地区。嘉庆初年，这里还有一条宽阔的夹江。塘芦港附近宽约20多里，光绪中叶以来逐渐淤积，夹江形成一块“新涨沙”。光绪二十二年（1896）勘定海崇界址时，原属崇明县的惠安等“崇明外沙”已经与海门连成一片。塘芦港已成为一条“水道浅无淮望，轮帆视为畏途”的小港了。20世纪中叶，因沙洲连陆，海岸又有伸涨，此港已在内地距海20里以上了（图22）。

20世纪中叶，由于长江北泓逐渐淤积，崇明西北部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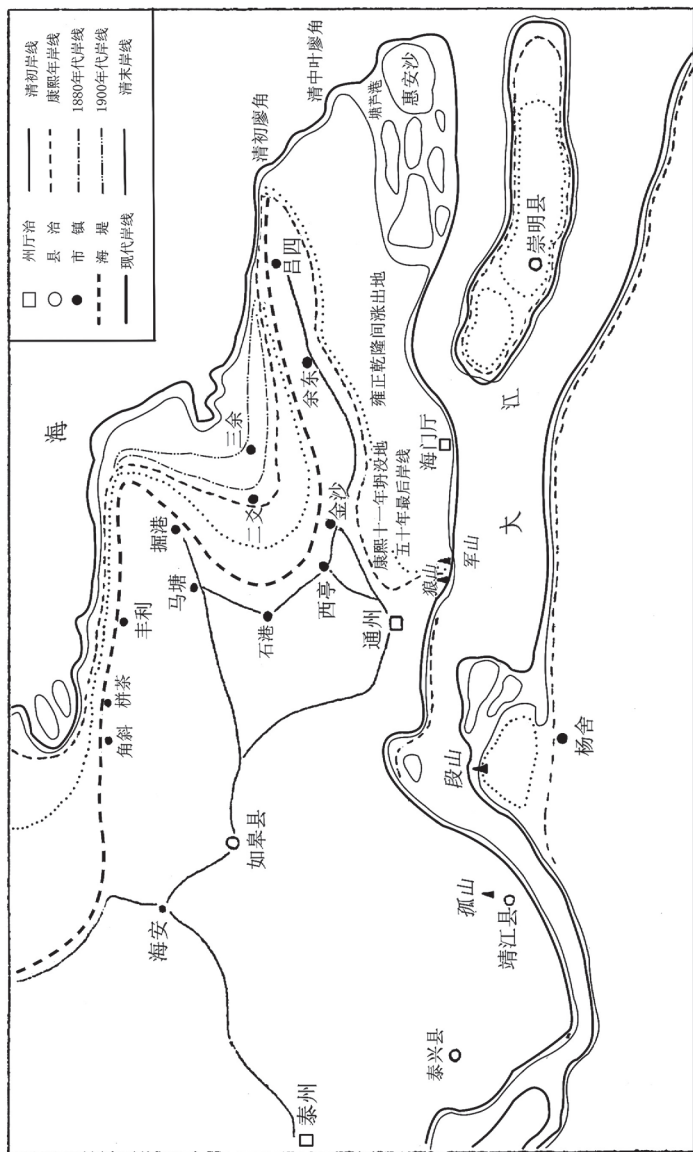


图22 清代江口以北岸线变迁(示意)

向北扩展，海门县青龙港江面日渐狭窄，江流又有冲激北岸的现象，青龙港附近曾有较剧烈的坍塌。因此，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修建护岸工程，以遏制塌势。

2. 启东的出现

当海门各沙逐渐涨出的时候，东南海口附近也涨出了一些沙洲。这些沙洲接近崇明县，多由崇明人移垦，归崇明县管辖，一般称之为“崇明外沙”。其中，最早出现的是惠安沙，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左右。此后，于乾隆七年（1742）在距其东不远处涨出了杨家沙。其时，海门尚未建厅，两沙与通州、吕四及崇明之间都有比较宽阔的泓道。乾隆中叶以后，惠安沙四周又有新沙涨出，计西有永丰沙，北有永泰沙，西南有永兴沙，永丰沙以西接近海门属境的半洋沙之处有永旺沙。这些沙洲出水后，大致在清雍正至咸丰年间成功开发，其沙田为清政府升科。升科时间及沙田见表6。

表6 升科沙田名称与时间

时 间	升科沙田
雍正十一年	惠安沙
乾隆七年	杨家沙
十九年	永丰沙
三十一年	永旺沙
五十二年	利民沙
嘉庆元年	永泰沙
道光十八年	北连升沙
二十一年	日旺沙
三十年	向阳沙
咸丰六年	南连升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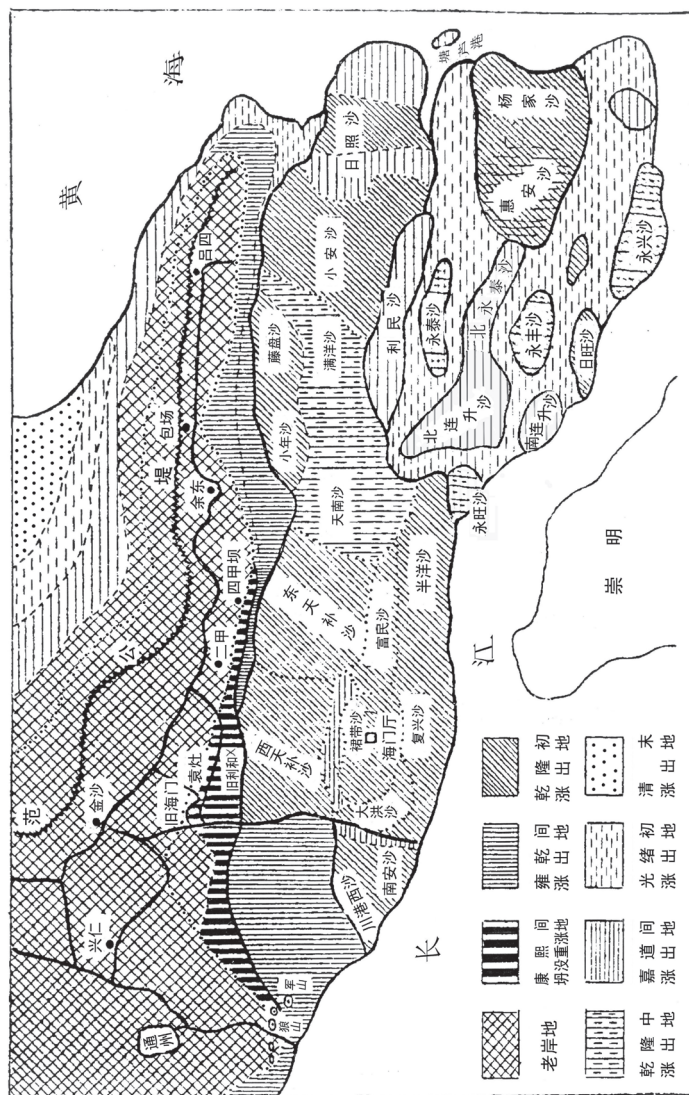
说明：资料取自清光绪《崇明县志》卷6田制升科沙田。

嘉庆初年，惠安、永泰与海门小安沙之间隔有宽约20±的江面，且永泰沙有向西移动的现象。嘉庆七年，永泰沙与海门天南沙之间涨出了利民沙，利民沙隔泓与海门天南沙相



望，成为海门、崇明互争之地。为平息纷争，苏松太道、常镇道共同勘定：沙南部划归崇明，北部划归海门，中部为苏州普济、老妇、育婴三堂公田。

这时，永丰、永旺两沙之间泓道还很宽阔。道光、咸丰年间，南、北连升沙在这里涨出，永丰沙以北又涨出了北永丰沙。启东县境的范围大体形成。嘉庆以后，惠安、永泰等沙与海门厅境之间的泓道逐渐淤积，海门境内的小安、满洋两沙以南接涨成陆。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这条泓道完全淤塞，原先宽阔的塘芦港只剩下一条小港东出大海，且成为海门、崇明间的界河。至此，启海平原全部形成（图23）。





崇明岛的变化

唐朝武德初年，长江口积涨出东沙和西沙两块沙洲，后来“渐积高广，渔樵者依之，遂成田庐”^[1]。西沙又叫顾俊沙，五代杨吴改置崇明镇。宋初这里归通州海门县管辖。宋天圣三年（1025），东沙附近又涨出一块新沙，移住开垦的居民多为姚、刘两姓，因此叫姚刘沙。北宋建中靖国年间（1101），西沙西北约50里的地方出现一块沙洲，由于三次叠涨，因名“三沙”，也称崇明沙。南宋时这里曾经是韩侂胄的私庄所在。嘉定十五年（1222），在姚刘沙上置天赐场，抽征盐税，仍属海门县管辖。由于地当江口，东南可至定海抵明州（今宁波市），西南到浒浦可达苏州，位置冲要。元代以来“民居繁庶”，至元十四年（1277）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

沙洲位于江口，海潮和江流对沙洲的涨坍有很大影响，沙洲境域很不稳定，崇明州（县）城曾五度迁治：元至正七年（1347），风潮侵袭城南；十二年（1352），州治北迁15里，移到东沙。明永乐十八年（1420），州治再度北迁，移到秦家村。正德元年（1506），县城“又圯于海”；嘉靖八年（1529），崇明第三次迁治，移到马家浜西南。嘉靖二十九年（1550），海水啮蚀县城东北隅，故四迁到平洋沙。万历十一年（1583），城东南又圯于水，十四年，县治五迁到长沙^[2]，即今县城所在。此

[1]《读史方輿纪要》卷24太仓州崇明县。

[2]《读史方輿纪要》卷24太仓州崇明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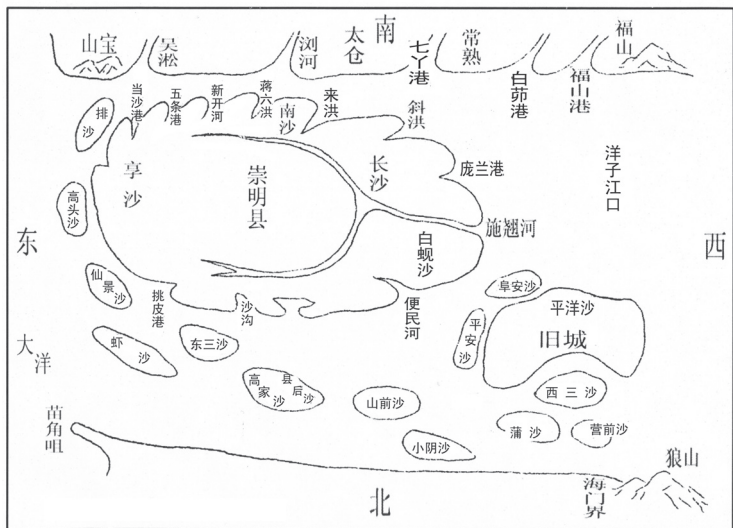


图24 明崇祯《崇明县志》附图

时，城南距江10~15里。光绪二十年（1894），长江南泓主流北偏，城南一带又被江水冲坍，县城再次被逼近江边。

崇明县各沙洲涨坍靡定。据《读史方輿纪要》说，明代以来可记的沙洲大小约有30多个，明初以前各沙的位置已不易寻求。《筹海图编》（参见图19）和崇祯《崇明县志》都载有崇明县概况图（图24）。前者所绘为嘉靖年间沿海形势，后者所绘为明末崇明县的范围。虽然原图很粗略，所示崇明各沙的方位也与事实上有较大差异，但从这两幅图中仍可以了解到当年崇明各沙洲的分布及其发展的大致情况。这两幅图是相当珍贵的资料。根据《读史方輿纪要》所引明代方志的记载，参考上列两图，可以推想出崇明州（县）治与崇明各沙的大体位置，并可为明代崇明绘出各沙位置示意图（图25）。

按《筹海图编·沿海图》，崇明县治位于平洋沙。这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四迁县治。平洋沙在江南白茆口外长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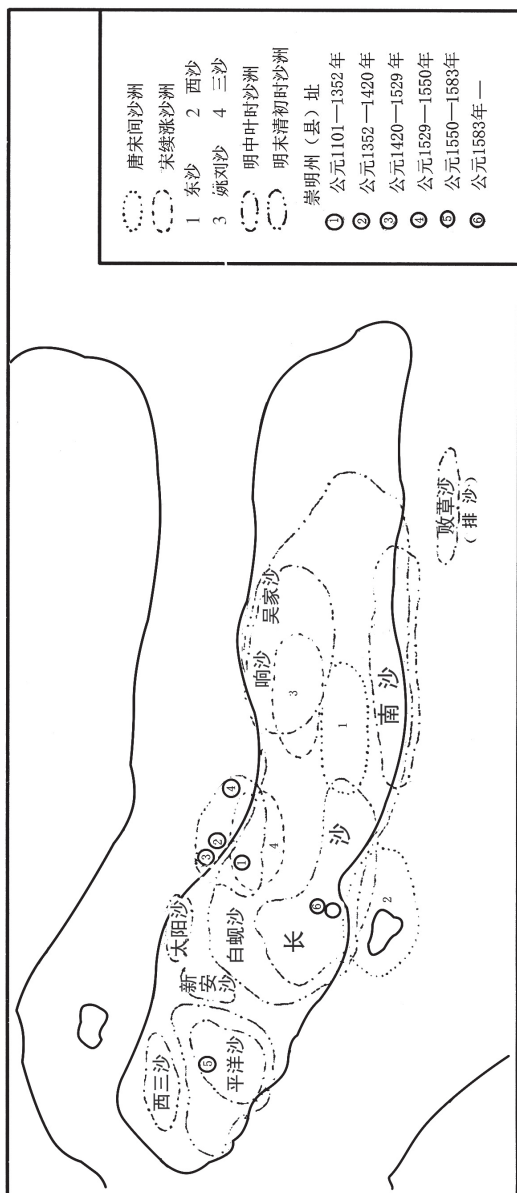


图25 清初以前崇明县沙洲演变（示意）

按其方位，应在今崇明西北境三光镇东南的三江口以西一带。平洋沙之东为县后沙，该沙应在今望仓港一带。县后沙东南是三沙，约当今三沙洪一带。《读史方輿纪要》卷24记载：

三沙在县东北，即旧县治所（明初县治）。云，控诸沙上游为一邑，中土，昔浪涛冲激，日渐迫狭……三沙北通狼福，南通宋信咀，西接营前沙，为江南北数郡关键。

由此可见，三沙的位置十分重要。宋、元于此建置管理机构，其原因即在此。三沙东北方有三月沙，为三沙门户，亦系江浙在长江口的险要之地。三沙西南即今县治所在的长沙。《读史方輿纪要》说，长沙旁连十余沙，最为雄壮。大致今施翘河以东到二条竖河一带都是长沙的范围。长沙以东为享沙，一作响沙。享沙东北是吴家沙，明代天赐场在这个沙洲上。长沙西北有一块白蚬沙，可能就是《元典章》所载“白砚”盐场院所在。长沙东南隔来洪与南沙西北端的宋信嘴相对。南沙是一块“长八十里，广十余里”、“多稻菽、萑草”的大沙洲，明代在此设南沙巡司，是江口的一块重要沙洲。南沙东南端为竹簿沙，正对吴淞江口，再东便是大海，明代以此为江防第一关。明代末年，南沙、竹簿沙与隔江相望的烂沙、小团、孙家、白蚬、县前等沙已涨连为一“南北长百四十余里，东西阔四十余里，居民艺植，悉成沃壤”的土地了。^[1]

清初，长沙西端与平洋沙之间仍然有夹江存在，并未完全涨连。今崇明城西北的山江口、盘激一带仍为夹江所在。清代以来，南沙、平洋沙、三沙都和长沙涨接起来，并且向东南和西北方向扩展。七激、永寿等沙都于乾隆以后涨出^[2]。至此，崇明

[1] 《读史方輿纪要》卷24太仓州崇明县。

[2] 清光绪《崇明县志》卷6则田。



本岛基本形成，成为长江口的一个大岛。

由于长江江流及海潮的侵蚀作用，崇明岛岸线并不稳定，有南坍北涨的现象。20世纪中叶，岛的面积由600多平方千米扩大到1 083平方千米，岛的西北端以年平均200~300米的速度伸涨，长江北泓道最狭处仅12里，有连接北岸的趋势。20世纪末，岛北长江北泓日渐淤浅，岛又在不断扩展之中。从长江北岸沙嘴及其沙洲变化的历史来看，崇明岛连接北岸的可能性极大。一旦岛与北岸涨连，长江三角洲北部将出现第二个马蹄形海湾。不过，长江流量巨大，单靠南泓道是否能容纳丰水期最大洪水全部流量，是否会引起其他问题，乃是今后值得慎重研究的问题。

南通市区以东长江岸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围垦，南通县围垦约16.6万亩，海门县围地约8.5万亩，启东县围垦约4.7万亩，其中南通农场及江心沙的江岸凸入江心，屏蔽了崇明岛北长江北泓道的入口。在这里，长江水要折而向北，才能流入北泓道，因而，崇明岛北端近岸的江水流速缓慢，便于泥沙沉积。崇明岛北部迅速向北扩展，平均每年淤涨二三百米（图26）。20世纪50年代初，海门青龙港江面约有20里宽，于今最狭处不足8里。预计不久的将来，如无人工干预，长江北泓道会自行封闭，千年前古横江淤积、沙岛连陆的故事又将重现。必须预见到，这种新情况将会给海门、启东的青龙港、三和港等沿江港口带来不良影响。泓道中的永隆沙等沙洲也会因泥沙淤积速度的加快而并陆。长江北泓道正处于江苏省与上海市管辖区的分界线上，未来新涨的土地将会出现开发管理等种种具体问题。这就需要地区之间协调处理，预为规划，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议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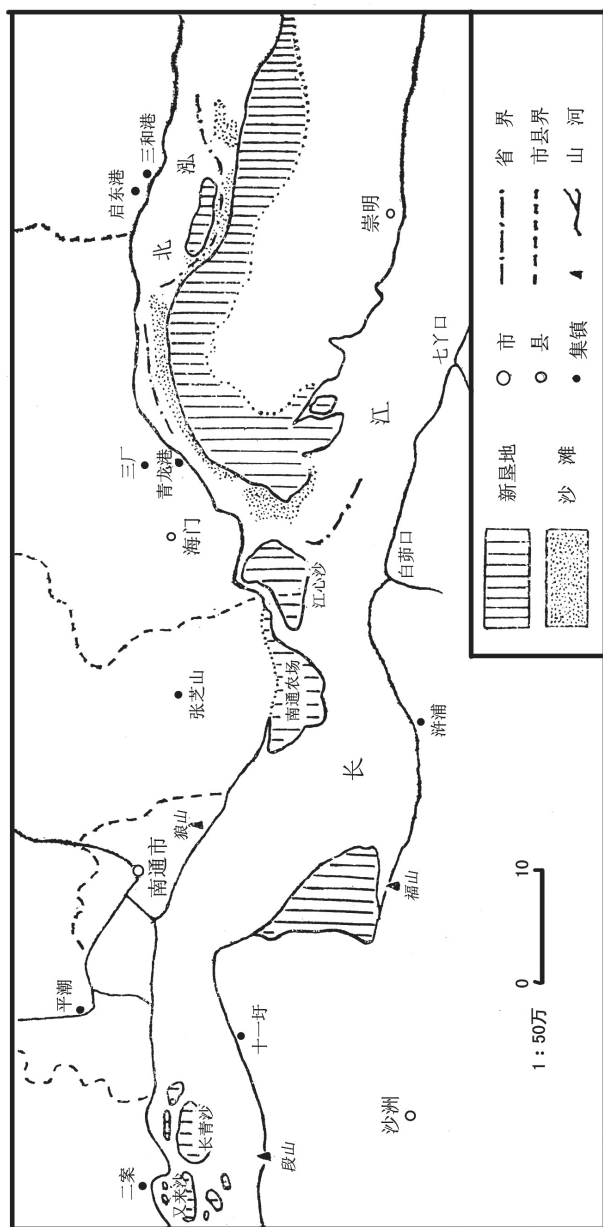


图26 20世纪中期新张江滩及垦地



唐代以来海岸的变迁

南通地区现在的海岸线，西北起自海安县东的老坝港，南到启东市圆陀角与江岸东端衔接，跨越海安、如东、南通、海门、启东五县境，全长204.75公里。这条海岸线随同长江北岸沙嘴发育而形成。

江北沙嘴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向江、海两方面的扩展。由于江口外沙洲不断涨接，且从西北向东南渐次发展，因而江岸线的变化特别显著。本书已用较多的篇幅加以探讨，说明其演变过程。至于海岸线，不同地段有不同成因，其发展也不一致。从捍海堤（范公堤）的位置判断，唐宋时这一带的岸线起点应在海安北面东台县的富安镇附近。一千年来，海安县以北的海岸线向东推进达50公里左右。同一条海堤，堤外成陆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如东县川子洋口以东的海岸，距海堤不足5公里；南通县（今通州区）石港以东的马蹄形海湾则保留了近千年之久，近百年来才完全成陆；启海平原的一段海岸线则随土地的涨坍而有进有退，近年来在继续延伸。

沙洲涨接与海岸线的延伸

南通地区的海岸线与盐城地区的海岸线相连，且是盐城海岸线的延伸部分。自长江北岸古沙嘴形成以后，长江与里下河洼地被分隔开来。里下河洼地东缘有一列列沙岗。这些沙岗南起海安，北到古淮河河口，大致呈北北西—南南东走向，且与合成风方向正相交。沙岗的走向说明，沙岗是在合成风的作用下，海浪堆积泥沙而形成的。海安县东南部另有东北—西南走向的沙岗，这是来自东南的强烈风浪且在江口涌潮作用下堆积形成的产物，构成古沙嘴的南缘。古沙嘴的尖端就是古廖角嘴，它是古代江海岸线分界的标志。按江口沙嘴的发育规律，长江北岸沙嘴应向东北发展，由于两种不同的风在这里相交，沙嘴尖端附近不利于泥沙沉淀，因此古沙嘴的发展缓慢。

在长江江流逐渐转向东南的情况下，接近北岸的江口沙洲发育加速，且不断与北岸并接。在这个基础上，长江北岸沙嘴范围由西北向东南扩大。南通地区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可以认为，南通地区的海岸线是各不同时期的沙洲靠海一边岸线的连续。显然，其成因与盐城的海岸线不同。

古代如皋县北50里有一条东西长约50里的“浦岸”，这应是汉代留下的古海岸。如东县一带曾是本地区较早形成的沙洲，称扶海洲。六朝时期扶海洲与大陆涨连以后，海岸线便向东延伸，廖角嘴也东移到今掘港东北的长沙附近。

在扶海洲与大陆涨接之前，栟茶（今属如东县）一带曾发生称为“南沙”的沙洲涨积。江水携带的泥沙从栟茶附近入



海，逐渐在扶海洲北部边缘沉积下来，形成水下暗沙。扶海洲与大陆涨连，导致长江北泓枞茶汉道淤塞。此后，近岸暗沙的发育速度缓慢，未能出水。日本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公元9世纪前期的如皋东部近海海况的记录中所说的“见陆岛”“犹称不见”，就是指枞茶、掘港以东浅海中暗沙明灭，具有潮间带的一般特征。从东晋到唐初宁海县的建立与裁废以及宁海的范围在东台富安、海安旧场、如东枞茶一带的情况看，本地区于东晋时的北部海岸线还在富安、角斜、枞茶一线以北，这条岸线于唐代则向南后退，以致宁海县因海浸而被裁废。

唐代，长江入海北泓道在胡逗洲以北，江水含沙量较多。这有利于掘港以东沙洲的发育及陆地的伸展，也有利于胡逗洲等沙洲的发育。掘港以东近海水域明、暗沙洲的存在，使这里成为海船的禁区，不熟悉航道闯进来会造成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如皋以东伸入大海的半岛端部存在着一个个小沙岛，这与河口三角洲的地貌特征相吻合，也表明掘港以东海岸正在逐渐向东推进。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说，大陆上有混浊的江流冲入大海，说明长江北泓富含泥沙的支汊入海之水，其势浩大。这为沙洲发育、海岸推进提供了必需的物料。黄海海域在唐代，其色一般浅绿。《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海色“浅绿”、“亦白”，是当年浑浊的江水从长江北泓道的支汊中冲向“绿色”大海形成的。浅海中有绿色水生植物，这是水下形成沙洲的一种生态特征，且有利于泥沙作有序沉积。

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大江口”的情况分析，9世纪中期的长江北岸江海交汇点在掘港以东约60里的地方。唐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七月三日，日本遣唐使一行乘船于丑时从大江口出发，巳时到白湖口，停留四个时辰，乘潮逆水上行。以每时辰行10里估算，大江口到白湖口约40里。午时到东梁丰



图27 海湾（模拟）

村、守捉，离掘港附近的国清寺18里。这样计算，当年的大江口应至少在掘港以东60里处。可以说，唐代的廖角嘴就在这里。

唐末，胡逗洲接涨大陆以后，海岸线再度延伸。原存在于胡逗洲与如皋间的长江支泓遂被阻隔，支泓东端得不到长江泥沙的补充，但仍然保持一定的水深，于是形成了掘港东南、石港以东、余西以北的马蹄形大海湾，古称卖鱼湾，亦称石港湾（图27）。廖角嘴南移到余西以东。这时的海岸线大致自海安旧场及如东栟茶、丰利向东南，经如东掘港以东，折向西南，又经如东马塘、南通石港东折向东南，经南通西亭、金沙北向东至余西一线。

北宋中期，东布洲涨接大陆以后，海岸线又一次向东延伸，由余西向东经吕四折向东南，到达宋代海门县城以东（参见图9）。廖角嘴移至海门县城东南，宋代文献称之为“料角”。

《舆地纪胜》卷41“海门有料角，昔号形势控扼”即此。元末以来，海门县旧境陆续坍没，吕四东南的海岸线也向北退缩。到明嘉靖年间，廖角嘴在吕四东南的大河营外不远处。清中叶以后，通州东南新沙涨起，廖角嘴南移到塘芦港以东。清末，惠安等沙涨连北岸，廖角嘴推至启东下和合镇东南。20世纪末，廖角即为今启东圆陀角。自明嘉靖以后的400多年来，廖角嘴向南推移了约54公里。廖角嘴的逐渐南移，标志着南通地区海岸线的不断延伸，也表明长江北岸沙嘴仍然在发展之中。



宋代到清初的海岸线

现存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有关南通地区海岸情况的记载较少，仅有《博物记》和《后汉书·郡国志》留下一个海陵东境麋鹿成群、扶海洲上多茆草的滨海旷野的记述，海岸线的具体位置并不十分明确。自从大历（766—779）中李承实筑捍海堰、宋天圣初（1023—1025）范仲淹再修筑捍海堰以及历代修筑海堤留下遗址后，我们方可从海堤的走向推测当年海岸线的所在。

南通范围内的古海堤是历经几代人的艰辛逐步修建起来的。《宋史》卷97东南诸水（下）说：“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一百四十二里。”这是唐黜陟使李承实所筑之堤。《宋史·张纶传》也提到“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张纶以江淮制置发运副使的身份兼知泰州，修筑海堤。《读史方輿纪要·淮安府盐城县》说：“宋天圣初，张纶刺泰州，留意修复，时范仲淹监西溪盐仓，力赞之，议移堤势稍西，垒石以固其外，迤邐如坡，不与水争，虽洪涛不能冲击。五年，堤成，长一百四十三里有奇，俗谓之塘潮岸。”对于这段历史，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障海治绩》中是这么记载的：“仁宗天圣五年，监西溪盐税范仲淹建议，白发运副使张纶，请堤泰通海三州址。厚三丈，面三之一，高一丈五尺，长一百四十三里百三十六丈，称范公堤。”而《读史方輿纪要·泰州》称，捍海堰“自北海寨至景庄，修筑凡一百八十



图28 古堤新生

里”，则海堤又向北延伸。由此可见，当年范仲淹与张纶主修的海堤仅是现代海堤的一部分，大致在海安县以北。后人以范仲淹筑堤拦阻海潮、保护民田的功劳巨大，为纪念范仲淹，故笼统地称苏北境内的捍海堤为范公堤（图28）。现在习惯上所称之范公堤北起阜宁，南达吕四，全长400余公里。

通州、泰州及如皋境内的海堤是宋代以来陆续修筑的。在范仲淹、张纶主持修堤以后，庆历（1041—1048）年间通州知州狄遵礼、至和（1054—1055）年间海门知县沈起、嘉定（1208—1224）年间如皋知县魏甫元、元大德（1297—1307）中兴化知县詹士龙、明隆庆三年（1569）两淮运盐使司运判包怪芳等也曾主持修筑捍海堤^[1]，形成了自东台富安到海安古贲，向东至李堡、旧场，又经如东栟茶、丰利到掘港，南通石港向东至余西、启东吕四的海堤。这些海堤基本上就是宋、明当年的海岸线所在。自掘港向西，海水可直达马塘。可见，掘港西南，海岸线向西内凹，马塘是石港湾的西部顶端。（参见图9）

宋代通州境内较早修筑海堤的是任建中和狄遵礼、沈起。《万历通州志·河渠》中称：“捍海堰功最巨修者任公、沈

[1]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2山川志障海治绩。



公，后复有包判官。”任公即任建中，史料中记任公修筑堤堰的事仅有任公堤，此为江堤，而任公修筑海堤却未见记载。狄遵礼筑海堤于万历《通州志》中也只是在《秩官表》中有所体现。清光绪州志《山水志·障海治绩》记“庆历中知州狄遵礼修捍海堰”，应是明万历州志《秩官表》所记内容的文字反映。由于狄遵礼修筑海堤的史料并不多，而狄堤的位置也仅是推测，一般认为，狄遵礼主持修筑的海堤从石港经西亭到金沙东南（今余西）。沈公即沈起。沈起在任海门知县时主持筑堤，于《宋史·沈起传》中有记载：

县负海地卑，间岁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弃其业。起为筑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辟，民相率以归，至立祠以报。

其筑堤的长度百里也只是约数。清光绪州志《山水志·障海治绩》记“沈起筑堤七十里，自吕四场至余西，延接范堤，称沈公堤”，堤的长度数据取自宋王安石为沈起（兴宗）所作的《海门兴水利记》，且据以推定了海堤的起止地。熙宁（1068—1077）年间，通州州判徐绩主持维修捍海堤，这是继狄遵礼、沈起筑堤以后的一次大维修工程。由狄、沈两道海堤的走向，大体可认定宋代通州东北部的海岸线在石港、西亭、金沙、吕四一线。

宋嘉定（1208—1224）年间，如皋知县魏甫元主持修筑范公堤，可能是如皋境内较早的海堤。自宋至明，泰州如皋县及通州北部的海岸线变化不大，大体在北起角斜（原海安县旧场），向东南经栟茶、丰利（均在今如东县境内），延至掘港（今如东县镇）的一线上。

明成化十三年（1477），巡盐御史雍泰主持补修吕四、余东、掘港等场被海潮冲坏的捍海堤。嘉靖二十九年（1550）巡盐御史杨选主修捍海堤，崔桐为修堤事作记，记



图29 制盐用具 锅(左) 盘铁(右)(南通博物院收藏)

有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等场筑堤二万零八百多丈，西亭、石港场筑堤三千二百多丈。另外，修补马塘、掘港间的海堤缺口。这些资料足以说明，明代中期通、泰两州海堤的位置还在各盐场附近。隆庆三年（1569），运判包怪芳主持修筑从掘港场彭家缺口起经马塘场南至石港场新堤的海堤，人称包公堤，改变了石港、马塘间长期没有海堤防潮的状况。

范公堤内为民田，堤外为潮间带。唐代以来，这一带海滩上盐灶遍布，为淮南著名的产盐地带。从此处盐场的兴废可看出相关海岸的变迁。

唐代淮南盐场没有留下名称，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所记唐代如皋东部情景——海边彻夜通明的火光、盐官以及河道中庞大的运盐船队——可以断言，当年如皋以东是淮南盐的重要产区。

大使及圆仁等的座船到达如皋以东近海后，六月二十九日亥时，“望见西方遥有火光……通夜瞻望，山岛不见，唯看火光”。这种火光是如皋沿海一带盐灶煎盐的灶火。汉唐以来直至明清，南通盐业生产均为手工操作，用盘铁等煎盐工具（图29），以盐卤作原料、芦苇作燃料煎盐，每天子时到亥时煎成，称一伏火。唐代如皋东部的产盐地，史书上少有记载。从宋初盐场的分布来推测，掘港、丰利、栟茶、角斜等地



在唐时应当是盐产地。这些地方位于海边，因此，圆仁等在海边看到彻夜通明的火光。七月一日，大使等到达掘港以东的大江口，受到盐官判官元行存的接待。七月二十一日，在从如皋到扬州的河道中，圆仁等看到“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十数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这是如皋以东盛产海盐的间接写照。

宋《太平寰宇记》卷130有通州利丰监“管盐场八：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余庆”的记载。这些是南通见于史籍最早的一批盐场。同书泰州海陵监也管8个盐场，有南四场、北四场，未载场名。《宋史·食货志·盐法》称，通州与泰州分别有7个与8个盐场，同样未载盐场名。《宋会要辑稿》收录南宋通州、泰州盐场的场名与场额，其中属于今南通地区的有：角斜^[1]、虎墩、拼茶、古窑（即古坳）、丰利东西、马塘、掘港东陈、石港兴利永兴、西亭丰利、金沙、余庆、吕四港，计12个盐场。^[2]12个盐场中，除古窑、马塘两场是南宋绍兴中新置的以外，其余均为北宋时的旧盐场。《太平寰宇记》通州8个盐场中的利和场，南宋时已不见记载，应即后来的利和镇。利和场于宋天圣前裁废，如前面推定，这可能与11世纪中叶东布洲涨接大陆、海水难以到达有关。

各盐场分布在海堤沿线。元代以后，除余庆场析为余东、余中、余西三场，虎墩场裁减以外，其余各盐场经历明代直到清初，基本没有变动。由此可见，从宋代到清初近800年间，这一带海岸线大致稳定在西北起自角斜（海安旧场），东经丰利东北，东南经掘港东北折向西南达石港以

[1] 清初以前的角斜场在海安旧场（今属海安县老坝港镇）。乾隆三年，角斜场移至费家滩新场，即今海安县角斜镇。

[2] 《宋会要辑稿》食货23盐法。原书中角斜、虎墩、拼茶场分别记作角针（又作角科）、虎塾、拼桑。



图30 角斜一景

东，再南折经过西亭、金沙东北，向东直达吕四的一线上。

元末，黄河夺淮，大量泥沙注入黄海，加快了盐城一带海岸伸展的速度。阜宁、海安间海岸向东推进了75~100公里。原东台县富安与如东县栟茶之间的海岸线，其沿海堤呈西北—东南走向。这条海岸线与东台富安、阜宁间的海岸线约有 120° 的夹角，形成一弯曲。东台县富安与如东县栟茶间的海岸线成为这个海湾的南缘。盐城一带海岸线向东推进以后，原范公堤外海滩遂成平陆。于是，东台富安，海安李堡、角斜（图30）也不再濒海。清咸丰六年（1856），黄河河道再度北徙，黄海泥沙来源减少，海岸东移速度减慢。栟茶东南到长沙约45公里的一段海岸不再受盐城、东台向东推进的海岸影响，所以，这一带的范公堤距海平均在5公里左右。

由于海岸线东移，南通古代的许多盐场因“海远卤淡”而逐渐裁废。丰利及吕四一带近千年来变化较少，长期以来为本地重要盐产地。1912年，淮南各场相继归并：以丰利归并掘港，改名丰掘场；以栟茶归并角斜，改名栟角场；以余西归并余东，改名余中场；又裁撤石港、金沙两场。20世纪前20年，如东丰利到长沙一线及吕四附近的海岸基本稳定，这些地方成了盐场亭灶的集中地。宋代以来南通历代盐场变化见表7。



表7 北宋以来南通盐场演变概况

北宋 太平兴国	北宋 天 圣	南 宋	元	明	清	民国
	吕四	吕四	吕四	吕四	吕四	吕四
余 庆	余庆	余庆	余东 余中 余西	余东 余中 余西	余东 (乾隆朝废) 余西	余中
利 和 金 沙	金沙	金沙	金沙	金沙	金沙	
西 亭 利 丰	西亭	西亭丰利	西亭	西亭	(乾隆朝废)	
石 港 永 兴	石港	石港 永兴兴利	石港	石港	石港	
东 陈	掘港 东陈	掘港东陈	掘港	掘港	掘港	丰掘
丰 利	丰利	(马塘) 丰利东西 (古窑)	马塘 丰利	马塘 丰利	(乾隆朝废) 丰利	(丰掘)
	拼茶 角斜 虎墩	拼茶 角斜 虎墩	拼茶 角斜	拼茶 角斜	(李堡) 拼茶 角斜	拼角 (拼角)

三余海积平原的成陆

唐朝末年，通吕水脊的沙洲和北岸沙嘴涨接，封闭了原沙洲与如皋间的长江支泓——古横江。横江东口近海处水深且泥沙淤积缓慢，于是形成了一个马蹄形海湾。它的西北侧为原来横江的北岸，南侧即通吕水脊沙洲的北缘。宋代以来的捍海堤遗址勾画出这个海湾当年的岸线轮廓。其岸线大致北起如东县北坎附近，折向西南，经掘港东南到石港以东，转向东南，经西亭、金沙东北转而东折，经余西、余中、余东到达吕四，形成一大弯曲。石港位于这个海湾的西端，当年横江淤积后残存的清水港就在这里入海。

石港以东15里的五总附近于宋代叫卖鱼湾，是一个入海启航的地方，南宋末仍通海舶。10世纪初，胡逗洲与如皋大陆并接。11世纪中叶，东布洲与通州大陆并接后，通州北部、泰州东部的海岸线内凹，黄海在这里形成一马蹄形海湾——石港湾。南宋末，文天祥从通州石港东15里卖鱼湾出海南下时曾留有诗作：

风起千湾浪，潮生万顷沙。
春红堆蟹子，晚白结盐花。
故国何时讯，扁舟到处家。
狼山青两点，极目是天涯。^[1]

诗人在寄托对故国怀念之情的同时，描绘了卖鱼湾的自然环

[1]《指南前录·卖鱼湾》，见《文山集》卷18。



境风貌与特色物产，给后人留下了海湾当年的历史信息，卖鱼湾也因此成了本地的一个著名遗迹。元末，黄河夺淮改道入海，大量泥沙从江苏北部注入黄海，黄海由北向南的近岸流又把泥沙带入海湾。直到清末，海湾才全部淤积，石港湾成为陆地。海湾沿线自宋朝到清初是淮南主要的盐产区，如掘港、马塘、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均为历史上的著名盐场。

元末黄河南徙夺淮入海，海湾逐渐为泥沙淤积，海湾岸线渐渐东伸。清顺治初，掘港东南距海口约5公里。清代，因海湾逐渐淤积成陆，海水不能进入盐场，导致各盐场陆续被裁撤。康熙十九年（1680），马塘场因位置偏西，通海水道淤塞，海水不能流入，渐渐不再产盐，终于在雍正十三年（1735）被裁废。嘉庆以后的近百年间，石港以东浅海淤积成陆，到光绪年间，石港已在内陆距海口约70里，金沙离海口也有60多里。石港、金沙、西亭等海湾周边的盐场因无海水进入，生产原料大减，也就不宜再生产海盐了。

从20世纪初的近百年来，人工围垦加速了这一带的成陆。50年代当地农民说，80年前（即19世纪70年代），海水可到双墩；50年前（即19世纪末），海水还可到二爻；40年前（即20世纪初），海水还可到达三余。1914年以后，新筑海堤，北起如皋北坎（今属如东），南经南通环本到大东港，这一带完全成陆。昔日海湾中心只剩遥望港（洋岸港）为通如两县分界线。原来沿范公堤一线的盐场，清初以来陆续裁并。到1912年，南通、如皋及东台南部一带只剩栟角、丰掘、余中、吕四四个盐场。清末民初，通州沿海一带兴建垦殖公司，1914—1916年先后建立大有晋、华丰、大豫等公司。到1924年，大有晋、大豫两公司有耕地74万亩，年产棉约四万二千石，^[1]原来的石港

[1]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页。

湾遂成为重要的棉产区(图31)。

由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多年来的冲积,本地区东方海中存在许多浅沙,以勿南沙、冷家沙最为重要,沿海滩涂也有继续外伸的趋势,若干年后可能还有新的陆地继续出现。本地区处于江海之交,海流、海潮常给人们带来灾害,因此,人们与大自然的斗争将是持续不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从抗潮保地的防御斗争转为向海要地的斗争。



图31 垦区棉田



海涂开发与海岸线的延伸

南通200多公里的海岸线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不断由沙洲并接大陆形成的。自宋至清初，南通大部分海岸线稳定在原捍海堰（俗称范公堤）一线。元末，黄河改道，从苏北入海，黄河大量的泥沙在苏北沿海沉积，原海堤外的滩涂逐渐淤涨，特别是石港以东的海湾淤积速度较快。清末民初，海岸线东移：海岸线北段，今如东县栟茶向东到长沙一线海岸平直，变化不大；海岸线中段，从如东县掘港到南通县（今通州区）石港、西亭、余西一线海堤东侧的石港湾已成平陆；海岸线南段，吕四以南各沙洲发育连陆，启东东部海岸逐渐连接。清末，通州以东海岸的扩展及通州东南沙洲的涌现与并陆，使今启东东部海岸逐渐成形。

清嘉庆以后到光绪年间，石港、金沙已在内陆。清末民初，因海岸线东移等原因，原通州盐运分司管辖下的九个盐场不得不调整合并。伴随着南通各盐场生产的逐渐萎缩，代之而兴起的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垦牧公司，古代南通的盐业经济从此开始转变为农业经济。

自清末开始的围垦造田使南通沿海岸线渐趋稳定，尽管在围垦造田的过程中海浸现象时有发生，但总的趋势仍然是海岸线在逐渐东移。南通范围内的滩涂围垦大体分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前30年；二是20世纪中期。

20世纪前30年，南通的滩涂围垦主要在南通、如皋、海门三地的沿海地带。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在通州东境与海门厅交界处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开通境滩涂围垦先例。通海垦牧公司在吕四场东南,北自三补丁荡分界处起,南至小安沙之川流港止,北部属通州,南部属海门厅。原吕四场东南部的大片荡地及原苏松镇、狼山镇兵营草地均为公司所围垦。公司围垦八堤计8.7万亩,又有未开垦土地2.8万亩,合计11.5万亩。

1914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其后制订垦牧及植棉条例。垦植之风遍及通泰沿海,大有晋、华丰、大赉、大豫等公司在本地区相继建立。

1914年,张謇发起成立大有晋盐垦公司,拟围垦原余东场及金陵公荡的荡地26万亩。1915年,在石港以东、掘港以南建立华丰公司,有土地2.82万亩。1916年,在原如皋东部滨海地带利用掘港场滩地48万亩建立大豫盐垦公司。公司南界遥望港,东至海滩,西沿挑鲜路向北经原范公堤东侧折向西北至长沙,达丰利场,长沙以南先行开垦,长沙以西至北凌河种青蓄草。1917年,在角斜场建立大赉公司,南距大豫公司约30里,有垦地13万亩。^[1]此外,在丰利范公堤以北还有益昌盐垦公司。

以上各盐垦公司对滩涂的围垦,使原范公堤外的土地渐成良田,如东县东部及南通县东部海岸线基本稳定下来。在南通东部、北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围垦的同时,原海门厅各沙也由当地大户,发起围垦,促进了启东境内海岸线的连接。据统计,1910年—1934年,原海门厅主要的八起围垦计围田4.74万亩(见表8)。启东海岸线东移至近海、向阳一线以东。

[1] 南通市档案馆资料:《大豫盐垦公司创立会纪录》《张謇为通泰各盐垦公司集赉之说明书》。



表8 1910—1934年海启围垦统计

年代	垦户	面积(亩)	围垦范围(今地)
1910	王象山	10730	向阳乡:协南、建平、海界村
1911	王象山等	9000	向阳乡东北部
1915	黄驹谨	2310.5	向阳乡建东村
1918	龚筠笙等	4554.5	向阳乡:垦西、小闸口村
1920	董涤清	10581	近海乡:临海、合兴、海塔村
1923	陆宝官	4117	向阳乡协兴闸村
1927	董涤清	2500	近海乡塘北、塘芦港村部分土地
1934	陆械人	3600	近海农场
合计		47393	

资料来源:《启东水利志》。

20世纪前30年,南通沿海滩涂的围垦,除大赉公司大部分在今东台市境内外,大豫、大有晋以及通海垦牧公司几乎把原海堤以外的滩地都利用了起来(图32)。为对沿海滩涂进行围垦,各公司发动劳力,增筑新海堤。这样,南通北部与东部的海岸线基本固定了下来。今如东县东北部沿海岸线由原范公堤向堤外平均扩展约2公里。原石港以东的三余湾成为良田,石港以东的海岸线向东推进约25公里。

20世纪中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南通地区除如皋县没有滩涂外,其余各县均各按其具体情况进行了滩涂围垦与开发。海安、南通及海门三县因海岸线较短,滩涂面积不大,围垦面积也较小。1959—1984年,海安县两次围垦,共3.25万亩,老坝港一带海岸线向东推进了约8公里。1945年,南通县民主政府组织民工围垦环本荡,至1946年秋,围垦滩涂2.17万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围垦晋余荡1.1万亩,三余以东海岸向东扩展5~8公里不等。1958、1969年海门县两次在东灶港一带组织围垦,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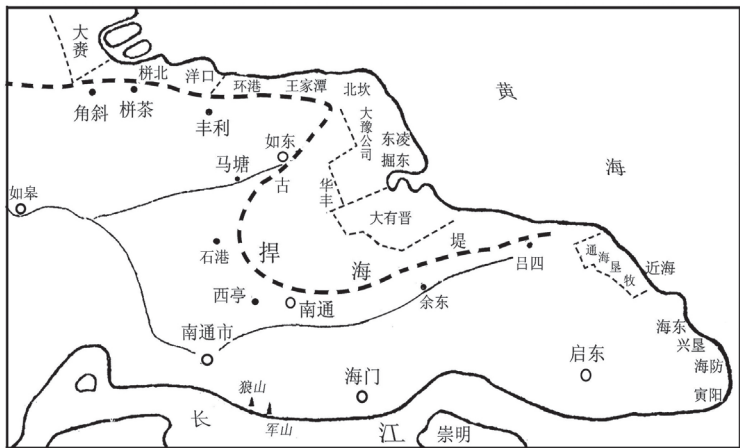


图32 20世纪初中期南通沿海滩涂垦区分布(示意)

围滩涂1.5万亩，海门北部海岸线向北推移。^[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较大规模的滩涂围垦发生在海岸线较长的启东、如东两县。

启东县从1952年以后逐渐对沿海滩涂进行围垦，建立农场、盐场及养殖场。从1952年起到1980年前后，建立近海农场（1952年）、启东盐场（1958年）、兴垦农场（1963年）、海东农场（1967年）、大坂盐场（1969年）、海防农场（1972年）、黄海盐场（1975年）、寅阳农场（1976年）、东元盐场（1976年），以及一些鱼虾养殖场等，共围垦滩涂6.6万亩。^[2]1976年，寅阳农场建立，位于启东的廖角嘴向东南移动到江海交汇处。

如东县有广阔的滩涂，从西北端与海安县交界的老坝港起到与南通县交界的遥望港止约有92.4公里的海岸线。县东南自遥望港至北坎，20世纪70年代年均淤涨20~30米；

[1] 资料来源：《海安县志》《南通县志》《海门县志》。

[2] 资料来源：《启东水利志》。



北坎至小洋口段西部年均淤进30米；小洋口至老坝港段因有外海辐射沙洲的屏蔽，淤涨速度较快。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起到1981年，共围垦269 300万亩滩涂。（见表9）如东县的围垦配以海堤的修筑，使如东县海岸线稳定地向外海延伸。东部丁店到北坎一线以东，海岸线推进8~10公里；北部靖海、洋口一线也向外扩展6~8公里不等。

总之，在20世纪中期南通沿海地带的围垦活动中，各县建立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为社会主义新农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末，新一轮围海造地工程亦已开始，新型的工农业基地将在这片处女地上显露勃勃生机。

表9 如东县部分垦区统计

垦区名称	围垦年代	围垦面积（亩）
老北坎垦区	1951	5 300
如东盐场	1958	16 000
栟北垦区	1969	57 000
洋口农场	1960	31 000
环港、环东垦区	1969—1971	50 000
王家潭垦区	1973	12 000
新北坎垦区	1974	32 000
掘东垦区	1971	15 000
东凌垦区	1981	51 000
合 计		269 300

资料来源：《如东县水利志》（稿本）。

唐代及唐代以前行政归属

自汉代以来，长江江口北侧陆地的扩展，渔、盐业与农业的振兴，使南通古代的居民聚落逐渐出现，经济逐步繁荣，南通历史上的县级城市陆续兴建。汉代广陵（今扬州市）东部设置海陵县后，其东部较长时期内没有建立县级行政机构。两晋南北朝到唐代，本地区西北部地域有所扩展，南通范围内出现了县级行政机构。直到东晋义熙年间，晋安帝分广陵郡地设置海陵郡，这一带的县级行政机构才有所增加。一般认为，海陵郡属县中的临江、如皋、蒲涛、宁海、海安五县，在今南通市的范围内。唐代以前，这些县多有废并，最后均纳入海陵县（今泰州市）管辖之下。



东晋及东晋以前的行政隶属关系

南通地区历史上最早的县级行政机构是东晋时才开始设立的。汉代设海陵县以前，南通为广陵县东部滨海之地。汉代设立海陵县后，本地在行政上属海陵县。东晋以前，南通地区还没有出现县以上的行政机构，所以，在东晋以前，南通的历史沿革实际上是指地域范围的行政归属关系。

1. 自“唐虞”至东晋的行政隶属

古代地方志对东晋以前南通地域的行政归属说明比较明确，且多大同小异。现存较早的明嘉靖《通州志·沿革》认为，通州“在唐虞属扬州之域，在春秋属吴越，战国属楚。在秦属九江郡，在汉为海陵东境，属临淮郡，东汉改属广陵，晋因之，东晋宋齐皆属海陵郡”（图33）。

清乾隆《通州志》对通州的这段历史沿革记述得更为详细，且认定了属海陵郡的时间在“晋义熙七年”：

古扬州之域。《禹贡》淮海维扬州，周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春秋属吴，周元王三年越并吴。以江北地至泗上与楚，地属楚。秦并天下，地属九江郡。汉为海陵县地。东汉属广陵郡。三国属曹魏，已属孙吴。晋义熙七年分广陵东界隶徐州，仍属海陵郡。

以上引文中“古扬州之域”及“东南曰扬州”，是指地域范围而不是指行政隶属。这里的扬州，指淮河以南中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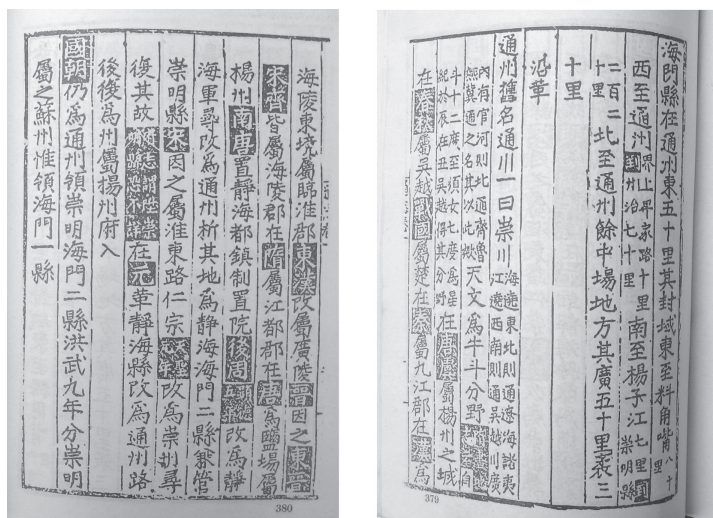


图33 明嘉靖《通州志》通州沿革

鄱阳湖以东的长江中下游、东及大海的广大地区。春秋时本地属吴国；周元王三年（前473）“越并吴”，战国时本地域已并入越国的范围。《史记·越世家》中说，勾践平吴且得到“伯”的爵位后，“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淮上地”与“江北地”是两个不同的地理范围，楚得到“江北地”与“泗上”是多年后的事。越国灭吴以后多年，却还是“不能正江、淮北”，《史记·楚世家》记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5），“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说明直到公元前445年，楚国才向东扩展并占领了江北之地。乾隆州志这么记载，显然是作者自己的理解有误。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沿革》不仅继承了这个时期历史沿革的记述，而且对本地域的行政归属作了进一步阐述：

三代属扬州，春秋属吴，吴灭属越，已属楚。秦属九江郡，隶扬州。汉为海陵县地，属临淮郡，隶徐



州。后汉为东阳县地，属广陵郡，隶徐州刺史部。三国属魏已属吴。晋为海阳县地，属广陵郡，隶徐州。东晋立蒲涛县，属海陵郡，隶徐州。南北朝为蒲涛县，属海陵郡，隶南兖州。

光绪通州志中关于本地域于东汉为“东阳县地”的说法，上文已有论及^[1]，属东阳县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再赘述。至于“南北朝为蒲涛县”的说法，则是明确了东晋时设立的蒲涛县与通州间的地域联系，其依据实为《读史方輿纪要》中古蒲涛县位于通州西部的记述。

古代通州地方志以及地理总志中关于“通州地域”于东晋属海陵郡的说法较为笼统。《晋书·地理下》说，晋安帝“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山阳、海陵二郡”。义熙七年为公元411年，此时距东晋结束已不足10年。东晋自317年至420年历百余年，在411年之前的90多年中，“通州地域”还是属于广陵郡。所以，“东晋属海陵郡”的说法并不准确。另外，新增设的如皋、宁海等县也不是一开始就归海陵郡管辖的。晋“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属南兖州”^[2]。到南朝宋时，这几个县已属于海陵太守管辖。可以说，“通州地域”内的如皋等县于东晋时属广陵郡；义熙七年起，先后属山阳、海陵两郡。南朝宋齐梁陈时，本地区在海陵郡的管辖范围内。隋初，废海陵郡。唐代，曾在海陵县设置吴州，不久又废。综合地方志的记录，对于东晋以前本地域的行政归属可作如下表述：

夏、商、周为扬州之域。东周春秋属吴，战国时（公元前473年）属越、（公元前445年）属楚。秦属九江郡。西汉为海陵

[1] 见本书“汉代江岸线及扶海洲”。

[2] 《晋书》卷14《地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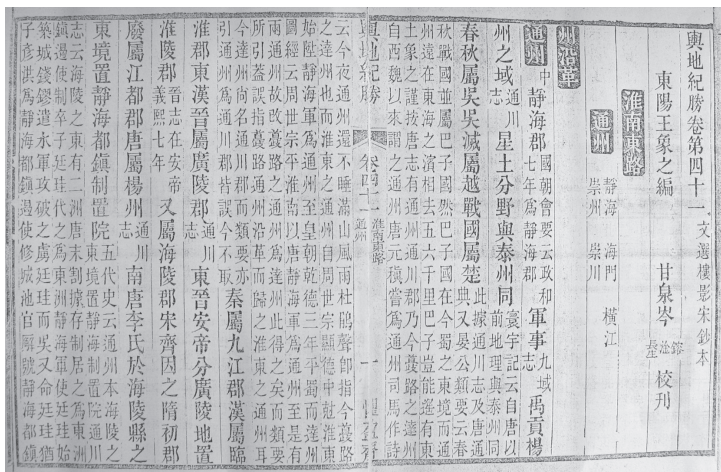


图34 宋《輿地紀勝》通州沿革

县东境，属临淮郡，东汉改属广陵郡，隶徐州刺史部。三国时属魏，后属吴。西晋属徐州广陵郡，东晋义熙七年起先后属山阳、海陵郡。

2.对“秦属九江郡”的分析

古代地理总志关于通州的历史沿革，一般大体相同。南宋《輿地纪胜》卷41通州沿革（图34）承宋《通川志》与唐《通典》的观点，认为“通州地”于“秦属九江郡”：

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吴灭属越，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属临淮郡，东汉、晋属广陵郡，东晋安帝分广陵地置临淮郡，又属海陵郡。

然而，对于本地域秦代“属九江郡”的说法，目前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继承了历代地方志与宋以来地理总志的说法，认为本地于秦代属“九江郡”。《南通市志》也延用了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以乾隆甲戌《通州志》为代表，认为秦时属“东楚之郟郡”。郟郡后为东海郡，则又有本地秦时属东



海郡的说法。^[1]

通州历史沿革中“秦属九江郡”的观点于通州地方志中并不是一致的。乾隆甲戌《通州志》在历史沿革“秦并天下，地属九江郡”条下有注：

按马端临《古扬州輿地考》曰：秦兼天下，置郡。此为九江、鄆、会稽、闽中、南海郡之东境。旧志遂概之曰“秦隶九江郡”。考《货殖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是西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三楚之地秦所置郡可考者，曰九江郡，曰泗水郡、曰郢郡。郢郡即东海郡，县三十有八。有朐县、缯县，即《史记》所谓东楚之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也。有建陵县，即晋所分广陵五县置山阳郡者也。州于秦，当属东楚之郢郡矣。

乾隆州志的编纂者对“秦并天下，地属九江郡”提出了质疑，认为州境于秦代“当属东楚之郢郡”。可以说，乾隆甲戌《通州志》的编纂者保留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为此，光绪通州志的编者对“秦属九江郡”的问题做了考证，且在“秦属九江郡，属扬州”的文字下作了注：

《文献通考》古扬州秦郡五：九江及鄆、会稽、闽中、南海也。《通典》广陵，秦属九江郡。甲

[1]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代疆域图，把本地区划在“东海郡”范围内。地图集在“秦时期图组编例”说明中指出，秦代郡级行政单位的总数和名称，自古以来有多种不同说法。《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用了谭其骧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所写秦郡的说法，秦末除京师附近为内史辖区外，全境分为四十八郡。郡界主要是依据谭先生《秦郡界址考》（谭其骧《长水集》上册）画出的。

寅志、省志皆以通州于秦属九江郡。甲戌志因《史记·货殖传》东海、广陵皆东楚，九江为南楚。《汉志》广陵、东海属徐州。应劭注：东海，秦郯郡，遂疑州属于郯，不知州隶广陵，不隶东海。《货殖传》本区为二，且秦承周后，广陵仍属扬州，至汉始属徐州耳，即郯郡亦非秦郡。宋刘攽《汉书刊误》言之。《史记》注，秦三十六郡亦无郯郡。王应麟《地理通释》谓郯郡楚汉之际所置。通州当仍从旧说为长。

光绪州志作者的这番考证，等于否定了乾隆州志关于通州地于秦代属九江郡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通州于秦时属郯郡与属九江郡两说的主要分歧在于秦代是否设有郯郡（一说，东海郡于秦时曾为郯郡），且本地域是否归东海郡管辖。光绪州志的作者以通州在地域上曾属广陵，且以秦三十六郡中无郯郡、郯郡设立于楚汉之际为据，依从旧说。这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处理方法。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司马迁没有列出三十六郡的郡名。裴骃的《集解》所列三十五个郡中也没有东海或郯郡。《汉书·地理志》中，东海郡设立于“高帝”时。那么，是否秦代就没有东海郡呢？谭其骧先生认为，秦代有东海郡，且是从薛郡中划分出来的，而其设郡的时间，则于史无征，疑为始皇三十五年。^[1]在《史记·陈涉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研究：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钜人董绲、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

[1]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这段传记中，秦嘉等人“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其中“庆”是“东海守”的名字，不知其姓，“郯”应为郯县，是“庆”被围困的地点。秦制，郡有守。看来，秦代似有东海郡。《宋书·州郡志》说：“东海太守，秦郯郡，汉高更名。”这是《宋书》作者的观点，承认了郯郡与东海郡之间的承继性。在《史记》中还有一些资料是与东海郡有关的。《史记·绛侯世家》记载：

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侯共食钟离。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

《汉书·高帝纪》在高帝六年春正月的记事中说：

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鄆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

研究以上三条资料，不难发现，司马迁对于东海郡的概念并不确定。前两条中有“东海”，后一条中却为“郯”郡。后两条均与汉高祖“六年”相关，与《汉书》“高帝”设立东海郡相吻合，不能说明秦时已有东海郡。而《绛侯世家》记项籍死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十二月，其时秦政权已不存在，所以也难以此为据，说秦时已经有了东海郡。

研究《汉书·地理志》有关郡县的条目，发现作者在行

文时有一定的规律：凡是原为秦代的郡且于汉代没有变更的，作者都是写明了的，如“河东郡，秦置”、“九江郡，秦置”、“会稽郡，秦置”等；凡是原为秦代的郡而于汉代名称有所变更的，作者用了另一种写法，如“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名为临江郡”等；凡是汉代增设的郡，作者一般只写郡名与设立的时间，如“东海郡，高帝置”之类。班氏作《汉书》所掌握的史料要比我们丰富，且接近秦代，其可信度应当是较高的。《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一段话：

（楚惠王）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在“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句后有张守节《正义》注：“正，长也。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是也。”楚惠王四十四年是公元前445年，也就是说，其时楚国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广陵县及“徐、泗等州”了。位于“江北”的广陵东部海边，当然也会在其中。

一说东海郡从薛郡中分出，且薛郡设立于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对此，《正义》认为“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显然没有包括“江北”。如果说薛郡是秦始皇二十三年取楚“陈以南至平舆”后才设立的，那么，薛郡是否包含了淮南东部的江北广陵以东地区，我们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如果张守节的《正义》可以理解为泗水与薛郡是以“楚淮北之地”为范围的话，那么，原为薛郡一部分的东海郡就不会含有远在长江边的于汉代设置的海陵县之地。淮河、秦岭自古以来为中国南北分界，东海郡治郯县离淮河与广陵离淮河的距离几乎相等，且当年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还有许多湖泊、水洼，很难说首府在郯县的东海郡能管到江北的广陵。



《史记》还记载，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置会稽郡”。从秦始皇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的记录看，很有可能秦置九江郡是在秦始皇二十四年。这个九江郡治寿春。那么，当年的这个九江郡的范围是可以到达东部海边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广陵也在九江郡的范围内。

乾隆通州志作者认为，“郟郡即东海郡，县三十有八”。那么，这38个县究竟有哪些呢？《汉书·地理志》中的东海郡也管辖38个县，分别是：

郟、兰陵、襄贲、下邳、良成、平曲、戚、朐、开阳、费、利成、海曲、兰祺、缙、南成、山乡、建乡、即丘、祝其、临沂、厚丘、容丘、东安、合乡、承、建阳、曲阳、司吾、于乡、平曲、都阳、阴平、郚乡、武阳、新阳、建陵、昌虑、都平。

这38个县在淮河以北。秦代郟郡管辖下的是否也是这些县？目前尚无资料能说明。如果郟郡的范围可达长江北岸的话，那么，汉代临淮郡治下的29个县也会纳入其中。剔除汉代新增设的县不算，郟郡治下的县于秦代会超出38县之数。这与郟郡“县有三十八”并不相符。所以说，即便秦代有郟郡，其管理范围也很难到达长江边。

汉代设立海陵县之前，本地区还是广陵县东部的濒海之地。光绪州志作者批评乾隆志“不知州隶广陵，不隶东海”，有一定的道理。广陵县于秦代属九江郡，当然其时本地域也应当在九江郡的范围内。乾隆州志以九江郡系“南楚”，东海、广陵系“东楚”为理由，说州境于秦代“当属东楚之郟郡（东海郡）”。其实，这种推理是十分勉强的。司马

迁根据汉代的情况，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一些地区分为“三楚”，在“东楚”范围内的还有“吴”：“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就习俗与物产言，东海与吴、广陵有较大的差异。东海郡“胸、缙以北，俗则齐”，与南方的吴俗绝不相同。把广陵县划入东海郡，显然不合理。再说，战国时楚灭越，楚尽取吴故地且扩展至浙江，东达大海。秦灭楚，把广陵县划入与之相近的九江郡并非不可能。此外，乾隆州志说，“有建陵县即晋所分广陵五县置山阳郡者也”，以建陵县属东海郡为据，认定广陵也属东海郡。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东晋时分广陵县地所设置的建陵县是侨县，与汉代建陵县不在同一地方。

由上所述，可以认为，通州地方志中对于本地区地域于秦代属九江郡的记述是正确的。至于本地于“秦属东海郡”的说法，我们应当持审慎的态度。



东晋至唐代的行政隶属关系

由东晋至唐代，海陵东部地域有所变化。东晋义熙年间，海陵以东的地域有所扩大，县级行政建置逐渐增加，在本地区范围内增设了临江、如皋、宁海、蒲涛等县。隋唐之际，本地区受海潮浸蚀，地域缩小，导致东晋时设立的部分县被裁并。这个时期的行政隶属关系较为清楚。

“通州地域”于东晋时属广陵郡，隶徐州。义熙七年（411）起，先后属山阳、海陵两郡。南朝宋、齐、梁、陈时，本地区在海陵郡的管辖范围内。隋初，废海陵郡，本地属江都郡。唐为盐亭场，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唐末，为浙江西道节度使控制，乾符二年（875）设有狼山镇遏使的职位，隶属于浙西常州。

1. 南北朝时期的几个古县

一般认为，海陵郡属县中的临江、如皋、蒲涛、宁海、海安五县在今南通市的范围内。临江、蒲涛、宁海的古县治，均难觅其故地，有以宁海为今海安、以蒲涛为今如皋白蒲镇的说法，但只见于少数历史记载，未见确凿的史实、物证。

东晋时设立的几个县中，宁海、海安、如皋三个县的位置比较明确，这些县建立的时间可能早于义熙七年。《晋书·地理志》说，晋安帝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山阳、海陵二郡。又说，设立山阳郡时，其属县如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等，是从广陵郡分出来的。《宋书·州郡志》中这几个县已隶属于海陵太守治下。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如皋、宁

海、临江、蒲涛等县先属山阳郡，后属海陵，其划属海陵郡的时间尚无史料说明，待考证。第二，从这几个县是从广陵郡下划属山阳郡的史实看，这几个县很可能在义熙七年之前已经建立，其建立的具体时间失考。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原居住在北方的汉民大量南迁。为安置南迁的北方民众，南方政权设立大量的侨州郡和侨县。东晋海陵郡建立时，其辖县有建陵等五个，南朝刘宋政权海陵郡有建陵等七个县，而齐、梁两朝海陵郡曾有八个属县。这个时期侨置州郡县的设立，使侨、实行政建制交错相间，终究导致了行政体系的紊乱，不利于朝廷的管理。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以来的割据局面，为改革政区体制创造了条件。隋初，由于长期战乱，民户大减，许多州郡辖区的户籍不符，且州县侨制滥设，机构重叠，因而隋政权调整了地方政区及其制度。隋时古海陵郡管辖下的建陵县的撤并，应当是这个原因，而临江、蒲涛、如皋县的撤并，则可能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起。

东晋至唐代原海陵郡下属县级建制变更情况，见表10。

表10 古海陵郡属县建制变更概况 （公元5~8世纪）

东晋	宋	齐	梁	陈(北周)	隋	唐
(海陵)	(海陵)	(海陵)	海陵	海陵	海陵	海陵
建陵	建陵	建陵	建陵	建陵	并入海陵	
临江	临江	临江	临江	并入宁海		
如皋	如皋	如皋	如皋	如皋	并入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宁海	并入海陵
蒲涛	蒲涛	蒲涛	蒲涛	废		
	临泽(472)	临泽	临泽	临泽	并入高邮	
		齐昌(483)	废(?)			
	海安(471)	海安(484)	海安	海安	废(?)	海安

说明：《陈书》无州郡志，陈朝建制据各史书记载汇集；括号中的县，原属其他郡，括号中的时间为始建年或归属年。唐代设立的海安县仅14年。



上述古县的立废，于史籍中虽无系统完整的记述，但也可从零散史料中理清其大概情况。

(1) 海陵县的设置

古海陵县即今泰州市。由于南朝梁时海陵县成为海陵郡治，且南北朝时期的郡辖县多并入其境，五代通州与如皋县均为划其东境设置，所以一并述及。

海陵于汉代建县，在吴王刘濞的封地范围内，其后曾为江都国、临淮郡、广陵郡辖地。海陵于王莽统治时称亭间^[1]，于西晋曾称海阳。南宋初王象之《舆地纪胜》卷40泰州中说：“晋志无海陵县。”他在对此进行分析时说：“汉志海陵县下有江海会祠，晋志但有海阳县，以注有江海会祠之语，知其为海陵。”“沈约宋志于宣城郡之广阳县下云：‘汉曰陵阳，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广阳，则书海陵为海阳，恐是避杜皇后讳亦未可知也。’”王象之说的汉志、晋志、宋志，当分别是《汉书》《晋书》及《宋书》的地理（州郡）志，他推测了海陵更名为海阳的原因。海陵县于南齐时为广陵郡治，梁时该县划归海陵郡，始为海陵郡治。^[2]东晋宁海、蒲涛等县设立之前，本地区为海陵县东部濒海地区。

(2) 古如皋县的建立与裁废

如皋县在今南通市范围内是最早设立县级行政机构的，东晋义熙七年已有如皋县。隋开皇初，如皋并入宁海，唐代后期为海陵县的如皋镇。

古如皋县的建立，一般认为是在东晋义熙七年，与山阳、海陵设郡于同年。嘉靖（重修）《如皋县志》说：“晋安帝义熙七年，分广陵为五县，如皋其一也。”而《晋书·地理志》安帝义熙七年有“分广陵界置山阳、海陵二郡”的说法，

[1]《汉书》卷28《地理志上》临淮郡。

[2]《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州海陵废县条。

此年“分广陵为五县”的说法其依据失考。《輿地纪胜》泰州沿革综合了《晋书·地理志》于安帝义熙七年设山阳郡及划广陵五县归属的记录，说如皋县“本汉广陵郡地，晋安帝义熙七年分广陵之五县置山阳郡，而如皋预其一，莫知为县之始”。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尽管此说与其他史籍有别，但与《晋书·地理志》晋“安帝分广陵郡之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置山阳郡”的说法相吻合。这就是说，如皋县的建县时间可能还要早于东晋义熙七年，只是缺少史料证实。民国《如皋县志》在“如皋沿革考”中写道：“东晋义熙七年，分广陵界置山阳郡，属南兖州，领县五，如皋居其一。如皋之名见于史传始此。”这是考证了相关史料得出的结论，比嘉靖县志更为严谨。《读史方輿纪要》关于建陵、宁海两县的沿革记述中有两县先“属山阳郡，寻属海陵郡”的说法，当有依据。宋、明两部地理总志就有这种说法，而《宋书·州郡志》所记却较为简略，只说如皋县由东晋安帝建立。

如皋县于隋朝开皇初并入宁海，宁海县于唐代并入海陵县。唐代，如皋成为海陵县东部的一个大镇。日本求法僧圆仁曾于唐开成三年（838）在如皋受到“镇大使”的接待，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了赴唐一行途经如皋镇的情况：

（七月廿日）午时，水路北岸杨柳相连。未时到如皋茶店暂停。掘沟北岸店家相连。射手丈部贞名等从大使所来，云：从此行半里，西头有镇家，大使、判官等居此，未向县家……

廿一日卯时，大使以下共发去。水路左右富家相连，专无阻隙。暂行未几，人家渐疏，先是镇家四围矣……

这里的“镇家”即为如皋镇，从如皋茶店到“镇家”有半里行



程，又从“掘沟北岸店家相连”，及离开如皋镇时描述的“水路左右富家相连，专无阻隙”的情况看，圆仁所描述的如皋显然是海陵县东部的一个大镇。唐代后期的镇，多系军政合一的建制。从圆仁对如皋镇记述的规模来看，按当年条件，不可能在七八年间形成。这个如皋镇应当就是隋时被废的如皋县城。

东晋设立的临江、如皋二县后来并入宁海，宁海县于唐时并入海陵，所以在叙述建置沿革时，要把行政上的归属与地域内的建置区分开来。有一段讲述如皋县沿革的文字是这么写的：

如皋夏时为“扬州之域”，周时属海阳……战国时属楚，复名海阳。秦时属九江郡，汉时属吴王刘濞，改名海陵，新莽时改名亭间。东汉建武六年（30）省入东阳县；建武十八年（42）又改名海陵县。三国时海陵县被废，东吴赤乌四年（241）复置海陵县。东晋义熙七年（411）析置如皋县。^[1]

既然说的是古代如皋县的沿革，本节所叙述的主体即应为如皋县。“秦时属九江郡，汉时属吴王刘濞”所说指的就是如皋。叙述中说“东晋义熙七年（411）析置如皋县”，既然赞同如皋建县于义熙七年的说法，怎么可能超前三百数十年于“建武十八年（42）又改名海陵县”呢？显然，其叙述的主体不一。从“改名海陵”到东吴“复置海陵县”的叙述，可见其主体明显置换为海陵县。海陵县的历史沿革不能一成不变地用在如皋县上。看来，明嘉靖（重修）《如皋县志》的沿革说明较为合理：

如皋县古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吴灭属越，战

[1]《如皋历史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页。

国属楚，秦属九江郡，汉属广陵。晋安帝义熙七年分广陵为五县，如皋其一也，隋开皇初入宁海……

嘉靖重修县志的这种叙述，“汉属广陵”之前说的是地域归属，“晋安帝义熙七年”之后说的是如皋县的沿革，用语准确。

(3) 古海安县的设置与废止

海安县开始建县的时间为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归属与它同时设立的侨置新平郡，始见于《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海陵郡记载：“海安，永明五年罢新郡，并此县度属。”南齐时没有“新郡”，《南齐书》中的“新郡”应当是“新平郡”，《宋书·州郡志》所载可证。从《宋书》及《南齐书》的《州郡志》记录可知，古海安县建立于471年，齐永明五年(487)新平郡废，海安划属海陵郡。

对海安县与宁海县的史料研究发现，从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起至少有近百年时间，海安与宁海两县是同时存在的，且从齐永明五年(487)起，宁海与海安曾同为海陵郡管辖。《古海陵县志》和民国《泰县志》都说，海安县即宁海县，可能是后承前说，两县志对于宁海与海安在齐梁间曾同时存在的史实疏于考证。

对于海安县的沿革，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叙述得较为详细。该书卷23泰州条下记载：

海安城 在州东百二十里。南北朝时戍守处也。
宋泰始七年侨置新平郡，治江阳，又领海安县。齐永明五年罢新平郡，并入海安，属海陵郡。陈大建五年，将军徐敬辩克齐海安城是也，后省。唐景龙二年又置海安县，开元十年省入海陵……

唐以前海安县的裁撤，顾祖禹仅以“后省”两字高度概括，没



有交代其被废省的时间及原因，也没有交代其归宿。从隋代整顿行政建制的情况来看，该县可能于隋初被废，但这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海安从唐景龙二年（708）到开元十年（722）期间曾恢复县级建制15年，此后长期没有县级建制。

从以上关于海安的历史资料判断，唐宋至明清，海安除建有县、镇之别外，其治所并无重大变化。顾祖禹“陈大建五年，将军徐敬辩克齐海安城”中的海安城，在《古海陵县志》中有不同的考证，认为这里的“海安城”是涟水，而不是今海安县城。《古海陵县志·建置》记载：

海安城 ……按旧府志、新州志皆引陈大建五年师克齐城海安，相传为南北朝时戍守处。考《陈书·宣帝纪》云：徐敬辩克海安城，青州东海城降。陈所克之海安，令安东。又考《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青州东魏改曰海州，涟水东魏改曰海安。故《江南通志》谓涟水三城在安东县，则城海安之地非今泰州所属海安，益信新志刊误。

涟水县隋属东海郡，东魏时更名海安。陈将徐敬辩攻占北齐海安城事见《陈书·本纪》。陈宣帝太建五年（573）：

乙未，山阳城降。壬寅，盱眙城降。戊申，罢南齐昌郡。壬子，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青州东海城降。

陈太建五年南朝陈与北齐的战事发生在淮河下游，山阳、盱眙、海安（涟水）相去不远，均在淮河沿岸，陈将徐敬辩攻占的海安城应当在淮河流域。《古海陵县志》对这条史料的考证是正确的。

（4）古宁海县及其区域范围

宁海县与如皋等县同时于东晋义熙间设置，废于唐

初。南宋时为宁海乡，明代为泰州东部属乡，今海安县的旧场（原角斜场），东台市的富安、安丰及梁垛，以及如东县的栟茶均在其范围内。从建制的裁废与降格的规律看，这应与县土大规模为江海坍塌，致其经济规模与县之标准相差甚远有关。但是，宁海乡名称的来历应当与前宁海县存在相承关系，因此，古宁海县的位置即应今海安县东部与东台市南部一带。

宁海县与海安县地域相邻，且同时于唐代并入海陵。有关宁海县沿革的说明，除六朝正史州郡志外，还散见于宋、明等地理典籍。宋《舆地纪胜》泰州古迹条：

宁海城 在海陵县东南一百里，周三里，即故宁海县城。按《舆地志》，晋分广陵郡置宁海县，久废。今为宁海乡。

明《读史方輿纪要》泰州如皋县条：

宁海废县 在县东北。晋安帝置县，属山阳郡，寻属海陵郡。宋齐及梁因之。隋属扬州，以如皋县并入，唐又省县入海陵。

民国《泰县志》卷5地理第十一区海安：

宁海废县 在县治东南，晋义熙中置，属海陵郡。隋属江都郡，以如皋县并入，唐初废。《纪胜》云，故城在海陵县东南一百里，今为宁海乡。

这三条资料告诉我们：第一，在宋代，古宁海县还以“宁海乡”的身份存在着。第二，古宁海的地理坐标有三种记法，分别为“海陵县东南一百里”，“如皋县东北”，“民国泰县东南”。从《舆地纪胜》的资料看，似乎南宋时宁海城还存在。这些历史资料的可信度有待论证，但无论如何，这



毕竟是古宁海县留下的历史痕迹，为我们推定该县的范围提供了线索。上述关于宁海县位置的地理坐标，因其所论存在两个方向，一是海陵东南，一是如皋东北，须加论证。另外，《舆地纪胜》所记海陵、宁海的距离与《读史方輿纪要》所记海陵、海安间的距离也有疑问，前者为一百里，后者为一百二十里，似乎宁海在海安的西边。在没有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很难断定哪个数据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有“宁海乡”这条线索可据参考。万历《泰州志》卷1“乡都”目下记有宁海乡的具体范围：

宁海乡，辖都七，场五，里二十八。

二十五都一里，二十三都三里，二十七都二里，
二十八都一里，二十九都二里，三十二都七里，一都
二里；梁垛场二里，安丰场二里，栟茶场四里，富安
场一里，角斜场一里。

应当认识到，上述史料中的宁海乡基本上是同一个历史实体。“都”是乡村的基层组织，我们目前还未能排出宁海乡管辖下七个都的具体位置，但宁海所属五个盐场的地理位置却是十分明确的。梁垛、安丰、富安场在今东台市境，栟茶在今如东县境。明代的角斜场位于今海安县角斜镇以东的旧场（曾名海防，今并入老坝港镇）。旧场，即旧角斜场，因清雍正初旧角斜场受海潮冲激，于乾隆三年（1738）移场署至费（一作“富”）家滩新场，今海安县角斜镇。由此可知，宁海县的确在南黄海边，且范围广大。这条资料也印证了《读史方輿纪要》宁海故县在如皋东北的说法正确。

《舆地纪胜》宁海城在海陵东百里之说并不可信。民国《如皋县志》在《建置志·古迹》中记有“宁海废县”：“《方輿纪要》云，在县东北。按泰州旧志有宁海乡（扬州府志都里同），今分入东台县境，如角斜、栟茶等场，与皋毗连，皆古

宁海县地。”可以说，民国《如皋县志》的作者们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对以往的史料进行了研究，其所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史实的。清咸丰《古海陵县志》认为，海安县即宁海县，但并没有对此说加以论证，其所列举的宁海县晋以来的沿革，尚不足以支持此说。

我们认为，宁海故治当在今海安之东、如皋之北的古海滨。此有两点依据：其一，宁海故治的位置应在今海安县治之东、如皋县治之北的范围内；其二，位于“古海滨”。既然是“古海滨”，就应与现代海滨有别，说明宁海县于六朝时濒临大海，县被裁废以后，于宋、明间，其故土也是位于海边的。宋时盐城、南通间的海岸线大致在古范公堤沿线。现在东台市的富安，海安县的李堡、旧场都位于“今海安之东、如皋之北的古海滨”。也就是说，古宁海县可能在富安、旧场古范公堤沿线一带，也有可能南北朝时的宁海范围还在海堤外侧，因海潮的冲蚀而塌坍。宁海故城应当位于海安以东的南黄海边，其故县址极可能毁于宋以后的多次海潮灾害中，难寻旧踪，有待将来的考古发掘探明。

(5) 海陵郡治下的其他古县

东晋海陵郡郡治建陵。建陵县本为东海郡属县，东晋时北民南迁，设此侨县，划属海陵，《南齐书·州郡志》中未记此县。《隋书·地理志》说，开皇初，该县并入海陵县。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州条称建陵废县在泰州东北七十里，民国《泰县志》认为“此废县即边城”。从距离看，边城约在泰州东北30里，与70里之数相差较大。嘉庆《东台县志》则认为建陵县城在东台县治西南，这种说法较为可靠。

临泽县，刘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初置，属海陵郡，齐梁因之，隋开皇初并入高邮。齐昌县设立于齐永明元年（483），属海陵郡，在清洪畴孙的《补梁疆域志》海陵郡中未记此县，可能已废，其地域不明。



海陵郡属下的临江、蒲涛二县的位置较为模糊，除正史中有简单记录外，留下的历史资料并不多。《读史方輿纪要》对这两个县的归宿做了记述。顾祖禹把临江县附在泰州如皋县的“宁海废县”条下：

临江废县在县南，亦晋安帝时置，初属山阳郡，寻属海陵郡。宋、齐因之，后周并入宁海县。

蒲涛县则见之于通州条下：

蒲涛废县 在州西。晋义熙中置，初属山阳郡，寻属海陵郡。宋、齐因之，后周省。

《读史方輿纪要》所说的“后周”实际上是北朝的北周。在南北朝地图上，一般把海陵及其以东一带标在北齐的范围内。江淮沿海素为盐业生产基地，所以公元6世纪后半期，这一带战火连年，为南北各政权争夺的要地。北齐立国27年，从552年起，其势力渐向江淮扩展。577年，北齐被北周所灭，江淮一带又为北周所控制。一般认为，临江县在如皋县的西南，蒲涛县即今如皋白蒲镇，两县治可能毁于江潮的冲蚀。如果顾祖禹对临江县位置的认定是正确的话，则临江县的位置应当偏东，可能要在如皋县的东南边。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古迹》因居民曾在白蒲挖出古城砖，而有白蒲是蒲涛县治所在地的说法。不过，这些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其他旁证资料及实物证据的证实。

2. 唐代海陵县东部的几个村镇

反映本地区唐代情况的史料以日僧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最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圆仁记录了扬州海陵县东部地区的几个地名，为我们保留了研究唐代如皋及其以东地区的宝贵资料。日本仁明朝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即公元838年）六月，日本遣唐使团的第一船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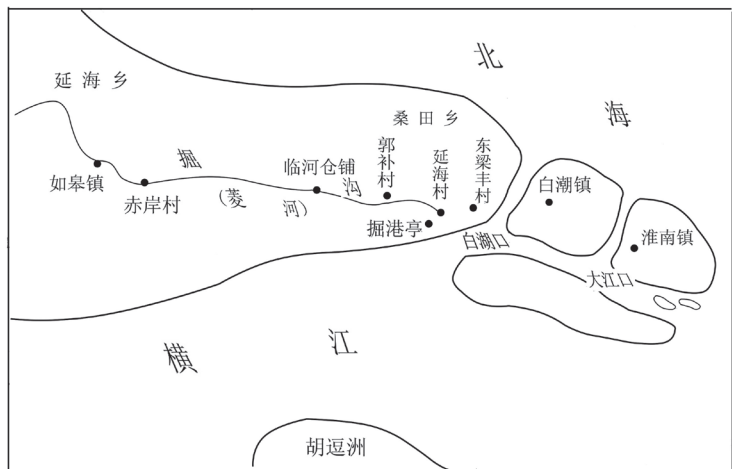


图35 唐末海陵县东部村镇(示意)

掘港以东海域，并在掘港附近登陆。随团赴唐的圆仁记下了在掘港以东海域遇险、获救后到达如皋镇的过程。《入唐求法巡礼记》中保留了海陵县如皋镇以东的一些村镇地名，主要有淮南镇、白潮镇，东梁丰村（守捉军中村）、延海村、掘港庭等（图35）。

唐代以后，如皋以东沿海一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些地方已经不再存在，很难把《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列出的地名与现在的村镇一一对应。现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记》的资料把唐代海陵县如皋镇以东的村镇略述于下。

淮南镇

淮南镇是唐代位于海陵县东部沿海某沙洲上的一个小镇，其位置大体在今如东县（掘港）城的东北方。从圆仁六月廿八日所描述的海边景观判断，唐代掘港以东应该有一些不知名的、面积较大的沙洲。这些沙洲之间有小江与大海相通。长江混浊的水流从小江水道中流入大海，形成了海边浅



绿色的海水中多股色如黄泥的水流景观。淮南镇就在其中的一块沙洲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

（七月一日）未时泛艇从海边行……终到大江口……僦逢卖芦人即问国乡，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即如其商人两人上船，向淮南镇。从水路而到半途，彼两人未知镇家，更指江口却归。日晚，于江口宿。二日晚，彼二人归去。近侧有盐官，即差判官长岑宿祢高名、准录事高丘宿祢百兴令向镇家，兼送文条。即盐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来慰问。使等笔言国风。大使赠土物，亦更向淮南镇去。从江口北行十五里许，既到镇家。镇军等申云：“更可还向于掘港庭。”

圆仁的记述，把唐末掘港以东的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淮南镇在大江口近侧的沙洲上，设有军事和盐政机构，沙洲上的居民从事盐业生产。淮南镇南距江边约15里，附近有掘港庭。遣唐大使等人曾到达淮南镇，受到淮南镇盐官的热情接待。上引文中的“文条”应当是日方签发的外事文书，尽管两国人们言语不通，但相同的文字成为交流的工具。

这个淮南镇仅见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都没有载录。为什么838年时淮南镇还存在，而于时隔一个多世纪后的宋初《太平寰宇记》中却不见记载呢？我们应当从南通地区成陆变迁的规律中找出答案。

如本书第二、第四部分所说明，公元5世纪以后，南通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海浸。南北朝时期，南通范围内的一些古县被裁撤；明清时期，古海门县境土几乎坍没。这个淮南镇也可能在838年到960年之间的一百多年里，因海潮冲刷

而消失。这是因为10世纪初胡逗洲与北岸沙嘴并接后，古横江水道逐渐封闭，掘港以东的沙洲得不到泥沙的供应，海岸却必须承受海潮的冲蚀而消减的缘故。

白潮镇

白潮镇是唐代海陵县如皋镇以东海边的一个小镇，其东有淮南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这个镇的记述很少，仅在两组地名中出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海陵县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从这组地名中可以知道，唐代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还有镇、乡、村三级；作为军事机构的守捉，为镇所节制。从大使的行程路线判断，白潮镇的位置应在淮南镇以西、掘港镇以东的范围内。从宋、明掘港北东南三面环海的情况推测，这个白潮镇也在唐末以后坍没入海。

东梁丰村

东梁丰村是白潮镇桑田乡的下属行政村，村内有驻军，又被圆仁称为“守捉军中村”。唐代，对于海外来人的管理十分严格。早在开成三年（838）六月廿九日，大使与圆仁等乘坐入唐第一舶在掘港以东海边遇险，大使等先乘小船离开了遇险的座船。七月二日，圆仁等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后，“留学僧等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即住在当地驻军防区之内的民宅，以便于保护。大使等人离开第一舶后，于七月三日午时，才到达海陵县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与先期到达的圆仁等另一批人会合。圆仁记下了大使等同船乘员重新会合后悲喜交集的心情：

（七月三日）午时，仅到海陵县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爰先于海中相别，录事山代氏益等卅余人



迎出，再得相见，悲悦并集，流泪申情。

这里的“录事山代氏益等”就是七月二日先期到达东梁丰村的圆仁等第一船的同船乘员。他们在海边遇险后，分次登陆获救，两批人再次重逢，喜悲交集。可见，东梁丰村是大唐海陵县沿海边境一支守捉军队的驻地。守捉为军事据点，东梁丰村是白潮镇辖区内的行政村，二者实为一地。这个村子应当在淮南镇的西边，延海村的东边，后圯没于海。

延海村

延海村距东梁丰村18里，为国清寺所在地：“从东梁丰村去十八里，有延海村，村里有寺，名国清寺。”大使等登陆后就住在寺中。国清寺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古延海村地了。国清寺，“在掘港东营内，唐元和中僧行满建”^[1]，后历代几经修整。国清寺附近还有开元寺，圆仁在国清寺停留期间该寺曾有僧人来造访。20世纪中期，国清寺还有建筑留存，其位置在掘港镇东。由此推断，掘港东营应为唐时延海村故地，当在今如东县掘港镇东部。

延海村和东梁丰村之间，只说有18里的距离，没有标明两村间的位置关系。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七月十二到十八日的记载分析，东梁丰村与延海村有水路相通。从圆仁等向如皋进发前把随船带来的物品从东梁丰村运来，并从延海村出发的史实推断，从延海村出发到如皋要比从东梁丰村出发近些，所以延海村应位于东梁丰村的西边。

掘港庭和掘港镇

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掘港庭和掘港镇只是记

[1] 民国《如皋县志》卷3寺院。

述中的两个地名。庭应作“亭”，唐时为煎盐的场所。原本七月三日大使的座船是开往掘港庭的，但到达东梁丰村后，却未驶往掘港庭，而圆仁的记述中再也没有提及这个地方。这个掘港庭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在昔日的芳泉。民国《如皋县志》附有《掘港场沿革考》，其中提到“掘港场市昔在芳泉，自明中叶立备倭营于东北（即今之场治），人遂徙家成市，而芳泉遂成村落”。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可能性。掘港场市是盐场场署所在地，盐亭是煎盐场所，其位置不必与盐政管理机构在一起。《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又有“水手长佐伯全继在掘港镇死去”的记录，这里的掘港镇应是指居民集中的聚落，不是产盐的场所，宋以后的场署应当设在这里。掘港镇东有延海村，其西南为掘港庭（亭），三者位置相近，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今天的如东县城。

掘沟及郭补村、临河仓铺

圆仁等开往如皋的船队从延海村出发，沿着被称为“掘沟”的河道行进。圆仁误以此水道为“邗沟”。水道沿线有郭补村、临河仓铺等小村集。

“掘沟”有二丈多宽，河道平直，是延海村通往如皋的主要河道，也是唐代如皋与沿海盐场间运输海盐等物资的水上交通线。从现今的地图看，流经如皋、如东两县的如泰运河从掘港直流向西，在丁堰与通扬运河相接，似乎如泰运河就是“掘沟”了，其实不然。如泰运河即串场河，但串场河的资料说明，经过马塘、丁堰抵达如皋的运河是在宋、元以后才开通的，且马塘于元代存在与当今串场河交叉的贝壳堤，所以，唐代的“掘沟”不可能从今天的马塘向西贯通，应另有其线路。

南通学者管劲丞先生曾说：“南宋时马塘场之南与石港场之间，还一派夹洪，东通到海门县和掘港之间的海湾，



这一海湾清初还存在。大约元、明间夹洪涨满……”^[1]这种关于南宋时马塘濒临海湾的推断,可以从现代考古挖掘的资料中得到印证。20世纪80年代,在马塘发现了长650米以上的贝壳堤,这些堤“呈北北西—南南东展布”^[2],且有多条贝壳堤呈平行走向,与今如泰运河交叉。根据对贝壳年代的测定,这条贝壳堤形成于元末。这说明宋元之际马塘西边至少还有海湾存在。可见,元代以前,串场河是无法如现在这样东西贯通的。

从“掘沟”沿线的地名“临河仓铺”推测,“临河”可能是“菱河”之误。圆仁自延海村西行行程中的掘沟西段,可能即古代的菱河故道。明清时如皋确有“菱河”存在^[3]。今如皋、如东境内有南凌河、东凌河,虽然现在两河不直接相通,但应是由古代的菱河演变而来的。如东县境内的凌民、古坝、景安,如皋境内的丁北、东陈等地一带,可能即当年菱河故道的流经地。当然,这尚待进一步考察。

“掘沟”沿岸的郭补村、临河仓铺等小村,难以与今天的地方一一对应,从圆仁记载的向如皋进发的行程中,可以大致推定它们的位置。

唐末的“掘沟”不是今天的串场河,推定其位置,应横贯如东县中部。圆仁船队从十八日巳时起到申时止,行30多里,到达郭补村,花了三个时辰。十九日寅时起从郭补村出发,午时到达临河仓铺,这段路用了约四个时辰。由于此间接到大使的命令,船队没有在临河仓铺停宿,连夜向如皋行进。假设船队在临河仓铺休息一个时辰,那么,从十九日申时起,至廿日卯毕,约花了八个时辰到达赤岸村。此后,由于

[1] 《南通历史札记》,第37页。

[2] 刘嘉静,顾斌,徐志楠:《马塘贝壳堤探讨》,刊《南通市科技》1982(2)。

[3] 清嘉庆:《如皋县志》卷2运盐河。

要开挖堰坝，且水手疲劳不堪，直到未时才到达如皋。如视船队以匀速行进，则临河仓铺可以视作延海村至赤岸村的中点，那么，郭补村、临河仓铺这两个小村应在今如东县凌民、古坝、岔河、马塘一带范围内。



五代以来的行政机构演变

五代以来，南通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大致经历了由军政合一至军政分离这一演变过程，有制置院、军以及路、州、厅、县、镇、村等机构。此外，还有监、场等盐业生产管理机构。制置院、军、路等机构与州、县、镇、村等机构相比，其延续的时间不长。五代后期，州、县等行政机构于海陵以东逐渐建立。952年，南唐建立如皋县，属泰州。958年，后周设立通州，同时增设静海、海门两县，属通州管辖。此后近一千年内，南通境内没有增加县级行政机构。直到20世纪前半期，设立于1768年的海门直隶厅改为海门县，增设启东县，又分如皋县为如皋、如东两县，划泰县、东台、如皋三县境增设紫石县，后改为海安县，南通县改设南通市。与此同时，另在金沙镇设南通县。至此，南通境内一市六县（市）的格局基本形成。

五代至宋、元的通州及各县

公元10世纪初，随着胡逗洲等沙洲渐次与大陆涨连，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这一带得到进一步开发。长江口及江口北岸一带为吴国管辖下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姚氏家族集团控制，逐步建立地方军政合一的权力机构，吴设立静海镇，南唐设立静海制置院。后周显德五年（958），周世宗攻克淮南，设立通州。在设立通州的同时，划海陵东境设静海县与海门县，属通州管辖。静海县的设置以通吕水脊区西部为范围，海门县则以江口沙洲为境域。此前，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分海陵东境设如皋镇，南唐保大十年（952）如皋镇升为县，属泰州。

1. 从静海镇到静海制置院

南唐建立于后晋天福二年（937）。通州建州前地域行政机构的一段历史并不十分清楚。南通市南郊狼山的题名坡天祚石刻、《通川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有关记录，保留了五代十国静海制置院建立之前的历史，反映了当年长江口北岸的地方军事及行政机构的情况。

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
上西都朝覲回到此。^[1]

通州，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2]

[1]《南通历史札记》，第141页。

[2]《新五代史》卷60。



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制卒，子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始筑城，钱镠遣水军攻破之，虏廷珪。而吴又命廷珪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改东州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至南唐李璟嗣位，始补静海制置使。^[1]

（显德三年二月癸巳）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兵民万人奔吴越。^[2]

上述资料以天祚石刻为最早，《通川志》虽已失传，但《舆地纪胜》摘录的文字相对全面，均反映五代十国时期本地经历由静海镇而静海都镇至静海制置院的建制变化。

静海镇与静海都镇有上引姚氏家族成员官职史料的支持。《通川志》中的“海陵之东”的二洲应为胡逗洲与东洲，“存”、“制”即姚存、姚制。他们及后人廷珪、彦洪先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长江江口北岸一带的统治者。天祚是吴王杨溥的年号。由唐东洲镇遏使、东洲静海军使、杨吴静海都镇遏使、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等官职名称的变化，可以推知东州虽一度地位上升，终究被静海都镇所取代。静海超越东洲，可能与吴越军北进有关。《资治通鉴》记载，自后梁开平二年（908）到贞明五年（919）的十多年间，吴越军队在江口沙洲一带与吴国军队发生大战，江口沙洲几经易手。静海号称“静海都镇”，正是在姚廷珪被吴越军俘虏之后，姚彦洪始任静海都镇遏使的时候。推测其时间，应在这一期间，毕竟静海比东洲安全、稳定。廷珪筑城、彦洪修城池官廨，反映

[1]《舆地纪胜》卷41通州。

[2]《资治通鉴》卷292。

静海城的建设逐步细化，与静海由镇升格为都镇相适应。与此同时，东洲地位下降，其改为丰乐镇后与崇明、大安、狼山等镇同归静海都镇管辖。

南唐政权为杨吴权臣徐知诰逼吴王杨溥退位所立。南唐至李璟统治时，在静海都镇设静海制置院。静海制置院于《舆地纪胜》中亦称“静海都镇制置院”，今从正史的称谓。静海镇的位置有在原通州师范学校旧址的说法。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始建记》中说：

抑闻之史学家沿革建置一方之掌故也，城濠东南水口，静海城故址在焉。即址为阁，阁之东为书院。证之州志，南唐尝立静海都镇制置院，周升为军，寻改通州。城则周显德五年筑，曾无更易。然则地或当为都镇院故址。^[1]

通州师范学校旧址原为明千佛寺，寺北有文昌阁，张謇文中的“即址为阁”指此。在静海都镇成为静海制置院之后，由于理顺了静海与其境域内诸镇之间的关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在政治局面稳定或相对稳定下取得显著的进步。

姚氏家族先人是浙江西道节度使治下苏州刺史の镇将，唐末引兵，从江南“姑苏”迁来北渡至胡逗洲、东洲一带。1971年，在南通市唐闸十八里河口，亦即五代时静海地域内的永兴场运盐河东出土的《唐吴兴姚公夫人东海徐氏墓铭》^[2]（下称《徐夫人墓志》），追述了“吴兴姚公”的家世及业绩，反映了姚氏家族对静海、东洲一带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 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2] 《南通市志》（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1页。



……其先，始祖于姑苏，蝉联位望，为代所称。其后，枝分派引，从宦过江，佐唐吴二朝，历官四世。镇东陲江海之奥府，静边鄙，安民庶，务耕桑。复竭家财，贍义勇将士一千人。设官吏，烈将校，上佐国家，已安边地。司煮海积盐，嵯嵯山岳，专漕运，副上供。此公家世之绩业也……

从墓志铭文中可以看出，姚氏先祖为开发静海而发展农业、盐业生产，建立军队，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静海也因其经济发展，成为江口北岸的一个“都镇”，对丰乐镇、崇明镇、大安镇和狼山镇实施管辖，进一步巩固了其都镇的军事行政地位。

早在杨吴统治期间，江口沙洲一带得到开发。《輿地纪胜·通州》人物篇记有“蒋司徒”指导布洲居民经营盐业生产的事迹，这是五代静海、东洲经济开发的另一重要历史见证：

吴 蒋司徒 本吴郡人，吴大和中至布洲，教民经营煮海，盐利之获不赋而美。未几，籍其灶数而归于国。自是，风帆浪泊奔走赴集。民区吏廛日益繁夥。没后，民祠之。保大中，封通利公。

大和（929—934）是杨溥的年号。这条关于蒋司徒的记录，明确指出了布洲开发盐业生产是在公元1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从蒋司徒“籍其灶数而归于国”起，布洲便成为吴政权管辖下的一个盐业生产基地，盐业生产便成为吴国经济的重要支柱。蒋司徒开发布洲盐业生产的史料与《徐夫人墓志》所载“司煮海积盐，嵯嵯山岳，专漕运，副上供”互为印证，是五代时期静海、东洲、布洲经济开发的历史见证。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唐末浙西节度使辖下的苏州刺史派其部属姚存、姚制等率兵进占胡逗洲及东洲一带的江口沙洲。这些沙洲，在五代时期曾先后为吴、南

唐政权控制，吴越也曾进占其中部分沙洲。从后梁开平二年（908）起，吴在原胡逗洲及其东边的沙洲上设有静海镇（号称都镇）及丰乐、崇明、大安、狼山等镇。943年，南唐在“静海都镇”的基础上设立静海制置院。

2. 通州的建立

（1）由南唐静海都镇制置院演变为后周通州

通州建立于后周显德五年（958）。对于这个时间，现存明代及其以后的地方志所记基本相同，但正史中却没有载录明确的时间。史料反映，通州建州，以静海都镇制置院为基础，经历静海军阶段。《新五代史·职方考》记载：

通州 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而治静海。

《新五代史》的《职方考》相当于一般正史的地理志，在说明由南唐静海演变为后周通州时并未明确各次升格的时间。而与其同时的一些史料，在涉及静海的记述中，对静海使用了不同名称：静海、静海都镇、静海制置院、静海军、通州。《资治通鉴·后周纪三》说，后周军于显德三年（956）二月占领扬州、泰州后，迫使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兵民万人奔吴越。此后，扬、泰二州几经易手。及至显德五年正月，后周军又进攻淮南，以战舰百艘自淮河进入长江，“壬辰，拔静海军，始通吴越之路”。三月，后周军攻取东布洲。南唐主为保江南，献淮南庐、舒、蕲、黄四州地，请求周世宗准予划江而治，后周于是尽得长江以北的土地。四月，后周撤兵。^[1]这些史料容易让后世学人对本地区行政沿革史发生误解，有必要加以说明。

通州之所以为通州，与后周世宗新的战略目标吴越关

[1]《资治通鉴》卷294。



系密切。10世纪的扬州、泰州，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程度远较静海为高，因而扬、泰二州成为后周与南唐的争夺重点，但静海都镇是泰州以东的大镇，不但是当时盐业生产的主要集散基地，而且从军事角度看，必然与泰州形成犄角之势，得静海都镇及其所辖全境是控扼江口的关键，也是对泰州的强力支援，双方同样必有一争，毕竟得静海对双方实力消长干系甚大。因此，在显德三年二月，后周军夺扬、泰二州和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万人弃城而走吴越后，后周军进占静海便成为必然。

后周改南唐静海制置院为静海军当在显德三年二月后不久。史料只言扬、泰几经易手，反复争夺，静海都镇亦应如此。从显德三年二月后周占得南唐静海都镇来看，当年有足够的时间作出改其为静海军的决定。因为升格为静海军，侧重军事，是对反复争夺扬、泰二州而最后得之的强力支援。静海升军之后，有一度重新为南唐占据的可能，且后周不必改称。直到四年十二月，后周军把战线稳定地推进到长江北岸重新占领泰州时，静海仍然为南唐占领。这样，到显德五年正月，才会有“壬辰，拔静海军，始通吴越之路”的说法。

南唐自然不甘心失败。扬、泰二州几度易手，位于泰州东边的静海不会例外。南唐重新得到静海，大致也就是为了光复失地，复原自己的制度，就静海而言，当仍用静海制置院名称，不会采用静海军。上述后周显德五年正月的军事行动，陆游《南唐书》记为“交泰元年春正月……壬辰，周师陷静海军”。南唐交泰元年即后周显德五年（958）。陆游《南唐书》及《资治通鉴》称后周军“陷静海军”、“拔静海军”委实奇怪。对此，我们也只能理解为“再拔南唐静海制置院，复静海军”。

《资治通鉴·后周纪》对显德五年三月戊戌，处、秀二州刺史的军事行动记作：“吴越奏遣上直都指挥使、处州刺史

邵可迁、秀州刺史路彦铎以战舰四百艘、士卒万七千人屯通州南岸。”从《资治通鉴》的这条记录来看，显德五年三月，静海军已升格为通州。

《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于显德五年三月“壬午朔”到泰州，四月乙卯“自扬州北还”。其间，江北战事“悉平”，后周得南唐江北地十四州、六十县。从三月辛卯（初十日）周世宗派军队进攻东布洲，至甲午（十三日）慕容延钊报告大破唐军于东布洲，到戊戌（十七日）邵可迁、路彦铎屯兵“通州南岸”，前后不过八天时间。说从甲午到戊戌的几天时间里就决定建立通州，未免太仓促。不过，在三月壬午日周世宗到达泰州，亲临前线，视察新拓疆土，进而督战，促使周军甲午日占领东布洲，在四月乙卯世宗离开扬州北还前决定设立通州，同时又分地设静海、海门县划属通州，还是极有可能的。

（2）后周在静海军设立通州的原因

由静海军升格为通州，一般认为在后周显德五年（958）。明嘉靖《通州志》对此予以认定。通州之所以为通州，似应与江北全取，从此直通吴越，而将吴越视作下一个战略目标有关。

后周世宗于显德五年占有长江北岸之地后，视扬、泰二州为“通吴越之路”，于三月定静海撤军置州。这里“海绕东北，则通辽海诸夷；江绕西南，则通吴越川广；内有官河，则北通齐鲁燕冀”^[1]，因以“通”命名。这不仅表明下一个战略目标便是吴越，也反映了他长期觊觎吴越的心志。两年之久的对南唐用兵，也只使自己的疆土推进到长江之北。在这一过程中，兵员损耗与财力损耗巨大，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促进经济发展势在必行。不然，统一南唐和对吴越用兵必成泡影。远的

[1] 嘉靖《通州志》卷1。



说，即便周世宗眼前的“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兵民万人奔吴越”，吴越处、秀二州刺史“以战舰四百艘、士卒万七千人屯通州南岸”示威，也会让世宗感知吴越乃劲敌，不可小觑；更何况吴越之北还有一个伤未及死的南唐。

夺得南唐淮南江北之地的意义重大，因为这里是当年经济相当发达的区域，物产丰富，尤其盛产粮食与海盐。尽管如此，后周对新拓疆土的胜利果实必须加以消化，使南唐原有的民众后周化。通州的设立便是一例。

通州的设立既与其未来的战略目标有关，就必须大力经营，以长自己国力。为经营好泰东静海都镇境域，光是静海军的建制不够。“军”与军事有关，以消耗国力为主。在此建州开县，并不放弃其军事目标的转型而充分发展静海的经济社会，若没有州县及其以下的行政系统，光靠军的建制肯定不行。建州就隐含了着眼于未来夺取整个南唐境域乃至夺取吴越而积聚力量的目的。

3. 宋元时期通州的行政演变

宋代建立，通州属淮南路，州的等级为“中”。中州的户数要达到25 000户。太平兴国（976—984）年间，通州主客户仅分别为8 087户与2 700户，到元丰（1078—1085）年间，主户达28 692户，客户也增至3 247户。一百年间通州主户数骤增。崇宁（1102—1106）年间，通州有27 527户43 189人，户数较元丰年间有所下降。

通州于天圣元年（1023）改名崇州，明道二年（1033）复旧称。熙宁五年（1072），淮南路分成东西两路，通州属淮南东路。政和七年（1117）又称静海郡。元代通州属扬州路，至元十五年（1278）升通州为通州路，二十一年又恢复为通州，仍属扬州路。

对于宋代通州行政的沿革，通州地方志的说明比较简单。明嘉靖《通州志·沿革》称：“后周显德五年改为静海

军，寻改为通州……宋因之，属淮东路。仁宗天圣元年改为崇州，寻复其故。”清乾隆《通州志》也认为通州“宋属淮东路”。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沿革》说：“宋改崇州寻复为通州，隶淮南东路。”通州地方志关于通州归属关系的这些叙述并不完善。

天圣元年（1023），通州改为崇州是因为宋仁宗下令避皇太后之父刘通名讳的缘故。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病故，仁宗赵祯即帝位。赵祯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登基当年才13岁，由刘太后听政，“处分军国事”。十月，“诏中外避皇太后父讳”。^[1]刘太后父名通，通州只得改名了。为什么改为崇州？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3通州条认为“以州兼辖崇明镇，因名”，这仅是一种说法。但通州南边有五山，在一片平原上，五山高耸即为崇，也可能因此而取名崇州。

宋代通州有别称，如通川郡、崇川郡、静海郡等。通川郡是误记，源自宋晏殊《晏公类要》。对通川郡这一名称，王象之《舆地纪胜》有不同的观点。宋代夔州路的达州于唐代称通州，也称通川郡。后周把静海军改为通州后，就有了两个通州。一个归后蜀，一个在后周。乾德三年（965），宋平后蜀，因有两个通州，便改原后蜀的通州为达州。达州仍保留通川郡的名称。《晏公类要》错把达州的沿革混入通州沿革，而称通州为通川郡。王象之对此做了点评：

《类要》所引盖误指夔路通州沿革而归之淮东之通州耳。今达州尚名通川郡，而《类要》亦引通州为通川郡，皆误。今不取。^[2]

[1]《宋史》卷9。

[2]《舆地纪胜》卷41通州。



所以，王象之认为通州的别称“当遵政和制，书曰静海郡”。通州于天圣年改名崇州，于是通川也就改为崇川了。明道二年崇州恢复了通州原名，而崇川延续千年，今南通市有崇川区，缘出于此。

上引明清两部通州志对宋代通州的行政归属说法不一，嘉靖、乾隆州志说“属淮东路”，光绪州志说“隶淮南东路”。明《万历通州志》与嘉靖州志所说相同，该书沿革中说，通州宋时“改属淮东路”，又在“沿革表”中标明天圣元年为“淮南东路崇州”。《宋史·地理志》对于淮南路及淮南东路以及淮东路的名称有较为明确的时间界定：

淮南路。旧为一路，熙宁五年分为东、西两路。

东路。州十：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军二：高邮、涟水。县三十八。南渡后，州九：扬、楚、海、泰、泗、滁、淮安、真、通；军四：高邮、招信、淮安、清河，为淮东路。

这就是说，《宋史》以熙宁五年（1072）为界，之前有淮南路，熙宁五年起，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始有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的名称，而淮东路则是高宗南渡以后的路名。

《宋史》为元代人所撰，嘉靖、万历州志为明人所写。那么，宋人如何说明“淮南东路”？《舆地纪胜》的行政收录资料止于南宋宝庆三年（1226）六月以前，该书关于通州改崇州以及恢复旧称的时间均以《宋会要》为依据，属“淮南东路”的时间同《元丰九域志》。显然，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一致的。而作者把通州列在“淮南东路”之下，可见两宋时期的“淮南东路”是较为正式的名称。不过，《宋史》中多处使用“淮东”这一名称，如“淮东宣谕使”、“淮东提点刑狱司”、“淮东路沿海制置使”、“淮东安抚使”等，可能是受南宋淮东路名称的影响。《舆地纪胜》在叙述通州沿革时，也

用了“淮东”一词，所以《辞海》有“淮东路”为“淮南东路”简称之说。由《宋史·地理志》可知，淮南东路是在熙宁五年（1072）分淮南路产生的。那么，从宋建立时的960年起，到1072年也有一百多年，既然“淮东路”是“淮南东路”的简称，则明代地方志中通州于宋代属“淮东路”的说法就不准确。明嘉靖、万历及清乾隆《通州志》称通州在宋代“属淮东路”，忽略了宋熙宁五年之前通州属“淮南路”达一百多年之久的史实；清光绪州志把通州“隶淮南东路”紧接在“宋改崇州，寻复为通州”之后，显然把宋代分淮南路为东西两路的时间提前了近40年，以致产生了失误。

4. 通州的境域及几个县镇

宋代，南通范围内有一个州级及三个县级行政机构，即通州及其下辖县静海、海门以及时属泰州的如皋县。宋代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如皋县有两个乡，到元丰年间（1078—1085）有三个乡及白蒲一镇。宋代的海安是泰州海陵县管辖之下的一个镇。当年，在今南通范围内还设有利丰监及所辖盐场和海陵监的部分盐场。

（1）宋代通州的境域

宋初的通州有静海、海门两个县，静海县呈半岛状，海门县则为一群沙洲。通州南、西南临长江，东、东北两面为大海，西、西北与泰州如皋县接壤（图36）。

宋初太平兴国年间，通州“东西一百二十五里，南北六十五里”。宋《太平寰宇记》中保留的通州“四至八到”（图37），可以让我们了解当年通州境域的大体范围：

东至大海八十里。西至泰州三百五十里。南至狼山及大江一十五里。北至泰州如皋县界清水港五十里。东南至海，州下口海门县界六十里。西北至蒲堰南清水港如皋县界六十里。西北至石港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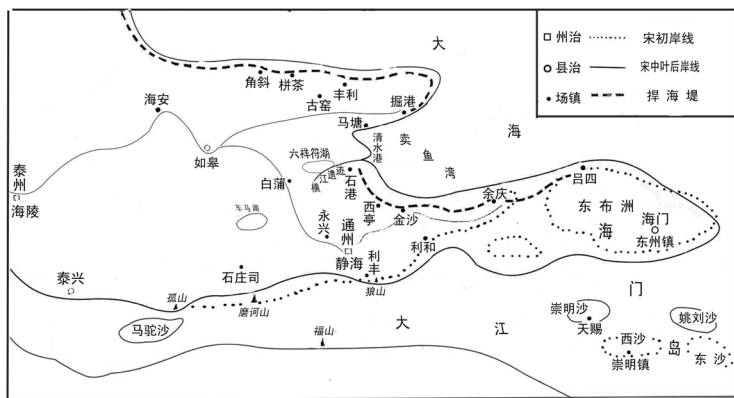


图36 宋代通州及如皋县场镇分布(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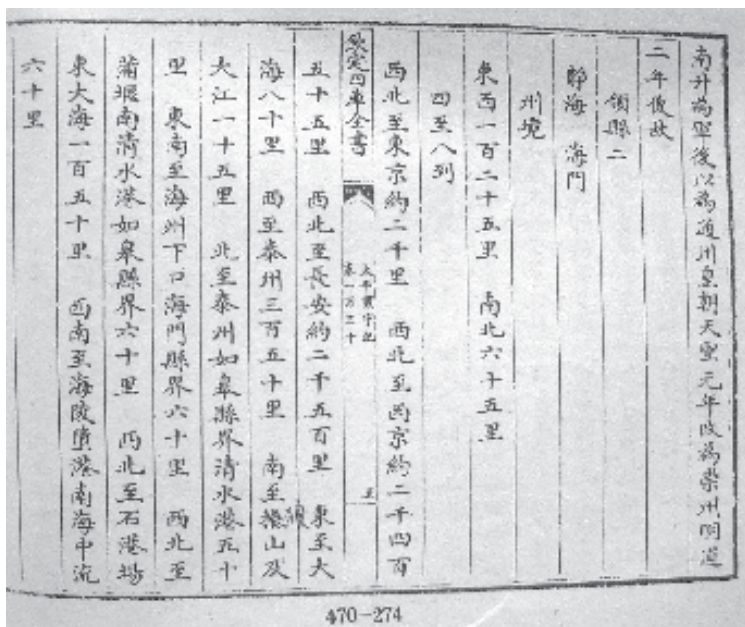


图37 宋初《太平寰宇记》通州四至

大海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海，陵〔陈〕堕港南海中流六十里。

通州“四至八到”中的“陵堕港”应为“陈堕港”，同卷通州利丰监“西至泰州界陈堕港四十五里”可证。《太平寰宇记》记载，通州“东至大海八十里”，“东南至海，州下口海门县界六十里”，唯独没有记“东北”方向的情况。实际上，通州东北也是大海，石港、西亭、金沙、余庆等盐场分布在东北沿海一带。这个“四至八到”指的是通州大陆的陆域范围。当年的海门县为沙洲，从通州东、东南至大海的距离看，海门县不在这个范围内。宋初的海门县在通州东南，隔海约二百余里，^[1]把这个数据考虑在内，通州东部的境域应当更为广大。相隔一个世纪，到了元丰（1078—1085）年间，通州“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里”^[2]，说明海门的沙洲与陆地连接后，通州的陆域已经向东南延伸了。

宋《太平寰宇记》指认通州北至“泰州如皋县界清水港五十里”，而《元丰九域志》也说通州“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这两个北界的数据相同，可见宋代通州北部界线没有多少变化。从通州“西北至蒲堰南清水港如皋县界六十里”的数据推测，清水港是一条较长的水道，这条水道极可能就是由州北的“古横江”^[3]演变而来的。

南宋文天祥于德祐二年（1276）从镇江北渡，经真州、扬州、通州，在卖鱼湾出海南返。他离开通州后，于闰三月十八日到石港，此后途经卖鱼湾、北海口，于二十一日到达泰州境宋家林，二十二日出海南下，以沿途所见，写下了一组诗文。卖鱼

[1]《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

[2]《元丰九域志》卷5通州。

[3]《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静海县：“古横江在州北，元（原）是海，天祐年间沙涨，今有小江东出大海。”



湾约在石港东15里，诗人《即事》诗序中描述了途经卖鱼湾的一景：涨潮了，出海归来的渔船随着潮水纷纷靠岸，在岸边等待买鱼的人们即向渔船走去，与捕鱼人谈论鱼价。在《出海》诗序中他写道：“二十一日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极目皆水，水外惟天，大哉观乎！”^[1]“卖鱼湾”既然可宿，说明文天祥在卖鱼湾的投宿地是一个濒临大海的小渔村。十八日，他还在通州境，二十二日从泰州宋家林出海，可以设想宋家林也是海湾边的一个小村。宋家林，在清嘉庆《如皋县志·水泉汇载》中记作宋家溇，位于掘港场东。从石港出发，三天的行程到达这里是可能的。当年通州北部的通、泰二州分界线应当在蒲堰南、石港向东到大海的一线上。这条分界线即是清水港，其东端为卖鱼湾。

(2) 静海县、海门县

后周显德五年（958）建立通州时，划海陵县东境设立静海、海门两县，归通州管辖，两县的等级为“望”。宋承唐制，县分赤、次赤、望、紧、上、中、中下七个等级，建隆四年（963）定人口4000户以上的为望县，以次递减一千户，不满千户的县为中下等，可见当年的静海、海门两县户数均达4000户以上。历宋元两代，通州只有两个属县，即静海县与海门县。

后周的静海县有狼山、蔡港、余庆、石港、西寨五个寨。北宋时有三个乡，元丰年间有“江口镇”。三个乡的名称失传，后周时的蔡港、西寨以及北宋的江口镇的确凿地点失考。宋初，海门县在通州东南，隔海二百余里，原有六个乡，元丰年间有三个乡及崇明一镇。

海门县是在长江口的沙洲上建立的。上引《舆地纪胜》通州沿革中提到，五代时姚彦洪任静海都镇遏使时，“改东

[1]《文山集》卷18《指南前录》，《四库全书》集部。

州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这四个镇中，除狼山镇外，均在静海以东的江海交汇处。这里的东州即东洲，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政权在江口的沙洲上设立丰乐、大安、崇明三镇，而这三个镇于后周设立海门县时均划入该县，同时，镇额都被废除。因而，《元丰九域志》所记海门县有三乡及崇明一镇，这个崇明镇应当有撤建的过程。《太平寰宇记》说，海门县“本东州镇”（一作东洲镇），因设通州升镇为县。东州镇应当在原来的东洲上，东州镇是否即原来的丰乐镇，没有史料说明。清光绪通州志静海乡条记“古大安镇即东洲”，应是误记。明万历《通州志·海门沿革》称，海门于后周设县时“置里本百有二十，亦称壮县”。从以上史料推断，海门县原是长江口的一个大县，在东布洲连陆以前，由长江口的沙洲组成。宋代海门县的境域，依据文献资料列表于下（见表11）。

表11 宋代海门县境域

时期	记载摘要	说明
初期	《太平寰宇记》：通州东南下口海门县界一百四十五里。《元丰九域志》：通州东二百十五里，三乡，崇明镇一。 据明嘉靖《海门县志》：东洲河在县东吕四场境。按：县在唐宋时属吴，为东州镇。河已淤浅，故道尚存。	县南包崇明，北达吕四。在宋初未连接大陆前，西境距通州一百四十五里。明嘉靖县图，旧界在吕四以西的曹严注。
中期	《舆地纪胜》：布洲夹在静海县南四十里，潮势如箭激。	县西境距通州四十里处。布洲夹原是通州、海门间的夹江。

(3)如皋县的重新设立

五代、宋、元时期，如皋县在行政上隶属泰州，宋时为中下县，有白蒲一镇。如皋县于南唐保大十年（952）重新设置。如皋重新设县前的沿革，史料中有不同的说法。《太平



寰宇记》卷130泰州条说：

如皋县……唐太和五年析海陵之五乡置如皋场，属扬州。伪唐保大十年升为县。

《舆地纪胜》与《太平寰宇记》略有不同。该书卷40泰州记载：

如皋县……《寰宇记》云，唐文宗太和五年析海陵之五乡置如皋镇。伪唐保大中升为县。

明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1，对如皋的沿革有新的说法：

如皋县……唐析海陵县置如皋镇，吴武义间分置如皋场，属扬州。南唐保大十年复升为县，隶泰州。宋、元因之。

万历《泰州志》如皋县的沿革与嘉靖《如皋县志》所记大体相同。上引资料中唐文宗“太和”年号于正史中为“大和”。以上三条资料，《舆地纪胜》所引《太平寰宇记》的资料与清版《太平寰宇记》对比，有唐大和五年（831）“置如皋镇”及“置如皋场”的差别。王象之所引《太平寰宇记》的版本应当早于清代《太平寰宇记》的版本，其可信度较高。嘉靖《如皋县志》之说，多了“吴武义间分置如皋场”的说法。武义（919—921）是五代十国吴政权杨隆演及杨溥的年号，前后仅三年。所谓“分置如皋场”，就是把镇、场的建制分立，使其各司其职能。如皋场专管盐业生产，如皋镇专司行政、治安等职能。五代十国杨吴政权为发展盐业生产，另在如皋东部沿海设立盐场也是必然的。明嘉靖《如皋县志》关于如皋县的沿革，特别是唐以后由镇升为县的说法，较为可信。这样，对如皋县在五代重新设县前的沿革可以这样表述：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分海陵东境五乡设如皋镇，五代

吴武义年间增设如皋场，南唐保大十年如皋镇升为县，隶属泰州。

(4) 利丰监

宋代通州为著名的盐产地，设有利丰监主其事。海门、崇明的盐产也归利丰监管辖。利丰监在通州城南，隶属通州，管辖八个盐场，即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口、金沙、余庆。利丰监有亭户1342户，盐丁1694人。^[1]监系国家为管理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而设立的专业管理机构，没有属县的监隶于府州，与县同级。

《读史方輿纪要》有利丰监在丰乐镇的说法。《太平寰宇记·通州》认为“利丰监，古之煎盐之所也，国朝升为监，在通州城南三里”。明万历《通州志·古迹》却说“利丰监（抄本作丰利监）宋太平兴国中移治于州西南”，要比《宋史》卷88中所记利丰监于“太平兴国八年移治于州西南四里”的说法模糊。而《宋会要辑稿·刑法》配隶条亦称此监为通州义丰监：“乾德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诏搜索殿前诸军亡赖者数十人悉黥面，配通州义丰监。”显然，宋初乾德（963—968）时通州就设有义丰监，地点可能就在丰乐镇，《读史方輿纪要》所记应有所据，后为避赵光义的“讳”改义丰监为利丰监。海门县境内的盐场均为此监的直管盐场，未记其名。太平兴国（976—984）中移监于通州城南“古煎盐之所”的利丰场，八年（983）又移监于州西南。《太平寰宇记》作利丰“国朝升为监”，原因在此。

利丰监的八个盐场中，西亭、永兴、石港、金沙、余庆五场的位置较为清楚。西亭、石港、金沙三场在今通州区（原南通县）范围内，余庆场在今海门市余东镇附近，永兴场在今南通市港闸区。八场中的“利口”场，应当是利和场。这个

[1]《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



利和场后为利和镇，在通州东南约40里，于明末清初没入江中。利丰、丰利两盐场的位置失考。从利丰监的名称分析，利丰场可能是利丰监的直管盐场，其位置可能在永兴场与利和场的中间，亦即在通州城城南一带，其时此场与狼五山之间尚有辽阔的海面。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民赋志·盐法》中，只记宋太平兴国年间利丰监“辖盐场七”，没有记这个盐场，是缺乏地史动态变化的反映。

八个盐场中的丰利场，不是位于如皋的丰利场，如皋的丰利场时属泰州海陵监。宋开宝七年（974），海陵监移驻如皋县，管“南四场，北四场”八个盐场，如皋丰利场为海陵监南四场之一。《宋会要辑稿》中有通州盐场名为“西亭丰利”，另有“丰利东西”盐场，“西亭丰利”中的“丰利”应当是利丰监中的“丰利场”。它的位置可能在西亭附近，偏西，因海水不能到达而把该盐场并入西亭；又因如皋的丰利场生存多年，其名称延续下来，而利丰监的这个“丰利”便自然消亡了。光绪通州志盐法所记宋太平兴国年间利丰监下辖盐场中，也没有记这个“丰利场”，而把吕四场记入七盐场之内。这是根据清代的境内盐场实际配置来理解史料的。

明清时期的通州及各县镇

明代至清初，通州属扬州府。清雍正二年（1724）升通州为直隶州，隶江苏布政使司，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隶江宁布政使司。明初，通州辖静海、海门二县。洪武二年（1369）废静海县，领有海门一县（图38）。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境因塌坍殆尽而被裁废。雍正二年通州升为直隶州，此时扬州府的泰兴县和泰州的如皋县划归通州，通州又领两个属县。

明代州县级别以税粮缴纳数量划定，县粮3万石以下的县为下县。从嘉靖《通州志》与嘉靖《如皋县志》所统计的税粮数看，从永乐到嘉靖，通州与如皋县夏秋税粮数均没有达到年均3万石以上，可知其等级都不高。清代州县级别则以位置冲要、事务繁简、税粮多寡、治理难易区分，以“冲繁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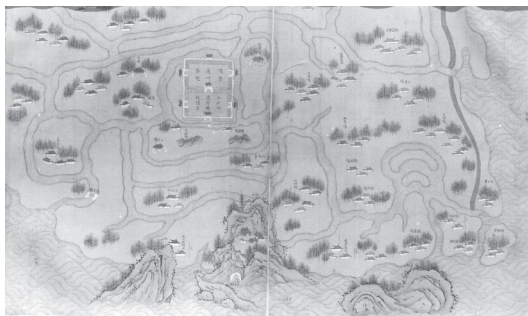


图38 明代通州图（南通博物院收藏）



难”定级。通州及如皋、泰兴都为“繁难”级。

1. 通州的境域

自元末海门县开始大规模坍塌以来，通州州境也开始缩小。明嘉靖年间，通州“广六十七里，袤七十里”^[1]。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被裁废并入通州后，这时的通州呈蝌蚪状：西部大，东西方向金沙到单店（今通州区平潮镇）约63里，南北方向狼山到石港约63里；东端狭小，金沙以东，东西方向自吕四到金沙南约100里，南北方向江岸、海岸之间最宽处约15里；从东部的吕四到西部的单店约163里。

海门县裁废并入通州后，通州直管狼山、石港二镇，有吕四、余东、余中、余西、西亭、金沙、石港等盐场。乾隆元年（1736）裁余中场，三十三年（1768）裁西亭场。清雍正二年（1724），如皋县与泰兴县划归通州。这时，通州的境域有所扩大，“广三百里，袤百三十里”^[2]（图39）。泰兴县有口岸、黄桥、印庄三巡检司。泰兴县现不属南通地区，不再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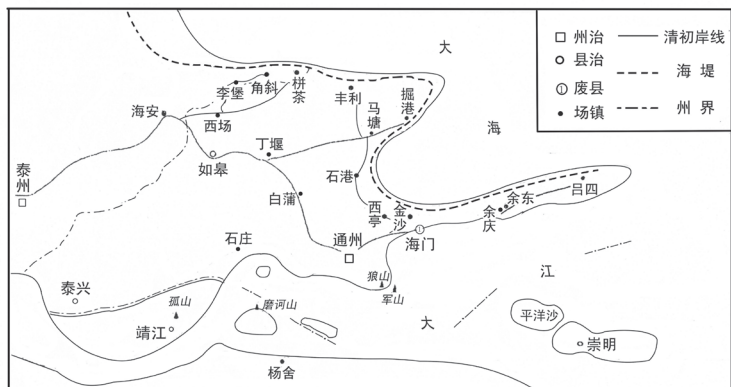


图39 清初通州境内县镇分布 (示意)

[1] 明嘉靖《通州志·如皋县志》卷1。

[2] 《清史稿》卷65《地理志五》。

2. 通州的县镇

明洪武二年(1369),静海并入通州,通州辖县为海门(图40)。当年,崇明改州为县,一度属通州,后划属苏州府太仓州。明嘉靖、万历年间,通州直管范围内有狼山、永兴、西成、文安、清幹、六场等六个乡,利和、余中、余庆、便仓、石港、白蒲等六个镇,金沙、西亭、余西、余中、余东、石港等六个盐场。海门县有礼安乡、人和乡、崇信乡,嘉会都、智正都及吕四一盐场。

明代,如皋县属泰州(图41),县境域广大,“广一百八十里,袤一百七十里”^[1],有江宁、安定、赤岸、沿海四乡,丁堰、白蒲、石庄、西场四镇,掘港、马塘、丰利三盐场也在境内。白蒲镇的归属较为奇特,南半边属通州,北半边属如皋。清雍正二年(1724),如皋县划归通州,县内有丁堰、掘港、丰利、白蒲四个镇,西场、石庄两个巡检司。如皋县境内原有丰利、马塘、掘港三个盐场,乾隆元年(1736)裁马塘场。乾隆三十二年(1767),划泰州东境设立东台县,角斜、栟茶二场在泰州东台县范围内。

海安镇及角斜(旧场)、栟茶两盐场于明代在泰州范围内。《读史方輿纪要》卷23泰州条下记载:

海安城 ……明初,徐达攻江北,驻军海安,寻进图泰州,使孙兴祖留镇于此……控扼要地也。今为海安镇,有土城周六里。《海防考》镇居如皋泰州之中,东可以控御狼山,通州海门之入,西可以捍卫扬州,因置巡司于此。

明嘉靖《如皋县志》卷6记载:

[1] 明嘉靖《如皋县志》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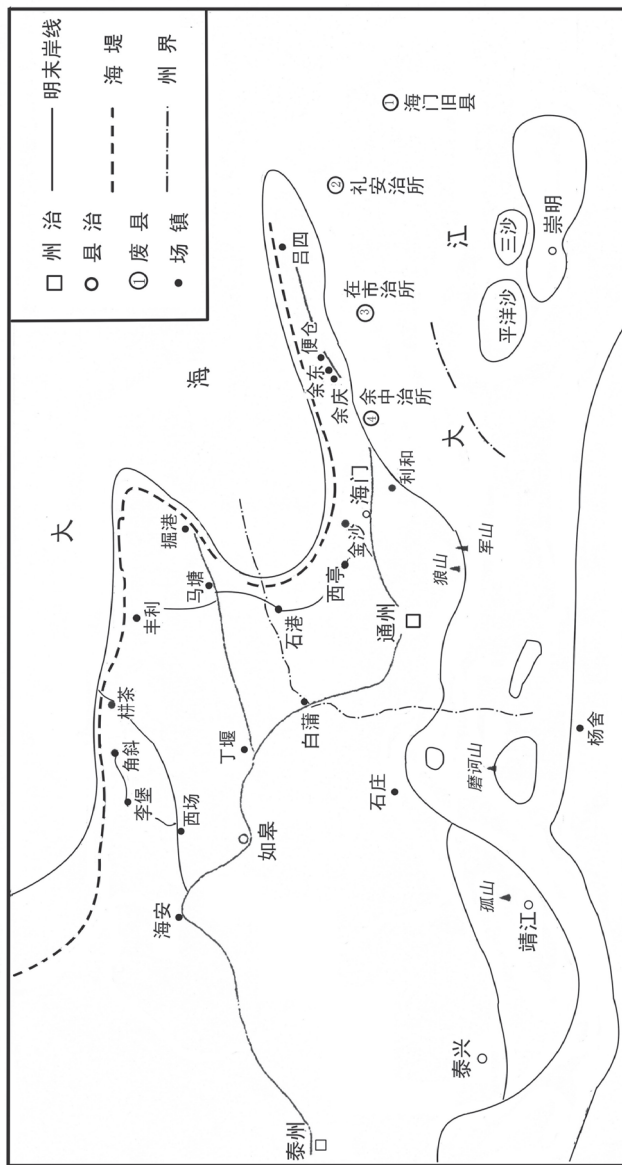


图40 明末通州及泰州东部县镇场分布(示意)



图41 明代如皋县图(南通博物院收藏)

乙巳年十月，左相国徐达、平章事常遇春合兵泰州，攻张士诚军，败之。遇春东筑海安镇以绝士诚如皋、通州粮道矣。

据《古海陵县志》引旧“府州志”（应为扬州府志及泰州志）的内容，《如皋县志》所记常遇春筑海安镇城控制通州、泰州间的交通，该镇城是一座“周三里三十步”的砖城，“后圯”。顾祖禹所记的六里土城，系嘉靖间为防御倭寇，巡抚唐顺之、海防刘景韶重建。明代的海安镇是通州到泰州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3. 通州与崇明县的领属关系

明嘉靖《通州志》说，后周时通州“兼管崇明县”。万历《通州志》在通州沿革表中列出的通州属县，自后周至元代均有三个，即静海、海门及崇明。万历州志的这种记载不全正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则认为，明洪武二年（1369）崇明县隶属通州，八年划属苏州府。这种说法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明史·地理志》所记基本相同。对于崇明县的沿革，顾祖禹认为：



崇明县……本海中沙洲。杨吴时谓之顾俊沙。

《五代史》杨溥改顾俊沙为崇明镇是也。宋嘉定十五年，改为天赐场，属海门县。元至元十四年，置崇明州，属扬州府……明洪武二年，降州为县。八年，改属苏州府。宏治十年，复改属太仓州。^[1]

《明史·地理志》太仓州条记载：

崇明，州东。元崇明州，属扬州路。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改属苏州府。弘治十年正月来属。

崇明州于明洪武二年（1369）降为县以后，崇明县的归属没有交代。崇明县于明洪武八年改属苏州府、弘治十年（1479）隶属太仓州的这段历史却是明确的。王世贞为万历《通州志》作序说：

明三百年来，盐豔之利衣食江南北……通故领邑二，曰海门，曰崇明。崇明越在海中央，以故而通失之，而改隶吾苏之太仓。而海门之隶通如故……

王世贞，苏州人，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京大理、太仆寺卿。他既为《通州志》作序，对通州的历史当有所了解。他说，通州原领有海门、崇明两县，当然是静海县裁废以后的事。他说的这段历史与洪武二年至八年（1369—1375）间崇明县属通州的史实相吻合。

明代两部通州志都把崇明县的设县时间提前到“后周”，这就混淆了后周崇明镇与后来崇明县的概念。五代后周只有崇明镇，没有崇明县，且此镇没有发展成后来的崇明县。《明史·地理志》所记，与顾祖禹对崇明县沿革的表述基本一致。

[1]《读史方輿纪要》卷24太仓州。

这说明清代学者认同顾祖禹对崇明县于明初隶属关系的记录，而对他关于顾俊沙与后来的天赐场的直接记述有所保留。清乾隆《通州志》作者也对崇明县与通州归属关系的问题做了考证：

今考《江南通志》，元以前未尝著崇明。《元史》崇明本通州海滨之沙。宋建炎间，有句容姚、刘姓者避兵沙上，呼姚刘沙。嘉定中始置天赐场，属通州海门县，隶淮东制置使。元至元间始改天赐场为崇明州，属扬州路。然则旧志所云领三县之说，非也。

清乾隆《通州志》认定崇明县发端于南宋“姚刘沙”，且否定了旧州志通州领三县的说法。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里的崇明县与五代顾俊沙上的崇明镇没有关系。

光绪州志在叙述明代通州沿革后，引用了《南畿志》的记述，且做了按语：

《南畿志》：通州明属扬州府，洪武初以静海县省入，领县二：海门、崇明。后改崇明属苏州府，领县一。按崇明宋嘉定中置天赐场，属通州海门县，元至元十四年升州，属扬州路。明洪武二年降为县，属通州。八年改属苏州府。

光绪州志对明初通州的属县采用了各家之说，把《南畿志》的内容加上了具体时间，使这段沿革更为明确。光绪州志认为，明洪武二年（1369）崇明降州为县以后，归属通州，八年划属苏州府。光绪州志的这种观点摒弃了现存明代两部《通州志》关于崇明县宋代属通州管辖的说法，且认为明洪武二年到八年期间，崇明县曾属通州管辖。应当说，光绪州志的作者对崇明县归属通州的问题是做了认真研究的。



4. 元明两代海门县及县治的迁移

自五代末海门设县以后，历宋、元两代，海门县由沙洲并接大陆后的陆域有近400年较为稳定的时期。元末至正到明嘉靖年间，海门因县城受海潮冲蚀而四次迁移县治，因而宋、明之际海门应有五个县址（图40）。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因辖地不断减少而废县，改为海门乡，并入通州。由于现存明清史料中对海门县在元、明两朝的迁县记载不一，造成海门县迁治有不同的说法。史料中，海门县治迁移的不同说法主要表现在迁县地点上，有“三迁”与“四迁”两种说法。现存史料中比较明确的海门县县治有四个，其中一个为五代设立的海门县县治，其位置在原东布洲上，称东州镇。另三个为迁县县治，一个在原海门县的礼安乡，另两个分别在通州境内的余中场及金沙场南。由于江海潮的冲蚀，这四个县治仅有史料记载，没有留下遗迹。

（1）史料中的五代末海门县治及三个迁县址

在历代通州地方志中，海门县治被多处提到。比较明确的有四个县治，即海门县东州镇、礼安乡，通州余中场、金沙场南。明嘉靖《通州志》海门县沿革指出了海门县最早的县治在东州镇，且于元至正年间做了第一次迁移：

海门县治本汉海陵县东境之东洲镇，自后周改静海军为通州，始以仁和等乡置海门县属焉。宋、元因之，至正间因江潮逼，乃迁礼安乡，后毁于兵燹。洪武元年，知县徐伯善重建，既而坍逼不已。正德甲戌，巡按御史江良贵、知州高鹏、知县王宣文卜迁于西□十里通州余中场地界，百务草创。未几，风潮倾圮。知县裴绍宗、王俊，县丞张瑞相继修葺，规制略备。

嘉靖《通州志》提出了海门县迁治礼安乡、通州余中场的时间与过程。明正德迁县治于通州余中场地界句，说明这次迁

县的时间为正德甲戌年，即正德九年（1514）。所提出西迁的距离因有缺字，不甚明了。用明崔桐嘉靖《海门县志》及明万历《通州志》的有关记录做比对，这个西迁的距离应为30里。嘉靖《海门县志》附有《海门新旧县总图》（图41），万历《通州志》也转录了这幅图。这幅总图的“新县”指的是位于余中场范围内的新海门县。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新县位于余中场本场的西南。嘉靖州志撰写于嘉靖九年（1530）。当时，海门迁县还没有发生。

海门县迁治金沙场在明万历《通州志》卷1中有所记载：

……至正中江逼，乃徙县礼安乡。会张士诚僭据浙西，遣伪将张佐丞守之，县治毁。国朝仍为海门县，领于通州，属扬州府，编里仅三十有七。嗣后，江日内蚀，正德九年迁余西场三十里余中场，北实通州境。是时，海门已无饶土。嘉靖十七年飓涛作，溺人万计，境日蹙。越五年甲辰，知县汪有执请损里为十有四，又西徙三十里曰金沙治焉……

万历《通州志》的这段记录是否完全准确，后将再作分析。不过，这段沿革中关于元至正中海门县治迁礼安乡、明正德年间迁通州余中场、嘉靖年间迁金沙场南的这段史实的记载为后人所继承。

《明史·地理志》通州海门县条也记有礼安乡和余中场、金沙场南三个县址，而迁县的时间与万历《通州志》所记不完全相同：

海门，州东。旧治礼安乡，圯于海。正德七年徙治余中场。嘉靖二十四年八月迁于金沙场以避水患。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不仅把海门县于元明时期的沿革记在静海乡条中，还引用了《明史·地理志》的有关条文，并对



通州沿革加了注。光绪州志赞同元至正年间迁治礼安乡、明正德七年(1512)迁治余中场,嘉靖二十四年(1545)迁治金沙场的观点。民国《南通县志·地理志》对这段历史作了概括性的记述:“故海门县,居州之东。元以江逼,徙礼安乡,明徙余中场,再徙金沙场,清省为海门乡。”可谓海门县迁县治的总结。

地方志中,崔桐嘉靖《海门县志》对于海门迁县的记载要比万历《通州志》写得清楚。嘉靖《海门县志》沿革中说:

至正中以江逼北徙礼安乡,会张士诚潜据浙西,遣伪将张左丞守之,县治毁于兵燹。国朝御寓,仍为海门县,领于通州,属扬州府,编里三十有七。嗣后,江日湫隘,正德九年复卜迁于西三十里余中场,之北实通州境,海门已无饶土矣。

比较明嘉靖《海门县志》与万历《通州志》的记录,可以发现:在明正德九年海门迁县的问题上,两志所说有较大的差异。嘉靖《海门县志》说“正德九年复卜迁于西三十里余中场,之北实通州境”,万历《通州志》则称“正德九年迁余西场三十里余中场,北实通州境”。在地点的概念上,万历州志比嘉靖县志多了一个“余西场”,这种改动是错误的。一则人们不能明白正德九年(1514)迁县地是在余西还是在余中,二则混淆了正德九年迁县前后两个县治的距离关系。这就给后人研究县治位置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海门县位于通州金沙场的治所在进鲜港和瞿灶港之间,这个治所在嘉靖《海门县志·四迁县治图》中标识得十分明确(图42)。这幅图在万历《通州志》中称为《海门新县》图。图示海门新县的东边为进鲜港,西为瞿灶港,北为金沙场,新县东南有利和镇。崔桐《海门迁县记》中对这个治所有明确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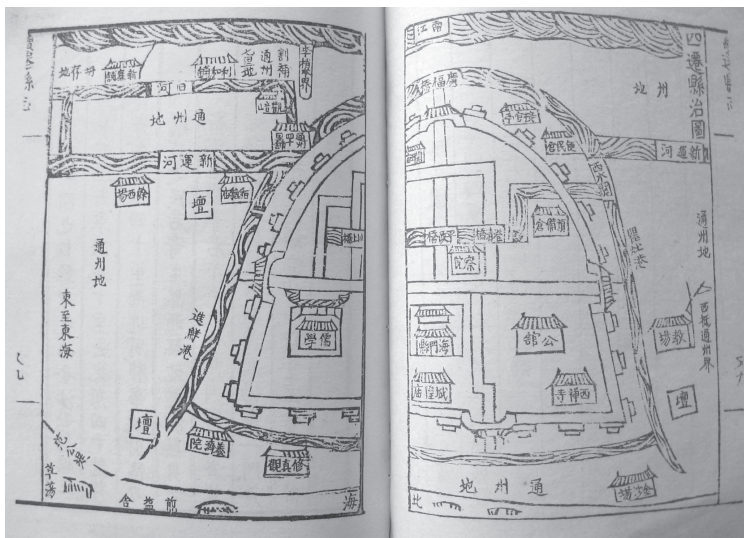


图42 海门四迁之县治（原载明万历《通州志》）

……至正中，以江患北徙礼安境，我国朝改隶惟扬，附诸通，损里为三十有七。正德中，江逾逼，西徙余中境。己亥，颶涛溺民，土日蹙。甲辰，汪令有执请损里为十有四。会入覲，复议改邑……议曰：通州之东四十里，海门之西三十里有土曰金沙，南襟漕河，北负阜埜。东有港焉，曰进鲜，厥流入河环其左；西有港焉，曰瞿灶，厥流入河环其右。左之南则利和雄镇……右之西则狼军五峰……若弼宅金沙一里可以永奠，益清干六里可以禪虚……^[1]

嘉靖《海门县志·四迁县治图》中还说明：

[1] 明万历《通州志》卷3公署。



此新县图也，自余中徙治金沙，去旧县二十五里，去东海九十里，去北海四十里有奇，去通州四十里。而近时移事改，财匮力竭，邑之民若寄生。然而无地之租，无身之庸与全盛等。若不与之休息，则寄生者其何以自存？且负江滨海，实惟扬等〔第〕一门户，故夙称“海门锁钥壮而后堂安”。司国计者，其有隐忧乎？

这个海门新县距通州40里，距旧县（余中治所）25里。从利和镇距通州50里、旧县距金沙30里的里程分析，海门新县位置在金沙东南，而非金沙本场。《读史方輿纪要》卷23对海门县城迁移的记述虽较为简要，但指出了海门古县城和礼安乡县城与通州间的距离。同时，还指出了海门县余中场治所、金沙场治所均在通州境内：

海门城 旧城在州东二百十五里。元末，以水患，徙治礼安乡，去州城百里。正德中，徙余中场；嘉靖二十四年，又徙金沙场，皆寄治州境。迨来复圯于海，盖非复旧壤矣……

从以上明清时期的史料看，海门县除始设县址外，还有三个迁县址是明确的。由于以上诸多史料关于海门迁县的三个地点都相同，所以产生了海门于元、明以来三次迁县的说法。可以认为，海门县于元、明之际迁县治于礼安乡、通州余中场和金沙场的三次得到普遍确认。为便于叙述，我们将这三个迁县的治所分别称为礼安治所、余中治所和金沙治所。

（2）海门县四次迁治的史料依据

在通州、海门县有关地方志以及其他资料中还有海门县四次迁移县治的零星记载。海门县治“四迁说”不似“三迁说”那么为史家重视，通州地方志沿革或正史地理志中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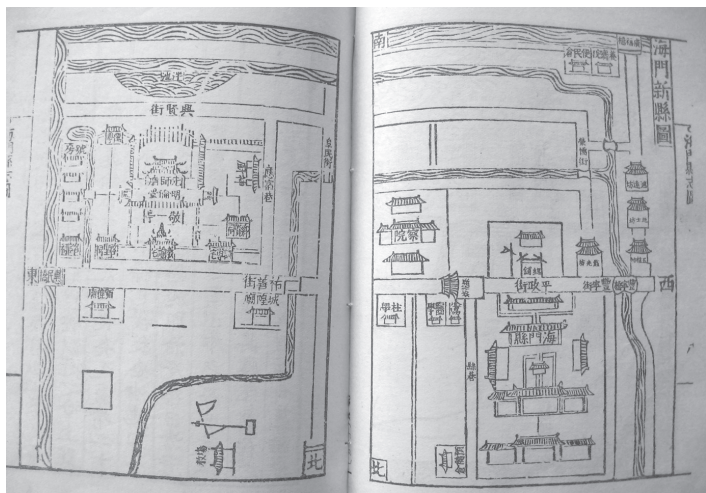


图43 明海门县余中治所（原载明万历《通州志》）

有集中载录。但是，这些片段的、零星的史料却为我们提供了海门县治曾经有四次迁徙的确凿信息。这些史料是我们正确认识古代海门县迁移问题的重要依据。

明嘉靖《海门县志》及万历《通州志》中均载有《海门新县图》（图43），这幅图实为海门迁县至金沙场南之前的县城图，即海门县余中治所图。《图说》记下了海门县迁往通州金沙场的原因：

嗟夫，此东洲先生所志旧县图也。江海交啮，月异而岁不同，逼则内徙以避之。分土既尽，借迁余中，至是凡三徙矣，迄嘉靖二十八年水泊城下，不得已复徙金沙地，即今县治也。故此为旧县，旋即沦没。桑田沧海，黥黎鱼鳖，赋税之逋，负土木之劳费，可胜道哉！先生志旧县已不甚其惨，悼桑梓之情。迄今患日益深，土日益削，民日益离，几不可支。使公犹及见之，



则其感怆又当何如？谨图四迁县治于左，以补其未备。

庶观风者于以考舆地而稽民艰。

这一《图说》明显不是崔桐所作。《图说》中称“分土既尽，借迁余中，至是凡三徙矣”，说明了海门余中治所是三迁县址。于是，该县志把位于金沙治所的海门县图称为《四迁县治图》，且置于新县图之后。把这幅四迁县图与万历通州志海门新县图比较基本相同，并且《四迁县治图》的《图说》与万历《通州志》《海门新县图·图说》也相同。换言之，海门县金沙治所应当是“四迁”县治。

上引海门《四迁县治图》（图42）可以说是位于金沙场南的海门县治为海门四迁县的写真证据。此外，还有两条史料依据：

其一，万历《通州志》卷6汪有执传说：

汪有执字某，南粤之东明县人也，以举人知海门县事……县故负海襟江，飓涛屡作，地善崩溃。自五代迄今日邑凡三徙。境土日蹙，民贫莫支，几不为县矣。有执乃上书迁县，请割通州七里属焉。建治金沙场……

汪有执于明嘉靖二十到二十三年（1541—1544）任海门知县，时年海门县治在余中场。从以上引文可知，海门县余中治所是三迁县址。

其二，万历《通州志·物土志》的小序称：

通之田本下，而赋乃上，是果人功修乎？抑有说也，额设既定其奈何？而监司守土之臣能因时损益，使上不亏国计，下不伤民命，善之善者也……而海门薄蚀江海，乃今四迁县治，旧额所存征科未减，守臣监司疏请亦数。圣人明见万里，幸下尺一之诏

以存弊邑，庶几鱼鳖之民不致釜中偷活尔……

万历《通州志》系万历五年（1577）本，其问世在海门迁县治于金沙场之后三十多年。《物土志》小序中所指“而海门薄蚀江海，乃今四迁县治”，实际上就是说海门县金沙治所即四迁县治。由此，海门金沙南治所为四迁县治得以确认。

南通博物苑收藏有明代《海门县图》复制品（图44）。其《图说》（参见图47）载：

海门为通州属县，其先则汉海陵县东境之东布洲。至周显德中始析通州之东偏为海门县。其县治薄蚀江海，迨国朝凡四徙犹岌岌焉。顾桑田半海，赤子盐鱼，而旧额何存，征科未减……议者欲废县并之通州，又欲徙其治至瓜洲镇。夫并则通州病，徙则江都轻……

《图说》中有“迨国朝凡四徙犹岌岌焉”句，也就是说，海门县治已经有四次迁移。这里的所谓“国朝”，即明朝。说海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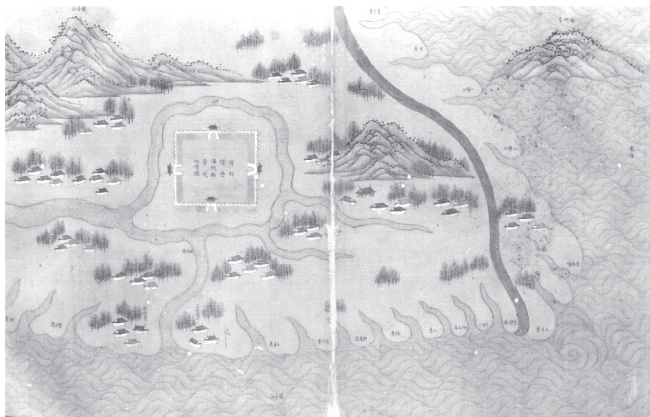


图44 明代海门县图（南通博物苑收藏）



县“凡四徙”，已经知道的元代末年海门县迁移到礼安乡，是为一次，于明代最多有三次迁徙。《图说》产生于海门县四次迁徙以后，是十分明确的，但这幅图却不是前此所述及的位于金沙治所的古海门县图。而海门县迁至金沙以后，直到明末，县治的位置也没有变动。因此，古县图中的《图说》应成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以后。可以肯定，在海门县礼安、余中、金沙治所以外还应当另有一个迁县治所。

清乾隆《通州志·古迹志》为海门乡条沿革作了按语：

“按海门县治以江潮啮蚀，民舍田庐四徙靡定，至楼禅修真之所多付波臣矣。或有徙而存者，依旧志仍列其名。”乾隆州志撰写之时，古代海门县已经并入通州，成为通州管辖之下的一个乡，即海门乡。古海门县的历史沿革由海门乡来继承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条按语中的“民舍田庐四徙靡定”，系指因海门县治四次迁移，而民户随县治搬迁的现象。

以上资料虽然没有把海门县的四次迁治系统地表达出来，但足以说明元、明之际海门县治曾四次迁移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上引通州地方志和正史等史料中只提到海门县礼安、余中、金沙三个迁县县址，那么，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清康熙《通州志·艺文志下》保存了明崇祯十六年（1643）海门成友谦的《濒江坍没已尽疏》。疏文明确提出海门县的四个迁县址：

……溯考洪永初志，海门县编户一百八十三里。缘海潮冲激，城郭崩坍。一迁于吕四场界地，再迁于余东场界地，三迁于余中场界地，止剩民户一十四里。于嘉靖二十四年，割借臣通州清干乡六里，金沙一里，合成二十一里，是以四迁县址……

疏文中的余中治所及金沙治所，在嘉靖《海门县志》及万历《通州志》的附图中均有载录；而“再迁于余东场界地”的

治所，各本地方志沿革中都没有提及。成友谦关于海门县迁治的四迁说与三迁说相比较，有三处不同。第一，县治一迁“在吕四场界地”，而不是礼安乡；第二，明确指出嘉靖年间的迁县为四迁县址；第三，多了一个位于“余东场界地”的迁县址。四迁说仅此一例，没有被正式认可。四迁说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弄清第二次迁县的地点及时间。

就迁县时间而言，迁治余中场的有明正德七年（1512）与九年两种说法，迁治金沙场南的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与二十八年两个时间。正德九年海门县迁治余中出于明崔桐《海门县志》，嘉靖二十四年迁治金沙场有万历《通州志》、海门成友谦《濒江坍没已尽疏》及《读史方輿纪要》采用，这些都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海门县迁治的史料，可以采信。至于正德七年，则是县城被飓风冲毁，上疏议迁的时间，《明史》和清光绪州志有所失察。嘉靖二十八年海门迁治于金沙场的说法是后人补记的，只能存疑。对于以上史料中海门迁县的说法，我们采用明正德九年迁治余中场与嘉靖二十四年迁治金沙场的说法。

历史上海门县治三迁说与四迁说交叉含混，其源出于明万历《通州志》。万历《通州志》沿革所记海门县虽与崔桐《海门县志》一样，有礼安乡、余中场、金沙场南三个迁县治所，然而，万历州志作者对崔桐关于海门县迁通州余中场的叙述没有正确理解，反而做了错误的记述。所谓“正德九年迁余西场三十里余中场，北实通州境”，没有崔桐记述的“正德九年复卜迁于西三十里余中场，之北实通州境”那么清楚，令人难以理解。这不仅违背了余西场从未作过海门县治驻地的史实，而且还导致人们忽略了海门县迁余中场前后两个县址的路程关系。如崔桐所记，有一个县址应位于余中场治所的东边30里。由于万历州志的错误，后来学者没有对海门县的迁移做进一步的研究，以致



三迁说在清代地方志中成为定论。通州《州乘一览》作者对海门县迁治采取客观的态度，在引述崔桐所记迁县过程并记三个迁县址的同时，还记下了成友谦关于县治四迁的说法。这种客观保留各种观点的方法，在没有做进一步研究的时候是可以借鉴的。

(3) 海门第二次迁县

要确认元、明之际海门四次迁县的真实性，还得论证成友谦所说的“再迁于余东场界地”的真实可靠性，即对海门县的第二次迁县址进行考定。在史料中，有许多州县场镇间的路程记录，这些里程虽没有现代那么准确，但分析这些记录可以提供海门第二次迁县的可靠历史信息。不仅如此，分析这些路程记录，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其他迁县治所的位置。

按三迁说推定，余中场应为二迁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崔桐说海门县“正德九年复卜迁于西三十里余中场”，这比“正德中迁余中场”的说法更具体。他明确指出了明正德九年迁县前后两个县址的位置关系，说明在余中治所以东30里处还有个迁县址。余中场距通州70里，其东30里为100里之数，这个距离与余东场距通州93里之数相近。^[1]可见，成友谦说海门“再迁于余东场界地”有一定的可信度。因此，可以提出假说，距通州100里的海门县城是二迁县治，应位于余东场附近。那么，作为一迁县治的礼安治所应在其东或东南方。

这个假说与《读史方輿纪要》的记载相悖。《读史方輿纪要》卷23说：“（海门县）旧城在州东二百十五里。元末以水患徙治礼安乡，去州城百里。”这里的旧城指后周始设县的治所，亦即北宋海门县城。它在州东215里之说，沿用了北宋《元丰九域志》的观点，这也与宋初记海门县与通州隔海

[1] 明万历《通州志》卷3场。

相距200里之数大体吻合，说礼安治所距州城百里则是第一次提出。按《读史方輿纪要》的提法，海门第一次迁县，县城距州从215里减少到100里，一次移动115里，这是不大可能的。与崔桐提供的数据比对，这个“州城百里”的治所应当是二迁县治，而不是一迁县礼安治所。

明万历《通州志》卷3中关于海门县邮递铺里程的记录，留下了海门县治所位置的明显痕迹。其中的“三迁铺”、“沈家铺”和“旧县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三迁铺在县东三十里……沈家铺在县东七十里，旧县铺在县东九十里”这些里程数据。明代万历年间的海门县已经迁移到通州金沙南了，距通州40里。把各邮递铺距海门县治的路程数与县州间的路程数相加可得：三迁铺距通州70里，沈家铺、旧县铺分别距通州110里、130里。旧县铺应当在“旧县”，但海门多次迁县，这个“旧县”是哪一个？从里程数据看，这个旧县铺距通州130里，与《读史方輿纪要》所记的“旧城”距通州100里之数不能吻合，显然不是同一地点。以各邮递铺到通州的路程为依据，分析有关史料，便可得出合理的结论来。

第一，海门县礼安治所与旧县铺地名有关，位于沈家铺之东。旧县铺得名于“旧县”，距通州130里，旧县也应距通州130里左右。这个数字既超过了《读史方輿纪要》中的百里之数，又与北宋故县距通州215里之数相差甚大。另外，沈家铺距州110里，显然它“在旧县西”^[1]，可见与旧县铺相关的旧县应在北宋故县与二迁治所之间，是位于礼安乡的一迁县，约距通州130里。

第二，三迁铺与余中场均距通州70里，三迁铺的得名应当与三迁县密切相关，余中治所是三迁县治。这个邮铺

[1] 明嘉靖《海门县志》集之三铺舍。



的里程与名称即成为三迁治所的一个有力的旁证。万历《通州志》汪有执传记：“（海门）县故负海襟，江颶涛屡作，地善崩溃，自五代迄今，邑凡三徙，境土日蹙，民贫莫支，几不为县矣。有执乃上疏迁县，请割通州七里属焉，建治金沙场……”汪有执，明嘉靖二十到二十三年（1541—1544）任海门知县，他的驻地应在余中。从他的传记中可以明确，在他上疏另建海门县治之前，该县已三次迁移。十分明显，金沙南治所应为第四次迁县址。

由于上述理由，有关“距通州100里的海门县城是二迁县治”的假说应当成立。那么，海门县二迁县址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否如成友谦提出的在“余东场地界”呢？并非如此。余东场于明代属于通州，依成友谦的说法，等于认定海门第二次迁县后，治所已移入通州境内。

元末，张士诚曾派张左丞驻守海门县——礼安治所，这个城后来毁于战火。明洪武元年（1368），海门知县徐伯善重建县城，这是对礼安治所的修复。隔23年，县城“圯于风潮”，由县丞李选重筑新城：

县治初与崇明比境，元至正中以江患北徙礼安乡，寻火于兵。国朝洪武元年，知县徐伯善重建，规制创备。二十有三年圯于风潮，县丞李选改新之……正德七年，颶涛溢作，溺民漂屋，官民之居荡然一墟。巡按御史江良贵行县叹曰，江势若此，而重迁是诞劝忧也。乃躬相善地，得余中场北境以为胚阜，遂谋迁也，疏其事……越三岁而底绩……^[1]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推想，礼安治所于元至正中到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存在约半个世纪。

[1] 明嘉靖《海门县志》集之三建置。

礼安治所被江潮冲毁后，李选重新筑城必定汲取旧城被毁的教训而远离江滨。显而易见，李选建筑的新城不会在原礼安治所。按几次迁县的方向来看，应是向北偏西的方向移位。古代一个县的人力及经济力有限，当政者不会不考虑到实际效果。这次迁县后历经120多年，到明正德年间才又一次西迁。很有可能李选新筑的城，就是第二个海门迁县址，西距余中场30里。

嘉靖《海门县志》所附海门迁治余中场后的《新旧县总图》（参见图20）中，有“海门县乡没江”的文字说明，其两边还有“在市没江”的条文。“在市”，是海门县迁治余中场之前的县治所在地，位于通州余东场南，应是海门二迁县址。嘉靖《海门县志》集之一乡村条记载：

在市四里，在旧县，没于江……礼安乡五里，在旧县南，没于江。崇信乡四里，在旧县西，没于江。陈坝庄二里，在旧县东，没于江……

首先应当说明，这里的“旧县”是指余中治所东边的二迁县治。其次应当注意，礼安乡在“旧县南”，而“在市”明确地说是在“旧县”。按县治由东南向西北迁移的规律可以推断，二迁县治所位于“在市”，“在市”位于礼安乡西北。

礼安乡是宋代海门县中一个范围较大的乡，“在市”是位于该乡西北的一个农村集市，即海门县治所在的市镇，其真正的名称失考，可以称为“海门市”，为避免与现今地名混淆姑且以“在市”为名。海门县第一、第二两次迁县的治所均在礼安乡境内，一个偏东南，一个偏西北。“在市”位于通州余东场南偏东的方位。《读史方輿纪要》所记海门县距通州百里之数，应是以此为基准的。此后，海门县治移驻通州余中场，因此，史料中有“借迁余中”的说法，而不提“借迁余东”。“在市”与通州余东场毗邻，成友谦产生了误解。也



正因为礼安乡境内有两个迁县故址，地坍无存，后人难以考定，便把两址合而为一，造成“三迁”、“四迁”说的混乱。

综上所述，海门县的第二次迁县应在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二迁县治在礼安乡西北部的“在市（海门县治市）”，距通州约100里，地当今海门市新河镇以东一带，故址不存。从元至正中到明嘉靖二十四年，海门县四迁其治。迁县后的治所先后驻在海门县的礼安乡、“在市”、通州余中场南、金沙场南。（图40）明万历《通州志》《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及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中记述海门三次迁县，均有所遗漏。

5. 海门直隶厅的设置

后周显德五年（958）设立的海门县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裁撤后，通州东部江城逼近州城。康熙中叶以后，通州东南江中陆续涨出许多沙洲。通州、崇明两地人民移往围垦，经常发生争沙纠纷。为解决纠纷，官府将这些新沙分划为通州、崇明两地，也有为两地共管的。然而，通、崇两地纠纷仍然时有发生。为此，崇明县增设半洋司巡检一名，通州增设州同一名，分别管理各自沙务。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新涨沙地日益增多、扩大，江苏巡抚明德上报朝廷，要求设立海门直隶厅，且裁撤苏州府海防同知，改设海门同知，专事管理通州、崇明两地新涨各沙的“刑名钱谷”事宜。为此，割通州的安庆、南安等19沙，崇明县的半洋、富民等11沙及续涨的天南等10沙设海门直隶厅，直属江苏省。海门厅治驻裙带沙，厅“广一百四十里，袤三十七里”。^[1]厅治东至海108里，西至通州界32里，南至圩角港18里，北至余西场六甲坝18里，东南至大有港50里，至新沙东界118里，东北至文庙公地115里，西南至南安沙大安港28里，西北至通

[1]《清史稿》卷65《地理志五》。

海界河25里。

设厅之初，厅境有40沙，后有坍涨，到光绪年间有43沙。沙上因垦民日增，形成居民聚落。部分沙上的镇市见表12。

表12 海门直隶厅沙洲及市镇分布

沙 名	镇 市 名
裙带沙	茅家镇 通源镇 大兴镇 三和镇 坝头镇 连元镇 朝阳镇
复兴沙	横沙镇 圩角镇 木棚镇 宋季镇 史家镇 浒通镇
大洪沙	黄狼镇
安庆沙	津桥镇
南安沙	大成镇 大安镇
川港西沙	天星镇
西天补沙	搭连镇 湾头镇 天补镇 汇通镇 三星镇 新镇
富民沙	富民镇 中兴镇 倪家镇 下浒通镇 汤家镇 太兴镇
日盛沙	大桥镇 大脚镇
永阜沙	协隆镇 长圈镇
半洋沙	兴隆镇 虹桥镇 崇海镇 灵甸镇
利民沙	普济镇
东天补沙	张家镇 汇安镇 常乐镇 长兴镇 大洪镇 二匡镇 常来镇 长春镇
东小沙	麒麟镇
新小沙	师子镇
天南沙	凤凰桥镇 头匡镇 六匡镇 十匡镇 十二匡镇 悦来镇 三阳镇 汲滨镇
小年沙	下三和镇
三角沙	义兴镇
丁角沙	江家镇
藤盘沙	闸头镇 池棚镇 骑岸镇 三兴镇 南星镇



续表

沙 名	镇 市 名
吕寿沙	拳头镇 脚跟镇 巴掌镇
满洋沙	聚星镇 和合镇 蟠龙镇
小安沙	竖河镇 二溁镇 曾家镇 老虎镇 中央镇 富安镇 悦兴镇 东昌镇 杨家桥镇
小荫沙	富兴镇（俗名老虎尾巴）
小塘沙	新阳镇 叙阳镇
鲈鱼沙	挂刀镇
馒头沙	汇阳镇

南通市历史地理 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南通市历史地理研究中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本部分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姚存制”以及北宋“通州海门岛”的问题作专题说明。“姚存制”是否为一个人的姓名，历来就有争议。清代通州地方志认为“姚存制”是为一人，五代时期遗留下来的南通狼山天祚姚存石刻和姚锷墓志则提供了与此不同的史实依据，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石刻资料。宋代史料中提出了“通州海门岛”的概念，且指出了它的地域范围及作用，其后在明清史料中也载录了“海门岛”，以致造成了古今学者们对此问题认识上的混乱。本书以历史文字资料为依据，对与以上问题相关的史料进行疏理、分析，对“姚存制”为一人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观点，对宋、明、清时期的“通州海门岛”史料进行判别，认定了“通州海门岛”出现的时期、范围及其归宿。



五代姚氏集团的姚存和姚制

唐末五代，军阀割据。当时，统治南通的是姚氏集团。这个姚氏集团留下的历史记载较少，南通博物苑收藏的《唐吴兴姚公夫人东海徐氏墓铭》与《唐故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下称《姚锷墓志》）保留了有关姚氏家族的文字资料。然而，对于这个集团在南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尚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在对姚氏集团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集团中早期的首领为“姚存制”。从狼山天祚石刻及《姚锷墓志》等资料看，这个认识值得商榷。其实，“姚存制”是两个人，即姚存和姚制。

1. 历史物证

与姚存、姚制相关的历史遗存有五代狼山天祚石刻、《姚锷墓志》，通州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录。天祚石刻与《姚锷墓志》既是实物，又是可贵的文字史料，是不可多得的五代时姚存和姚制存在的力证。

(1) 天祚石刻

南通狼山风景区狼山北麓有一个称为题名坡的景点，其中有五代时统治静海、东洲的姚氏集团首领前往西都朝覲齐王徐知诰（后更名为徐诰），途经狼山时留下的石刻。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石刻字迹依然可以分辨（图45）：

天祚□□□□十四日东□□海都镇遏使姚存
上西都朝覲回到此。



图45 天祚石刻（《南通县金石志》拓片）

管劲丞先生对此做过考证，填补了多数空缺，认定这个题名应为：

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
上西都朝覲回到此。

这个题名通常称为“天祚石刻”。

吴天祚三年（937）二月，吴廷权臣徐知诰接受吴主封号为齐王，其王府形制犹如帝制。而王府所在的西都，是与作为吴国国都的东都扬州相对而言的金陵。十月，徐诰逼杨溥退位，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唐，是为南唐，年号昇元。

姚存极有心机，在徐诰受封齐王后，即往西都朝覲，表示拥戴。这种朝覲极具有政治上的“站队”意味，其目的就是让齐王确认他自己在东洲、静海一带地位的合法性。就姚存希望尽快得到齐王政权认可的心理状态加以分析，他前往西都的时间应当不迟于当年三月。他借天祚石刻，既向社会公开宣称臣服齐王，又表明其“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的地位



已经得到齐王认可。从这些情况看，题名石刻的用字应是十分讲究和准确的。

其后，史家据此纪事，如清康熙《通州志·古迹》中记有“天祚岩五代时姚存舫舟处”，其所记当根据天祚石刻。这个石刻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五代十国的吴唐之际，担任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的是姚存。这充分表明，公元937年，姚存在世。

(2)《姚锷墓志》

20世纪90年代初，南通市区东郊出土了一方墓志，即《唐故静海指挥都知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冯翊姚公墓志》（此唐即南唐），称《姚锷墓志》。《姚锷墓志》证明了姚制为其曾祖：

公讳锷，字子明，享年二十有七，于乙巳岁仲冬月十五日遘疾奄终。曾祖讳制，东洲都镇使、检校户部尚书。祖讳珪，知西面兵马事、检校工部尚书。皇考讳裕，吴左军押衙，充静海指挥使，兼东洲静海镇遏使，检校吏部尚书……（公）年未及冠即掌戎……兼充都镇都虞候……^[1]

从墓志可知，墓主姚锷亡于“乙巳岁”，应为公元945年。墓志追叙先人的业绩、官号，必然根据史实，不可能乱写。可见，生前任东洲都镇使的姚制，绝不会是子虚乌有。

(3)《通川志》与《资治通鉴》的记录

南宋时孙昭先主修的《淮南通川志》亦称《通川志》，这部通州志中应有许多为后人不知的史料。不过，此书现已失传。在南宋《舆地纪胜》的通州卷中，有若干《通川志》内

[1]《南通市志》（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1-2582页。

容节录，其中就有关于姚氏“存”与“制”的内容。《舆地纪胜·通州·沿革》在对“南唐李氏于海陵县之东境置静海都镇制置院”一说作注时，引用了《通川志》和《资治通鉴》的资料，现摘引于下：

《通川志》云：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制卒，子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始筑城，钱镠遣水军攻破之，虏廷珪。而吴又命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改东州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至南唐李璟嗣位，始补静海制置使。

《通鉴》：显德三年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帅兵民万人奔吴越之地。

天祚石刻与《姚锬墓志》于五代就存在，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特别是《姚锬墓志》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通川志》“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之说，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川志》的著作年代迟于天祚石刻、《姚锬墓志》约260年。有关文字的依据，除天祚石刻外尚有其他来源，有可能包括家族传说与民间传说，其细节部分失实在所难免。志书作者根据这些资料加工，也只能做到基本正确。从天祚石刻与《姚锬墓志》可知，姚存的官职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统辖东洲与静海；姚制官至“东洲都镇使”，只管辖东洲。作为一方军政大权的最高首领，对齐王负责的是姚存，并非姚制。《通川志》录姚制官号东洲镇遏使，与墓志记作“东洲都镇使”小异。对姚存的官号未加提及，这可能是《通川志》作者的失误，于是导致后人对姚氏集团首领的姓名、官职发生误解。



2.清代通州地方志“姚存制”的记录

清代通州地方志的作者们对于五代时的这段历史有与《通川志》不同的写法。目前，我们尚无法找到清代州志作者们这种写法的史料依据。《通川志》中的片言只语对姚氏“存、制”的身份关系没有交代清楚，而清代通州地方志的作者则根据自己的见解，对《通川志》的这段文字做了修改与加工，致使本来比较含糊的说法变得“明确”起来。“姚存制”的名字由此而产生，以致成为公案。从有关史料的对比研究中可以发现，“姚存制”之称的产生，实源于清代通州地方志作者的失误。

清康熙、光绪朝修通州志的作者们对《通川志》的记载做了修改。康熙《通州志·遗事》中说：

唐末吴姚存制割据海陵东二洲，子庭珪始筑城。钱王镠擒庭珪。吴又使庭珪犹子彦洪居之。其后彦洪受困，聚族自焚。以金宝投使院井中，风雨则有光烛天，咸谓宝气云。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军政志·历代兵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昭宣帝天祐四年（梁太祖开平元年），吴姚存制据海陵东二洲，其子庭珪城而居之。吴越王钱镠擒珪以归。（珪被擒，吴使珪犹子彦洪复据洲上。洪益受困，聚族自焚。以金宝投使院井中，风雨则有光烛天。）

清代两部州志的作者，依据其掌握的史料与传说，把《通川志》的这段史料重新改写。与《通川志》所记对比，康熙志的作者冠“存制”以姚姓，删去了两个官号及“制卒”等字，并把句子做了调整。与康熙州志相比，光绪志要详细

些，其作者不仅考出了姚氏割据的具体时间，而且加了一个“其”字，肯定了“存制”和“庭珪”的父子关系。所以，通常的一种观点便认为“存制”就是“制”。

说“存制”就是“姚制”的，见于《舆地纪胜·校勘记》。文选楼影宋钞本《舆地纪胜》在未刊前已由张鉴做了校勘。《舆地纪胜》付梓前又由刘文淇、毓崧父子纂辑《舆地纪胜·校勘记》，校勘记序说：“于张氏之说采录无遗。其是者，则加引申；其非者，则加驳正；其有疑者，则为之剖析；其未详者，则为之证明；其论之不定者，则参考以折衷；其说之互歧者，则援据以决断。”对通州沿革部分中的“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制卒，子庭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句，《校勘记》根据上下文认定，“存制”为“姚制”之误。校勘者是这么推理的：“……彦洪姓姚，则制及廷珪姓姚，可知‘存’字乃‘姚’字之误。”校勘者未必见到过狼山天祚石刻，这个校勘也许是“姚存制一人”论者所难以接受的。因为姚制一死，那个姚存是断然去不了西都朝觐齐王的。

《舆地纪胜》的这个校勘，反证了“存制居之”是《通川志》的原文。文选楼影印本好就好在对原文没有随意改动，而另外刊印了校勘本。这是尊重客观史实的文风。关于《通川志》中的人名，这条校勘是否正确，可以用历史实物遗存狼山天祚岩姚存题名石刻和五代姚鶚的墓志验证。

光绪州志的资料提供了五个信息：第一，天祐四年（907）姚存制占领了海陵东边的两个沙洲。第二，姚廷珪在沙洲上筑城驻守。第三，姚廷珪被吴越王钱鏐的军队俘虏。第四，姚廷珪的侄儿姚彦洪继续控制沙洲。第五，姚彦洪兵败自焚。《资治通鉴》说姚彦洪投奔了吴越，等于否定了光绪州志姚彦洪“兵败自焚”的说法。这表明光绪志的有关记述还有可商榷之处。清代学者这么一改写，《通川志》中的人物“制”及政权南唐，在康熙、光绪两部州志中都被删除。



三部通州志中相关资料各条的第一句话，极易引导人们误认“存”、“制”为“存制”。试比较以下资料（不加标点）：

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
遏使

（南宋《通川志》）

唐末吴姚存制割据海陵东二洲子庭珪始筑城

（清康熙《通州志》）

昭宣帝天祐四年（梁太祖开平元年）吴姚存制
据海陵东二洲其子庭珪城而居之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历代兵略》）

古代本来就没有标点符号，断句不同则会产生多种理解。清代州志的作者并没有认真梳理他们所能掌握的历史资料，更没有结合天祚石刻进行认真的分析，又囿于《姚鶚墓志》尚未出土，产生某些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存制”前加了姓氏“姚”，以致出现了“姚存制”其人。由于清代州志中“姚存制”的出现，《通川志》中的“存制”当然也就被理解成一个人了。清代通州地方志的观点影响了今人对五代南通姚氏集团早期首领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南通市志》。《南通市志·大事记》“五代十国，吴初”条说：

吴姚存制据海陵东二洲（胡逗洲和东洲），设东洲静海都镇，由其子姚廷珪镇守，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城而居之”。时有丰乐镇、崇明镇、大安镇、狼山镇。

《南通市志》继承了清代州志的说法，情有可原。附带提及，与上引《通川志》的资料对比，市志中的这则条目尚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东洲静海都镇遏使”是姚存

的官职，他应掌握东洲和静海的军政大权，驻所位于静海，史料未见“东洲静海都镇”。第二，姚廷珪是东洲静海军使，而不是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唐代，在都督府下设军、城、镇、守，其长官均称使，掌管军队。五代初沿用唐代的设置，东洲静海军使是统领东洲与静海两地的军事统领，镇将而已。第三，丰乐等四个镇是在姚彦洪时期，而不是姚廷珪时期设立的，设立四镇时，姚廷珪已经被吴越军队俘虏了。

有学者认为，“姚存”、“姚制”是为了避讳而省了字的。那么，对于“同一个人”，在狼山石刻中省了“制”，在《姚锿墓志》中却省了“存”，时间仅隔了八年，标准就不那么统一了？做石刻的人要省“制”避讳，而做墓志的人却要省“存”避讳，这种说法实难成立。《姚锿墓志》中对“制”、“珪”都用了缺笔避讳，而对“裕”、“锿”却没有缺笔。其实，孙绍先写《通川志》，完全没有必要避姚氏的名讳，既然先写了“存制”，接着写“制卒”，就不必避“存”而留“制”。避讳的观点值得商榷。

3. 姚存、姚制与钱鏐生命存续期的分析

宋、清两代三种通州志的文字资料，就姚氏“存、制”的人名问题而言，其说各有所异，出现了“姚存制”的名字，这就得对之进行校勘。一般说来，同样内容的史料，要看时代最早的记载，并且力求搜集其他资料加以考证。所以，《通川志》所记要比清代地方志所记相对可靠；天祚题名与《姚锿墓志》是对《通川志》人名校勘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证。以上所引资料中有三个关键人物，即姚存、姚制与吴越钱鏐。“姚存制是姚存和姚制”这个命题研究的突破点，在于姚存、姚制与吴越王钱鏐三人生命存续的时间上。这三个人的卒年先后顺序应为：姚制、钱鏐、姚存。总之，五代十国的吴唐之际，姚存与姚制各有其人。

(1) 姚制先于钱鏐亡故



现存史料中，与南通一带关系密切的史料并不多见。而在这些史料中，三人的卒年，除钱镠外，无明确记载，但与他们相关的几个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这一关键问题却是十分清楚的。因而，可据此对三人的卒年先后作出推定。康熙、光绪通州志的两则资料中，除“吴姚存制据海陵东二洲”为“天祐四年（梁开平元年）”外，其余事件的时间都不明确。结合《通川志》所记，可知重大事件的先后顺序。

姚制亡故以后，他的儿子姚廷珪担任了东洲、静海军事要职。而吴越执政者钱镠后来派军队进攻吴的东洲、静海，并俘虏了姚廷珪。这说明，姚制是在钱镠军队擒获姚廷珪之前亡故的。《资治通鉴》记载，钱镠于长兴三年三月病故，长兴三年即公元932年。姚存于天祚三年上西都朝觐，天祚三年是公元937年。显然，廷珪被俘时姚存还活着，而姚制却已亡故多年了。因此，从生存时间论，姚存是姚存，姚制是姚制，二者不能合一。下面作进一步分述。

姚制是军事统帅，他的死亡应与战争有关，可能发生在五代梁时。五代梁时，吴与吴越之间有这么几次重大战事。《资治通鉴》卷267《后梁纪二》说：

开平二年八月……淮南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击吴越。九月围苏州，吴越将张仁保攻常州之东洲，拔之。淮南兵死者万余人，淮南以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帅柴再用等诸将救东洲。大破仁保于鱼荡，复取东洲。

开平二年即公元908年。此后，乾化三年（913）三月，吴出兵两万，进攻吴越。吴越则派水军进击吴的东洲，以牵制吴军的攻势。

再一次的重大战事发生在贞明五年（919）三月至七月。《资治通鉴·后梁纪五》说：

贞明五年三月……诏吴越王鏐大举讨淮南。鏐以节度副大使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夏四月……乙巳战于狼山江……传瓘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余级……

贞明五年八月，双方言和，“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1]。三次战事中，开平二年（908）的一次，淮南兵死者万余人，损失重大。姚制身为东洲都镇使，极有可能在这次战事中因战败而亡。

如果姚制是开平二年亡故的，则姚廷珪应于这年挑起了东洲、静海的军事防务重任。他被吴越俘虏，极可能是在贞明五年（919）的一次战争中。919年，吴越军队与吴军大战于狼山一带的江域，吴师战败，吴越军队“俘吴裨将七十人”。也许，姚廷珪就在其中。对此，《南通市志·大事记》做了肯定的记述。如是，姚彦洪则于919年始任静海都镇遏使。他任职的时间长于他的两位长辈。对于他的结局，有两种说法：按光绪州志《历代兵略》的说法，他是兵败被围困，自焚而终的；按《通鉴》的说法，是于后周显德三年（956）率部众投奔了吴越。

对姚制之死与姚廷珪被俘时间的推定，仅是凭几条文字作出的。史海浩瀚，也许有重要的文献尚未看到，一旦有新的发现，当然要据以研究、纠正误论。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对姚制卒年的推定，如果不是908年，那么最迟也不会迟于919年。这个时间的推定准确与否，对于弄清“姚存制”是否为一人问题并不是关键。这是因为，根据《通川志》资料分析，姚制亡故以后，他的儿子姚廷珪以东洲静海军使的身份接替他负责军务；姚廷珪被吴越军俘虏后，他的侄子姚彦洪接受

[1]《资治通鉴》卷270。



吴政权的任命，担任静海都镇遏使。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五代十国时的吴政权统治期间，而且俘虏姚廷珪的吴越军队是钱镠派遣的，可以说明这些故事还都是发生在钱镠执政期间。钱镠于932年病故，他执掌吴越政权到此中止。简言之，姚制亡故应先于钱镠。这是我们应当辨别清楚的。

(2) 姚存上西都朝觐时钱镠已病逝多年

了解了以上的史实，还要回到姚存“上西都朝觐”的事件上来。管劲丞先生说，天祚三年二月，吴主杨溥派使臣到西都封徐诰为齐王，姚氏得到消息后就上西都朝觐。这年十月，南唐代替了吴政权。天祚三年（937），钱镠已病逝5年，而姚制又是在钱镠之前就亡故的。那么，这年姚制当然是无法去西都朝觐的，也不可能在狼山题字。题名坡上的姚存石刻与姚制无涉。

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由于编著者本身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失误或多或少被保留在著作之中。这样，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背离关系。对于存在失误的史料，不经考证与鉴别是不能用作论据的。“姚存制”作为一个人的名字存在于清代通州志中，对于前代所记，有些史料就无法解释，与“存”“制”相关的一些史实也很难自圆其说。我们在对与姚存、姚制相关史料有了一定的认识后，还得对这些史料与史实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理解，以进一步检验我们对所研究的历史客体的认识是否正确。我们不妨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来做分析。

首先，姚存上西都朝觐，有狼山天祚题名石刻记之，应为之证，不能否定。也就是说，天祚三年（937）“姚存制”还活着。那么，如《通川志》所记，要在“制”死后，姚廷珪才能代替他负责东洲军务的话，那么，这至少要在937年之后。由此可以推定，钱镠派军队攻吴且俘虏姚廷珪也应在937年之后。《资治通鉴》告诉我们，钱镠已于932年去世，

那么,说他在937年以后派军队攻吴是违背历史的。

其次,既然认定天祚三年“姚存制”,亦即“制”还活着,那么上述“吴又命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云云,应当更在937年之后了。众所周知,天祚三年十月,吴政权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南唐政权上了台。那么“吴”政权怎么可能再去“命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呢?这个命令不是应由南唐政权来发布吗?这些,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姚存制”为一人,则上引“史料”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清代地方志的失误,使历史记载与史实之间出现了背离关系。由此推论,只有一种可能,上述史实才能成立,即“存制”为两个人:姚存和姚制。另外,姚存与姚制,各有其任职,姚存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狼山天祚题名记之。姚制的职务,从姚锿墓志铭看为东洲都镇使。可见,《通川志》说“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其中的这个职务是姚制的。

4. 结论

综合对上述资料的研究,从907年到937年,东洲、静海和吴越发生的一些大事,其先后顺序依次为:存、制控制东洲及静海;制卒,廷珪任东洲静海军使;廷珪被俘,彦洪任静海都镇遏使;钱鏐病故;姚存上西都朝觐。至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大事年表(表13),以便更为清楚地表明公元10世纪的前40年间与我们研究的人物相关的主要事件的先后顺序。

表13 907—937年姚氏集团大事简况

时间	人 物	国别	事 件
907年	姚存、姚制	吴	占据东洲、静海。存职务未详,制任东洲都镇使。
908年	姚制、姚廷珪	吴	吴越钱鏐派军攻占东洲。制卒。廷珪任东洲静海军使。



续表

时间	人 物	国别	事 件
919年	姚廷珪、姚彦洪	吴	吴越钱镠派军进攻东洲、静海，廷珪被俘。彦洪任静海都镇遏使。
932年	钱镠	吴越	病故。
937年	姚存	吴、南唐	上西都朝觐，确认东洲静海都镇遏使之职。

说明：表中的907年、908年、919年三个纪年为推定时间。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姚存制”是姚存和姚制。姚存任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制任东洲都镇使。从这种职务关系来看，姚存是东洲、静海一带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掌握静海、东洲两地的军政财大权。他驻在静海，统管并指挥东洲、静海的一切军政要务。《舆地纪胜》所引《通川志》节录对他的职务未作记述。天祚三年二月，吴主杨溥封徐诰为齐王。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姚存得到消息后即上西都朝觐，以示服从节制。姚制驻守东洲，接受姚存的指挥，掌管东洲行政及军事防务。东洲地处海口，用现代话来说，他是事实上的“前敌总指挥”，与姚存相比，其安全性较差。一有战事，他便首当其冲，殉职的可能性极大。从已知的姚氏家族成员来看，从姚存算起可排出四代人：第一代，姚存、姚制；第二代，姚廷珪；第三代，姚彦洪、姚裕；第四代，姚镠。

姚氏集团的姚存、姚制及其后辈多为五代时期的镇将。这些镇将或受州刺史派遣，或继承上辈职位，统治一地，尽管地位不如藩镇，但却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这些镇将凭藉军事力量，掌握一地的军政财大权，其权力往往超过州以下的县令。姚氏集团在静海、东洲一带的活动，正反映了当年的这种社会现象。

“通州海门岛”的史料研究

宋初,“通州海门岛”是南通成陆史中的自然实体,以群岛形式存在于通州东南部。11世纪中期,海门岛中的主岛之一东布洲与通州大陆连接,海门岛名称渐渐消失。自宋至清的历史资料对“通州海门岛”的记录有多种说法,现代学者也得出了几种不同的结论。本书对宋以来的史料进行分析,认定宋初“通州海门岛”是位于通州东南方海门县境内的古沙洲群;明代以后,通州地方志中的位于州东北的“海门岛”,与宋初海门岛无涉。

1. “通州海门岛”及其在南通成陆史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南通市地学会和南通市图书馆曾把“通州海门岛”的讨论文章汇编成册,但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其后30年来,对“通州海门岛”的研究出现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宋代初年,通州海门县仍是沙洲,“通州海门岛”即在宋初海门县的范围内,位于通州东南海中;^[1]第二种观点总体认为“通州海门岛”在通州东北海中。第二种观点又分三种说法:(1)宋代通州海门岛位于今如东县丰利东北海中。^2海门岛位于原石港以东的石港湾之中。^3今如东县环港一带即为“唐末宋初淤涨”直到明

[1] 陈昊、陈昊:《通州“海门岛”》,《南通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2] 姚谦:《通州海门岛探讨》,《海洋科学》1984年第3期。

[3] 宋建人:《通州海门岛初探》,《江苏社联通讯》1983年第13期。



代末年坍没的海门岛，宋朝犯死罪获贷者多数配隶此岛，并且认为崇明镇与东北洲是少数配隶犯人之处。^[1]

本书持第一种观点。五代后周与北宋初的海门县是由“通州海门岛”等沙洲组成的；配隶犯死罪获贷者的通州海门岛有两个主要沙岛：一为顾俊沙，二为东布洲。海门岛以群岛形式存在。公元11世纪中期，东布洲与通州大陆涨接，同时，顾俊沙又历经涨坍而发生了变化，海门岛的称呼渐渐被人们淡忘。宋代以来，有关南通的史料中关于海门岛的问题，有多种相左的记述，对于具有配隶犯死罪获贷者并令其煮盐的特定社会功能的自然实体“通州海门岛”，必然具有排他性。其诸多问题，应当在研究这些资料后，正确取舍，合理分析，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对“通州海门岛”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南通地区成陆的规律言，海门岛主岛之一的东布洲和通州陆岸的连接，是南通地区历史上继扶海洲、胡逗洲以后的又一次沙洲与大陆的并接。从研究南通地区经济史的角度言，海门岛的两个主岛均为海盐生产要地，盐业经济是南通经济的重要发端。进入21世纪，有关“通州海门岛”的文章多见诸南通地方媒体，说法各异。对“通州海门岛”的位置及其演变研究，不但关系到对南通市东南部的历史自然地理变化，亦即对长江北岸三角洲发育史的科学认识，而且涉及南通市及相关县（市）地方志书的正确编写。所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宋初“通州海门岛”的相关资料分析

“通州海门岛”作为历史自然实体，其面貌早已发生巨变，要从现代自然实体中去直接认识、发现比较困难，而在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与宋代相关的史料中，却保留了它

[1] 姚谦：《再探通州海门岛》，《南通今古》2006年第6期。

的部分历史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并不难发现它的某些踪迹。

(1) 宋代史料中的“通州海门岛”

现存历史典籍中，最早提出“通州海门岛”概念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资料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原作“沙”，据宋本、宋撮要本及《纪胜》卷41海门岛条改）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洲。两处悉官煮盐。是岁，始令配役者分（“分”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史》卷201《刑法志》补）隶盐亭役使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是南宋史学家。他熟悉宋代史料，对北宋实录、国史、官方文书等材料做过研究。在著作中，他不仅提出了“通州海门岛”的概念，而且指出了海门岛中的崇明镇和“东北洲”为发配犯人的地方。较早对“通州海门岛”及其中之一的“东北洲”得出考证结论的是《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

资料二：《文献通考》卷17刑考七：

太平兴国五年，诏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先是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布洲。两处悉官煮盐。是岁，始令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之，而沙门如故。

马端临，宋、元之际史学家。他著书态度十分严肃，穷二十多年精力，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完成巨著《文献通



考》。在《文献通考》自序中他写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则“研精覃思”，“窃注己意，附其后焉”。可见，马端临更注意对文献的甄择，并要从可靠的文献中得出恰当的结论。马端临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通州海门岛”为“通州海岛”，改《续资治通鉴长编》“东北洲”为“东布洲”，应当是他对史实研究的结果。继马氏之后，元代的《宋史》作者也根据具体情况，对宋初海门岛做了记述（见下引资料四）。三家所记，各有差异，这就是引起现在“通州海门岛”时间、位置多论的初始原因。

《宋史》中保留了宋代发配犯人至通州海门岛的史料。

资料三：《宋史·冯瓚传》卷270列传29：

初，太祖欲任用瓚，常与赵普言瓚有奇材。普忌之，乃遣诣蜀平寇，潜令所亲信从其行，密察其过，即亡入京师击登闻鼓，讼瓚及监军绫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楫受赇为奸事。急召归阙，亲问之，词理屡屈，乃属吏。既而普遣人至潼关，阅其囊装，得金带珍玩之物，皆封题将以赂刘整。整方在太宗幕府。瓚具伏。普言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乃削去名籍。瓚流登州沙门岛，美配隶通州海门岛，整免所居官。

其中，“瓚流登州沙门岛，美配隶通州海门岛”印证《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宋时犯死罪获贷者配隶沙门岛、海门岛的概况。资料二有《宋史·刑法志》支持。

资料四：《宋史》卷201《刑法志》：

……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

其中，“通州海岛”与《文献通考》一致，而“东州市”实位于《文献通考》所记之东布洲上。

比较上列资料一、二两则引文，除“海门岛”、“海岛”及“东北洲”、“东布洲”两处不同外，其余配隶人员的分类及经济开发项目并无二致。进一步研读资料一、资料二关于“通州海门岛”或“通州海岛”的说明可知：“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布洲。两处悉官煮盐”是对海门岛范围及其功能的进一步阐述。有论者认为，“海门岛”、“崇明镇”、“东北洲”（或“东布洲”）三岛均配隶犯死罪获贷者，而实际上，这些论者未能体会出海门岛与崇明镇、东北洲间的属种关系。于宋代，在通州范围内是否有海门岛、崇明镇、东北洲三处同时作为单独流放犯人之地？答案是否定的。如此分析，有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为依据（图46）。《舆地纪胜》卷41通州景物下：

东布洲 元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布机流至沙上，因名布洲。既成平陆，民户亦繁。

海门岛 长编云：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北洲。两处悉官煮盐。兴国五年，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之，而沙门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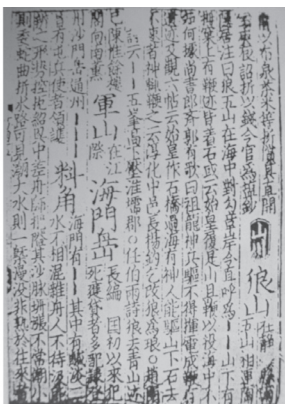


图46 《輿地纪胜》(左)、《方輿胜览》(右)海门岛资料

《輿地纪胜》中“海门岛”项下，直录《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可见王象之认为“通州海门岛”亦即“通州岛”，且包括崇明镇、东北洲。否则，王象之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书中列出“通州岛”项，并把崇明镇、东北洲列于其中。史地学界称《輿地纪胜》为南宋地理总志，具权威性。王象之与李焘是同时代人，他的解释一般应当贴近当时的情况。王象之的不足在于没能把“东北洲”和“东布洲”之间的关系理清，而把东北洲置于“海门岛”项下，将东布洲另立。然而，对于“东北洲”，马端临根据自己的考证，校正为“东布洲”。和《輿地纪胜》同时代的还有祝穆的《方輿胜览》，该书“通州”卷中关于海门岛的记载亦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与《輿地纪胜》不同的是，《方輿胜览》省略了“而通州岛中凡两处”以下各句，去掉了对海门岛中羁押犯人之地的进一步说明。这种省略，可能是因为南宋时原海门岛的主岛已发生了变化。两书相同的是，对海门岛的位置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客观地保留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海门岛的内容。

研究上列一、二、四三则资料,不难发现:这三则资料所述内容除地名表面看来有所不同外,其余基本一致。就资料一来说,从文意上看,“通州岛中凡两处”是对“通州海门岛”中流放犯人的岛屿数量或范围的进一步诠释。这条历史信息告诉我们,通州海门岛中流放犯人的处所有两个岛,一为“崇明镇”,一为“东北洲”。古代人的地理概念没有现代这么准确:崇明镇是建置镇,行政名称,怎能算是自然地理中的岛呢?可当年就是这样记的。《舆地纪胜》说,“吴改顾俊沙为崇明镇,周显德中废”。这就是说,吴在顾俊沙上设立了崇明镇,后来在周显德年间被裁撤了。所以,要把“崇明镇”说成是岛的话,就得用“顾俊沙”的概念了。古代地理学中还没有群岛的概念,而我们从“通州岛中凡两处”的表述,就可以知道,海门岛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海门群岛,它应由我们知道的东布洲、顾俊沙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称的沙洲组成,而配隶犯人的只是其中位于顾俊沙上的崇明镇以及东布洲两地。

上述三则资料的不同之处在于:资料一、资料三提出了“通州海门岛”的概念,而资料二、资料四只说“通州海岛”,并对通州岛中之一的东北洲分别改称东布洲、东州市。正因此,对于这些资料,我们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通州海门岛”与“通州海岛”究竟是否指同一自然实体?第二,东北洲与东布洲、东州市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其实,“通州海门岛”与“通州海岛”所指为同一自然实体,这是因为上引资料有共同之处。第一,资料记事的时间段相同,均记北宋“国初以来”,特别是太平兴国五年;第二,记事的主要内容相同,均指出通州岛中有两处分别羁押强弱两种犯人;第三,所记的管理体制相同,有屯兵使者领护,服刑者都得从事官盐生产。因此,上述三则资料所指向事物的同一性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东北洲、东布洲等不同的地名出现？是否能因此而认为东北洲与东布洲是两个不同的自然实体？否。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在南通的历史时期内，还没有一个称“东北洲”的沙岛，其社会功能、管理体制、经济开发状况均与东布洲完全相同。就是成书约迟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半个世纪的《舆地纪胜》中，除引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海门岛的记事外，也没有记下另外的“东北洲”项，反倒有“东布洲”项。

这就是说，在宋元之际的史料考证范围内，“东北洲”是为孤证。这是明、清史料中，学者们多依马端临《文献通考》用东布洲，而不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北洲”的原因。这表明明清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对“东北洲”持否定态度，而对“东布洲”持肯定态度。对于东布洲，我们可以在另一些史料中得到证明。

元代修《宋史》的作者把“东布洲”改成“东州市”，因为东布洲在元代已演变成长江北岸廖角嘴的一个部分，那里只有建置市镇东州市。其疏忽之处只是未对宋代东布洲与元代东州市的渊源关系做说明。尽管如此，他们的记录恰恰反映了东布洲这个自然实体的发展过程。当然，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个历史问题时，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去研究。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事物，是难以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的。

马端临及元代修《宋史》的作者把海门岛改为海岛并不奇怪（当然，并不排除掉字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作为海门岛主要岛屿之一的东布洲早已和大陆连接，再称“海门岛”，在他们看来是不合适的。于是，对同一地点，在历史范围内出现了三种称呼：东北洲、东布洲、东州市。东北洲，应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对东布洲的误称；东布洲在与大陆连接后，用位于其上的市镇东州市来命名，也是极自然的。

(2) 对东布洲的进一步认识

东布洲，在《旧五代史》中写作“东 沛洲”。一般认为，东布洲由东洲与布洲合并而成。由于东布洲及其前身之一的东洲的区位特殊性，这一带便成了军阀割据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下列几则资料很能说明问题。《通川志》说：

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制卒，子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始筑城，钱镠遣水军攻破之，虏廷珪。而吴又命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改东州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至南唐李璟嗣位，始补静海制置使。（转引自《舆地纪胜》卷41）

《旧五代史》卷一百十八（周）世宗纪第五：

显德五年……三月……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彦钊奏，大破贼军于东 沛州。

在《资治通鉴》中，对此战事有更明确的记述。后周显德五年三月：

辛卯，上如迎銮镇，屡至江口，遣水军击唐兵，破之。上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 沛洲，将趣海口扼苏、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将步骑，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将水军，循江而下。甲午，延钊奏大破唐兵于东 沛洲。

《宋史·慕容延钊传》中有一段与此雷同的记载。沛，《康熙字典》677页注：“《集韵》博故切，音布，地名。周世宗遣将破贼于东 沛洲。”《汉语大字典》1582页，“沛，去声”，注与《康熙字典》同。东沛洲就是东布洲，清代学者是



把东 沛洲和东布洲视作同一自然实体的，这在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对静海乡的叙述中有所反映。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1疆域志静海乡：

杨吴为东洲镇 扬州府旧志，海门县本汉海陵县东境，其地为东布洲。杨吴时为东洲镇。海门县旧志，古大安镇即东洲也，原为海屿沙岛，留有布机流挂其上，沙涨为陆，人民渐繁。又曰，东布洲。《通鉴》注东 沛洲在泰州东南大江中，元是海屿沙岛之地。宋白曰：东 沛洲，在泰州东南，通州海门县界。沛音布，州当作洲。《舆地记》通州有东南二布洲。

光绪州志的作者把宋海门县的历史让静海乡继承，有其一定的道理。而这段历史与上引《舆地纪胜》的记述内容并不矛盾。胡三省所注的内容应当与宋代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宋白对东 沛洲的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也许，胡三省引用了宋白的说明，进一步对东布洲的所在作出注释。可见，东 沛洲是东布洲最早的写法。

上引《舆地纪胜》资料，有令人不明之处，东布洲项下先引入东洲后又引入布洲的概念，用东洲和布洲解释东布洲，不合逻辑。因为东洲和布洲除了在东布洲项中出现外，在《舆地纪胜》通州古迹条中也有反映：吴“改东州为丰乐镇”，“改布洲为大安镇”，这两个镇都在后周显德年间废。

于是，东洲、布洲、东布洲看起来是三个不同名称的自然实体。如果用静止的观点去认识，便会得出这样的判断：王象之《舆地纪胜》关于“东布洲”的记载错了。

其实，东洲与布洲都是东布洲的前身，东布洲是东洲和布洲发生并洲现象后对新形成的一个大沙洲的称谓。王象之所以要把东洲与布洲同置于东布洲条下，正是要说明这个并洲现象，但没有解释清楚。在特定的江口条件下，距离较

近的小沙洲连为一体是不难发生的现象。这种现象从今海门、启东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到例证。这样看来，东布洲是成岛已久的沙洲，在宋初呈逐步扩展之势，相对稳定。

有论者认定的“唐末宋初淤涨而成”的如东环港一带的某“海门岛”，由于长江北支封闭，得不到江中泥沙及有机质的供应，必然逐渐被海水坍塌，其稳定性极差。并且，据持该论者所说，这个“海门岛”宋初才完成淤涨。我们认为，此岛即使有，因其受海拔高程所限，宋廷刑部不可能看中稳定性差的这个岛，用以配隶犯死罪获贷者从事盐业开发，而必然选定稳定性极佳的东布洲及崇明镇落实审判结果。

有宋一代，一经确定某处为犯死罪获贷者流放地，一般不会更改。在淮南盐产地之一的东布洲故地，了解百年前犯人管理情况相对容易。南宋，在国土丧失几半的情况下，一个既受刑部节制，又因产盐而受户部等部门关注之地，必然受史官重视。朝廷利益所倚，地方政府更不能等闲视之。须知：在南宋与金、元对峙的情况下，为了抗击金、元，需要财货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通州知州杨师亮坚持抗元，直至1276年，“东布洲”（东州市）还以财货支撑着南宋政权。南宋的爱国官员们面对的现实是：南宋政权尚存时，必须维持这个政权；南宋政权灭亡后，则努力复国。就海盐生产而言，在宋代北部沿海盐场沦入敌手的情况下，马端临如果要弄清涉及南宋国计民生的海盐生产仅余家底，就得正确；就刑事资料而言，宋廷不可能把流放犯人的“东布洲”写成“东北洲”。马端临治学严谨，他改“东北洲”为“东布洲”应当有刑事资料做依据。这也是如马氏自己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所说的，“研精覃思”的一例。南宋时东布洲早已与通州大陆涨连，洲的故土还在，洲上已有行政镇市的东州市，对其沿革进行考证并不困难。这样的调研成果尤其可信。



《宋史·刑法志》是元代官员的作品。在政权更迭的条件下，后朝各部门分别接管前朝相关部门及其下属各机构是惯例。元代刑部不可能不关注宋代的刑部及其下属机构，甚至留用前朝吏卒。有关接管官员在东州市接管宋配隶犯死罪获贷懦弱者的机构，也只能根据实情上报元廷刑部。元廷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出产税货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元廷是不可能弄错名称的。这也反映了在宋初的东布洲上，南宋时已出现建制市镇东州市。这是从另一角度对马端临考证“东北洲”为“东布洲”的有力证明。如果马端临和《宋史·刑法志》的作者能在丰利外海或石港湾中找到这个位于“东北洲”的产盐监所，那么，《文献通考》和《宋史·刑法志》也许就不会分别记作“东布洲”、“东州市”了。从这个角度看，马端临与《宋史·刑法志》的作者分别让“东布洲”、“东州市”承继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记录的其他内容，这就说明了三条资料中东北洲、东布洲及东州市之间的沿革关系。

著名史学家陈垣曾提出对史料的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及理校。上引中华书局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对“通州沙门岛”的校对采用了对校与他校两法，将之校正为“通州海门岛”，而马端临改“东北洲”为“东布洲”采用的则是理校法。这必须联系当时各种历史发展的背景和线索，运用逻辑思维对事物进行考证，这是一种更科学的考证方法，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力，没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术见识，是难以运用的。

至于持论者说丰利东北海中的“海门岛”，或者“清末民初坍塌的”环港一带的“海门岛”，是宋代“通州海门岛”，均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东北洲”而生。退一步说，即便历史上的确有，就地域归属言，它也只是扬州或泰州的海门岛，与通州无涉。因为它发育形成初期尚无这个通州，

而有扬州；且明代之丰利属泰州之如皋。此两说之结论是否正确，不能仅凭岛的方位来认定，还应运用史料考证中的内校与外校法，对所引史料进行鉴别，否则就有孤证之嫌。在沿革不明的情况下，坚持说此岛即宋初“通州海门岛”并不奇怪；在沿革已明的情况下，除非有信史佐证，否则，便难以令人信服。

(3) 与宋初海门县相关的历史地理资料

北宋初期的海门县以怎样的自然地理状态存在于通州东部地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我们对南通地区的形成历史作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下列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北宋初，海门县是建立在江口沙洲上的，也就是说，那时的海门县是以群岛的形式存在的。北宋《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

四至八到……东至大海八十里……东南至海，
州下口海门县界六十里……

海门县 东南隔海水二百余里，六乡。本东州镇，因州升为海门县。

南宋《舆地纪胜》卷41通州：

海门县 《九域志》云，在州东二百十五里；
《通川志》云，本东州镇，东南隔海水二百余里；
《舆地广纪》云，本海陵之东境，周显德中置；《寰
宇记》云，本东州镇，因置通州升为海门县。

从《太平寰宇记》所记判断，宋初通州东南方向行60里到海边，也就到了海门县界，而海门县治所在与通州州治所在之间的距离为200里，且州、县间被大海阻隔。这说明宋初海门县是在通州东南海中，县治所在镇称东州镇（一作东洲镇）。那么，这个海门县和海门岛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



肯定的。上文曾述及《舆地纪胜》引《通川志》说，五代十国中的吴政权改“东州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如何理解改东州为丰乐镇？可作两种解释：第一，东州因位于东洲之上而得名，称东州镇，吴改东州镇为丰乐镇；第二，东州与下文的顾俊沙、布洲对应，应为“东洲”，吴在东洲上设丰乐镇。总之，除狼山镇外的三个镇均在大江口大海中的沙洲上。这三个设立于沙洲上的镇，于周显德五年海门建县时均纳入该县的管辖范围之内，并因之而废“镇额”，这些史料在《舆地纪胜》上写得清清楚楚。上文已经对东洲、布洲合为东布洲作了分析，且顾俊沙上设过崇明镇，与上述海门岛的范围比对，海门县与海门岛关系之密切，是不可讳言的历史事实。就逻辑关系而言，县境之地与岛是包容关系。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与道光《海门县志》均收录了清代学者陆进的《海门岛赋》，赋有序：

……独海门岛者稽《禹贡》所载，扬州之域有云岛夷卉服。蔡沈注云：在东南海中。兹登狼山遥望东北，隐隐一痕，其即是与？爰为之赋。

赋文中有这么一段：

……迁客骚人每怅悵于负秽临深之地。烟波杳霭，锦禽藉此以栖迟；浊浪排空，樯乌因之而托寄。戴青山畔，西僧以此安禅；吕四场边，仙侣于兹游戏……

陆进作的赋，试图写出海门岛的历史渊源，这与我们今天对某事物做探源的研究一样。他在序文中引用了蔡沈的注。蔡沈，南宋学者。蔡沈所注，是对《禹贡》“扬州之域

有云岛夷卉服”中的“岛夷”而言的。陆进却把这个注套用了海门岛上，这就错了。但是，这一错却从另一角度反映了陆进对海门岛所在位置的认识，亦即海门岛“在东南海中”，从而就代表了清代学者认识海门岛的一种观点。陆进赋文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如戴青山、吕四场都是宋海门县境内的地名。可见，清代学者陆进也是把海门岛与宋海门县相联系的。

“通州海门岛”作为有宋一代司法、财税、商业等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其丰富的内涵：第一，时限定量，北宋初年或宋代；第二，功能定性，用于配隶犯死罪获贷者，从事官家煮盐的经济开发；第三，属州定位，指出海门岛在通州辖境内；第四，管理定类，豪强难制者配隶“崇明镇”，懦弱者配隶东布洲。研究宋初“通州海门岛”不能离开这四个基本要素。否则，就会把时间、空间概念混淆，而更难理清原本就不十分清楚的这一史实。

3. 明代史料中的“通州海门岛”分析

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中科院地学部学部委员谭其骧先生生前谈及历史地理资料信度时一再告诫：明代学者的史料往往疏于考证，引用时一定要谨慎，要多加研究；相比之下，清代学者重视考证，著作相当严谨，不轻易下结论。在关于“通州海门岛”的问题上，明代地理资料中的记录比较复杂，其文字记述多有与宋、元史料相同之处，有后代学者传承前说的痕迹。就地理位置来说，通州地方志及地图一般记其位置在“州东北海中”，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则认为海门岛在州东南海中，另有兼采两说的。我们在引用这些史料时，就应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辨别真伪，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分析，得出合理的结论。

在明代史料中，关于海门岛的位置有位于通州“州东北”与“州东南”两种说法。通州地方志中多持“州东北



说”，而正史及地理著作则持“州东南说”。由于明代资料对通州海门岛的方位说法不一，因此给我们今天正确认识“通州海门岛”的问题带来了困难。历史研究可以提出假说，而后对之加以证明。其中，就有个正确对待史料的问题。一般而言，假说提出后，必须对其所引用的史料及研究方法进行验证，通过了科学验证的假说才能成立。而只有在对各种史料都进行研究后，才能作出假说是否成立的判断。对于明代史料中所记录的“通州海门岛”位置，不能单凭一两条资料就判断孰是孰非，轻易下结论。特别要注意的是，引用明代史料确定宋代流放犯人的宋初“通州海门岛”地点时更应慎重，要从自然、社会两个方面的多个角度切入，作综合研究。

(1) 关于海门岛位于通州“州东北海中”的史料

①通州地方志

持海门岛位置在“州东北海中”说法的有明嘉靖、万历两部通州志，且万历《通州志》（丁丑志，1577年本）卷首附古迹图把海门岛标于通州东北方。明嘉靖《通州志》（1530年本）卷1古迹·海门县：

海门岛 在州东北海中。宋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于此，有屯兵使者领护。今没于海。

明万历《通州志》卷5古迹：

海门岛 在州东北海中。宋犯罪者多配于此，有屯兵使者领护。今没于海。

万历《通州志》卷8遗事：

宋初，凡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洲市。

明代嘉靖《通州志》与万历《通州志》两书的“古迹”中关于“通州海门岛”记录的内容大体相同，两条记录仅在岛的功能上继承了宋代海门岛的部分作用，但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认这个“海门岛”与宋代“通州海门岛”的同一性的。州志作者对海门岛位置的认定，在责任感与使命感两个方面，远不能与《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相比。前已指出，马端临面对的现实是：在南宋政权尚存时，维持南宋政权；在南宋政权灭亡后，则力图复国。因此，马氏对于南宋政权重要财货来源地和刑事执行地之一的东布洲，不可能不调研清楚再作记录。而嘉靖与万历州志的作者面对的只是古迹，于政权存亡无关痛痒，其所下的功夫难与马氏比肩。从万历《通州志》所记来看，其作者在“古迹”与“遗事”中的文字，系兼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刑法志》有关内容的综合。可见，此书作者并不赞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海门岛之一为“东北洲”而赞同《宋史》“东州市”之说。其卷5“古迹”中所记“州东北海中”的海门岛，显然与宋初包括崇明镇、东布洲在内的海门岛有别。正因此，万历州志的作者把另一部分内容列入“遗事”中，而没有把数说融为一体。万历州志所说并无大错，只是语焉不详。

就“古迹”而言，既是古迹，就不能依据这些记录十分肯定地说明代还有海门岛。这是因为如下的原因：首先，明万历《通州志》中海门岛的文字说明，列在“遗事”之中，而这些说明及记载中都没有增加属于“明代”海门岛的相关资料，所记的内容显然是属于“宋代”通州海门岛的记事。其次，嘉靖、万历通州志均说海门岛“今没于海”，那么就不能据此推定位于“州东北海中”的“海门岛”是在嘉靖年间还是在万历年间坍“没于海”的，由此造成了“明代”海门岛消亡时间的不确定性。再次，现存明代的著作中尚没有发现“明代”海门岛存



在的其他文字资料，两州志后承前说，这种资料是不能用来互相印证的。

明代学者邵潜在其著作《州乘资·遗事》中，对万历“丁丑志”中“宋太祖乾德三年副使李美配隶通州海门岛”的记录做了辩证的评述，对万历志中把宋海门岛相关的资料分列两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余删去原本一百四十一字，增三字。余按，此段宜附于“宋初凡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洲市”一段之后，方有源委，而丁丑志不相连属，良可笑也。

邵潜的评语说明他自己是要维护资料的系统完整性，这两条与海门岛相关的记录列在一起，才能说明“宋代海门岛”的问题。上文已分析了宋代资料，认定了宋初通州海门岛的组成及其方位。万历州志把“州东北”的方位与宋代通州海门岛的职能连为一体，用来解释“海门岛”，并不能说明这个海门岛自宋至明一直存在。可以说，万历州志只是保留了一段珍贵的史料。

② 古海门县图及图说

南通市博物苑存有明代《海门县图》（参见图44）及《海门县图说》（图47），县图中标有海门岛位于县东北海中，与万历《通州志》卷5“古迹”所记方位大体一致。对此图与图说时间的推定，有助于正确认识这个“海门岛”。

从图说的内容可推定图说写作的大体时间。图说中有“国朝凡四徙犹岌岌焉”句。这里的所谓“国朝”即明朝。说“国朝凡四徙”并不准确，这是因为元代时海门县就已经迁移过一次县治，但可说明《图说》应当写于海门县治四徙以后。明末海门成友谦在《濒江坍没已尽疏》中明确提出，“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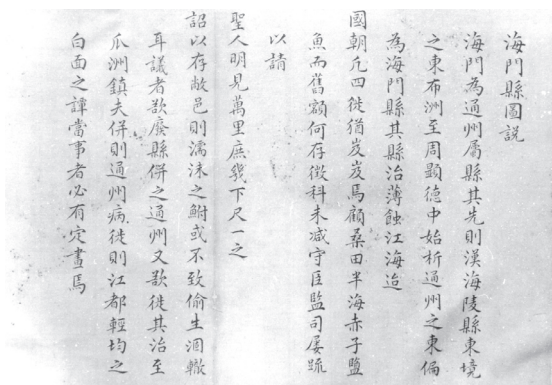


图47 海门县图说(南通博物院收藏)

靖二十四年”(1545)海门县做了第四次迁县。^[1]因此,古县图中的《海门县图说》应成于1545年以后。

古《海门县图》与图说在时间上并不对应。把《海门县图》与明万历《通州志》附图做比对,再参考其他材料,可以推定这幅县图描绘内容的时限。明万历《通州志》附有《海门新旧县总图》。这幅图是海门县城位于余中的治所与迁治余中前的县境状况,图示“海门县新迁余中场地”位于戴青山西边。《海门县图》中,则标明县城西北有戴安山,这个戴安山应该就是戴青山。以戴青山为参照物,海门县城的位置由东向西移动是十分明显的。嘉靖《海门县志》所记“戴青山,土山,在旧县西”可为佐证。因此,这幅古图所描绘内容的时间应在明正德九年,即1514年海门迁治余中场以前。

古《海门县图》不是海门县余中治所时期所绘制的。把古《海门县图》与万历《通州志》中《海门新旧县总图》做比对,古《海门县图》中县城南的大片沃土仍然存在,而万历州志附图中,海门县余中治所东南县境大片土地已坍入江

[1] 清乾隆《通州志·艺文志》。



中。古县图中有地名“新港”，这个新港在万历州志中的海门河渠条有记述：“海门县屡徙而江河亦屡变云。据崔志书其旧者……亦通江，亦县东而在嘉会都云若张港……若新港。”新港在嘉会都，在万历《通州志》附图中，嘉会都土地已所剩无几了。其实，古地图中的新港，在万历州志中已成为“旧者”之河，成为过去的事了。一般认为，古海门县迁通州余中场南的时间为明正德九年（1514），那么，这幅图所描绘的海门县极可能是古海门县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到正德九年一百多年间的情况，但其成图时间则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以后。

古《海门县图》中的海门岛没有说明文字。从以上对古县图与图说的分析可知，这个海门岛，不管如何，是不能与宋初“通州海门岛”相提并论的，因为两者内涵并不相同，这个岛不具备前面述及的有关宋代通州海门岛的四项基本要素。对这个岛可作如下分析：古海门县治的迁移，与地球间歇性暖化所导致的海面上升有关。元代东州市应在海潮一再冲激中坍没。如果没有这样的海蚀，东州市应有可考之地。从后朝刑部接管前朝刑部及其下属机构的惯例来看，明政权会继续使用元政权东州市的监所。但海蚀使县治因坍没而迁移，东州市的监所在那个大坍塌时期必不能幸免。因此，不能排斥这种可能，即东州市的监所迁往海门县北海中某岛。那么，此岛也只能是明政权的某监所之地，与位于宋初通州海门岛上的监所无关。这就是说，如果确有这个位于海门县北的某海岛，也只是在某些职能上承继了宋初州东南海门岛之东布洲的功用，如羁押犯人、生产海盐等，而并非宋初通州海门岛之一东布洲的实体，充其量是明代海门县境某岛。

③《筹海图编》附图

与上述明代“海门岛”有关的地图，还有《筹海图编》

的附图（参见图19）。附图中，有一个名为“海门岛”的沙洲标于“丰利东北”海中。《筹海图编》的作者郑若曾曾在国子监求学，他素怀大志，广泛阅读天文地理、山经海籍。嘉靖中期，东南沿海遭倭寇骚扰，胡宗宪主战东南，郑若曾为其幕僚。在此期间，郑撰写了许多有关御倭方面的著作。嘉靖三十九年（1560），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胜利，为总结经验，在胡宗宪的支持下，郑若曾执笔撰写《筹海图编》，并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付梓。胡宗宪，嘉靖十七年进士，三十三年巡按浙江，参与浙江抗倭军务。由此可知，在嘉靖十七年之前，郑、胡二公深入研究通州地理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于《筹海图编》附图中的海门岛（下称“图编海门岛”），应当把它与同时代的通州地方志联系起来分析。嘉靖九年《通州志》和万历《通州志》均称“海门岛……今没于海”，则明嘉靖九年（1530）时，位于“州东北海中”的海门岛就已不存在了。那么，对时隔30多年的《筹海图编》附图中出现的这个岛就应当认真研究。

《筹海图编》所附沿海图，是一幅示意图，沿海各地呈平面展开式排列，所标方位不如现今地图那么准确，据此推定地理位置，其准确度会受到影响。从这幅沿海图中可以看到，当年的海门县治位于通州余中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推论：此图所反映的情况属于明正德九年，即1514年以后。海门县治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迁通州金沙场南，那么，这幅图所示海门县内容的时间下限应在1545年。因此，可以排除《筹海图编》付梓时“海门岛”存在的可能性。从对《筹海图编》作者的了解，可以推想，郑若曾在图中标出海门岛的依据是通州志或通州地图，而不是当年的海况调研。

“图编海门岛”与上述古海门县地图中的海门岛一样，没有文字记录，难以说明1514年前它自宋至明一直存在。我



们至少可以判断,这不是宋初的海门岛。这是因为:第一,它是单一的沙洲,不可能含有宋时的东布洲、顾俊沙。第二,有明一代,倭寇劫掠东南沿海,特别是多次殃及江北泰州等地,如果“图编海门岛”即宋代海门岛,那么,它有足够的财货量,必定会引起倭寇垂涎而受侵犯。史载,明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间,倭寇曾劫掠沙门岛,遭到平江伯陈瑄的追击^[1],但史料中竟缺少倭寇侵犯海门岛的记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认真的思考。第三,即使有这个海门岛,也只能是如通州志所列,应在通州境内,属通州海门县管辖,而不应位于时属泰州如皋县的丰利海外;即使有这个海门岛,也只能是如前所论,系原址在“东州市”的犯人监所因海蚀而迁的新址,此监所关押的只是明代犯人,是“东州市”监所功能的延续。监所功能的延续不能说明监所载体于搬迁前后的同一性。

“图编海门岛”与上述宋初通州海门岛的内涵显然不同,就目前的史料,尚不能说明它具备宋初通州海门岛的四个基本要素,可以说,“图编海门岛”与宋初通州海门岛之间没有承继的关系。

(2) 关于海门岛位于“州东南海中”的史料

明代地理总志《读史方輿纪要》和《明史·地理志》均持海门岛位于“州东南海中”的说法,并对此做了客观记录。

《读史方輿纪要》卷23江南五:

海门岛 在州东南海中。宋《长编》云,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者,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有屯兵使者领护。而海门岛有两处:一在崇明镇,居豪强难制者;一在东布洲,居懦弱。皆令煮

[1] [明]采九德:《倭变事略》,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57页。

海纳官。兴国五年，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而沙门岛如故。

《明史·地理志》通州：

通州，洪武初以州治静海县省入。南有狼山，临大江，有狼山巡检司。东南滨海旧有海门岛及布州夹。西有运盐河，又东北有石港巡检司。城南有利丰监，宋置。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明一统志》，该书卷12扬州府中，也有关于海门岛的资料：

海门岛 在通州海中。宋长编云，国初以来，犯死获贫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有屯兵使者领护。

《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舛错牴牾，疏谬尤甚”^[1]，但它毕竟保留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这条资料的内容看，它所引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内容与《方輿胜览》所记基本相同。“在通州海中”句，只表明了海门岛的归属。从明代海门县坍塌的情况看，“在通州海中”并不足以说明海门岛于明代还存在。

《读史方輿纪要》基本沿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述，并明确指出：“海门岛有两处：一在崇明镇，居豪强难制者；一在东布洲，居懦弱。”这不仅继承了南宋马端临东北洲即东布洲的观点，而且反映了他对“海门岛”为宋代沙洲的认识。对于海门岛的方位，顾祖禹认定“在州东南海中”。根据对宋代东布洲及崇明镇（顾俊沙）位置的研究，

[1] [清]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68，中华书局1965年版。



这个方位是正确的，但这同样不足以说明海门岛于明代还存在。顾祖禹认同马端临改“东北洲”为“东布洲”的做法，其原因可作以下理解：顾祖禹与马端临所处的时代相似，同样面临着“异族”统治。《读史方輿纪要》既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因而作者就能理解“东布洲”对南宋政权的重要性和马端临修正“东北洲”为“东布洲”的正确性。

《明史·地理志》通州条说，通州“东南滨海旧有海门岛”，说明了作者对明代海门岛存在的态度。“旧有”二字，说明作者否定了自宋至明海门岛存在的连贯性。至于旧到什么时间，则未作解释。从其行文的文风来看，如果明代还有自宋至明存在的海门岛，就会交代其始终。而“东南滨海”却反映了《明史》作者对“旧”海门岛位置的认定。与上述对宋代海门岛资料做分析比对，这个位置与历史上存在于通州东南方向的东布洲、崇明镇（顾俊沙）的方位是一致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清代学者认同李焘、马端临、顾祖禹对通州海门岛的进一步解释。

从对明代有关史料的研究不难发现，《明一统志》《读史方輿纪要》及《明史》用客观记述的手法，基本保持了宋代学者对宋初海门岛记述的原貌，其可信度较大。明代地方志及古地图中关于海门岛位于通州东北的记述，就这个海门岛与“宋初通州海门岛”的关系言，其可信度极小；这种资料中关于海门岛的描述缺少前面提出的宋代通州海门岛必备的“时限定量，功能定性，属州定位，管理定类”四个要素。因此，我们不能认定北宋的“通州海门岛”一直到明代还存在着，且其位置在“州东北”。在讨论“宋初通州‘海门岛’”问题时，持“通州海门岛”位于通州“州东北海中”的第二种观点是错误的。

4. 清代史料中的“通州海门岛”分析

关于记述通州海门岛的清代资料，系辑录宋、明资料而

成，而以辑明代方志资料为多，主要散布在通州地方志与一统志中。就方位言，这些资料记载了两种说法，即位于通州“州东北海中”与“州东南海中”。

(1) 清代地方志保留海门岛位于通州“州东北海中”说

清代地方志中关于海门岛的记述多为对史料的辑录，且继承了海门岛位于通州“州东北海中”的说法。康熙《通州志》卷1古迹：

海门岛 在州东北海中。宋时犯罪者多配于此，
有屯兵使者领护，后没于海。

又，卷15杂记遗事：

宋初，凡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
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
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隶东洲市。

乾隆《通州志》卷3《山川志》中关于海门岛的记述与康熙志古迹条中的记述基本一致。康熙志中称海门岛“后没于海”，比明代方志中的“今没于海”更为准确。尽管它没有写明“没于海”的时间，但至少不会让人产生误解，反而会引导人们去进一步深入研究海门岛“没于海”的具体时间。清道光《海门县志》所记内容与康熙志大体雷同，不再一一列举。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山川志》中记“东北海中为海门岛〔原注：宋时戍有屯兵使者驻此〕”。而在卷末静海乡条中却又综合了宋、明著作中的说法：“《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制，大辟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海门岛有两处：崇明镇以居豪强难制者；东布洲以居懦弱者，皆令煮海纳官。”其中，“宋制”以下的说明承继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内容，而“海门岛有两处”及两处岛的说明，则是引用《读史方輿纪要》的观点。不



难看出，清代地方志中关于海门岛的记录，多继承了明代地方志及地理总志的记录，仅是保留了历史资料而已。

(2) 清代地理总志保存了关于海门岛的历史资料

清代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因其版本有别，对海门岛的记述明显不同，这反映了清代修志学者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与发展。从乾隆、嘉庆两朝的一统志中，更能看出这种变化。《钦定大清一统志》（下称《乾隆一统志》）卷74海门厅·山川·海：

海门岛 旧志在州东北海中。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初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海门岛有两处：崇明镇以居豪强难制者；东布洲以居懦弱者。皆令煮海纳官。至兴国五年，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王象之《舆地纪胜》：东布洲 先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布机流至沙上，因名布洲，既成平陆，民户亦繁。按：海门岛即今厅地。

《大清一统志》（下称《嘉庆一统志》）卷106通州直隶州附图（图48）图示：海门岛位于海门厅东南方。可以说，《嘉庆一统志》的这种画法是对海门岛位置的推定，是对历史的追忆，而不是记实。其在“山川”条中对海门岛的说明文字更能证实这一点：

海门岛 在州东南海中。宋《长编》，宋初，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门岛。海门岛有两处：崇明镇，以居豪强难制者；东布洲，以居懦弱者。皆令煮海纳官。至兴国五年，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舆地纪胜》：东布洲 先是海屿沙岛之地。古来涨起，号为东洲。忽有布机流至沙上，因



图48 清《嘉庆一统志》通州直隶州附图

名布洲，既成平陆，民户亦繁。

上引两种版本的清代一统志中关于海门岛的内容，《嘉庆一统志》对《乾隆一统志》所记做了修改：删去了“旧志在州东北海中”及“按海门岛即今厅地”句。这是因为，海门厅位于通州东南，既然认为“海门岛即今厅地”，那么海门岛就不可能“在州东北海中”。把清代一统志与上引宋、明史料做比对，不难发现，《乾隆一统志》关于海门岛的记录，辑录了通州地方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及《舆地纪胜》的资料，而《嘉庆一统志》中海门岛的资料则与《读史方舆纪要》所记内容基本一致。从清代一统志所记内容来看，清代学者肯定了宋初海门岛的地理范围，否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东北洲”地名，并代之以“东布洲”。清代一统志在“海门岛”条目中引入了《舆地纪胜》关于“东布洲”的史料，这是对海门岛主岛之一东布洲做的进一步诠释。《乾隆一统志》把海门岛条置于“海门厅”中，且记岛的位置与属



图49 清《嘉庆一统志》海门岛说明

地，显然为后来重修一统志的学者所否定。因而在《嘉庆一统志》中，对这个条目做了重大变更。第一，海门岛条由“海门厅”卷中移至“通州”卷。第二，删除位于“州东北海中”与“今厅地”之说。《嘉庆一统志》作者的修改显然是正确的，《嘉庆一统志》肯定了《读史方輿纪要》作者关于海门岛的观点（图49）。

（3）《东洲偶闻录》中的“海门岛”实为海市蜃楼现象

清代小说《东洲偶闻录》^[1]中有一段文字提到海门岛，有研究者以此为依据，试图论证宋代海门岛位于丰利（今属

[1] [清] 曹长恩：《东洲偶闻录》，南通市图书馆（油印本）。

如东县)外海。然而,这种记述不能作为判定海门岛位置的论据。《东洲偶闻录》既是小说,那么,我们就得研究并确定它对海门岛记述的历史信度。

《东洲偶闻录》作者曹长恩,通州骑岸人,清道光年庠生,坐馆多年。《东洲偶闻录》第十六章《归里·海市》部分写下了有关海门岛的内容。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丰利海边时有一段对话,说到主人公铁牛儿的先祖曾在“通州海门岛”服刑,其中就写了“海门岛”的形状。

黄英曰:“曩闻此间有军州岛,羈流人于此煮盐,吾外公之先人实出于此者,今不知其岛在何方矣。”铁牛儿曰:“英姐之外公与吾先人同里党矣。”子骞曰:“汝先人亦流人之裔乎?”铁牛儿曰:

“然。吾先人本徽歙人,因父仇杀豪家父子,以父愤杀人,减死解登州沙门岛。沙门岛吏酷卒狠,流人间又皆犷悍凶蛮,先祖以金赂上下,转送通州海门岛。岛四周环水,流人以煮盐为劳役,虽苦甚,比沙门岛之朝不谋夕、命在须臾有幸多多也。岛或即在此间海中,今早泯没矣。”又谓:“岛居东海中,其形如伞,如菌萼,流人称之为菌子洲,菌柄对陆地,菌伞对大海。柄长十四五里。宽三四里,伞最宽处八十余里,渐向外伸展,紧缩呈一穹窿云。”

小说的“此间”指丰利一带,丰利时属如皋县。因岛已坍没多年,为了寻求海门岛的位置,小说主人公们向一位村学究询问,村学究做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有了以下的一番话:

村学究曰:“客幸听吾言,吾非鼓舌故弄玄虚者流。约十余年前中秋后一日,东方微白,人奔赴呼告曰,海上呈海市矣!吾随众往观,但见海中接天处



现一岛屿，面陆狭长而面海阔，岛上官廨民房，盐灶盐墩，人熙熙攘攘，往来络绎，牛车蠢蠢然杂乎其间，肥马昂昂然奔走道上。有尖于视者，能见盐灶之火熊熊然。前后经两炊饭时，一轮红日将升，赤霞东方万道，此岛遂倏然亡失。从余儿时知事起，海市呈岛屿如海门岛凡三次。两次在此间，一次在数十余里之黄沙洋口。”黄英曰：“奇哉，大造之诡秘，令人匪夷所思。”

为了进一步说明海门岛的职能，《东洲偶闻录》写道：

海门岛亦名菌子洲，据云形似菌子也，以四而环水，便羁犯人。唐宋以来，减死囚徒，多拘于此。两淮盐官，在此屯军督流人煮盐。

阅读《东洲偶闻录》中这些涉及海门岛的文字，只能让人们产生如下认识，即这个位于丰利东北的海门岛其真实性应受到质疑，历史信度极差。第一，这个海门岛出现在《海市》一节中，且根据村学究的描述，这个海门岛的所谓“存在”是一种海市蜃楼现象。这种现象是不能说明这个海门岛位置的真实性的。第二，从所见小说的简介中推测，小说是以19世纪中期为时代背景的。主人公铁牛儿的先祖能上推到什么时间尚属疑问，具明显的不确定性。从科学论证的角度看，这不是丰利东北海门岛即宋代海门岛的力证。第三，丰利时属如皋县，尽管19世纪如皋已属通州，但自宋至明，如皋属泰州管辖，不在通州境域内，说宋代“通州海门岛”在丰利东北海中，难以解释。第四，小说中对岛的具体描绘，不能排除作者收集素材后对文字资料进行加工的可能。20世纪中期以来，口述史学成为现代史学中的一大潮流，口述史料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只有通过“内证”和“外证”

排除其失真成分后,这种史料才有使用价值。小说的史料价值远不如口述历史,要把小说当史料用,那就更得对其情节进行史学考证。要做到这点是十分困难的。把文学作品中某形象的艺术真实当做历史真实,会造成伪事。鉴于此,《东洲偶闻录》中的海门岛即令不是海市蜃楼,也不能用做确定宋初海门岛位置的论据。

对以上清代有关海门岛的资料分析可知,清代资料多系承前传抄或为对宋代史料的理解性说明,这反映了清代学者对“宋代海门岛”的认识程度。康熙与乾隆通州志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嘉靖、万历州志的说法;康熙志与光绪志遗事、轶闻中的记述,则与《元史》《读史方輿纪要》大体雷同。清代通州地方志承明代通州志与《筹海图编》海门岛图,指认海门岛在“州东北海中”,其严谨之处在于两说并存,不轻易否定其中一说,只是客观反映前代的研究成果。

然而,具有配隶宋代犯死罪获贷者且令其煮盐功能的“通州海门(海)岛”即崇明镇与东布洲,其方位只能在州东北或者在州东南海中,二者必居其一。光靠清代地方志的诠释难以讨论宋代通州海门岛,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读史方輿纪要》《明史·地理志》等成果,宋代通州海门岛应位于宋初通州东南海中。

5. 结论

综上所述,《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和明清通州地方志的相关不同记录,是南通地史研究关于宋初犯死罪获贷者官煮盐的“通州海门岛”产生分歧的根源。这种分歧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海门岛的位置,一说在通州东南海中,另一说在通州东北海中。持“州东北海中”说的又有丰利外海、石港湾和环港一带三种意见。第二,羁押犯人的处所:宋初海门县一带的沙岛中,一说犯人中豪强难制者配隶在崇明镇,懦弱者配隶在东布洲;另一说,多数配隶在海



门岛，少数配隶在崇明镇、东北洲。

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李焘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着眼点在总体把握史料，供南宋统治者维护统治；马端临著作《文献通考》在于记录典章制度，检校文献中的失误之处。马端临考《续资治通鉴长编》“东北洲”为“东布洲”，其后《宋史·刑法志》记作东州市，是宋、元司法、财税、商业实践的折光，可信度极大。东布洲、东州市并不矛盾，同一地点名称的变化正反映了宋时沙洲并陆后的历史过程。精于考证的顾祖禹与撰写《明史·地理志》的清代官员，言海门岛位于通州东南海滨，或海中旧有海门岛，有东州市作依据，同样可信度极大。即令丰利外海有历史更为悠久的汉唐长江北支海口的“海门岛”，此岛亦理应属扬州或泰州，不可能是宋初“通州海门岛”，因为通州是五代后周时才设置的，且此岛与宋初“通州海门岛”的内涵并不同一。

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州海门岛”或《文献通考》“通州海岛”指的是位于宋初通州东南海中的一组沙岛——海门群岛，顾俊沙（崇明镇）、东布洲（东州市）是这组沙岛中的两个，用于配隶犯死罪获贷者，官管煮盐。

附：长江北岸沙嘴演变及建置概况表

朝代 地区	汉以前	西汉	东汉	三国	西晋	东晋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泰州 泰县	约在五六千 年前涨出	临淮郡 海陵县	广陵郡 海陵县	广陵郡海陵县 (一作海阳)	广陵郡海陵县 东境	析置 海陵郡	海陵县	海陵县
海安县	约在五六千 年前涨出	海陵县 东境	广陵郡 海陵县	海陵县 东境	海陵县 东境	置海安县属海陵郡， 又置宁海县	无海安县 有宁海县	一度复置海安县
如皋县	西北部约在 五六千年前 涨出	西北部为 海陵县东境 南部为大江	广陵郡 海陵县	海陵县 东境	海陵县 东境	置如皋县属海陵郡，又 置蒲涛县，约在如皋县 南临江县，可能在境内	江岸北退 县废	海陵东境如皋场
如东县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扶海洲	扶海洲	扶海洲	扶海洲与大陆涨接		海陵东境，有如皋镇，已有丰 利、掘港、栟茶等盐场
南通市 南通县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叠豆洲涨出	胡逗洲	煎盐场所，南布洲已涨出，唐末 胡逗洲连陆，有狼山镇遏使
海门县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启东县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东洲、布洲涨出
崇明县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江口海域	东沙、西沙、顾俊沙涨出
泰兴县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海陵东境		江岸向南延伸
靖江县	江口	江口	江口	马驼沙	马驼沙	马驼沙	马驼沙	马驼沙
沙洲县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江口



续表

朝代 地区	五代	北宋	南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现代
泰州 泰县	吴(泰)州 海陵县	泰州 海陵县	泰州 海陵县	扬州路泰州 海陵县	扬州府 泰州	扬州府 泰州	秦县。解放后 设泰州市
海安县	海陵县地	海陵县地	海陵县地	海陵县地	泰州东部	泰州东部	1943年设紫石 县,1948年改海 安县
如皋县	南唐置如皋县属 泰州	如皋县,有海陵 监,段山在江北	如皋县,段山 在江中	如皋县	如皋县。皋南境江 宁乡大部坍没入 江,段山在江中	雍正二年属通州 直隶州	如皋县,1914年 设如西县,1945 年改如皋县
如东县	如皋东部 盐场	盐场属海陵监,有 耕茶丰利掘港虎 墩四盐场	有丰利东西、虎 掘港东陈、虎 墩、耕茶场,置 马塘、古窑场	如皋县地, 有耕茶、丰 利、掘港、 马塘场	如皋县东部地, 有耕茶、丰利、 掘港、马塘场	如皋县东部	1914年如皋 县,1945年改 如东县
南通市 南通县	吴置东洲静海 军便,又改静海 都镇统狼山镇,制 南唐置静海置制 院,后周置通州、 静海县	通州静海县,利丰 监在此,初置八 场后为七场。境内 有石港、西亭、永 兴、利和、余庆、金 沙、兴利七场,利 和场天圣前废。狼 山天圣中涨接大陆	有金沙、余 庆、西亭永 兴、石港永 兴、利和、凡四场	扬州路通 州静海县, 有石港、西 亭、金沙、余 庆、余中等盐场	扬州府通州,有石 港、西亭、金沙、 余庆、余中等盐 场。海门县正 德中寄治余中 场,嘉靖中移治 金沙场南	通州直隶州。 康熙初东部坍 没入江,兴仁、 观音山以东, 金沙、余西、余 庆、余中等盐 场,吕四以南为 江域	南通县。1912 年为南通县, 1949年分为南 通市及南通县, 南通县驻金沙 镇
海门县	江口沙洲	通州静海、海门 县地	通州静海、海 门县地	通州静海、 海门县地	海门智正都、嘉 会都嘉靖中坍没 入江	清初江口水域, 雍乾时江口沙 洲,乾隆中设海 门直隶厅,四十 年涨接大陆	1912年初海门县

续表

朝代 地区	五代	北宋	南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现代
启东县	吴以布洲为大安镇、东洲为丰乐镇。后周置海门县,属通州	海门县有吕四盐场,属利丰监。宋初县在江中,北宋中叶与大陆涨接	海门县有吕四盐场	海门县有吕四盐场,元末县城坍没,县移吕四南礼安乡	海门县礼安乡正德中坍入大江江口水域	清初海门县并入通州,雍正始涨沙为崇明外沙,清末连大陆	崇明外沙,1928年设启东县
崇明县	吴以顾俊沙为崇明镇后周属海门县	海门县崇明镇在长江口	海门县崇明镇置天赐场	崇明州天赐场白岬场	太仓州崇明县县治五灶,明末长沙、亭沙、白岬、南沙等涨成大岛	太仓州崇明县,平洋沙与本岛连接,高东南涨	崇明县,1958年划属上海市
泰兴县	置泰兴县属泰州	泰兴县。孤山在江江北岸	泰州泰兴县	泰州泰兴县	扬州府泰兴县	雍正二年属通州直隶州	泰兴县,1914年属苏常道
靖江县	属常州	常州江阴县地	江阴军地	江阴县地元末张士诚占地	江阴县地、原为江中马驼沙,孤山与沙连接。设靖江县属常州府,明末与江北岸涨接	常州府靖江县	靖江县,1914年属苏常道
沙洲县	江域	江域	江域	江域	段山附近出现小块沙洲	南沙、寿星沙、刘海沙涨出	沙洲与南岸涨接,1961年设沙洲县



参考文献

陈吉余.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地理学报,1957(23-3).

陈吉余等.长江三角洲的地貌发育.地理学报,1959(25-3).

陈吉余,恽才兴(执笔).南京吴淞间长江河槽的演变过程.地理学报,1959(25-3).

二十五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上海:点石斋,1885(光绪十一年).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金陵刻本,1882(光绪八年).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清道光年刊,文选楼影宋钞本.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民国).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上海:图书集成局(二林斋藏版),1901(光绪二十七年).

[清]曾国荃.两淮盐法志.江宁:金陵书局,190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57.

丛书集成(初编)·元丰九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0)·嘉靖通州志.上海:上海书店,1990.

万历通州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

[明]邵潜.州乘资.南通市图书馆(影印),1985.

康熙通州志.南通市图书馆,1962年据1674年(康熙十三年)版油印本.

乾隆直隶通州志.南通市图书馆,据1755年(乾隆二十年)版,油印本.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2)·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影印光绪元年刻本.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3)·民国南通县图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0)·嘉靖如皋县志.上海:上海书店,1990.

嘉庆如皋县志.1808(嘉庆十三年).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3)·民国如皋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3)·咸丰古海陵县志(咸丰五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嘉庆东台县志.1817(嘉庆二十二年).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8)·嘉靖海门县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光绪海门厅图志.1900(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光绪崇明县志.1880(光绪六年)刻本.

民国崇明县志.1924.

南通市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南通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如皋县志.香港:香港新亚洲出版有限公司,1995.

海门县志.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96.

海安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启东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

南通市水利志.合肥:黄山书社,1998.

启东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启东水利志.南京:河海大学出



版社, 1995.

如东县水利局水利志编纂办公室. 如东县水利志(征求意见稿). 1987.

胡焕庸. 两淮水利盐垦实录. 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 1934.

[南朝梁] 萧统. 文选. 李善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范宁. 博物志校证: 卷3.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缪启愉, 缪桂龙. 齐民要术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太平御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987.

[南宋] 文天祥. 文山集. 四库全书·集部.

[日] 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谭其骧. 长水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曹从坡, 杨桐. 张謇全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青墩文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如皋历史文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管劲丞. 南通历史札记. 南通博物苑、南通市图书馆编印, 1985.

特来克与南通保坍史料.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港闸区档案馆编印, 2009.

跋

南通地区沧桑多变，但从未有人研究过此变化过程。陈金渊先生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第一人。

1961年秋，陈金渊持钱啸秋老师的信来找我，要我为之考虑一个研究课题。他早年就学于南通中学，钱啸秋是他的地理老师。解放后，他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的研究人员，调回南通后在人民银行工作，打算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地理研究。我提出研究南通地理变迁的建议，他欣然接受。原来，他对此已研究有素，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我的建议与他的主观意图完全吻合。在研究资料方面，又得到南通市图书馆袁明馆长的支持，研究很顺利，于1962年国庆前夕写成了4万多字、18幅图的《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初探》。

陈金渊送了一册《初探》复写本给我。我阅后深感很有价值，如南通原是江口沙洲等论断，言之有据，分析合理，是地方志中未见记述的。复写本的纸质差，字迹欠清晰，难以长期保存，必须抢救。“文革”期间，我们请示了文化局的分管领导，他同意印发油印本书稿。刻印书稿的任务，由我的同事徐志楠担负起来。1973年，博物苑百废待兴，老徐工



作繁重。他利用工作间隙为之刻写，油印、装订一手承办，于1974年初完成。其时，陈金渊接受审查，尚未落实政策，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陈金渊参加了学术活动，但油印书稿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书末，我写了“说明”，列举了几个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包括海安出土的麋鹿角和古树干，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和陈桥出土的姚徐夫人墓志，都可与《初探》中的材料相互印证。我们对古麋鹿踪迹的探寻，最初也是受到《初探》启发的。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油印书稿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地理、地质、水利、建港、考古等科研项目和编史修志，都引用了此书的观点和材料。打倒了“四人帮”后，我们在油印本封面上补写了作者的名字。1980年，经程灼如建议，我们请陈金渊将书稿压缩到2万字（他同时作了修订和补充），在程编辑的《南通市科技》连载，原题《初探》改为《探索》。陈金渊仅看了第一部分的校样，便猝然病逝，终年65岁。

1982年，南通市地学会和土壤普查办公室据连载稿印成单行本。1983年，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主编的《历史地理》第三辑发表了《探索》的另一个文本，那是作者次子陈昊作了校订的。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教授对陈金渊的著作很赞赏，李俊民同志生前也曾带信给我，关注此著作的发表情况。

陈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曾与管劲丞先生多次商讨，且时有争论。这是近年陈昊告诉我的。我在整理管氏遗稿时，发现管对陈著作中提出的一些论断，曾详加考证，结论是一致的，如札记《胡逗洲是古通州地》等。这说明他们两位在学术研究上都是一丝不苟的。

穆 烜

2009年9月

后 记

倾注了父亲多年心血的《南通成陆》一书在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的直接关注下终于付梓了。

1961年,父亲从北京调回家乡工作后,曾拜访旧时业师钱嘯秋先生。言谈间,钱老嘱他把南通地区的发展历史写出来。不久,中共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穆烜先生与他交谈,建议他研究南通地理方面的历史状况这一问题。这样,研究南通地区成陆过程便作为一个课题定了下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十分支持,因为这涉及《中国历史地图集》长江口沙岛及江口以北江海岸线的画法。此前,多种历史地图对长江口北侧江海岸线的走向难以确定,把南通地区发育过程规律探讨出来,无疑是对历史地理研究中这个空白点的突破,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亦可资借鉴。南通地区有关历史自然地理的文献不多,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教授对长江三角洲的自然地貌研究颇丰,在这个基础上,父亲结合历史文献写成《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初探》一文。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带先后出土了麋骨、唐代沉船等,初步证实了本文一些论点的正确性。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期间,父亲曾在各大



图书馆查阅资料，对历代地理著作比较熟悉。南通市图书馆古籍收藏丰富，当年，古籍、特藏部的王子昌、冯昭两位先生陆续调出相关资料供他使用。《舆地纪胜》南通馆无藏，于是，两位先生与友馆联系借阅。1961年，我高中毕业，因病未能参加高考，于是一面养病，一面在父亲指导下收集、整理资料，成为他的助手。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父亲发现了本地区沙洲并陆的自然规律，于1962年国庆节前写成初稿，因条件所限，修改稿除送北京、上海外，只留下了几本手抄复写本，市图书馆有藏。1974年，市博物苑刻印了未曾署作者姓名的油印本。1980年，父亲将《初探》进行了修改，定名《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在《南通市科技》上连载发表。这是此文简稿第一次署名面世。可惜文章还未刊完，父亲便因病不幸去世。文章发表后，深得读者的好评，受到有关单位的关注。1982年，时任市地学会秘书长的顾斌同志提议由市地学会与市土壤普查办公室联合编印父亲发表在《南通市科技》上的这篇文章，编者认为，《探索》“在《初探》的基础上，删繁提要，添进本地区田野考古的新发现作为例证，增加近年来江岸发展趋势和展望一节，并从地学的角度对地区和市的基本建设问题，提出积极性的建议”，“对地理历史研究、城市、工业、海港建设、农业生产及南通地区土壤形成、分类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父亲病逝后，我把《初探》投寄《历史地理》，因受篇幅限制做了删改，于1983年发表。

1964—1978年，我在海安县角斜插队，回城后任教之余，即随父亲研究南通地理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如古海门县的迁移问题、某些时期江海岸线示意图的画法等。当年父亲因另有研究任务而未能对原稿再次修订。父亲去世后，我即遵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先生“承父志”之嘱，做进一步研讨。现在，有关认识已基本清楚，我对原稿欠妥之处进行了

考订。本书稿以父亲的原书修改稿为底本，参照南通市地学会文本，并对照历史文献进行了校正及修订。本书印行前，对原稿做了结构调整，增加了对本地历史沿革等研究及海涂开发的内容。原书稿附图25幅，增加了《南通市科技》上发表的1幅，另增5幅，计用31幅图；后经丛书编委会提议，增加了26幅照片插图，共用57幅图。本书研究资料一般止于清末，海岸线研究资料止于当代。本书的观点是在研究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仅是阶段性的成果，一家之言。随着新的实证史料的发现，理当有新的发展，还待共同努力。

书稿完成后，祈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陈吉余先生为本书作序；穆烜先生把他的《陈金渊探索沧桑》一文做了修改，作为跋；姜光斗先生对书稿进行了审读。多年来，南通博物苑、南通市图书馆为南通成陆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书稿修订过程中得到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博物苑赵鹏同志也为史料的核对多方帮助；南通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姚剑湘同志提供部分照片资料，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黄银土、董跃南同志，南通市华民彩印有限公司郭为民同志为编制图稿提供了技术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史海浩瀚，本人学识有限，错误及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陈 灵

2009年10月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点。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序

20世纪60年代，南通陈金渊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写了一本《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的书稿，虽未出版，但亦流传颇广。我曾有幸阅读，颇多启发。该书稿有史有图，典籍有据。40年后，其哲嗣陈炅就其原书稿进行整理，增补充实，使《南通成陆》一书正式出版，希我写序，我应允了。

南通位于长江河口北岸，依岗岸为托，两千多年来多次沙岛并岸，成陆过程殊为复杂。长江河口发育模式，南北两岸殊有差异：南岸以岗身为托，滩涂淤涨，一条条海堤向外推展，记录着不同年代的岸线。北岸则是一代代沙岛或沙岛群并岸，使南通地区不断扩展。它的成陆过程是很复杂的，而况还有长江主泓摆动，并岸沙岛，又复坍去，时过境迁，再度涨出。所以，分散而不完整的历史记载，需要考证、推敲、梳理、复原，颇费时日；而且，历史记录语焉不详，又多争论，其论证难度，就比较南岸大了一些。

比如，扶海洲靠了岸，继之以壶豆洲（胡逗洲）并了陆，又过了多少年代，沙洲演替，行政建制亦代有变化。一旦长江主泓摆动，原来大片陆地沉沦江中，而后河势再经涨复，所以，研究成陆过程就遇到诸多难以解释或者悬置的问题，



证之今日长江洲滩多变,就可知研究南通、启海江滩的变化历史,依据记载,寻证其迹,有时会有难度存在。

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洲滩并岸、地区成陆,陈金渊先生父子相继,于洲滩变化的过程中,论证了南通成陆的历史,这对研究长江河口的发育而言,是一项重要贡献。

陈金渊

2009年9月8日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教授)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南通的自然地貌及其成因

地貌分区.....	8
南通地区形成的主要原因	15

汉唐期间如皋以东地域的扩展

汉代江岸线及古扶海洲	20
唐以前江岸的扩展及胡逗洲	36

宋代以来江阴、如皋江岸的变迁

泰兴靖江的涨接和江岸南移	50
如皋南境的坍塌	55

宋代以来南通海门的巨变

通州狼山以西江岸的变化	68
-------------------	----



通州东部涨坍史	84
启海平原的形成	103
崇明岛的变化	110

唐代以来海岸的变迁

沙洲涨接与海岸线的延伸	117
宋代到清初的海岸线	120
三余海积平原的成陆	127
海涂开发与海岸线的延伸	130

唐代及唐代以前行政归属

东晋及东晋以前的行政隶属关系	136
东晋至唐代的行政隶属关系	146

五代以来的行政机构演变

五代至宋、元的通州及各县	165
明清时期的通州及各县镇	183

南通市县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五代姚氏集团的姚存和姚制	208
“通州海门岛”的史料研究	221
参考文献	256
跋	259
后 记	261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通成陆 / 陈金渊原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81137-619-7

I. ①南… II. ①陈… III. ①地理志—南通市 IV.
①K925.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7628号

书 名	南通成陆
原 著	陈金渊
校 补	陈 昊
责任编辑	金振华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6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619-7
定 价	22.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